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第六辑·

#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女子高等教育

——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

朱峰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吴梓明主编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

(第六辑)

---

#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

朱 峰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年·福州

This One



76E8-HBJ-3CEX

Copyrighted material

# 总序一

基督教传入中国,可分四个时期:即唐代的景教为第一时期;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为第二时期;明代的罗马天主教为第三时期;及至清代的基督新教为第四时期。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是始自19世纪,英人马礼逊牧师(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于1807年来华传教时。由于当时中国采取闭关政策,严禁传教士进入境内传教,马礼逊牧师只得在马六甲开办第一所教会学校,时为1818年,该校名为“英华书院”。办学之初,马礼逊的理想有二:一是为促进欧洲与中国间语言文学上的相互沟通,让欧洲人士可以学习中国的语言及文学,也让华人可以学习英语,接受西欧文学与科学成就;二是透过学校教育,促进基督教思想在东亚和平的传播。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开始积极在中国内地兴办学校。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传教的热诚,要促使“中国基督教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借助在政治上取得的优势,可以在各通商口岸兴办学校,教会学校的数目因而剧增。根据晏文士(Charles Keyser Edmunds)在《中国现代教育》一书中的报导,1918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的统计已高达6000所,学生超过15万人,分布如下:

学校类型	数目	学生人数
幼稚园	15	3,196

初级小学	5,276	133,826
高级小学	575	19,605
中学	233	12,533
专业院校	28	1,499
师范院校	56	不详
神道学校	31	985
职业学校	40	1,409
孤儿院	49	1,544

基督教教育事业因此构成了中国教育系统中一个重要部分。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的幼稚园、中小学、师范院校以至大学及研究院校,先后有一百多年的岁月,在中国教育、文化、医疗、科技、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至深且巨。今日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交流史,甚至是近代中国政治史、近代科学发展史、法律史或建筑史等,都可以在不同层面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与基督教教育有关的课题。至于基督教教育的资料也逐渐地成为近代学者所留意和重视的目标,并作为他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80年代开始,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学者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兴趣愈来愈浓厚,尤其在基督教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更有显著的成就。1989年6月,在武汉举办中国40年来首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章开沅教授对国内基督教教育史研究有如下的评价:“毋庸讳言,教会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经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抨击。”他接着补充说:“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判虽然不无事实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出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



区别开来。……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

近年来,国内学者先后举办多次国际性研讨会,即如1991年6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研讨会”;1993年10月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1994年3月在四川大学举办“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等。这些学术研讨会正是反映出中国学者正视过去的基督教教育事业,重新肯定基督教教育事业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及成果。福建师范大学高时良教授在他的近著《中国教会学校史》一书,明确指出教会学校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品”。至于近代学者应如何看待基督教教育的问题,高教授认为“应当全面地看问题,对它进行科学分析与总结。……既否定教会教育中的消极因素,又肯定其值得参考的经验,做到实事求是,对其办学成绩和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换言之,国内学者已积极采取较客观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全面地及实事求是地从事中国近代基督教教育史的研究。

为了肯定国内学者近年研究的成果,以及进一步推广有关基督教教育的研究,华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决定出版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促进会成立宗旨有三:一、联系香港及世界各地华人基督教宗教教育工作者,并借资讯促进彼此之交流;二、推动教会关注宗教教育,加强联络网;三、普及基督教教育研究的成果。该会自1989年在香港成立以来,曾积极接触从事教育工作或教育研究的信徒和学者,建立沟通的桥梁,达至相互的交流、促进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发展。除分别举办学术讲座、座谈会、训练课程、研讨会外,还有出版《通讯》和编撰《迈向九十年代的基督教

宗教教育》专书等工作，备受香港宗教界与教育界的尊崇。

至于对国内联系方面，近年经常主动与国内学者接触，参与国内举办有关基督教教育各种学术研讨会，由是加强两地学者交流往来的机会。本丛书的出版计划是缘起于1994年3月在成都四川联合大学举行“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其中一群来自中国不同地区和香港的学者，相聚间谈及国内有关基督教教育研究的专论著述不多，尤以丛书形式出版的专书更少。鉴于现代中国社会极需有较客观、更科学化及实事求是的研究著作，应在有关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的课题方面作出深入研究。有见及此，学者们建议彼此携手，共同撰写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以补这方面学术著作的不足。于是各位学者推举本人为丛书的主编，负责联系大陆、香港两地具有学术水平、专门研究基督教教育的学者，并策划有关出版事宜。本人适任华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主席，蒙学者们错爱，遂答允肩负出版丛书的重任。返回香港后，本人先后联系大陆、香港学者共八位，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史静寰博士、山东大学历史系陶飞亚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王立新副教授、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黄新宪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徐以骅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读博士学位之朱峰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刘家峰博士、及山东大学历史系刘天路副教授。他们均同意参加此项计划，并约定分工撰写下列七册的丛书：

- (一)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 (二)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
- (三)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
- (四)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
- (五)吴梓明：《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
- (六)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七)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

本辑作者朱峰先生刚在香港完成其硕士论文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个案研究》,而《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本也是丛书构思出版时的一个课题。我于是邀请朱先生进一步研究金陵女子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作个比较,写成本辑出版面世。

这项丛书出版计划,标志着大陆、香港两地学者首次携手合作,共同撰写有关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课题的专论。丛书的特色除了由两地学者共同撰写外,更是十分着重客观的研究及事实的陈述,尤其是从正面、系统地探讨西方传教士过往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1807~1952),在中国社会所提供的基督教教育(包括教会或差会所兴办之中、小及大学机构),以及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作者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多种层次去探讨,目的是要将基督教教育过往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影响作出客观的论述及阐释,冀能引发更多学术交流。本丛书为使能符合一般学术著作的要求,各书均有详录所引的注释及参考书目,以方便读者进行研究。

本丛书得以顺利完成,实有赖各位作者的衷诚合作,不负所望,完成艰苦的撰写工作。1995年初,适逢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从事学术访问研究,借此难得的机会,我们恭请章教授执笔,为丛书作序,获赠鸿文,使丛书增添无限光彩,谨此衷心铭谢!

本丛书能如期出版,我们更须感谢香港圣公会诸圣堂等慷慨捐助教育专款作为丛书出版经费,并蒙福建教育出版社支持出版,乃底以成,谨此致谢。

吴梓明 谨序

于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

2001年12月31日

## 总序二

---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是源远流长且具有普世性的重要宗教之一。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也有一千多年的漫长历程，其间虽然多经严重挫折与长期停顿，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 20 至 30 年代间，又复得到比较明显的发展。基督教的信徒虽然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佛、回、道等业已完成本土化的各大宗教，但由于其兴办的各项事业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媒体，因此所产生的影响之深远亦未可低估。

教育是基督教在华事业的重要部分，除了神学教育外还包括各个种类与各个层面、各种形式的世俗教育，而对中国社会影响更大的正是世俗教育。这不仅是就学校和师生总数而言，更重要的是世俗教育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直接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无可讳言，早期的较低层次的基督教教育，多半是为传教或培养宣教人才而兴办。其中有些草创阶段的学校还具有救济与慈善性质，当然救济与慈善也被视为传递福音的信息，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基督教的传播。由于 19 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在华传播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支持与庇护，许多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



而且持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态度，有些人甚至直接为殖民主义的侵略活动服务，所以“中华归主”之类口号自然会受到中国民众的厌恶与抗拒，被解读为西方侵略者“征服中国”的同义语，乃至激起20世纪20年代风起云涌的非基督教运动，而基督教各类教育事业亦曾受到严重的冲击。

但是，与任何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都存在着冲突与融合，排拒与接纳两种趋向一样，上述情况只是基督教在华事业遭遇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基督教内部也存在着逐渐加强理解、吸收中国文化的顺应趋向，与此相应的则是很早就出现了中国基督教“自传、自治、自养”的主张，以及其后“本色神学”探讨热潮的兴起。历经多次反复的激烈碰撞乃至对抗，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以各级基督教学校向中国政府教育部门注册为标志，基督教教育迅速走上本土化、世俗化和知识化的道路。对于这条道路的选择，其利弊功过在基督教内诚然有激烈的争议，因为世俗化的结果必然是教育功能的迅速彰显与宗教功能的日益淡化。但从基督教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自身发展而言，唯有世俗化才能赢得政府与民间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否则便很难承受，公立学校与其他私立学校的强力竞争，甚至连继续存在都会受到严重威胁。前些年我在美国教书时，有的天主教大学知道我正在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便邀请我参加座谈会。我曾谈到中国教会大学之所以一度得到迅速发展，是由于它们的决策注意到：（1）努力满足社会需要；（2）利用有限资源，着力办好两三个领先于全国的有特色的专业，决不追求“大而全”。这些天主教大学同事对此倍加赞赏，因为他们的学校也正面临类似的困难抉择，而从学校自身来说，存在与发展毕竟是性命攸关的首要问题。后来我到台湾东海大学访问，知道夜间部的创办对该校的发展厥功甚伟，但却受到有些教会人士的指责，称之为“不务正业”、“偏离了办学

宗旨”。这或许也可以看做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世俗化问题的争议在台湾的延续。

但无论如何，世俗化毕竟为基督教教育事业增添了活力，开辟了通向社会并为社会所认同的道路，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虔诚而多少流于偏执的基要派必然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他们认为福音的传播主要得靠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对话，颇为近似传统儒学所一贯提倡的“内省”。但现代神学的诠释早已多元化，把基督精神外化为世俗精神，把“Serve God”与“Serve the Society”统一起来，把“与上帝对话”溶于“与人民对话”之中，也未尝不能促使基督教得到复兴，至少是可以发扬基督教文化的优良部分。或许可以说，也正因为如此，基督教教育才能对中国社会的走向现代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吴梓明博士主编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经由福建教育出版社鼎力协助出版，正好为我们研究上述这些问题提供一套重要的参考书。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多年从事基督教教育研究的学者，他们分别从国学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科学文化专业、教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神学教育、近代妇女等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这些选题虽然未能包括基督教教育的全部内容，特别是没有专门论述基督教的出版事业等，但是大体上却能涵盖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主要方面。因此，通过这套丛书，读者对于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将可获致比较客观而又深彻的认识。

我对基督教教育的研究侧重于高等层次，深感基督教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十余所大学很有成绩，在专业人才培养与新型学科的开拓两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如果仅就教会大学的教育功能着眼，它们与亚洲其他地区的教会大学相比较，自有其优胜与成功之处。正如一些中外学者所曾指出，教会大学已经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



用，不仅培养了大批新型人才，开创了许多新兴学科，而且它们的校园、建筑、设备、图书乃至留校服务的师生，仍然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继续作出贡献。同时，教会大学还留下许多成功的或失败的办学经验，这也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只要加以正确总结，便可成为当前深化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借鉴。

1979年以来，由于出国机会较多和任职学校的历史渊源，使我得以结识许多以前曾经在中国教会大学长期服务的教职员及其子女。根据我的了解，他们虽然在1950年前后离开中国，但绝大多数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衷心希望中美两国恢复正常邦交与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以燕京大学夏仁德教授(Dr. R. Sailer)为例，他不仅敢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公开向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新中国代表握手祝贺，而且还不顾横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的威胁，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强烈谴责美国飞机轰炸上海的野蛮行径。1982年秋天，我有幸在华盛顿郊区他的儿子家里小住数日，这位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第二代”，当时正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繁忙的律师业务之余，尽心尽力地推动美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我们曾一起满怀激情地大唱当年流行于教会大学校园的各种歌曲，包括迎接解放的革命歌曲。歌声使我们回到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歌声也唤醒了我们之间沉睡已久的固有情谊。类似的事例我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无论是我个人的生活体验，还是通过中外历史研究的心得，我永远相信世界上的好人占绝大多数。对于那些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青春，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的外籍教会人士，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以应有的尊敬。

我之所以要说这些似乎“题外”的话，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评价常失于偏颇，而其实对它们的切实研究非常不够，甚至缺乏起码的了解。现在，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力求

客观地、也更为超越地研究这种历史课题，使人们获致比较符合当年实际的全面理解。基督教并非专属于西方，它也属于世界，是人类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老是把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其实它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已经逐步融入中国社会，极其量只是有时间长短、程度深浅、范围大小的差别而已。基督教教育，经过几代中外人士一百多年的努力，早已不是外来事物，而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不加珍惜而随便唾弃。即令是基督教神学教育，除狭义的教育功能外，更具有满足一部分人民灵性生活需要的宗教功能，我们也不可以简单粗暴的态度随意加以否定。我认为，基督教教义的正常宣传，特别是多年以来基督教内有识之士对于汉语神学的艰苦探索，也属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相互融合，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丰富与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大力提倡研究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加强对基督教文化，特别是中国基督教文化的研究，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将有益于当前的人文精神重建。

是为序。

章开沅

于香港马料水客舍

1995年夏

# 序 言

---

面对 21 世纪的挑战，中国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便是如何培养适合时代发展的人才。教育不但是国家社会现代化的基础，更是迎向未来的重要装备。

回顾近代中国教育史，教会所办高等教育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尤其对占了社会半边天的女性接受大学教育方面，教会所办的金陵女子大学与华南女子大学更是处于开创和领导的地位。由于种种原因，教会对现代中国教育发展的贡献一直被忽视甚至被贬低。这种不客观、不实事求是的态度，非但阻碍了学术研究的发展，更无法在历史中吸取养分作为发展现代教育的资源。

这种情况最近有了一些变化。学术界对过往中国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研究兴趣正在稳定地发展，而微观地就个别院校作研究的计划亦在展开，华人学者参与这方面的研究不断增加。在此学术背景下，朱峰同学在其哲学硕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全情投入，不懈地发掘材料，获得不错的成果。此书的出版正是这方面的明证。

朱峰同学以及自己熟悉的福州华南女子大学为研究起点，扩展至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研究，使其对现代中国两所女子大学可做出较全面的认识与比较。其独特之处，在于将个别学校的研究

置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历史背景中处理，以校长的领导方式和办学理念为例，追索女子大学的发展经验，并且将焦点放在其“校训”的理解和实践之中，以量度这两所女子大学的成就，更辅以校友的经验为佐证，使本书不但与现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相连，而且资料充足，令作者能在枯燥的历史材料中，发掘出很多充满人情味、令人感动的历史片段与对话，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赋予历史一种少有的生命感染力。

妇女在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地位，尚未普遍提升至与男性完全平等的位置，而本书特别提出该两所女子大学在建立女性主体意识中面对、克服困境的经验，这是一个较少受注意的角度，是本书对妇女研究的贡献。此书的出版，不但标志着朱峰同学个人在学术道路上的成果，也为重构现代中国教育史作出努力，盼望它能对建立今天的教育蓝图与理想提供材料，使历史经验成为 21 世纪中国教育发展的“源头活水”。

卢龙光

于香港中文大学

2002 年 7 月 3 日

# 第一章

## 导论：概念及文献的分析

---

### 一、概念澄清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课程。它涉及到基督教传教运动、性别研究以及高等教育等学术范畴。为方便下文阐述，防止概念混淆，这一节先就“基督教与大学教育”、“基督教与性别议题”两对基本概念作一清楚的交代。

#### （一）“基督教与大学教育”

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之前，必须澄清的是基督教与大学教育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澄清实际上就是如何理解“基督教大学”这一概念。徐以骅先生指出：“在英语中基督教教会大学先后有 *mission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和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两种称呼，如果直译的话，前者应是差会大学，后者才是教会大学（或基督教大学）。差会和教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般来说，差会指的是西方教会派遣到中国来传



教的各宗派团体，而教会则是由中国本国信徒按其信仰之宗派组成的团体。从形式上看，在立案之前教会大学与中国教会是‘平起平坐’的，都处于西方差会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因此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差会大学；在立案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成立校董会，由平信徒担任校长，至少在名义上摆脱了差会的控制，但与中国教会亦未发生隶属关系……以此观之，严格意义上的教会大学在中国竟是不存在的！”<sup>①</sup>很显然，“教会大学”这个习惯性称呼并没有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进一步说，基督教大学与教会大学是否是同一个概念？另外一位近代史学者胡卫清在《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中曾对基督教教育作一界定，他“将那些根据基督教精神办理——不论它们是由传教士直接领导，还是名义上由中国人领导实际归传教士控制——且学制较为规范的学校所实施的教育统称为基督教教育”。<sup>②</sup>根据这一定义，基督教大学教育的存在未必与其办学者及隶属关系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在近代找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以民国时期的岭南大学为例，它是“中国教会教育史上不属于任何教派而仍保持基督教教育性质的高等学府”。民国时期的岭南大学的经费收入，组织与中国教会，差会的关系都不明显。<sup>③</sup>相反，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南女大等基督教大学就与西方差会有着密切关系。故此，基督教大学与教会大学应该是不同的概念。基督教大学这个概念涵括面相对较广。事实上，“教会”强调的是基督教信仰者的组织、财务及拓展；而“基督教”有文化、组织及信仰等多个层面。因

---

① 徐以骅著：《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192页。

②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6页。

③ 《岭南大学》，吴梓明，梁元生主编：《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一），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1998年。

此，本书不采用“教会大学”这个概念，而用“基督教大学”<sup>①</sup>来描述分析本书的研究对象——金陵女大，华南女大<sup>②</sup>。

理解基督教大学这一概念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在基督教大学中基督教和大学教育的关系？事实上，在不同的话语环境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基督教与大学教育之间关系的理解未必一致。在学术研究中，不同的理解往往带来无休止的争论。为方便本书阐述，下文尝试归纳基督教教育界对“基督教大学”概念的认识。

1. 核心理念。这是基督教影响大学教育的首要特性。基督教教育界人士认为：基督教大学和其他类型教育之所以不同，即因其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与宗旨”，即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信仰。1922年巴敦（Ernest D. Burton）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调查团的报告认为：“所谓‘基督教教育’之主要特征，盖不在操权办理之团体，又不在于办事人之宗教关系，又不在于课程中之科目，而实在于教育之精神与宗旨而已。”<sup>③</sup>换言之，基督教大学不一定是教会支

---

① 1989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吴梓明先生在武汉举行的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已提出“教会大学”与“基督教大学”的分别。他指出：“教会大学是指直接由教会管辖或办理的大学；而基督教大学的含义较广泛”“包括了一个或多个教会宗派管辖之‘教会大学’，及纯由基督教人士办理之‘非教会大学’”参氏《从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看基督教大学应以何种形式为国家教育事业服务》，章开沅，林蔚等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242页。

② 这两所基督教女子大学的称谓是有变化的，1930年代立案前分别称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1930年代，两所学校在中国政府注册时，教育部门的文件中都冠以“私立文理学院”的称谓直至结束。以往的研究，多数称她们为金陵女大、华南女大。本书尊重这一传统，用“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统一两校的称谓。除非直接引用原文，本书均用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女大、金陵，华南女子大学、华南女大、华南作为两校的称谓。请读者注意。

③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9页。

持和信徒办学，也不在于宗教课程<sup>①</sup>的设置。民国时期许多中外基督教教育家大力宣传基督教大学教育是“爱的教育”（陈淑圭），是“人格教育”（刘廷芳）。基督教教育会的缪秋笙说：“建立整全人格是教育的共同目标。官立学校的道德训练建基在伦理上，而基督教的德育训练则建基在宗教上。我们希望学生被耶稣基督塑造，他为拯救世界而舍己，是充满着牺牲的喜乐，服侍的勇气，我们希望学生养成基督化的人格。这一类的教育不会令学生不爱国，相反使他们对国家更忠心投入，战胜那些自私的贪念与权势。这类教育不会令学生对人道、社会漠不关心，相反，令他们学效耶稣基督的爱悯及牺牲的精神，抵抗恶劣环境。这就是基督教教育的独特之处及特殊的贡献。除此之外，基督教教育与一般的教育并无分别。”<sup>②</sup>这些当然是基督教教育工作者的“自我表述”。他们确信，基督教教育的核心宗旨是在高等教育中渗入基督教信仰和价值观。这是他们对自己身份的理解。

2. 多元功能。在坚持基督教精神和价值观的同时，基督教大学也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转化其功能。从最早期强调的传教功能到19世纪末逐渐强调教育功能，如史静寰认为“19世纪末教育专业化使教育活动从一般传教活动中分离出来，传教士的教育工作

---

① 严格地说，宗教课程包括：宗教知识教育（Religious Knowledge education）和宗教教育（Religious education），“宗教知识教育指一般学校实施的宗教知识教育，特别是大学的宗教学教育；宗教教育指宗教团体内部的信仰培育与神学、佛学、道学的教育，以接受该团体的信仰传统为先设条件。”，陈德光，〈宗教知识教育与宗教教育的信仰问题〉《21世纪亚洲基督教大学面临的挑战》，会议论文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金禧校庆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

② C. S. Miao & F. W. Price, *Religion and Character in Christian Middle School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2, p. 31.

虽然仍未脱离传教目标，但已形成了自己的专业工作特点”<sup>①</sup>；再到 20 世纪 30 年代，基督教大学教育界强调的社会服务功能。正如鲁珍晞/Jessie Gregory Lutz<sup>②</sup> 所说，这一时期“教会大学开始谈论用实际行动来表现基督教精神，如补充中国的教育制度，向自己学生灌输社会服务的思想”<sup>③</sup>。显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学校，基督教高等教育强调的功能会有所差异。传教、教育或社会服务等都是基督教大学的功能；这些功能往往同时存在，只不过时代变迁，强调的重点会有所不同。我们无法找到纯粹只想传教的基督教大学教育（若为传教，根本无须办大学）；也很难找到只有教育功能的基督教大学教育（必须顾及基督教的性质）；更不可能出现只有社会服务的基督教大学教育（教育有其自身的要求和规律）。这些只不过基督教大学外在社会功能的不同方面。

3. 博雅教育。基督教大学与博雅教育有紧密的关联性。博雅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又被称为自由教育、人文教育，具体指从 19 世纪西方大学延续下来的强调文化陶冶，反对工具理性，以提高个人文化素质的教育理念。这种博雅教育强调通识教育，强调人文主义式的批判精神。而在 20 世纪初崛起的所谓专业或职业教育 (Professional/vocational education) 则认为教育必须向人提供一技之长以使之见用于社会。专业教育强调实用技能的养成。现代高等教育基本上兼两者而有之，如金耀基所指出的：“我们以为 20 世纪‘知识人’一种合理的信仰是科学的人文主义。他应该知

---

① 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14 页。

② Jessie Gregory Lutz 在国内又翻译为杰西·格·卢茨、曾钜生 1987 年翻译《中国教会大学史》就用这个中文名。但 Jessie Gregory Lutz 本人表示，她更希望用自己取的中文名——鲁珍晞，故本书一概使用鲁珍晞。

③ 鲁珍晞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年，266 页。



道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关系，并通过科学与技术以建立并丰富以人为主体为本位的人文主义。”<sup>①</sup> 基督教大学强调博雅教育由来已久。19世纪英国著名基督教神学家纽曼（Cardinal 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在其《大学之理念》（*The Idea of University*）一文中非常强调大学的人文学科教育，“人文教育（Liberal Art Education），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知识分子的教养，所以它的目标应该是不偏不倚，并以此作为知识的优异的表现。”“如果大学的性质即是教授普遍性知识的地方，而某一间所谓大学竟没有把宗教科目包括进去的话，我认为只有两种结论，即若不是宗教范畴缺乏真知识，那就是这样的大学是忽略了知识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部门”。很明显，纽曼强调基督教大学的人文学科、通识教育，是基于基督教是世界真理的信念。纽曼相信，基督教和其他学科一样是建立在理性之上。因此，大学“这地方是智能的首府，是人文的亮光，是宗教的传布者，是下一代文明之母”<sup>②</sup>。近现代许多基督教知识分子承袭了纽曼的这一思想，认为：基督教以其对宇宙和生命的终极真理的强烈兴趣，本身就与博雅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反映在不同时期基督教大学教育

---

①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台北：时报出版社，1983年，67页。

② 纽曼著、许牧世译：《大学是什么》，《纽曼选集》，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7年，277页。纽曼（1801~1890），毕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1824年被按立作圣公会牧师。他发动了英国教会史上著名牛津运动，1845年改宗罗马天主教。撰写著名的《自我辩护》（*Apologia Pro Vita Sua*）一书，1879年任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纽曼在神学和文学上建树很高，是近代英国神学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的课程设置上。余达心曾应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sup>①</sup>（以下简称亚联董）的要求，对二战之后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的基督教高等教育状况作了分析。余达心在文中对比这些地区在战后急剧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基督教大学和基督教大学在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态度差异，认为“差别是明显的。看来在社会急剧转型中，对社会人文学科有愈益忽视的趋势。基督教高等教育则成为维持人文传统的坚实据点，在此基础上才建立起科学、技术和其他文明产物”。余达心总结道：“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维持、发展人文学科是基督教大学重要使命。”<sup>②</sup>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民国时期十三所基督教大学对国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研究的长期坚持<sup>③</sup>。

---

① 亚联董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前身是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简称 UBCCC) 又名联合董事会, “是由原在美国的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 (Associated Boards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简称 ABCCC) 为中国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各董事会联合办事机构演变而来的。校董联合会乃由 1927 年 8 月, 各教会在上海开会, 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提议成立联合托事部。1945 年 6 月 30 日校董联合会举行年会, 正式宣告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的产生。联合托事部是一个单一的组织, 有权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 比起校董联合会更加统一集权”。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80 页。

② Carver T. S. YU (余达心):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Educational Expansion in Asia”, *ACU-CA Exchange* (Vol. 1) (May 1991), p. 8.

③ 关于国学研究, 可参考陶飞亚、吴梓明的《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而社会学方面的建树, 可多了解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等人创立的以社会调查和个案研究为主体的中国燕京社会学学派。参考许苏民:《重新评估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51 页。

## （二）基督教与性别议题

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关系，同样无可避免地遇到“性别议题”（gender issue）。在西方，性别议题的研究是一门重要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世界范围内 feminism 有着密切关系。feminism 一词通常被翻译作“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18世纪英国的玛丽·伍史东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是女性主义的启蒙者。玛丽早年在伦敦 Newington Green 创办女子学校，和著名思想家汤姆·潘恩（Tom Paine）相稔熟。1792年，她发表了一篇题为《妇女权利的辩白》（*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的声明，“要求女性应该有独立工作之权，有受教育之权，有享受公民及政治权力之权”。提出“所谓女性气质是一种结构性问题。”美国早期女性主义的代表是公理会女传教士露西亚·莫特（Lucretia Mott, 1791~1850），伊莉莎白凯蒂·史丹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 1815~1902）等人。1848年7月19日，她们在一所卫理公会教堂召开第一届女权大会。会上声言：女性要拥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利。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英美西方妇女逐渐在教育权、财产权、职业权以及政治权利诸方面取得了成功。在二次大战之前，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远多过理论上的总结。二战之后，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在1949年出版《第二性——女人》（*The Second Sex*），西方开始了新一波的妇女运动。197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运动再度兴起高潮。妇女运动的社会实践与女性议题的理论研究成了一时时尚，直至今日。<sup>①</sup>

基本上，世界妇女运动可以分作三个不同的路线。一是激进派女性主义，认为现存社会系统是父权制的完全宰制；二是以左

---

<sup>①</sup> Susan Alice Watkin: 《女性主义》，朱侃如译，广州出版社，1998年。

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一派认为社会物质条件的平等是妇女解放的基础；三是自由派女性主义，这一派强调社会机会的均等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这三种不同女性主义路线反映在学术领域内，分别出现了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学派等性别研究理论。<sup>①</sup>

虽然本书研究的是民国时期两所基督教女子大学——华南女大和金陵女大，但无意用西方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去诠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关系。实质上，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本身也无法概括世界妇女运动的全部。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学者王政所说，“feminism 有别于各种‘主义’，它不是由几条定义和一系列连贯的概念组成的一种固定不变的学说，更不是排斥异己，追求占据思想领域中霸权地位的‘真理’，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交融的场所。它历来同时包括理论与实践。‘主义’二字已是不准确，而‘女性’，‘女权’则更是未能表达 feminism 的丰富内涵和社会文化改造的宏大目标……”<sup>②</sup>

在本书的研究中，“性别”只是一个社会分析范畴，正如阶级、种族等概念一样。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重要认知。

1. “性别”是一个“社会关系”的概念。妇女的社会位置从来就是相对男性而存在的，正如男性的社会位置也是相对妇女而存在的一样。若没有处理男性与妇女的关系，根本无从认知妇女历史的真实。所谓妇女的权力、话语结构等等总是和其他本身也

---

①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Scott, *Gender and Politics of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8.

②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8页。

在不断发生变化的范畴相关联的。单方面阐述妇女或男性的概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别”研究。

2. “性别”是以“差异性”为基础的社会概念。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性别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妇女群体中。“差异”既实施了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又产生了男女之间的身份认同。以往“女性主义为将妇女动员起来，组成一个连贯的政治运动。女性主义把妇女看做是一个永久的、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社会群体。由此，女性主义的历史成了一部削减女性之间差异的历史。这些差异（即阶级、种族、族裔、政治、宗教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差异）被缩减成一个妇女的共同身份（往往与父权制相对立而言，父权制即男性统治的制度）。为达到服务于女性主义的政治目的，女性主义史学参与制造了这个本质先于存在的妇女共同的身份”。<sup>①</sup>在本书中，这种“共同身份”是不存在的。

3. “性别”是一个“相对的历史性”的概念。“本质先于存在”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性别”也不是一个先于历史而存在的社会范畴。根据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观点：“性和性欲是不断变化着的人类行为概念的产物。这些概念，可以从医生和法官的看法，以及男女的活动中研究出来。不仅有对不同性行为的记载，而且相似的行为有十分不同的含义。比如在中世纪，鸡奸者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被惩处，当时人们决不会把他们看成男女同性恋”<sup>②</sup>。因此，性别问题的理解离不开历史背景的影响。学者不可以用20世纪末妇女运动的标准评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妇女运动。

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宗教与性别从来就是个非常突出的问

---

① Joan W. Scott:《女性主义与历史》鲍晓兰译，王政、杜芳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359~377页。

② 同上注，372页。

题。几乎所有宗教教义都对男女两性关系作过详细的解说和繁杂的规定，中国基督教史亦是如此。明末清初，中西礼仪之争中性伦理就是一个重要争论点，如天主教传教士一方面要应付反教人士在性别问题上的攻讦。许大受在《佐辟》中评论天主教“且欲一切国王皆从邪说，尽去后宫妃嫔，而等于编氓。然其自处，又延无智女流夜入猩红帐中，阖户而点以圣油，援以圣水，及手按五处之秘媒处。男女之乱，曷以如诸？”<sup>①</sup>。另一方面，中国天主教信徒（杨廷筠，瞿汝夔等人）在纳妾等问题上也有很多疑问。近代，基督新教的传人同样导致性别问题上的许多争论。

中国基督教史中性别议题的学术研究开展得却较为迟缓。这一学术课题最早源自美国学术界。由于当地女权主义思潮以及对基督教传教史的认识，美国学术界自1980年初开始不断有中国基督教性别史研究的著作。其中的代表作有1984年Hunter, Jane出版的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年, Dana L. Robert 出版的 *American Women in Missio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ir Thought and Practice* (Macon,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这些著作基本上从女传教士的角度出发，探讨女性在基督教差传工作的经历。1992年，香港学者郭佩兰出版 *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1860~1927*, (Atlanta: Scholars Press) 一书，对基督教对中国妇女的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内容涉及传教、办学、医疗及其他社会活动。上述这些研究以基督新教为对象，基本上是基于传教史和妇女运动的角度。近年来国内基督教史的性别问题渐受重视。1999年，福建师范大学李湘敏教授

---

① 许大受著、夏瑰琦校：《佐辟》《圣朝破邪集》，香港：宣道出版社，207~208页。



出版其著作《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这是内地学术界基督教女子教育的开山之作。李湘敏教授在书中指出：“近代中国妇女的解放是历史的必然。若没有基督教教育，中国妇女也必然要获得解放”；“然而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改变了其原有的方向，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体系，必然要变离原来前进的方向。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的关系，正是这一变离方向的产物。西方传教士以宗教信仰改革中国的尝试，以发展教育传播西学为突破口，近代中国妇女摆脱封建束缚，提出女性的解放和自由，也以接受西方教育、西学为契机，两者正是在基督教教育这一形式中寻找到的共同点”<sup>①</sup>。这是极有见地的研究思路。2000年，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林中泽教授在其博士论文《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相遇——以利玛窦〈天主实义〉和庞迪我〈七克〉为中心》对晚明天主教史中性伦理问题作了深入的剖析。该文“主要通过阐释利玛窦《天主实义》和庞迪我《七克》的相关内容，对中西性伦理的这场初次接触作一次较系统的梳理”<sup>②</sup>。林中泽先生以文化分析的角度认识性别议题。他认为：这场性伦理的讨论是属于中西文化的深层次交流，也涉及文化的本质问题。<sup>③</sup>这篇博士论文是笔者仅见的国内有关中国天主教史性别问题的专门讨论。

本书将参考这些成果，根据自己对基督教大学、性别问题的概念界定，集中探讨以华南女大和金陵女大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

---

① 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150页。

② 林中泽：《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相遇——以利玛窦〈天主实义〉和庞迪我〈七克〉为中心》广州中山大学专门史专业博士论文，2000年，未刊稿，1页。

③ 同上注。

## 二、文献综述

文献调查、搜集是研究的第一步。为撰写本书，作者先后到中国内地、香港、美国三地的图书馆、档案中心寻访资料，用各种形式采访健在的金陵女大、华南女大校友，获得了大量一手材料。本书主要史料来自福建省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图书馆、香港浸会大学中国基督教文献中心、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师范大学、耶鲁大学馆藏之亚联董档案，另外还参考了相关校史、传记、文史资料、回忆录和纪念文集以及历年来有关女子教育与基督教教育研究著作。大体而言，可分作以下两类。

### （一）原始文献举隅

据吴梓明、梁元生主编的《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sup>①</sup>的记载，华南女大国内原始资料主要集中在福建省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至于保存在美国的档案，则主要集中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所收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的全宗档案内。另外，惠顿大学葛培理中心档案室 (*Billy Graham Center Archives, Wheaton College, Illinois*)、德鲁大学美国联合卫理公会档案资料中心 (*United Methodist*

---

① 吴梓明、梁元生主编：《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一），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研究丛书，1998年，75~91页，205~213页。

*Archives, Drew University*)、爱荷华州晨边学院(*Morningside College*)也收藏有该校的相关档案。

至于金陵女大的一手文献，国内主要分布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师范大学综合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在美国，金陵女大的档案也集中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所收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的全宗档案内。另外德鲁大学美国联合卫理公会档案资料中心(*United Methodist Archives, Drew University*)、曼特荷里欧学院历史档案馆(*College History and Archives, Mount Holyoke College*)、史密斯大学档案馆(*College Archives, Smith College*)、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General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纽约协和神学院档案馆(*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Archives, New York*)、乔治亚州艾默里大学图书馆(*Pitts Theology Library, Emory University, Atlanta, Georgia*)等地也有金陵女大的相关资料。

纵观这些资料馆藏，中文部分以福建省档案馆、南京二档的收藏最为完整，不过档案馆内收藏的多是各类官式文件，较难真实反映办学者、教学者以及学生三方面在两所基督教女子大学中的心态、表现甚至争论。英文档案中，以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所收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的全宗档案(以下称联董档案)较为完整。另外，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校友回忆录，纪念文集也为我们认识这两所基督教女子大学提供了生动的一手材料。



### 1. 联董档案<sup>①</sup>。

联董档案内有华南女大的资料共 2 盒, 18 卷, 时间跨度为 1922 至 1970 年。资料分为四类: 一、行政类, 包括临时宪章、正式宪章、校长年度报告、给纽约州教育局的报告、与福建协和大学合作会议记录; 二、教务类, 包括校友情况、教职员情况; 三、信函类, 包括王世静、陈芝美、富品德 (E. Pierce Hayes), 葛思德 (Garside) 等人的来往函件; 四、宣传品类, 包括《华南女子学院》(1928)、《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36)、《华南学院》(1932~1943)。

金陵女大的史料分别储存在两辑档案内, 分别是第二册 (Series I)、第四册 (Series IV)。第二册的档案共 3 盒, 主要收集金陵女大从 40 年代至 50 年代的史料, 内部包括资产、教职员名单、社会服务工作、戏剧、报告、学生与校友统计等, 另外还有吴贻芳从 1945 至 1954 年间的档案史料。第四册存放的档案是金陵女大从创校到 50 年代初的史料, 共 35 盒。因此金陵女大的史料合计有 38 盒。

资料分为几部分: 一、行政类 (1913~1957), 包括金女大立案事宜、金女大委员会、金女大创立人理事会、校董会的组织及会议记录、呈给纽约州教育局的年报、校舍建筑蓝图、学校资产; 二、学务类, 包括学校课程编排、校规制订、校务报告、开学及结业、毕业礼、校庆事、金女大图书馆、各学系之文件; 三、学生及教职员的情况, 包括各级学生名单、人数统计、毕业生概况、校友问卷调查、1921 至 1950 年金女大教职员名册及中西教职员工的情况; 四、信件, 包括 353 个私人及团体的信件。团体信件

---

<sup>①</sup> 以下资料分析主要根据: 吴梓明、梁元生主编:《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一),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研究丛书, 1998 年, 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收藏的联董档案微缩胶卷。

中以金女大姐妹校史密斯大学 (Smith College) 的来往书信为最大宗。私人信件中最有价值的是金女大校长德本康夫人 (1913~1934) 和吴贻芳 (1927~1949) 的来往信件；五、财务类，包括财政收支及学校经费记录；六、校刊，包括首届毕业同学的《先驱特刊》(*Pioneer*)、1924 至 1930 年之间的《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32 年至 1936 年之间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sup>①</sup>、金女大通讯及宣传刊物。另外，联董档案收藏了许多当事人的日记或自传，如著名的华群日记 (*Minnie Vautrin's Diary*)<sup>②</sup>。

## 2. 回忆录与纪念文集。

近年来，华南女大和金陵女大当事人的回忆性文字陆续出版问世。华南女大方面，有福建华南女子学院编的《余宝笙院长纪念集》、郭肇民（则杰）的《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史概述》（《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辑，1988 年版）、张涵深的《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概况》（未刊稿）、周苏藤的《蒙爱岁月》等。金陵女大的回忆材料更多。1983 年吴贻芳著《金女大四十年》、1992 年孙海英等著的《金女大大事记》、《吴贻芳纪念集》、《吴贻芳》（传记体小说）、《金陵女儿》、《永久的思念》等等。以 1995 年、2000 年两度出版的《金陵女儿》为例，书内共收录有 257 篇回忆性文章，内容极为丰富。

这些回忆从亲历者的角度描述了华南女大、金陵女大历史。大

---

① 据南京师范大学孙海英介绍，“《金陵女大校刊》创刊于 1933 年 10 月 16 日，每半月一期，直至 1937 年 6 月停刊。1939 年 10 月 21 日在四川成都复刊，每月一期。1943 年 3 月改为半月刊。1945 年又改为月刊，直至 1948 年 11 月停刊，共出 153 期”，氏《关于金陵女子大学历史文献在国内分布情况及跟踪研究设想》，吴梓明主编：《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1998 年，112 页。

② 华群于 1919 年至 1940 年间任教于金陵女大，历任教务主任、教育系主任、代理校长等职。其日记已由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出版。书名为《魏特琳日记》。



部分人都提到了她们在两校求学期间经历、师生感情、毕业后的工作生活。字里行间中流露出校友对母校的深深眷恋。作为口述史料，它们不仅大大丰富了华南女大、金陵女大的历史认知。口述历史和文本历史互相参照，更增加了研究的历史质感。比如，2000年初笔者曾对华南女大校友进行过一项问卷调查。受访的华南女大校友有政府官员、共产党员；有学校教师、民主党派。笔者发现：华南女大校训“受当施”竟是受访校友印象最深刻的回忆。尽管问卷调查本身没有任何关于校训的提示，受访校友却不约而同地直接提到校训“受当施”对她们生命成长的意义。如“校训‘受当施’是我一生为人处世的准则”、“校训‘受当施’，培养了我为社会服务的信念”、“华南‘受当施’的校训巩固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校训‘受当施’，施的基础是对人类的爱。学校教我诚实，善良，勤奋，勤快，节约以及教育女子要自信，自强，自立，自爱”、“我牢记‘受当施’因为我受华南的帮助太多，所以我想应该多帮助需要人帮助的……”有位校友对笔者说：“你能以旧华南的历史写论文，为你高兴。由于我们现在是无神论的国家，不可能强调基督教对学生的影响，实际上学校每天的朝会给我们圣经的道理，是做人的基本法则，使我们一生不做越轨的事，而且处处尽量用‘爱’洒向人间。华南的校训‘受当施’，培养我们不自私。希望你能把这种精神写入你的论文中……”<sup>①</sup>这些回忆令笔者想起华南女大教育学教授华惠德（Miss L. Ethel Wallace）1942年在一篇纪念文章《值得我们回忆的几椿事》中所说的，“当我想到华南的校训时，忽然又想起了从前悬挂在彭氏楼大礼堂门口的一块大匾额来，上头刻着‘受当施’三个字，是一班毕业

---

<sup>①</sup> 1950届华南女大毕业的一位校友的意见，写在2000年初笔者问卷调查之回复上。该位校友是基督徒。有关问卷调查设定，可参看附录二之问卷调查。

生赠送母校的，自去年二月是楼被火，此匾额遂不复存在。我每念及，心中总觉得十分怅惘，可是再一转想，即又得了安慰，因为匾额虽毁，而匾额中的每一个字，却已经深刻到我们校友的心里了。”<sup>①</sup> 前后参照，历史的延续性一览无遗。

## （二）研究文献评述

除了档案资料、口述文本外，前人的学术研究也是本书的重要资料来源。本书的撰写根本离不开学术前辈的努力。

1. 基督教大学研究。在讨论基督教与近代女子高等教育的研究实际上是中国基督教大学史研究的一部分。这一专题史的研究自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经在西方渐次展开。迄今为止，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 世纪 50 年代的微观研究。以徐光荣 (R. Scott) 1954 年出版《福建协和大学史》(*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为开端，亚联董先后出版了 10 所基督教大学的历史。这批著作采用了大量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正由于是当事人的回忆，这些著作一般局限于某一大学的历史演变过程，尚缺乏对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宏观、整体性研究<sup>②</sup>。

第二阶段研究在六七十年代，以 1971 年鲁珍晞的《中国教会大学史》(*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1976 年芳卫廉 (William P. Fenn) 的《基督教高等教育与变化中的中国》(*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为代表。研究者开始“置基督教高等教育史于民族主义及世俗化等

---

① 华惠德 (Miss L. Ethel Wallace)：《值得我们回忆的几椿事》《华南女子学院院刊》(1942 年 5 月)，11 页。华惠德是华南女大教育学教授。华南女大的校舍曾于 1941 年失火。

② Arthur Waldron (林蔚)：《序言》，马敏译，章开沅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5~11 页。

更大的社会历史潮流之中，使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特殊研究领域蕴涵了整体性意义”。<sup>①</sup> 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宏观上勾画出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史的整体图景。

第三阶段的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中国内地。在国内外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若干国际学术会议的相继召开和有关学术专著，论文陆续发表，使这一领域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热点”。<sup>②</sup> 这一阶段可以称作“再微观”的过程。学者们再次将视线集中在各个专题的探讨上。近年来，吴梓明主持编写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对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神学教育、国学研究和抗战时期的基督教大学<sup>③</sup> 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2. 基督教女子大学的研究。作为中国基督教大学史研究领域之一、基督教女子大学<sup>④</sup> 研究也走过相类似的路程。由于麦美德 (Luella Miner) 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在 1919、1920 年间和燕京大学合并，民国时期独立的中国基督教女子高等综合学府只有华南

---

① Arthur Waldron (林蔚)：《序言》，马敏译，章开沅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5~11 页。

② 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 年第 4 期，132 页。

③ 这一丛书包括：徐以骅的《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1999 年)；陶飞亚、吴梓明合著的《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1998 年)；吴梓明编著：《教会大学华人校长研究》(2001 年)。这些著作由福建教育出版社负责出版。部分书已经由该出版社再版。

④ 女子大学只是女子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女子高等教育还包括男女合校的大学中的女生教育。

女大和金陵女大两间<sup>①</sup>。

第一阶段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1955 年，德本康夫人 (Mrs. Lawrence Thurston)、蔡路得女士 (Miss Ruth N. Chester) 撰写了《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1956 年，华惠德女士 (Miss L. Ethel Wallace) 出版了《华南女子大学》(*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at South China*)。这两部著作可以视为中国基督教女子大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由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史料价值颇高。同样的问题是：她们虽然以单个女子教会大学作为研究对象，但撰写者并非历史学家，著作内容平铺直叙，缺乏比较研究和深入分析。严格地说，两本书只是“回忆录”，还称不上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第二阶段，鲁珍晞 (Jessie G. Lutz) 的《中国教会大学史》、高时良的《中国教会学校史》中都曾涉及到基督教女子大学的研究。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一批基督教女子大学的专门研究。如 1995 年，Harris, Marjorie Jane 的 *American Missions, Chinese Realities: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China Union Women's College/Yenching Women's College, 1905~1943* 一书对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女部的研究；台湾中央大学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 (1915~1951)》(1996 年)、香港中文大学黄

---

① 民国时期，政府办女子专门高等教育只有师范类，如 1920 年成立首个国立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高师。综合性的女子大学只有 4 间，除了华南女大 (1908 年)、金陵女大 (1915 年)，还有美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1937 年) 和中国共产党 1939 年在延安创办的中国女子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创立时间较晚。而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专门培养共产党妇女干部。校长是王明。1941 年，这所大学被取消，并入延安大学。参考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 年。

洁珍《从吴贻芳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1998年)分别对金陵女大的研究等。

纵观上述研究,中国基督教女子大学史研究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

(1) 研究发展不平衡。国内两间基督教女子大学中,金陵女大的研究者已不乏其人。其中有王奇生、孙海英等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著作;也有黄洁珍、曾芳苗等研究生的硕士论文。反观另一间教会女子大学——华南女大至今未有系统深入的研究。目前所见,只有香港浸会大学谢志坚在1998年撰写的文学及社会科学文学学士学位论文《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之研究》和美国学者白珍妮(Suzanne Wilson Barnett)的一篇未刊论文稿“Higher Education in Social Translation: Hwa Nan Women's College and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Fuzhou”(1995)。至于两校的比较研究,王奇生的《教会大学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范例。在这篇文章中,王奇生对包括金陵女大、华南女大在内的女子高等教育作了宏观的比较分析。不过,王奇生对华南女大的观点可能受到鲁珍晞的影响。比如:“那些作为女子大学前身的教会女校在其最初并没有想到要为中国妇女提供高等教育做准备。”而华南女大“由于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与中国民众相隔绝,大大减弱了该校在中国女子教育界的地位和影响。”<sup>①</sup>这样的定论似乎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的比较研究应进一步深入。

(2) 应有多重背景的认知。基督教女子大学是中国社会变迁、美国差会之间互相影响的结果。它既是世界基督教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重要因素。不应漠视基督教女子教

---

<sup>①</sup> 参考王奇生:《教会大学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6年第4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35~166页。



育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互动关系，更不能回避基督教女子教育同世界基督教发展的联系。换言之，基督教女子教育研究需要国内外背景 (Context) 的双重关怀，不能只看到中国的变化，也应关注到世界基督教发展的态势。以往的研究缺乏对国内外社会处境、差会教育政策的整体理解。比如说：在宗教传播中使用教育手段，兴办学校的作法，中国古代历史是前所未有的。许多研究者在理解基督教学校出现时，常将其解释成某种策略、手段，因而把中国传教时的困难、华人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作为基督教学校出现的决定性因素，认为许多传教士宣教受挫时，发现教育较受华人欢迎，才“不得不”兴办教会学校。这样的理解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从整个世界基督教发展史观察，这一问题或许有其他的解释。兴办教育本身就是基督教发展中固有的传统。许多名牌大学原先都是基督教大学，未必是因为基督教发展在西方受挫时而不采取采取的传教策略。宣教士不仅在中国兴办基督教教育，还在印度、韩国、日本、非洲等地区都有大量基督教学校。<sup>①</sup>

① 我们若翻开历史文献，会发现中国未必是基督教宣教运动的中心，而且19世纪开始的海外宣教运动亦不以落后地区为唯一目标。以美国卫理公会为例，其首个非英文语言的宣教区固然在中国福州 (1847)；其后的宣教区却分别是德国 (1849)、丹麦 (1854)、瑞典 (1854)、挪威 (1854) 和印度 (1856)。在亚洲地区，卫理公会对印度的投入远大过在中国传教的投入 (有语言、宣教效果和政治环境方面的原因)。从资金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

时间	中国	印度
1860	\$ 17, 368	\$ 32, 355
1870	\$ 36, 918	\$ 93, 057
1880	\$ 44, 000	\$ 60, 500
1900	\$ 119, 376	\$ 144, 241

资料来源: Harry Wescott Worley (华惠成), *The Central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A Study in Ecclesiastical Adaptation* (Foochow: the Christian Herald Mission Press, 1940).

3. 应该清楚基督教女子大学的独特性及其在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中的地位。基督教女子大学的性别特征在以往的研究中被边缘化。基督教女子大学同基督教大学固然有其共同性，但亦有其特殊性。过去，研究者将女子教会大学归入普通教会大学的个案，而没有分析其特殊性，甚至认为办学者有意回避女子大学的性别特征。以曾芳苗、黄洁珍的研究为例，尽管她们详细阐述了金陵女大的历史及其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具体实践，但她们没有说明金陵女大和其他类型的基督教大学的差异？实际上，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甚至早期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等女校，曾和当地男女同校的基督教大学发生过合校的争论。而合校争论的出现与女校的性别特点有着直接关系，以往国内的研究均未能涉及到这个问题。

综上，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的比较研究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个研究应该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再微观”的研究。如上文所述，基督教女子大学研究经历过微观——宏观——再微观的三个阶段。显然，所谓“再微观”已不是50年代单个基督教大学史研究的简单重复，而是学术界吸收第二阶段宏观整合式的研究成果，再度将研究具体化、个案化；用具体个案研究来深入展示教会大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趋势已有共识。林蔚指出：“诸如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之类的大题目笼而统之地研究太为困难。若集中注意力于一个教会大学，利用丰富的资料，或许能使研究更为具体充实，更易于把握。”<sup>①</sup>马敏也认为：“要特别重视微观研究。只有将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结合起来，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概括、研究工作才会深入展开并

---

① Arthur Waldron (林蔚) 著、马敏译：《序言》，章开沅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5~11页。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sup>①</sup> 有鉴于此，本书的研究将对华南女大和金陵女大作个案式的比较评析，以探讨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关系。

---

① 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147页。

## 第二章

### 背景：晚清中国女学的兴起

---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发展从来就是长期努力与积累渐进的过程。20世纪初年华南女大、金陵女大等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的出现，与晚清中国近代女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本章将从巨变前的中西女子教育、基督教女校与中国本土女学、第一代中国女学生群体三个方面来阐释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女学的发展。

#### 一、巨变前的中西女子教育

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女学与此前的中西方女子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从世界性的妇女教育史来看，19世纪是中西方妇女教育的巨变时期。

##### （一）中国古代女子教育

关于中古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民国时期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阎广芬的《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杜学元的《中国



《女子教育通史》是讨论这一问题的中文专著。在英文著述方面，卢爱德(Ida Belle Lewis)的《中国女子教育》(*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巴顿(Burton, Margaret E.)的《中国妇女教育》(*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对中国传统女子教育也有一些讨论。

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陈东原提出“女教”与“女学”两个不同的概念。“女教”指的是传统女子的家庭式教育，实际上是封建礼教的一部分。“中国向来没有什么女子教育，她们所有的教育，是和妇女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sup>①</sup>至于“女学”这个概念，陈东原用来形容晚清兴起的近代中国女子学校。它是指正规学校教育中的系统化教育，而不包括非正规教育中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这种学校教育与古代中国的女子礼教有着质的区别。故此，古代中国女子教育可以称为“有教无学”的阶段。但是，阎广芬在《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中列举了古代宫廷、宗族内女子学校、民间社会的各种女子教化。她认为：“谈到中国古代女子学校教育，因史料有限，无法知晓得更具体，就本人所搜集的资料来分析，古代女子学校教育不是没有，只是多属初级的，或者可以说是粗疏的雏形。”<sup>②</sup>因此，中国古代也有女学。

陈东原与阎广芬观点的不同，应从古代中国女子教育具体的教育内容来加以考究。先人早在周代的《诗经》中就对女性的教育内容及要求作过描述，所谓“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寝之褥，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小雅·斯干》）。儒家经典《礼记·内则》、《礼记·曲礼》中表述得更清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事舅姑时，女性须“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诗经》、《礼记》的记载反映了周代的女子教育只是

---

①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版，4页。

② 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81页。

所谓“闾内教育”——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活教育。这种教育思想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汉代是礼教形成的时期。女教也在此期间形成。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分别从历史、礼教两方面提出系统的女子教育规范。其后的两千余年中，又先后有《女论语》、《女孝经》、《女范》、《女训》、《闺范》等女教书籍的出现。延至清代，康熙年间闽人蓝鼎元在1711年著《女学》，主旨仍是围绕着“德、容、言、功”所谓四女德。与两千年前班昭的《女诫》相比，基本观点没有太大出入。总的来看，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对女子的要求有两个方面，在观念上要求妇女“宛顺、贞静”；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事夫、事子之道。这种女子教育以家庭生活为教育中心，以“事夫主义”（陈东原语）为教育目的，无论其教育方式如何，都应该称作“女教”。在中国古代“女教”传统中，间或有少数的杰出女性或因家庭教育出色而博学多才，或因天资聪颖，个人努力而崭露头角。以著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明代冯梦龙拟话本《全像古今小说》之《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写道，“又有个女子，叫做祝英台，常州义兴人氏，自小通书好学，闻余杭文风最盛，欲往求学。其哥嫂止之曰：‘古者男女七岁不同席，不共食，你今一十六岁，却出外游学，男女不分，岂不笑话！’”为了消除家人疑虑，祝英台女扮男装，并手摘一枝榴花，“插于花台之上，对天祷告说：‘奴家祝英台出外游学，若完名全节，此枝生根长叶，年年花发；若有不肖之事，玷辱门风，此枝枯萎’”。<sup>①</sup>这当然是“小说家者言”，但古代女子求学的困难却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古代女性掌握知识接受教育的只是极少数，知识女性从未形成一个社会性群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

<sup>①</sup> 冯梦龙：《全像古今小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363~364页。

## (二) 19 世纪英美女子教育

在中国女子教育尚处在落后闭塞的时候，19 世纪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近代女子教育实际上也刚刚起步。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子教育的起步只是略早于晚清。约在 19 世纪初，英国上流社会妇女多在家中接受母亲教育，至 12 岁才开始送到一些私立女校。校长、教师、工作人员尽可能聘用女性。课程也不包括拉丁文、数学等被视为是男性专利的学科，课程以技能学习为主。目的是为未来婚嫁做准备。只有极少数的妇女可以接受较高程度教育，毕业后只能从事教师职业。1870 年，英国教育法令公布低下阶层的妇女也可接受公共小学教育及部分职业训练。1902 年新教育法令才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公共中等教育。但中上阶层的妇女，始终尊崇淑女式教育。妇女教育不仅受到师资、财政方面的困扰，还要面对各类反对声音，甚至认为妇女接受男性教育，会妨碍其脑神经发展和生育机能。<sup>①</sup>在 19 世纪美国，女子教育的情况也大致相同。直至 1836 年，美国乔治亚州才成立第一所女子学院，而且不为公众所认同。19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内战是近代美国妇女教育的转折点。战争中 600,000 人阵亡，更多人伤残，美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开始上升，就业机会增加。内战以后美国人对女子高等教育愈益重视，独立女子学院开始得到公众的支持与认可。<sup>②</sup>美国“反对妇女受高等教育的偏见之破灭，以 19 世纪之最后 10 年为最著，此为经济状况之急遽变化所迫促，已无可疑。是时妇女之送入各机关为雇员者，数

---

① Pauline Marks, "Femininity in the Classroom: An account of Changing Attitudes", Juliet Mitchell & Ann Oakley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Women* Great Britain: Penguin Book Ltd, 1977, pp. 176~198.

② Eschbach, Elizabeth Seymour,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 in England and America 1865~1920*,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 Inc, 1993), p. 60, 99.

达几百万。”“父兄担负未嫁及已寡女性亲戚——不仅女儿及姊妹，即姑婶及表姊妹，亦皆不训练‘自食其力’之技能，而专倚赖于亲属——之赡养义务，至此始停止。”<sup>①</sup>

英美近代女子教育的出现稍早于中国，但其兴起对西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改变世界基督教差传工作的面貌。当时，这些早期受教育的英美女性在毕业之后，发现社会上提供的职位很少（大部分是教师、图书馆员等），而且职位低下，报酬低微。“公众意见之态度，对于妇女希望作医生、法官或官吏，咸不甚赞同”<sup>②</sup>。相比之下，海外传教工作无疑是更富刺激性和成就感的工作。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为妇女所能提供的职业只有婚姻、图书馆或教师几个职业，薪金少，升迁机会渺茫……但海外差传工作为她们提供了独立、地位和事业的成就感”<sup>③</sup>。

于是，大批受教育的英美女性投身海外差传工作。她们不满足男性占主导的差会体系，自己组织了独立的海外传教系统。1834年，在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的建议下，英国一些妇女成立的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sup>④</sup>。1869年美国公理会妇女成立了世界首个独立女布道会。同年，美以美会女布道会（Woman's Foreign Mis-

---

① Willystine Goodsell 著、胡衡臣译：《美国最近二十五年之女子教育》，《教育杂志》，第18卷，第3号，1926年3月。

② 同上注。

③ Eschbach, Elizabeth Seymour,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 in England and America 1865~1920*,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3), pp. 37~38.

④ Margaret E. Bu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p. 35.



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正式成立<sup>①</sup>。在众多女布道会中，“美以美女布道会是最独立的一支。创立者坚持女布道会和总议会应保持合作的关系而非传统的附属地位。美以美女布道会有独立的财政系统。作为响应，总议会禁止女布道会在公众集会中募捐或通过主日学招募会友”。<sup>②</sup>美以美女布道会自 1869 年开始，在波士顿编辑出版《异教妇女之友》(*Heathen Woman's Friend*)，鼓吹妇女赴海外传教。许多加入女布道会的女传教士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是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坚持独立的财政组织，直接向本国妇女布道组织负责，信仰虔诚，受过良好教育，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宗教

---

① 美以美会女性有组织地加入海外传道，自中国开始。1848 年 3 月 19 日，Mrs. Caroline Dulin 等人在巴尔的摩城 Charles Street Church 的地窖中成立“The China Missionary Society of Baltimore。”她们在 Middletown 卫斯理大学校长 Dr. Stephen Olin 的支持下，每月集会，在妇女中筹募金钱，派女宣教士赴福州。福州亦因此有毓英女中。1869 年，美国美以美会女子外洋布道会 (WFMS) 正式成立，这是美国继长老会女子海外布道会之后的第二个类似的女子宣教团体。巴尔的摩中国女子布道会并入 WFMS (参考 UK ING: *The Pioneer Historical Beginnings of Methodist Woman's Work in Asia and Story of the First School, Foochow*; Christian Herald Mission Press, 1939)。1939 年，美国美以美会与监理会合并成为美国卫理公会。这一女子布道会被撤销，并入卫理公会女子服务部。

另：在卫斯理宗形成的早期，约翰卫斯理对女子参与传道事工持实用和开放的态度。强调只要有内心的呼召和特殊的讲道能力，女子也可作为传道人 (Preacher) 向男女信徒们巡回讲道。但他始终没有将其定为会内正规制度。1791 年，约翰卫斯理死。1803 年卫斯理派在曼彻斯特大会上，限制妇女传道 (规定妇女只能向女子传道并须先取得堂会牧师事先允许等等)。美国南北战争后，会内妇女重新活跃起来。参考：Paul W. Chilcote, *She Offered Them Christ, The Legacy of Women Preachers in Early Methodism*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3)。

②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84), pp. 12~13.



意识。<sup>①</sup> 到 19 世纪末，她们甚至成为差会在华宣教的主体。下表以中国美以美会女布道会为例，说明这一变化。

表 2-1 近代来华美以美会女传教士人数及比例变化表

时 间	男传教士	传教士妻子	单身女传教士	女性所占比例
1851 年 <sup>②</sup>	5	4	0	40%
1890 年 <sup>③</sup>	37	35	27	62.6%
1907 年 <sup>④</sup>	67	63	66	65.8%
1920 年 <sup>⑤</sup>	88	88	140	68.3%

这些英美女传教士既然是早期享受到近代教育的女性，就深知教育对女子的影响。在传教工作中，她们尤其重视女子教育事业。“1876 年 *Heathen Woman's Friend* 的编辑在杂志上抨击美部会 (American Board) 的年度报告，因为报告鼓吹直接布道优于教育。该刊编辑争辩说，强调布道优于教育的作法其实是要攻击那

① 段琦：《清末民初美国女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及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4 年第 3 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②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ppendix 1.

③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④ *Records of China Centu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p. 771.

⑤ 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190 页。

些成功教育异教妇女的女布道会……”<sup>①</sup>（1877年，在华宣教士上海大会上，主张兴办教育的狄考文等人仍是受到剧烈攻击的少数派<sup>②</sup>）。而且，“到1911年，50%以上在华美国女传教士不再投身直接的宣教工作，大部分成了教师”<sup>③</sup>。她们对中国女子教育的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 二、基督教女校与本土女学

过去，很多人都将基督教女子大学的出现归因于清末民初教会女学的发展。教会中人尤其如此。似乎晚清基督教女校的发展必然地产生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但实际上，民国时期基督教女子大学的出现存在着两种模式。一、由于基督教女子教育发展迅速以及部分女传教士的理想，基督教女子大学因此产生；二、基督教女子教育受到中国本土女学兴起的刺激（或激励），从而筹办中国基督教女子大学。因此，分析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必须全面探讨这两个因素。

### （一）“教会所至，女塾接轨”

“教会所至，女塾接轨”这句话是梁启超对晚清基督教女校的

---

① Dana L. Robert, *American Women in Missio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ir Thought and Practice*, (Macon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32.

② 参考: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1877*,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4年。

③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84, p. 10.

评价<sup>①</sup>。在鸦片战争前，任何教会都无法进入中国。传教士们只能在南洋、澳门等华人聚居地设立女学堂。1825年，英国妇人（Miss Grant）在新加坡设立了首间当地华人女子学校。另据容闳的回忆，“1834年，伦敦妇女会议在远东提倡女学。英教士古特拉富之夫人（Mrs. Gutzlaff）遂于是时莅澳，初设一女塾，专授女生。未几复设附塾，兼收男生”<sup>②</sup>。这所学校应该是中国第一所女校。“1840年，马六甲有6校195名学生，檳城有2校43名学生，爪哇有1校30名学生，印尼巴达维亚有5校40名学生，澳门有2校26名学生，新加坡有1校20名学生，婆罗洲有1校15名学生，曼谷有1校12名学生，总数是19所女学堂，共381名女学生。”<sup>③</sup>

1844年创立的宁波女塾是所著名的早期基督教女校。创校者阿尔德赛女士（Miss Aldersay），全名Mary Ann Aldersay，1797年6月24日出生在英国Hackney地区的一个牧师家庭。19岁时，阿尔德赛正式受洗入教。少年时的阿尔德赛对教会活动非常热心，曾负责Hackney地区妇女圣经协会的财政工作，还每周一次到Clapton等地传道。她本人也是英国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首批委员之一<sup>④</sup>。

阿尔德赛生活的英国社会，一方面是女子教育开始出现，另一方面是海外传教的热潮方兴未艾。阿尔德赛童年时的保姆嫁给了一个圣公会海外传教士。这位保姆在致信阿尔德赛时，介绍她在Travancore开办教会女校。这对阿尔德赛后来的传教工作有

---

① 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37~44页。

②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等译：《西学东渐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页。

③ 刘玉玲：《晚清女学的开展》，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硕士论文，1998年，未刊稿，51页。

④ E. Aldersay White, ed. *A Woman Pioneer in China: the Life of Mary A. Aldersay* London: the Livingstone Press, 1932. pp. 9~14.

很大的影响。1824至1825年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回到英国休假时，居住在Hackney地区。马礼逊在当地开办汉文班，招揽有志到中国传教的人士。阿尔德赛报名参加了这个汉文班。在汉文班学习期间，阿尔德赛决定参加伦敦会海外宣教工作，向东方妇女教育促进委员会申请资金赞助。1837年8月10日，阿尔德赛离开英国前往爪哇的Sourabaya，在当地设立女校。1842年8月29日，阿尔德赛来到中国宁波传教，租住在宁波城外河提上一处木房。阿尔德赛的日记中说，她的房东是个孀居妇人，有一个孙子。这个妇人为孙子买了一个童养媳，经常虐待她。<sup>①</sup>

1844年，阿尔德赛在宁波办起了一个女校。1845年，该校有学生15人。“从1844年到1860年，又有11所教会女子学校设立在五个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办学，便在北方的北京，天津各设立一所教会女子学校。中国中部最早的教会女学创于1873年。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从南到北都已经设立了教会女子学校。”<sup>②</sup>对于晚清中国教会女校的发展，Margaret E. Burton在1911年出版的《中国女子教育》一书有较为全面的介绍。基本上，传教士们将女子教育、基督教福音和近代文明三者等而视之。他（她）们一方面利用女子教育来达到传教目的，另一方面也深信缺乏女子教育是妨碍中国文明开化的一大原因。阿尔德赛在1846年1月6日的信中谈到她在宁波女塾的工作：“这块土地是如此不开化(uncultivated)！也许只有信、望、爱才能让我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这些异教的人们不能理解我

---

① E. Aldersay White, ed. *A Woman Pioneer in China: the Life of Mary A. Aldersay* London: the Livingstone Press, 1932. pp. 9~14.

② 史静寰、何晓夏：《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223页。

所做的一切，总把我往最坏处想。”<sup>①</sup> 参与创办上海中西女塾<sup>②</sup> 的传教士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也批评说：“若自由结婚，乃全世界之公理，而中国则引以为大辱，而一夫数妇，则又为理所当然，怪怪奇奇，诚为外人所不解也。”<sup>③</sup> 很明显，这些男女传教士认为：中国女学不兴是因为不“开化”的缘故，而不“开化”的原因正是基督教没有被中国人接受。因此，兴办女学成为传教士心目中促进中国走向“开化”，接受基督教的重要途径。

晚清教会女校的发展是整个基督教教育发展的一部分。其模式和内容的变化与整个晚清基督教教育的发展方向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晚清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基本趋势。这方面，胡卫清在《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 (1877~1927)》一书中有精彩的描述。根据胡的研究，1880 至 1890 年传教士内部有关双语教学的争论是近代基督教教育重要转折点。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广州、上海和福州等地教会学校开始引入英文教育。在这股引入英文教育的热潮中，同属美国卫斯理宗的监理会、美以美会率先采用英文教学。但英文教学的引入受到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eer)、谢卫楼 (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 等人的反对。在 1890 年的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双语教育成为双方激烈争论的焦点。狄考文在会上坚决反对在学校开设英文课程。他指出：“尽管有些人拼命提倡英语教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在这种学校学生读上两三年初级英语就不愿继续读了，他付清应负担的费用就可自由地离开，让这

---

① E. Aldersay White, ed. *A Woman Pioneer in China: the Life of Mary A. Aldersay* London: the Livingstone Press, 1932, p. 35.

② 光绪十八年 (1891 年) 在上海监理会慕尔堂西首创立，主事者是海歌女士 (Miss Laura Haygood)。

③ 林乐知：《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万国公报》第 7 卷第 28 号，1905 年 9 月。



种学生使用英语学习只能是幻想,而且由于学生在校时间太短,也别指望宗教能对学生品格有什么影响。”<sup>①</sup> 对于狄考文的发言,福州传教士美以美会为廉(William Henry Lacy)、武林吉(Ohlinger)、李承恩(Nathan Plumb)等人都发言反对。他们力陈英语教育对教会学校的重要性。

这场争论的意义并不只是教授英语的问题,而在于:教会学校是否要反映中国本土社会发展的要求,抑或坚持固有封闭式的教育模式。英语教学表面上看来是教会学校的西化;但它却满足了通商口岸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从这一点说,英语教学又是教会学校跳出招揽赤贫的救济式教育,为中国主流社会接受,逐步本土化的开始。从日后教会学校的发展来看,美以美会和监理会传教士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两个同属卫斯理宗的美国差会兴办过许多著名教会女校,如南京镇江女塾、上海中西女塾以及福州毓英女塾。分析它们在教会女学方面的工作,或能更深入地说明晚清教会女校的发展。下文就以福州地区美以美会女子教育为案例,作一具体分析。

美以美会<sup>②</sup>是在1847年来到中国福州传教的。1850年12月30日,麦利和(Robert S. Maclay)<sup>③</sup>与妻子一起在家中创办福州第一所女校,最初时有11位女学生。这所女校既是美以美会在远东地区兴办女学的开始,也是福州地区近代女子教育的先声。这

---

①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274页。

② 美以美会,系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North (M. E. M)。该会属卫斯理宗,1840年,因奴隶问题,美国卫斯理宗分为南北两个独立教会,在中国,美国北方卫斯理差会称为美以美会;南方卫斯理差会称为监理会。1939年,美国美以美会与监理会合并成为美国卫理公会;中国的美以美会和监理会也同时合并。

③ R. S. Maclay (麦利和),是早期在福建传教(1848~1872)的美以美会宣教士;也是日本卫理公会的开创者。

是一所走读式的日校 (Day School)。1857 年,女塾因麦利和妻子返国停办。1859 年来闽的两位女传教士媯标利 (Beulah Woolston); 媯西利 (Sallie H. Woolston) 重新开办了一所新女塾,实行寄宿制<sup>①</sup>。这就是毓英女中。创立中国美以美会女学传统的麦利和认为:“建立女子学校的计划对中国人来说是件令人惊奇的事,……但在我们看来,这所女子学校的作用绝对不仅限于她们在阅读能力上的进步。这些女孩子每天参加对天父的祈祷,与虔诚的女传教士和睦相处。这一经历将在她们以后的岁月中留下对基督教难以磨灭的好感。而且,女子教育可以证明:这所女子学校的建立强有力地宣传了我们的信念,即女性的灵魂与男性的灵魂同样是高贵的。”<sup>②</sup>除此之外,传教女校还是基于现实宣教的需要。首先“教会女学使教会与女孩们的父母有良好的联系,消除歧见……”<sup>③</sup>;其次,“从一开始,创办女子寄宿学校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为中国助手们提供信仰基督教的妻子。中国传道助手们必须和基督徒结婚而不是异教徒,这点被传教士们视为十分重要的事。因为美以美会圣经学校的男生急着要迎娶毓英女生,女孩子们大都难以完成学业”。<sup>④</sup>

刚建立的毓英女中实行全日式寄宿制,“这一有违习俗的做法

---

① 麦利和及其妻子在福州创立的第一所女校是所谓的日校,此种日校实际上是走读学校,随开随闭,中途退学者不少;女学生亦无一人信教。1850 年开始,美以美会开始改办寄宿制男校和寄宿制女校。寄宿制办学,教会与学生家长签订合同,对学生实施持续影响。

②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New York: Carlton & Porter, 1861, p. 233.

③ R. S. Maclay, “Woman’s Work in Our Foochow Mission” *Heathen Woman’s Friend* (1872. 9)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 23.

④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Boston: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at Harvard University, 1974, pp. 86~87.

使当地居民大为惊恐，误信如果让女孩在教会女校住宿，朦胧入睡时就会被挖去双眼。于是最初招收到的7名女生，在两三天后相继逃跑，只剩下1人”。<sup>①</sup> 1861年的年度报告中，媯氏姐妹感慨地说：“今年我们花大力气让中国人送女儿来校，但大多被推托……一位女生还被她母亲偷偷带回家，因为她希望女儿留双小脚。有个女生也在家人探访期间被带走。其父母千方百计让她呆在家中，说：她已经和人订婚，若她返校学习基督教，将来她会拒绝这门亲事。”<sup>②</sup> 事实上，早期毓英女中生源以弃婴为主；规模极小。“1871年福州毓英女塾有学生28人。其中20人是孤儿，她们是从我们差会的孤儿院转送过来的。”<sup>③</sup>

19世纪80年代是福建美以美会女子教育的转折期。当时，福州美以美会内部就是否在教会学校设英文课程等议题上发生矛盾<sup>④</sup>。矛盾缘自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的创办。1880年美以美会华人信徒张鹤龄捐款10000银元，资助教会成立一所高级男校。美以美会遂借此建立了福州鹤龄英华书院<sup>⑤</sup>。传教士武林吉(Ohlinger)要求在鹤龄英华书院设立英文课程，他的观点得到会内华人教牧坚定支持。据当事人之一的黄乃裳回忆，他“于英华(书院)尤于

---

① 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p. 26.

② *Minute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Foochow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78, Foochow: Methodist Press, 1878, pp. 21~22.

③ *Minute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Foochow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78 Foochow: Methodist Press, 1878, pp. 21~22.

④ 关于美以美会19世纪在福州有关英文教育的争论，可参看 Dana L. Robert, “The Methodist Struggle Over Higher Education in Fuzhou, China, 1877~1883”, *Methodist History* (April 1996), pp. 173~189.

⑤ 鹤龄英华学校为近代中国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林森、洪煨莲、刘广京等人都出自英华门下。



许扬美、谢锡恩二君赞助武君林吉，力排在闽之英、美各教士之阻挠，而期以必成其志。以在彼时旷观环宇商战，与夫各国人才经济弥漫之势力，世界之潮流，知英文必大行于宇内。教会于施行慈善教育二端，在在出力，则教授英文为争后来各途之上流，殊不可缓。武君深知其意，不顾诸教士之横议攻击，甘为其难”。<sup>①</sup>很明显，黄乃裳等华人教牧是基于英文的商业（所谓世俗）价值为理由而坚持英文课程。这一理由正是许多传教士极力反对的。当时，美以美会的传教士李承恩夫妇（Rev. and Mrs. Nathan Plumb）坚决反对此一动议，蜗氏姐妹也站在李承恩夫妇一边。

1881年，前福州年议会监督麦利和（R. S. Maclay）从日本宣教区探访福州会友，指“英文学校在该国（按：日本）最占优胜，福州自应仿行”<sup>②</sup>。这一言论令武林吉一派大受鼓舞。1882年，争论蔓延到女校。华人教牧公开指责李承恩夫人负责的女校“课程范围过于狭窄，导致报读人数低迷……1883年，福州华人教牧又批评蜗氏姐妹的毓英女校课程太过狭窄，无法满足教会的要求。他们草拟了一份陈情，要求美以美女布道部为福州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sup>③</sup>。但蜗标利、蜗西利两姐妹认为教会女学必须培养教牧人员的妻子，建立基督教家庭。英文学习不仅毫无用处，甚至对“女学生在家庭的良好作用有极坏影响”<sup>④</sup>。蜗标利、蜗西利的观点虽然在福州美以美会内部只有小部分人的赞同，却得

---

① 黄乃裳：《绂臣七十自叙》，刘子政编《黄乃裳与新福州》，新加坡：南洋学会，1979年。

② 林显芳：《福州美以美年会史》，福州：美华书局，1936，53页。

③ Dana L. Robert, *American Women in Missio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ir Thought and Practice* Macon,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9~180.

④ 同上注。

到其他宗派的传教士大多数人的支持。<sup>①</sup>

与媯氏姐妹的观点针锋相对，1883年的美以美女年度报告向媯氏负责的女校工作提出了多达10项修改要求。内容包括：施行学生年龄限制，教授基督教和儒家经典，中英文双语教学，增设声乐、器乐、代数以及中西式针织教学，严格规范考试等等<sup>②</sup>。从表面上看，双方在争论是否采纳中英文双语教学，扩大教学内容，实际上争执的焦点在于：教会学校是否应摆脱单纯地为宣教人员培养妻子的限制，提供多方面的教育以满足华人信徒的现实需要。此种教育是否会影响到教会本身的发展。争论结果，武林吉和华人教牧获得了胜利。1883年媯氏姐妹离开福州。

武林吉和华人教牧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美国差会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在1883年美以美女布道会在美国召开第14届年会上，与会者在媯氏姐妹离职的问题上明确支持华人信徒的立场。会上说：“媯氏姐妹的离开表明，中国女子教育已做出一定改变，教授英文将成为主流”<sup>③</sup>。1890年，原先反对英语教学的李承恩也在上海全国宣教士大会上公开承认，“我曾经认为用汉语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我现在赞成英汉双语并用”。这就是卫斯理宗传教士支持英语教学的由来。但李承恩之转变态度，并非认同英文的商业（世俗）价值，乃是他发现英文教学在人文教育上的价值。他解释说，“用英文教学有多方面的好处……只懂中文的学生虽然能够完

---

① “The 1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General Executive Committee” (Nov. 1883) *Heathen Woman's Friend* (Vol. 15) Boston: Woman Missionary Society, p. 128.

② *Minute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Foochow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83*, Foochow: Methodist Publishing Press, 1883, pp. 24~25.

③ “the 1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General Executive Committee” (Nov. 1883) *Heathen Woman's Friend* (Vol. 15) Boston: Woman Missionary Society, p. 128.



成全部学业，实际上只是死读书。在他面前就没有如此巨大的知识宝藏吸引他去探索，以满足他深入学习文学、科学、历史、神学等等知识的渴望，因为这些都是用英文写的……在福州年议会，最有才干的中国教士是精通英语的，能很好地运用外国书籍和评注。”<sup>①</sup>

娟氏姐妹的离开和双语教学的出现标志着美以美女布道会在华教育事业新时期的来临。接办女校的星姑娘 (Miss Elizabeth Fisher)、薛承恩夫人等人不再将办学目标限制在为基督徒培养合格妻子。她们加开英文和音乐两科，更开设了华人教牧认为十分重要的“女孝经”、“女诫”。<sup>②</sup>1888年(办学三十年后)，毓英女校首次颁发毕业证书。第一名毕业生是谢绍英 (Ruby Sia) (华人传道谢亨韬之女)。同时，随着洋务运动在福州口岸的发展，学生家长开始愿意为女子教育投资。1899年，毓英女中已是清一色的自费生。家境不好的女生则利用假期工作赚钱自给，不再接受家庭资助。<sup>③</sup>

从上述福州美以美会女学的发展来看，晚清基督教女校发展存在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女校发展不断专业化。晚清教会女校的办学目标从最初的避免异端和认识福音，到培训本土传教女助手

---

① N. J. Plumb,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Mission Schools and What Further Plans are Desirable",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 1890 p. 454.

② Graham, Gael Norma,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U. M. I. Dissertation Service: A Bell & Howell Company, 1994), p. 95.

③ 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pp. 56~57.

和贤妻良母，再到为信徒女儿提供教育，使之成为专业化人才。<sup>①</sup>二是女校发展不断本土化。尽管传教士掌握学校领导权，但女校只要是在中国社会中存在，华人信徒、中国社会的影响势必在女校发展中不断增加。本土化是指教会女校从最开始只反映女传教士的办学意愿，到逐渐受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制约和影响。19世纪80年代，福州美以美会内部有关双语教学、人文教育的讨论就是一个明证。在这个例子中，华人教牧的声音明显影响了争论的进程。在专业化、本土化的过程中，教会女校从最早期慈善性的日间学校到固定的寄宿学校。最后提出女子大学教育的构想。

19世纪末，福建美以美会女传教士们已兴致勃勃地规划女子高等教育的计划。“从19世纪80年代，毓英女中的教师们就开始梦想为女性建立一所大学。1884年到校任教的星姑娘是位杰出的代表……一次，她受邀在福州年议会妇女会中演讲……当轮到星姑娘演讲时，她说：‘太晚了，我无法再宣读原先准备的演讲稿了。你们中有的人甚至睡着了。现在我要投下炸弹。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女孩们多少教育呢？假如给男孩中学教育，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女孩子有中学教育。假如我们有大学程度的男子教育，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女生同样有大学程度的女子教育’”<sup>②</sup>。在这些女传教士的努力下，华南女子大学建立在福州。1911年12月12日，美以美会中国会督柏锡福(Bishop Bashford)在华南女大首座建筑——彭氏楼的奠基仪式上说：“这所大学的建立是我们福州教会五十余

---

① 参考刘玉玲的观点，刘玉玲：《晚清女学的开展》，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硕士论文，1998年，未刊稿。

②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1.

年女子教育发展的结果，是极其自然的。”<sup>①</sup>

除了教会女学“自然”发展的模式，不能忽略晚清中国女学另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与中国本土女学的兴起着密切关系。

## （二）“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sup>②</sup>

中国本土女学的兴起在19世纪末。闽人林纾的《闽中新乐府》有《兴女学》诗云：“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华人轻女患识字，家常但责油盐事。夹幕重帘院落深，长年禁锢昏神智。神智昏来足又缠，生男却望全先天。父气母气本齐一，母苟蠢顽灵气失，胎教之言人不知，儿成无怪为书痴。陶母欧母何世有，千秋一二挂人口。果立女学相观摩，中西文字同切磋，学成即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sup>③</sup>林纾所谓“群贤海上真先觉”，缘自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所作的《倡设女学启》。启中痛陈中国女学不兴，“同志之士，悼心斯弊，纠众程课，共襄美举，建堂海上，为天下倡”。<sup>④</sup>林文和梁文中所指的“海上”，是指1898年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它的出现还要从晚清维新运动说起。

晚清时期，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曾对中国传统女子教育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如郑观应的《女教》（1893年）、陈炽的《妇学》（1893年）、康有为的《大同书》（1902年）、梁启超的《论女学》（1896年）、康同薇的《女学利弊说》（1898年）以及经元善

---

①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12.

②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首版，1998年影印版，326页。

③ 转引，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首版，1998年影印版，327页。

④ 同上，326页。

的《劝女子读书说》(1897年)。

这些著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将女子教育和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女子教育成为国家文明教化的指针。如康有为女儿康同薇认为：“西人在我通商之地，分割之境，皆设学校教堂，以教我女子。我有民焉，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无志甚也”<sup>①</sup>；二是仍以贤妻良母为女子教育的旨归，正如林纾所言：“学成即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sup>②</sup> 维新派人士将兴女学联系到国家富强教化的观点，显然受到教会女校和传教士言论的刺激和影响。林乐知在评价晚清维新派时就说：“闻热心救国之言矣，曰变法变法，曰立宪立宪，欲变法于国乎，盖先变法于家家，盖立宪于家家。家家不维新，而维新于国者，何也？家家不释放，而释放于国者何也？故今日应为之急务，为变法立宪之预备，不能人人家家而户说之，莫若兴女学。”<sup>③</sup>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1897年上海成立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参与者有经元善、郑观应、汪康年、梁启超、康广仁、周舜卿等上海绅商界，维新派和新闻界名人。1897年12月14日，经元善、梁启超等人邀请上海中西绅商四五十人集会，具体商讨女学堂筹办事宜。同月，经元善等人制定了《中国女学堂章程》，章程以恢复“三代妇学宏观”为号召，要“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女学堂的课程分为中西两类，西文总教习由林乐知的女儿林梅蕊担任。经正女学是中国

---

① 康同薇：《女学利弊说》《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876~880页。

② 梁启超：《兴女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37~44页。

③ 林乐知：《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万国公报》第7卷第28号，1905年9月。

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它的创立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林纾笔下“海上群贤真先觉”指的就是经元善、梁启超等创办经正女学这件事。<sup>①</sup> 不过，这所中国首家女子学校前后只办了两年。1898年底，主事人经元善因谏阻废光绪帝，受清廷通缉，被迫避走澳门。经正女学也于1900年被迫停办。中国士绅办学的真正高潮在1900年之后的十余年间。义和团事件后，清政府实行所谓“新政”，通令各省改书院为学堂。1901年，各省官员纷纷条陈请办女学堂。“在1901年至1908年间，像京师有北京豫教女学堂（1905），直隶有严氏女塾（1902），奉天有淑慎女学堂（1905），黑龙江有幼女学堂（1907），山东有山东女学堂（1904），山西有山西女学堂（1907），河南有兰仪官立女子小学堂（1906），陕西有雅阁女校（1908年前），江宁有旅宁第一女学校（1904），江苏有早期的经正女学（1898年）外，尚有苏州兰陵女校（1901），安徽省有竞化女学堂（1906），浙江省有杭州女学堂（1904），江西省有九江国立女学校（1904），湖北有不缠足会附设第一幼女学堂（1905），湖南有湖南第一女学校（1904），四川有铜梁县女学堂（1903），广东有私立公益女学堂（1902），广西有容县龙胆女学（1904），贵州有贵阳达德女学校（1904）。”<sup>②</sup> 在民间兴办女学风潮的影响下，清政府于1906年订立了女学章程，正式肯定了民间女子学校的合法地位。到1909年，全国已有在校女生78,376人。

20世纪初年中国本土女学的兴起固然与西方文化和教会女校有关。但中国本土女学仿照的却主要是东邻日本的女学模式。当时，除少数女学堂（经正女学）模仿中西女塾这类女子学校外，大多数的女学校“课程仿照日本华族女学校，规则略为变通”。留日

---

① 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41～159页。

② “各省第一所女学堂一览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632～633页。



女学生，日本女教师成了许多官绅女学的负责人。如，上海务本女塾师范科聘请日籍教员河原与钢岛二人，“其中河原操子更根据日本小学校的模式，规划了务本女塾的教学方针、课目及教授方法，且亲任教日语、算术、唱歌、图画等，把学堂办得颇具名气，日后转至蒙古喀喇沁王府的毓正女学堂任教。上海女子蚕业学校的本科课程，也有教授日文。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聘日籍教员佐口美都子教教育，左人丰冈梅教音乐，还有留日毕业生傅世炜，吴鼎昌在校任教。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亦延日本森田政子授算术、体操、唱歌、图画、手工。甚至幼儿园，如湖北幼儿园的筹划、建立及经营，由户野和另外两名日本教习兼任。其章程中的办学宗旨及教学内容，俱与日本公布的‘幼儿园保育及设备规定’（1899）完全一样，甚至也教授日语”<sup>①</sup>。日本女子教育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中国女学的突飞猛进，传教士们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相信“中国政府兴办女子教育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学校工作的结束。恰恰相反，基督教学校受到空前的欢迎。多年来，我们默默承受着歧视和阻力。现在，基督教女校的发展机会却超过了几年前最乐观的估计”。<sup>②</sup>确实，中国本土女学的兴起令许多中国士绅对以往并不在意的教会女学也多加留意。这无疑令女传教士们感到鼓舞。另一方面，女传教士们对中国本土女学却有着几分戒心。她们原本希望，基督教女校不仅可以向中国女学提供师资，还可以作为中国女学的示范，从而在整个女学系统提升基督教的

---

① 刘玉玲：《晚清女学的开展》，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硕士论文，1998年，未刊稿，95～96页。

② 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p. 194.

影响。<sup>①</sup>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她们的主观设想。传教士们很快发现,原有教会女学和新兴的士绅女学、政府女学相比,经费和教学设备等都是弱项。她们甚至开始担心新兴的中国女学会以高额薪金吸引走基督教女校本已不多的教师。另外,中国女学中强制性拜孔仪式也让女传教士感到不安。20世纪初基督教女校本身仍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1905年,华人教徒严子实(汶章)在《各女塾宜变通学法冀以广植人才说》一文中抱怨:“鄙人十年囊笔,由幕入官。甲辰岁,请假回籍。始闻教会女塾之设。颇不遗余力。见所有在塾女子均能洗从前巽懦之态。具文质彬彬之雅。私差窃喜之。继又闻教外人谈论毕业女子。甚少有用之材。反不如常人之家。半读半嬉之学问也。初亦不信。满谓女布道持此巨款。设书院聘教习。教育栽培之。或六年。或八年。始准毕业。且郑之重之。给以执照。以为奖励。若是成材之少。果执事者之不善调停耶。抑女子之质。真远逊于男子耶?”后来,严子实找到了答案。他在1904年“八月就充延平女塾教读。查塾中规矩莫不尽美尽善。惟考察女学生一切已读之旧书。仅能成诵无一能默佩者。于此始知教读之误。”原来,该女塾一切教学“只求其易,不责其难。若是一切之书。虽读而未读也”。<sup>②</sup>

最令女传教士们觉得尴尬的莫过于中国本土女学更愿意接受日本女子教育模式的影响。尽管Burton在书中列举了许多教会女校学生受聘中国女学的例子,她也不得不承认,“几乎每所政府女校和士绅女学的教职员中都有日本女性,她们常常是女学的主管”<sup>③</sup>。虽然Burton在书中猛烈批评日本女性在中国女学中的表

---

① 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p. 212.

② 《华美教保》1905年8月。

③ 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p. 140.

现，认为“许多日籍教师根本无法胜任她们承担的课程”<sup>①</sup>。但事实是，清初中国教育体制基本上以日为师。那么，如何在中国女学系统保有基督教女校的地位，向中国本土女学提供师资，作为中国本土女学的示范，从而在整个女学系统提升基督教的影响？这是20世纪初年，中国本土女学兴起时的教会女学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挑战。许多女传教士相信，唯一的办法是基督教女子教育通过提高自身层次以加强基督教在中国女子教育的地位。于是，师资成了问题的关键。为培养高素质的师资，就必须设立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

1909年，教会向各地基督教女校的负责人发出问卷调查，目的是了解兴办女子大学的可能性。从回卷来看，各地教会女校负责人普遍认为“现在就需要有女子高等教育”，“主要的原因是她们相信目前急需受过训练的老师。虽然高中学生可以在小学里做不少事，但高中教育应该有大学毕业的老师”。<sup>②</sup> 这些负责人相信“中国政府女校和士绅女校距女子高等教育的水平还相差甚远，虽然一些女校称为师范学校和学院”。<sup>③</sup> Burton最后总结说，“几个相对集中，仔细选择课程以满足中国需要的本地大学，将能够极大地加强女子教育的工作。这些大学向基督教女校、士绅女校和政府女校提供训练有素的教师；统一初等学校的课程；提供音乐、家政学、医疗等专业的学习机会；为渴望服务家庭生活的女性提供多方面的通识文化。这些负责人一致同意，本地大学应是联合女子大学，或者由某一地区几个基督教会联合控制，或者像为男生

---

① 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p. 140.

② *Ibids.* p. 226.

③ *Ibids.* p. 145.

建立的长沙雅礼大学一样，由一些美国或英国的大学兴办”。<sup>①</sup> Burton 的预见是准确的。1911 年该本著作出版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六位女传教士就发出了一份名为“Appeal for a Union Women’s College for Central China”。这份倡议书是金陵女大创校的第一声。

### 三、第一代女生群体的出现

晚清中国女学的展开，最实质的成果是知识型女性社会群体的出现。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女教或能产生个别才华出众的女性，但这些女性并不作为有组织的群体而存在于社会中。实际上，中国传统女子的交游圈绝大部分限于宗族内的血亲联系，女子教育也以家庭或宗族为单位。近代女子教育为她们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教育本身是完备的结构体系。在教育体系中，女生们聚众学习，大部分人过着寄宿生活，朝夕相对，共同活动。这与古代女性交游圈已有质的区别。同侪相互影响之下，她们组成了一个崭新的女性群体。这个群体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知识程度高，可以自由地从文字信息中迅速了解外部世界，对社会变化有着相对敏锐的触觉。毫不夸张地说，晚清女学中的女学生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妇女群体。

关于中国本土女学中女学生群体形象，桑兵<sup>②</sup>、罗苏文<sup>③</sup> 两人

---

① 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p. 248.

②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台北县：稻禾出版社，1991 年。

③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有过精彩的分析。本节只是补充说明基督教女子大学出现前的教会女生群体形象。同中国本土女学中女学生一样，基督教女校中的学生也能吸收到许多维新思想。20世纪初年，参与维新运动的一些华人基督徒领袖已对女子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福州基督徒黄乃裳<sup>①</sup>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1906年2月29日夜，黄在当地美以美会的毓英女中，对女生发表演讲。黄乃裳首先认为读书是女子个人的幸福，“中华四千余年前之女界，皆昏黑无些少之光。今较前大异。今之妇女有读书之机，并知救灵之道”，也是社会的进步，“且天下无论何国，其国中之男女若不同等同权，妇女不得自由。此国必不振兴，不富强”。黄乃裳认为，女子教育应分为德、智、体三方面。所谓德育，即是信仰基督教，“若欲为更新有德者，则当遵圣经所言行之”；所谓智育，除了重申耶和华是智能的开端，“惟吾信道者，当以上帝所赐之智能辩真假之道，真者从之，假者弃之。又云，凡为妇女者，要学治家之法”；所谓体育，“于体育中又分两端，一身体宜保卫……二学问宜诚求。吾人须重此读书之机，读时宜度其意。所谓口而诵，心而维也。不可信口读过。虽读多年亦毫无得益……吾华之士女，最要者，即不可舍华文徒求他邦文字。苟他邦文字甚通，而华文不通，亦不足称为有学问之人。故须先通华文，后学他邦文字方可”。最后，黄乃裳以法国罗兰夫人为例，鼓励毓英女校学生，“吾人为中华之妇女，宜自重，

---

① 黄乃裳字久美，闽清六都农民子弟。薛承恩到其乡布道时，他和族叔在当地最早加入美以美会。其后跟随牧师许扬美学习《圣经》和布道法。他从闽清到福州教会仓前山传道后，负责教会文字工作。其间“见夫流俗藐宗教中少文人学士与夫上流社会之人才，乃励志学为八股，……且以读书博科名以压流俗，以拓教中青年之胸次理想。”1888年考中举人。此后参加晚清的公车上书；移民屯垦沙撈越；参加同盟会反清革命。有关黄乃裳的生平研究涉及华侨史、教会史以及晚清政治史，因此目前研究者实不乏人。著名者有香港浸会大学的李金强教授、新加坡南洋学会的刘子政先生和福建师范大学的詹冠群教授。



切不可自轻”，“若吾读书信道之女同起为国之心，中华惧不兴哉”<sup>①</sup>。在这篇演讲中，除了女子教育有益于国家富强等维新派观点外，黄乃裳将智育分为信仰基督教和家政之学，而将人们通常认为的“学问”列入女子教育的体育部分。相信这与《圣经》的教义——“信仰耶和华是智能的开端”有关。从黄乃裳的上述言论看，基督教界华人信徒视贤妻良母为女子教育的旨归，学问只是女子个人的素质要求，并非社会职业的需要。这也是当时教会女学负责人普遍持有的看法。

但是，女生群体出现的意义应在于这个群体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群体意识。中国教会女校学生一旦形成群体的力量，就会凭借群体力量表达自己对社会、女权的种种看法。她们的人生理想未必就是办学者的要求。清末，教会学堂女生已经积极参与国家社会问题。在保路运动中，“福州毓英女校的女生邀集城内其他教会女校学生，政府女学学生和名门闺秀们在毓英学校内开会。会议商讨共同反对英国人贷款修建浙江铁路。会上人士都希望看到由中国人自行修建拥有的铁路。她们并不畏惧外国资本，但反对列强屡屡用资本来剥削中国的利权”，会后，女生们还决定向福建巡抚提交请愿书。<sup>②</sup>另外，著名的甲午战前赴美学医四位女留学生（金雅妹、康爱德、石美玉、许金匄等）都曾接受过基督教教育<sup>③</sup>。以福州的许金匄（1865~1929）为例。她是福州美以美会许扬美牧师的长女。幼年时，她母亲曾一度为其缠足。当时，传教士保灵（E. E. Baldwin）的夫人多次劝说，才得以不受缠足之苦。

---

① 陈淑莲：《训语述闻》（华美教保），上海：美华书局，1906年5月，16页。

② 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p177.

③ 褚季能：《甲午战前四位女留学生》《东方杂报》，第31卷，第11号，11~14页。

和许多华人教牧的子女一样，她毕业于毓英女校。1884年她受美以美女子外洋布道会(W.F.M.S)支助前往美国留学，1896获美国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回国。1898年受李鸿章派遣赴伦敦出席世界妇女协会。这是中国在国际上的第一个女代表。其后在福州长期主持教会医院，在院中附设“醒灵堂”供传教之用。1927年末北伐军人城时局势混乱，其诊所被毁。许女士移往南洋。1929年病死于新加坡。<sup>①</sup>

晚清基督教女校中早期女学生群体有如下几个特点：

1. 思想较新。从早期基督教女校的毕业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初生社会群体的激情与活力。1905年上海中西女塾女学生陆秀贞的毕业文章题目是《论自由平等同胞为生人之原理》。因为传教士的影响，陆秀贞的文章将自由平等同胞等观念归结为基督教的影响。她声言：“夫天赋之自由，天定之平等，天授之同胞，固与人类同时而生也。人类存在至何时，则自由平等同胞亦将存在至何时，而不可须臾离离之者。……语曰不自由，毋宁死，足见自由重于死，而不自由者且与死无异。”<sup>②</sup> 上海是当时中西文化

---

① 林显芳：《福州美以美年会史》，福州：美华书局，1936，109页。目前许多妇女史研究者将许金匄的姓名误作何金英或吴金英，其实，何金英也者，纯系子虚乌有。其真名就是许金匄。上述论者参考的是民国时期《东方杂志》第31卷，第11号中褚季能先生的《甲午战前四位女留学生》一文，其文中提到“其次是一位福州的小姐何金英（笔者注，这个名字由英文译成，尚未证实）。她的父亲也是教会中人，头脑比较清新的。女士幼时，为习俗所迫，一度请求她母亲缠足，可是她父亲大不以为然”。褚季能所谓“英文译成，尚未证实”是指该名字是从Burton: *The Notable Women of China 1911*中译出。用者不察，以讹传讹。所谓许金匄“缠足的事”最早见于保灵夫人的记载。Mrs. E. E. Baldw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 Binding of Girl’s Feet” *Heathen Woman’s Friend*. 1876. 5. p. 39.

② 陆秀贞：《论自由平等同胞为生人之原理》，《华美教保》，上海：美华书局，1905年11月，16~18页。

汇合的中心，陆秀贞的观点显然受到美国传教士的影响。但在清末封建皇权专制的社会中，这位中国女性竟然写下“不自由，毋宁死”，实属不易。在福建省的古田县，1907年美以美会女校毕业生黄香苓也谈到教会女学。黄香苓说：“我古田为山僻县，且亦有之。十余年来历有学成毕业派为外学女傅外，考进医馆学成西医者有之。进上女学成英文者有之。在省会中，且有多人由美国大书院肄习加功毕业而回，为女学与医馆主理。如西来之师姑。”<sup>①</sup>

2. 群体意识萌芽，同侪感情深厚。清末教会女校的女学生人数虽少，但彼此感情深厚。黄香苓毕业时，同窗吴秀花、林次妹两人临别赠诗，互相勉励。诗句颇能反映晚清女学群体的心态。现摘抄如下：（吴秀花赠诗）“名山学道豁襟期，正我裙钗得意时，济济一堂资丽泽，那堪分袂远相离。肄业非徒欲淑身，芸窗灯火志当伸，飞将破壁睛经点，女界方知有席珍”；（林次妹赠诗）“休云设绛让儒珍，满望同将女教伸，坤道衰颓资力挽，木兰应是女前身。缘波春草恨分离，当忆同堂唱和时，双鲤不难通尺素，临行叮嘱勿愆期。”<sup>②</sup> 诗词之中，同窗之间友情跃然手上。另外，“肄业非徒欲淑身，芸窗灯火志当伸”、“满望同将女教伸，坤道衰颓资力挽”等句显然不是要表达“贤妻良母”的理想，而是要在社会振兴女子教育的志向。

3. “身教”而来的性别意识。教育讲求教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但早期中国教会女生群体的性别意识不是来自“言传”，而是通过“身教”。必须注意近代教会女校教育活动中“言传”和“身教”之间的矛盾。清末，大部分女传教士们希望通过教会女学培养基督教化的“贤妻良母”。但是教会女校负责人和女教师本人

---

① 黄香苓：《论兴女学为中国一大要务》（《华美教保》，上海：美华书局，1907年9月，32~34页。

② 同上注。

却成了教会女生学习模仿的范例。这些女传教士自己没有家庭，把主要精力放在女子教育工作上，是早期的职业女性。女学生在她们身上发现的往往不是贤妻良母、直接布道，反而是教育医疗等职业工作的广阔天地。从基督教教育逐渐专业化后，基督教女校学生实际志趣和校方办学思想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虽然校方（至少在口头上）期望培养学生成为基督教化的贤妻良母，大部分学生却期望成为像她们的女教师一样的职业女性。许多人的性别意识是非常清楚的。上文中的古田县黄香苓已发现将女布道会与其他教会组织的差异，“知否女布道所费，如起架女学堂，栽培我等，教而兼养，以及设女医馆、派女传道、开外女学，其款之巨，年难以数计。果由谁所出乎。盖实与男人无干，皆女界中所筹集也”。相应的，黄香苓向往的人生目标并不是贤妻良母，反而是“西来之师姑”从事的医师、教师等等<sup>①</sup>。

#### 四、本章小结

大学阶段是女子教育的最高阶段。但是，从闺阁女子到大学女生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存在着一个过渡的历史时期。晚清女学的发展就是这段过渡时期的关键因素。若没有晚清教会女学的发展、中国本土女学的兴起，中国基督教女子大学是不可能出现的。

晚清中国女学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女子教育体

---

<sup>①</sup> 黄香苓：《论兴女学为中国一大要务》《华美教保》，上海：美华书局，1907年9月，32~34页。



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晚清中国女学的展开过程中，先是教会女校在1844年的出现，继则中国官绅在1898年兴办的女学，最后，1907年满清政府颁布女学制，由政府着手兴办女学。正如刘玉玲的研究指出：“在办学过程中，宗教与世俗，传统与近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因素互相推磨折冲，错综复杂。教会女学，根本目的是要基督教化中国，广传福音。办学过程中，教会女学的形式，内容及招生对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官绅办学，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求国家富强，抵抗外侮。两股办学势力目标根本不同。但事实上，彼此却互相刺激，逐次发展。早期教会女校虽然只能招揽赤贫，却用文明的尺度来标榜女学的工作，以培养基督化的贤妻良母；中国维新派官绅鉴于西方势力的人侵和教会女校的出现，也将女学作为国家教化文明的尺度，以培养保国保种的贤妻良母。中国官绅办学的浪潮反过来又刺激了基督教增加对女子教育的投入力度，促使基督教女子教育朝高等教育方向发展，以站稳女学先锋的地位。”<sup>①</sup> 对于晚清这两股办学力量，我们都应该有客观的评价。办学思想和教学内容上，教会女学和官绅办学都以贤妻良母作为办学的第一要务，大都标榜中西并重的教学课程。所不同的是，中国官绅是出于捍卫传统文化，封建守旧的思想；而教会女学女传教士们鼓吹基督化贤妻良母，有时允许一些连传教士本人未必赞同的课程，则是因为在华传教的需要。1898年在香港创立英华女校的伦敦会女传教士牒喜莲承认，“中国人不是野蛮民族，不必将生活全部改变才能成为基督徒。他们有自己的礼仪习俗，随便摒弃它们是不智的。当然，随着基督教的引入及妇女地位的提升，很多习俗礼仪的重要性将会减退或消失，但在此时此

---

<sup>①</sup> 刘玉玲：《晚清女学的开展》，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硕士论文，1998年，未刊稿。



刻，还是暂为保留较好”，“我们看到这里的妇女之所以能享受较高的自由与较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她们没有突然被脱去枷锁，使她们转向另一极端，以至争取一些连我们也要避免的自由”。<sup>①</sup>但是，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办学者的意志只是教育活动的一部分。关键是受教育者的发展变化。在教育实践中，受教育者未必全盘接受“贤妻良母”的观念。这一代女生群体既是晚清女学展开的具体成果，也昭示着民国时期基督教女子大学生的基本特性。

必须指出，基督教会和中国本土士绅的办学直接导致了中国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创校的两种模式。一是从基督教女校直接发展，不断专业化，从而建立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一是在基督教女校发展的同时，受到中国本土女学的刺激，从而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华南女大和金陵女大的创立，就分别代表了上述两种模式。

---

<sup>①</sup> 《百年树人百载恩——英华女学校校史》，香港，英华女校，2001年，23页。

## 第三章

# 校史的回溯：以校长治校为中心

---

### 一、从程吕底亚、卢爱德到王世静 ——华南女大（1908~1951）

#### （一）布道家办学——程吕底亚时期（Lydia A. Trimble/1908~1925）

程吕底亚（1863~1941）<sup>①</sup>，华南女大的首任校长。她原籍加拿大。“其父母皆为热心圣道之基督徒，家有子女十人。”程吕底亚排行第九，“幼秉家训，崇道甚笃，及长益以宣扬福音为职志。年二十随兄游学于美之伊阿华省（按：爱荷华州/Iowa；该州是美国中部以农业为主的州），后毕业于西弗特尔师范大学。”1889年12月19日，她受美以美女布道会 Des Moines 支会差遣来到中国福建，时年26岁。1890年，她经过在福州短期的语言学习，开始了在华50余年的宣教办学生涯。

---

① 以下背景资料取自《程前校长史略》《程前校长纪念传号》，南平：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出版委员会，1941年。

1. 布道创校。程吕底亚早年主要在福清、平潭、莆田三处传道。这三处都是远离通商口岸的农村地区。华惠德回忆说，程吕底亚“在这广阔的教区四处奔走，呼召着那些奉主之名却少有真实灵性、被人们忽视的妇女。”<sup>①</sup>“她第一次在外传教，就达三个月之久。对她而言，当地语言陌生艰涩。但她在公众演讲和个人面谈时却只能运用当地语言，以致她过于紧张。一朝醒来时，她竟然既不会讲英文，又不能说福建话。她的中国同工非常担心。经过一天休息后，她才恢复语言能力，继续巡回传道”。<sup>②</sup>在传道过程中，程吕底亚坚信女子教育在宣教工作中的重要性，福清毓贞女校、平潭毓贤女校都是她一手创办的。她认为中国妇女完全有受教育的权利和能力，称“给黄莺儿一个可歌的环境，即不会没有歌声出来”<sup>③</sup>，“到来华的第二年底，我就觉得只要有人关心中国的女孩和女青年，没有什么她们办不到的。我很愿意告诉她们五个字：‘我能，且我会’（I can, and I will）。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女孩不可以同男孩子们一样享有大学教育的权利。我萌生建立女子大学的念头，要在福州建所女子大学。中国的女孩子应该和美国女孩们一样享有完整的大学教育”。<sup>④</sup>

程吕底亚的个性干练，作风泼辣。“她的说话非常简单，绝没有敷衍。果断力极强。她不但站在教师的立场，也站在学生的立

---

① L Ethel Wallace, *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 6.

② Mamie Glassburner “Pentecost and Jubilee” *Lydia Trimble Archives of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Box177, Folder3217.

③ 魏秀莹：《悼念程前校长》，《华南学院校刊——程前校长纪念传号》，南平：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出版委员会，1941年，12页。

④ Lydia Trimble, “The Fiftieth Mile-Stone in Retrospect”, *Miss Lydia A. Trimble YDSL* (耶鲁大学神学图书馆特藏室，下同)，UB Arvchives (亚联董档案，下同)，Box177, Folder3217.

场，应付事情是用客观的眼光。”<sup>①</sup> 另据文史资料记载：建立福清毓贞女塾时，她“选择了一块据说是龙田七社墩地的废地，并无业主，她们不经在当地聚居数百年的龙田玉井施姓族人的许可，擅行破土下基兴工建筑。施姓族房长找出了他们宗祠里保存两三百年的老契，作为证据，向程吕底亚交涉，要求她承认地权并偿给地价。但程吕底亚拒不接受，声言就是你们告到你们的县堂里去，我也没钱给你，并喝令在旁的女会友把他们赶下楼去”。“一天晚上，施姓族人施天发提枪向程吕底亚的窗门射击。子弹打中程吕底亚的床架。事件发生后，程吕底亚告到清朝的县堂。施天发当即铁索银铛下狱。不但这样，施姓宗祠还得备办花红烛炮，由族房长送去向程师姑赔礼道歉”。<sup>②</sup>

进入 20 世纪，美以美女传教士们在福州、莆田等地已建立了 6 所以上的女子中学。1899 年，女布道会尝试建立一所新女学，想“利用士绅家庭子女想学英文的机会，建立一所特殊的学校”。但由于没有达到“大学的水平”，很快停办。<sup>③</sup> 1901 年 7 月，程吕底亚经上海返回美国晨边学院 (Morningside College)<sup>④</sup> 进修。1904 年获该校文学士学位。1903 年秋，美以美女传道会在爱荷华州召开会议，还在大学就读的程吕底亚在会上倡议在华建立女子大学。1904 年 5 月，洛杉矶举行美以美会总议会会议。程吕底亚又正式提出了在华南地区建立女子大学的设想。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从福州地理上与文化上之观察，均认为有设立高级女校提高女子

---

① 陈淑圭：《典型的教师》，《华南学院校刊》，1941 年 12 月，南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5 页。

② 张瑞哲：《龙高半岛上的几宗教案》，《福清文史资料》（第二辑），66 页。

③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3.

④ 晨边学院/Morningside College 是华南女大三任校长的母校。它在 1894 年成立，至今仍是美国卫理公会的著名私立学校。



教育之必要”。<sup>①</sup> 美以美女布道会咨询委员会成立由福州年议会<sup>②</sup>的程吕底亚、柏森 (Phoebe Parkinson) 和兴化年议会<sup>③</sup> 的威尔逊 (Wilson) 三人共同负责选定大学地址、校园范围、建筑规划、学校课程等事务。同年 10 月 20 日, 曾任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校长的美以美会会督柏锡福 (Dr. James W. Bashford) 到达福州, 会商建校事宜。1905 年 5 月 18 日, 25 位美以美会传教士在上海讨论通过: “应当在全中国建立 4 所女子大学——分别设在华北、华中、华西和华南; 衷心支持在福州已开始的建校活动, 盼望能够迅速在该地建立起华南地区的女子大学; 在建立大学时, 只要条件许可, 乐于同其他宗派开展合作。”<sup>④</sup>1907 年建校委员会从美国商人彭先生 (Mr. J. D. Payne) 处募集到首笔建校捐款 15,000 美元。1908 年初, 华南女大校董会在上海成立, 由福建美以美会年议会成员组成。同年, 华南女大预科班开学, 称为华英女子学堂, 程吕底亚担任学堂校长。

2. 服务办学。程吕底亚对这所学校期许甚高: “本校设于福建福州, 为中华南方惟一之女子大学校, 福州系全国教育中枢之一, 又为基督教美以美会发祥之地, 造本培基, 迄今已逾七十载, 计闽省信徒之数, 约占全国基督徒七分之一, 综此而观, 则本校关系之重要可知。”<sup>⑤</sup> 然而, 1941 年华南女大校友唐尚凯回忆说: “华南是由很艰难困苦中, 创造出来的。普通学校的创办, 总有相当

---

① 《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一览》, 福建省档案馆: 39-1-23。

② 正式年议会是美国美以美会总议会下设的一个正式区域机构, 由年议会主席管理, 并有权选派代表参加世界美以美会的总议会。福州年议会是世界美以美会第 91 个年会区。

③ 兴化年议会下辖莆田、仙游和永春等地教区, 1902 年正式成立。

④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4.

⑤ 《福建华南女子大学校务述略》, 1925 年, 高时良编;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 4 辑, 南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03 页。



的经费，所以对于校舍的建设，校内的设备，以及教职员的聘请，只要按着预定的计划去做。所谓有钱的家好当，至于华南则不是这样，当日校舍建筑了一年，因经费告乏而停顿，后来还是创办人程师姑的哥哥，将他美国住宅出卖，所得的房金，寄到中国来，方使校舍落成，以后不知经过多少艰难困苦，而前任校长程师姑，卒以百折不挠地精神，打破难关，至终将女子最高深教育的根基，奠定在华南。”<sup>①</sup>

程吕底亚治校从1908年至1925年为止。其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08~1921年）是大学发展的预备期；第二阶段（1922~1925年）是大学正式步入高等教育的阶段。

从1908年到1921年间，华南只能培养高中程度的女子教育。“在中国美以美会驻福州会督卢思义（Bishop Wilson S. Lewis）<sup>②</sup>的坚持下，这个小学校被称为福州女子大学预科。这个名字经常提醒大家，那计划中的大学将很快变成现实。”<sup>③</sup>

1908年，学生有13人。由于在岭后路购买的校址迟迟未能开工建造，学校被迫向美以美会毓英女校（又称太茂女塾）租借校舍，程吕底亚在校外租借了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屋子作为个人生活和学校办公的地方<sup>④</sup>。1911年大学彭氏楼<sup>⑤</sup>举行奠基仪式，正

---

① 唐尚凯：《我意念中的华南》：《华南学院校刊——三十五周校庆纪念专号》，南平：华南女子学院，1941年，7页。唐尚凯，30年代的华南女大校友，时任建瓯县圣公会医院医师。

② 卢思义（Bishop Wilson S. Lewis）是华南女子学院第二任校长卢爱德的父亲；原任美国Sioux City晨边学院（Morningside College）的第二任院长；来华后长期担任美以美会中国会督。

③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Ssia, 1956, p. 7.

④ “Annual report in 1908”, *Foochow Woman's Conference, 1919~1930*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31.

⑤ 又称马莲彭楼。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的校部办公楼——胜利楼。

式开工建造。彭氏楼 (Payne Hall) 由美国爱荷华州 Sioux 市建筑师毕齐先生 (Wilfred Beach) 设计。他照搬自己在晨边学院 (Morningside College) 卢思义楼 (Lewis Hall) 的设计图纸, 加上中国宫殿式的屋顶设计。1914 年, 行政楼彭氏楼和学生宿舍楼谷莲楼 (Cranston Hall)<sup>①</sup> 建成启用。华英女学堂才搬进属于自己的建筑。1916 年因福州城内已有英国圣公会办的华英女子学校, 为避免名称雷同, 遂将校名改为华南女子大学。

程吕底亚治校期间, 华南女大教学有两个特点:

一是师资不足, 外籍人士占教职员工的主体。大学开学时专任老师只有程吕底亚一人。1910 年, 谢绍英从美国康奈尔学院 (Cornell College) 毕业返国, 成为华南女大第一位华人教师。其后几年内, 陆续有教师加入大学教学行列, 比如: 华惠德 (Wallace, 1910 年)、明茂利 (Mary Mann, 1911 年)、康师姑 (Elsie G. Clark, 1912 年)、和爱德 (Katherine Willis)、罗黎晞 (Roxy Lefforge, 1918 年) 等人。早年大学师资中还有所谓 “Student of Language” 的女传教士。这些女传教士利用大学边教学边学习中文, 随后就离校到其他地方宣教。1912 年, 其他女传教士返国休假, 全年在校任教的竟然只有谢绍英一人。这时期的教学经常出现一个老师同时兼任多门学科的现象。据主修教育学的陈叔圭回忆: 有一次, 程吕底亚 “来告诉我学校的理科教师走了, 物理学没有人担任, 她叫我来代替, 我听了很莫名其妙, 因为我从来没有教过物理学。她说: ‘我现在所教的功课, 很多的地方, 都不是由学生时学习来的, 完全是由自己慢慢地研究的’。我听了没有话说, 只好答应了。”<sup>②</sup> 所谓 “自己研究” 云云, 实际是早年大学师

① 现为福建师范大学办公楼——民主楼。

② 陈叔圭:《典型的教师》,《华南学院校刊——程前校长纪念专号》,南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41年,5页。

资严重不足，为开课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当时，程吕底亚一人就负责过物理、地理、植物学、英文、宗教等多门功课。

二是学生年纪普遍较大，程度不高。传教士爱以利(Reik)说：“当我刚来大学时，学生们年纪都较大，比较严肃，不太懂得玩耍。她们都是为躲避婚约，自己争取机会来学校就读，全情投入。”“学校的每个女生都把参加课外活动作为自己学习的机会。所有女生都盼望回到家乡教导其他女孩。所有人都去教堂，所有人都属于教会，所有人都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成员。”<sup>①</sup> 学生入学时的程度似乎不佳。1908年的首份大学报告中，程吕底亚说：“大部分学生吸收知识不快，进度远不如我们的预期。”<sup>②</sup>

1914年，华南女大开始试招两年的大学课程；1917年，正式开办4年大学课程，首届学生有5人。1921年3位毕业生从程吕底亚手中获得大学文凭。从此，华南女大进入了大学阶段。

1922年是大学历史第一个转折点。1922年，大学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理事会获得临时特许证，学生毕业时可以获得纽约州立

---

① Miss Elsie I. Reik, "Changes in College Girls"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34, June)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p. 231~232.

② *Foochow Woman's Conference, 1919~1930*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31, p. 21.



大学的文凭<sup>①</sup>。学生从而可以直升美国大学研究院学习。1922 年纪念程吕底亚建校功绩的立雪楼<sup>②</sup>正式破土兴建。6 月，俄亥俄州美以美会会议上，美国差会方面正式提交华南女子大学的宪章。是次会议上，华南女子大学的英文从原来福州音的“Huan Nang”改为官话音的“Hwa Nan”，据称是让大学不再只有地方色彩。大学课程从原来单一的教育专修专业增加宗教教育、生物和理科等专业。大学也不再设立所谓“Student of Language。”由于取得美国

---

① 1921 年，学生学位既未有中国教育当局申请认可，也没有任何美国大学的承认。当年华惠德返美休假时，开始讨论向纽约州立大学呈文，申请获该校学历。经过和爱德（Katherine H. Willis）和美以美女布道会的努力，而获得纽约州教育部的认可。和爱德后来回忆说：“开会时候，他们向我发问。第一，是设立目的，我答以造就有基督化人格的青年妇女，高级教育。第二，问创办女子大学的缘由，我答称：女子大学，在美国威尔斯里，西密斯，俟立欧等也有设立，做母亲的人，他女儿五岁的时候，就向各校保留学额，美国这样，中国更觉需要；第三问，设立大学教育，不怕重复吗？我说中国福建人民，号称三千万，并不太多。”事后，纽约州立大学副校长穆峙（Adelbert Moot）在致和爱德的信中说：“这回董事会诸同仁，凡是听过女士去年所作关于华南的演讲，和看到华南各项报告，以及您向唐宁博士/Dr. Downing 的正式呈文，大家都欣然用意于该校权利之给予。查该校已入教育的成绩，目前办理的情形以及教育的计划，都能使人满意。根据女士所条陈的意见，和该校所设立的学科，足见主持该校教育的人，实属眼光长远，思想前进，其所栽培之中国女子将来必能应付一切问题与责任，不失为妇女领袖的地位。”《校史表演》《华南学院校刊——三十五周年校庆纪念专号》（1942 年 5 月）；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12。另现福建省博物馆收藏有 1931 年华南女子学院王某的毕业证书实物。正本是羊皮纸的纽约州立大学授予文学学士学位的证明，另有附有纽约州教育部和大学两份证明文件。中国另一所女子学院金陵女子学院于 1919 年获得纽约州立大学的特许。参黄政：《福建近代教育史话》《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一辑，福州：福建教育史志编写办公室，1990 年，62 页；黄洁珍：《从吴贻芳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及神学学部硕士论文未刊稿，1996 年，14 页。

② “立雪楼”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校部的“和平楼。”

大学和教育当局的认可，学生数从1920年的21人猛增至1923年的63人，1926年的87人。

1925年1月，年已62岁的程吕底亚从华南女子大学校长任上引退，仍然留在中国继续传教布道。1941年8月25日，程病逝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福州的华南女大立雪楼。

程吕底亚退休后，美以美女布道会曾考虑让她回美国。但会督卢思义说：“假如你把退休的程吕底亚接回美国，那将是个巨大错误。她会在中国度过余生，葬于当地。将来的日子，中国人民也会纪念她。”<sup>①</sup>程吕底亚将中国视作自己终身服务的地方，她曾说：“能够了解和深爱我选择的这片土地和人民是何等的快乐啊！”<sup>②</sup>程的学生王世静回忆说：“程前校长是我的恩师，我的慈母，也可以说引我到新生之路的唯一领导者。我忘记她是美国的女子，因为最同情于我国女子，首先发现我国女子，有绝大的能力，如果施以教育，不让于任何男子，更比任何女子没有愧色的，就是她！……程前校长本着先知先觉底眼光，觉得布道工夫，最大基础是在教育，所以到了中国，先从办学入手，办学以后，不论当时中国政府怎样顽腐，社会怎样黑暗，而中国女子潜在力量，化朽腐为神奇，化黑暗为光明。所以在中国男子教育尚未发达时期，已经感到女子有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的必要。……程前校长培植中国女子，不仅谋其自身改善，而在由小及大，由近及远，谋普遍的改良。所以华南女子毕业以后，所派工作，多是到民间去，到乡村去，不论环境怎样困苦，风气怎样闭塞，华南毕业生的使命，就是向困苦中求挣扎，于闭塞中谋开通……程前校长当日，早已见到中国女子，应该学习家政，并在历届学生中，选派留美专攻

---

① *Miss Lydia A. Trimble YDSL*, UB Archives, Box176, Folder3217, p. 1.

② Lydia Trimble, "The Fiftieth Mile-Stone in Retrospect", *Miss Lydia A. Trimble YDSL*, UB Archives, Box176, Folder3217, p. 14.



家政，音乐一门，也是她奠定基础。程前校长苦心焦思，凡是女子应有的学科，绝对不使缺乏，女子特长的学科，更设法谋其增加。……程前校长每次回国，募捐款项或报告在华工作经历，都是宣扬我国人的优点，和可以共同前进的精神，断不取傲慢轻蔑和侮辱的态度……”<sup>①</sup>

程本人不是个理论家，她创立华南女大，靠的是实干作风。程强调“每个人的需要和止于至善的必要 (the necessity of doing one's best)”<sup>②</sup>。她“最强调高等教育是为人服务的宗旨，而将对于未受教育同胞的责任感就像金丝线般深深织入大学的精神中”<sup>③</sup>。学生林碧珠 (Esther Ling) 回忆说：“她的宗教课使我认识到：个人的价值、基督关注每个人的需要以及每个人都应负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义务。她所有的教学都在强调宗教的实践方面 (Practical side of religion)。”<sup>④</sup>

程吕底亚辞职后，美以美女布道会决定由卢爱德继任大学校长一职。1926年1月28日，卢爱德来到华南女大正式就职。

## (二) 教育家办学——卢爱德时期 (Ida B. Lewis /1926~1927)

---

① 王世静：《永远刻在我的印象中》，《华南学院校刊——程前校长纪念专号》，1941年，7~8页。

② Esther Ling (林碧珠)， “A Modern Apostle-A tribute from the alumnae”， *Lydia, Trimble YDSL*, UB Archives, Box177, Folder3217, p. 11.

③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33.

④ Esther Ling (林碧珠)， “A Modern Apostle-A tribute from the alumnae”， *Lydia, Trimble YDSL*, UB Archives, Box177, Folder3217, p. 11.

卢爱德(1887年12月15日~1969年)<sup>①</sup>,是美以美会中国区会督卢思义的女儿。她生于美国爱荷华州 Blirstown。1909年卢氏从晨边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10年来到中国天津 Sarah L. Keen 纪念中学教书5年。从1915年开始,卢爱德返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读,1919年以毕业论文《中国女子教育论》(*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获哥大教育学博士。

1. 以服务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卢爱德对中国女子教育素有研究。中国女教育家俞庆棠誉其为中国女子教育上的“良友”<sup>②</sup>,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1922年也说:“这几年来在中国女子教育上有研究的人,我只遇到一位。这一位就是美国露懿士女士(即卢爱德)。他的《中国女子教育论》……是很有价值的”<sup>③</sup>。

1917年,卢爱德在《教育季报》(*Educational Review*)上发表《中国女子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of Woman in China*)一文,具体阐述了她对中国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的看法。她认为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在中国应该有三个主要目的:(1)用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改造中国社会;(2)为中国年轻女性提供自我觉醒的

---

① 以下资料取自,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Ida Belle Lewis,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 New York: Ph. 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19; Karen T. Wei, *Women in China: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4, p. 55.

② 俞庆棠:《三十五年的中国女子教育》,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香港:龙门书店1969年印行,178页。俞庆棠(1897~1949),曾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近代中国著名民众教育家,历任中国社会教育社总干事,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董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参茅仲英主编:《俞庆棠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③ 陶行知:《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占领地位之十五周年纪念》《陶行知全集》,卷一,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467页。

机会；(3) 培训乐于服务的基督教领袖。高等教育之女性可从事4项工作：家政，作家，教师，宗教工作者。女子高等教育设置的课目应有：中文、英文、社会科学、科学、教育、宗教教育等。<sup>①</sup>

在这篇文章中，卢爱德显示了对中国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颇具前瞻性的洞见。

(1) 鼓吹女性参与中国新文学的创造：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掀起新文化的白话文运动，反对之声尚不绝于耳。卢爱德在此时也开始鼓吹中国新文学。卢文中专门谈到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和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卢爱德指出：“既然成为20世纪女性，她们就应该与生活一起的人们共同思考。现代形式的文学欣赏和创作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大学生，她们应该以创造新文学为己任”。<sup>②</sup>

(2) 强调中国处境的特殊性：中国基督教女校不应该照搬西方的社会理论和观点，“需要以东方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中世纪和当代的历史”。而且，“中国女子大学的工作是为中国最有潜质女性提供丰富的生活。人们必须为此做出谨慎的选择。西方传统的大学教育不完全适用。中国问题是独特的，需要新的解决办法”。<sup>③</sup>

(3) 提倡自由理性的态度：“宗教教育是基督教大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宗教教育系，应该把重点摆在对《圣经》的理性研究上，将《圣经》中普世真理应用到具体的实际问题中。……伦

---

① Ida B. Lewis, "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Educational Review* (Oct. 1917)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pp. 272~278.

② 同上注。

③ 同上注。

理、哲学和比较宗教学在大学各年级都应该讲授。”<sup>①</sup>

(4) 强调服务精神：“课程本身并不是目标，我们应该意识到女子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同人民生活紧密联系的。基督教大学不应该是僵化呆板的制成所，而是一间不断服务，在服务中成长的学府。无论如何，基督教动机是决定性力量，非以役人，乃役于人。”<sup>②</sup>

卢爱德认为：“女子大学的目标当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为大学教育而大学教育’；而应该是‘大学教育为中国服务’。然后，使‘中国为建立上帝之国服务’。在这一代女学生培训积极服务的基督妇女应该是大学的使命。”<sup>③</sup> 从这些观点来看，卢爱德的信仰属于自由派神学<sup>④</sup>。

1919年，卢爱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通过了教育学博士论文的答辩。论文题目是《中国女子教育论》(*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这篇博士论文根据实地调查<sup>⑤</sup>，全面介绍中国女子教育（主要是中国基督教女子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

---

① Ida B. Lewis, "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Educational Review* (Oct. 1917)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pp. 272~278.

② 同上注。

③ 同上注。

④ 自由派神学，出现于20世纪初。这一派神学站在基要派的对立面，强调以理性思想诠释基督教教义。史静寰在《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中将传教士分为保守派教育传教士（以狄考文为代表）和自由派教育传教士（以司徒雷登为代表）。参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⑤ 为获得资料，卢氏向26间女校（基督教办21间，政府及私人办5间）发出问卷调查。调查总人数1176人，其中基督教女校学生1073人，即总数的91.2%。华南女大及附中35名参加了这次调查。从资料分布来看，卢氏此项研究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基督教女子教育状况。Ida Belle Lewis,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 New York: Ph. 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21, p. 43.

许多重要观点。

(1) 教会学校在中国女子教育系统的地位。她指出：“教会学校是中国教育体制的先行者，今日在教育各部门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传教教育系统还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可是，教会学校在政府注册才有可能建立个全国性的教育计划，从而减少竞争，利用所有资源提升教育水准。很明显：只有合一的努力才为这代中国女孩提供充足的教育机会。”<sup>①</sup>

(2) 中国基督教女子教育系统忽视贫下阶层的子女。根据卢的统计，这些学校女生中 49.5% 来自商人阶层；38.5% 来自学者家庭（包括牧师、传道人、教师）；7.7% 来自农民家庭；1.4% 来自工人家庭；2.7% 来自政界家庭；1% 来自军界家庭。卢氏感慨说：“中国的农业人口占了绝大多数，更远多过商业阶层。但他们和劳工阶层一样对女子教育几乎没有影响力。”“假如中国女性要得到教育，工农的女儿一定要顾及到。她们被女子教育界严重忽视。必须努力宣传，尽可能使她们获得教育。”<sup>②</sup>

(3) 严厉批评女子教育同社会生活相脱离的倾向。根据她的统计，中国基督教女子教育只有 36.4% 的学生修读同家庭服务、社会生活相关的科目，如家政学、社会学、公共卫生学等。根据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她认为学校“在课堂中应有自然和社会生活”，“教学形式和工具应附属于教学实践内容”。卢爱德指出中国女子教育课程“明显违反了现代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今日任何课程的价值都不该应由科目本身的准确和完整来评价，而是根据课程对学生个人在社会中成长生活所发挥之作用来判定”，“将学生从实际生活分隔的教学课程也许会显得比较明确，但这些学生

---

① Ida Belle Lewis,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 New York: Ph. 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19, pp. 35~36.

② *Ibids.* pp. 47~48.



会因此遭受无谓的巨大损失”。她提出应该调整中文教学，删去部分高等数学。还应“将课程作根本调整，提供更具理性的课程，加强与社会家庭生活的联系，更明确地将服务作为教育目标。”<sup>①</sup>

论文末尾，卢爱德总结说：“那些指导这一代女子教育、肩负实践任务的人们，应该通过与生活处境的不断接触作出判断和调整，从而创造新女性。因此，新中国的女性要在知识、技巧和精神方面多作准备，以服务她的家庭、社会、国家和这个世界。”<sup>②</sup>

从上述两项研究来看，卢爱德强调教育实践与社会生活的结合。卢爱德所说的“现代的教学理论与实践”是20世纪初以哥大师范学院杜威教授等人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在20年代哥大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卢爱德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也服膺于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在卢的论文中，基督教教育并不是死板生硬的课堂说教，而是吸收“教育即生活”等观点，结合中国宣教实际需要的实用主义教育，从而在理论上将为教会、社会和国家的服务精神诠释为基督教女子教育核心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卢氏关于培养学生的中国视野，支持学校向政府注册以及服务中国贫下阶层等观点是在1920年代非基运动之前提出的。卢氏的博士论文也使其成为西方最早研究中国女子教育的学者之一。其研究成果随即为巴顿调查团等研究团体所采纳。<sup>③</sup>当代中国妇女学家认为：卢的博士论文是“西方有关中国妇女教育的最早著作之一”。<sup>④</sup>正由于她对教育专

---

① Ida Belle Lewis,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 New York: Ph. 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19, pp. 81~82.

② *Ibids*, p. 89.

③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234页。

④ Karen T. Wei, *Women in China: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4, p. 55.

门研究，美以美会聘请她任中国美以美会教育助理干事。1921年，金陵女子大学欲聘请卢氏任大学董事。<sup>①</sup>但卢氏没有就任。1922年，她参加美以美女布道会中国教育视察团，来到了福州华南女大检查学校工作。1926年卢爱德来到福州担任华南女大校长，时年39岁。

2. 调整转型。卢爱德治校是华南女大发展的转型期。所谓转型期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卢爱德根据教育学理论对华南女大教育规划整理。卢任内非常注重教育工作的正规化和教育理论的具体实践。这与卢爱德本人教育素养及大学服务精神十余年之发展传承有密切关系。具体表现在：

(1) 以往差会和校董会方面对大学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目标。从华南女大创办伊始，不少传教士就希望华南女大能够发展成为覆盖整个华南（长江以南，或至少福建、广东两省<sup>②</sup>）的女子高等学府。但这一目标显然不切合实际。1926年的华南女大学生数只有87人，大部分来自福建省各地教会中学的女生。卢爱德为大学规划了更为明确切实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只是保持一间小型基督教大学，与福建省基督教妇女的需要保持紧密联系。”<sup>③</sup>

(2) 起用华人教职员担任学校要职。卢爱德尤其赏识大学教

---

① 华群 (Minnie Vautrin), "Report of Ginling College", YDSL, UB Archives, Box 154, Folder2956, p. 0601.

② 美以美会督柏锡福 (Bashford) 曾说：“我们希望不单是从福建，还要从三千一两万人口的广东省获得人们的支持” Mrs. Leon Roy Peel, "A Message from the official correspondent"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Feb. 1937), p. 52.

③ E. H.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26*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26, p. 261.

师陈淑圭。陈淑圭<sup>①</sup> 1899 年生于福州；1922 年获得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学士 (Cornell College)；1923 年又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1926 年，陈淑圭从讲师提升为副教授，卢爱德还任命其为华南女大附中的代理校长。她声称：“这项任命是本年大学发展的最重要进展”<sup>②</sup>。在当时差会普遍对华人职员担任要职抱有疑虑的 20 世纪 20 年代，这项任命尤其令人瞩目。

(3) 充实华南女大的教学资源，扩展学校服务范围。卢氏任上，正式提出要筹募捐款，为大学建立永久基金。卢氏提倡教学和生活相结合，由公共卫生系在农村地区建立公共卫生模范家庭，为村民们作示范；加强家政专业，设立家政实验室；为教育系建立实验学校；提高图书馆服务水准等等<sup>③</sup>。这些施政明显看到卢爱德本人对教育的理解。

(4) 为大学募集经费。到她任职结束时，华南女大与美国七间大学建立起“姐妹大学”的关系，这些大学分别负责选择华南女大的一个系作为资助对象，派遣师资提供经费和设备。Mt. Union College, Ohio 负责华南女大的运动馆；Baldwin-Wallace College, Ohio 负责家政系；West Virginia Wesleyan College 负责物理系；Cornell College, Iowa 负责音乐系；Morningside College, Iowa 负责化学系；Southwestern College, Kansas 负责生

---

① 以下相关资料取自 1999 年元月笔者在福建华南女子学院世静楼陈淑圭纪念碑文所记。

② “Report of Hwa Nan College”, *Foochow Woman's Conference, 1919~1930* (1926)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31, p. 19.

③ E. H.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26*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26, p. 261.

物系；Missouri Wesleyan College 负责师范专业。<sup>①</sup>

调整转型的第二层含义是卢爱德任期内，大学完成了从外国传教士领导向华人治校的转变。这一转变与当时剧变的政治形势有密切关系。

卢爱德任职一年未到，大学外部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入闽。福州设立政务委员会，下设教育科（随后改为教育厅）和福建教育改造委员会。此时，各路国民革命军在福州互相驱逐，局势混乱。福州爆发了大规模攻击基督教事件。先是福州城内天主教仁慈堂育婴堂被人发现有小孩遗骸。随后民众冲击了城内所有天主教、基督教机构。收回教育权运动亦大规模爆发。3月24日以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科教员陈锡襄发起“福州各界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大同盟”，指责教会办学是“文化侵略”，要求严格取缔教会学校并禁止其注册立案。<sup>②</sup>这个运动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背景，运动指挥部甚至就设在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的办公楼内。参加者大部分是福州地区教会学校师生。据人回忆：“游行队伍经过华南女校时，发现大门紧闭，我们向市民略作宣传，呼喊口号，随即离去。事后了解，当队伍抵达该校门口时，该校女生恐惧万分，以为大祸临头，哭哭啼啼，不知所措。校长程师姑安慰她们说：‘别怕，主会保佑你们。有必要时，我会请领事馆派美国军舰来，把你们先送马尼拉，然后到美国去。’她们听程师姑这样表示后，转啼为笑说：‘尽快把我们送到美国去。’”<sup>③</sup>

---

①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47.

② 章振乾：《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回忆》，《福建文史资料》第13辑，158页。

③ 黄毓泌：《福州‘三·二四’反帝的学生运动》，《福建文史资料》，第13辑，179页。

实际上，当时在校负责的是卢爱德、华惠德两人，程吕底亚本人更不是校长。据卢爱德向差会的报告：当日有几个男生从学校外墙爬入，要求学生参加游行。华南女大学生都集中在学校食堂内。学生许引明等人出来拒绝了游行学生的要求<sup>①</sup>。几日后，教会方面部署反击。一批学生成立了“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总同盟”。这个“总同盟”批评“大同盟”是排外反基组织，要求政府尽速让教会学校立案<sup>②</sup>。一时间，两个“同盟”互相攻讦，相持不下。4月3日，政局再起变化，国民党政权开展残酷的清党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亦随之趋于低潮。国民政府一方面强制解散两个同盟，一方面趁势发布1337号训令，转发国民党中央政府之“私立学校规程”、“私立学校校董会设立规程”、“学校立案规程”等，着手改造福建基督教教育系统。

在动荡的局势中，卢爱德等人既庆幸师生没有参加运动，又为学校办学的前景担忧。当时，福州美以美会传教士分成了两派。会督高智(John Gowdy)为首的一派对运动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认为学校既不能自由办学，就应当关门。高智自己也说：“在政府强制改变教会学校之前，我压根就没想到过中国人可以担任学校的领导。传教士中也没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sup>③</sup>另一派以鹤龄英华书院院长黄安素(Ralph A. Ward)为代表，主张根据政府要求做出调整，任命中国籍领导，与学生运动领袖联系等。在1926年，黄安素在杂志《教育季刊》(*Educational Review*)上发表《令基督教学校更加基督教化》(*Making Christian Schools More Chris-*

---

① “Report of Hwa Nan College” (1928), *Foochow Woman's Conference, 1919~1930* (1926)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31.

② 章振乾：《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回忆》，《福建文史资料》，第13辑，160页。

③ Walter Lacy, *A Hundred Years of China Methodism* New York: Abingdon-Cokesbury Press, 1948, p. 273.



tian”)一文,提出:不应再把教会学校称作“差会学校”(Mission School),“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应该称为基督教学校(Christian School)。”“差会”(Mission)这个字眼有太浓厚的外国意味……对非基督教运动最好的回答就是更加纯正的基督教。基督教学校应该办成更好的,更加基督化,中国人掌握更多管理权利的学校”。<sup>①</sup>

美以美会华南区教育干事陈芝美<sup>②</sup>1949年后回忆:“前华南女子学院院长卢爱德,本来是赞同高智的主张,停办华南,但经过黄安素的说服,也改变了方针,就跟黄安素走。在学院里也成立了一个‘五人校务委员会’和一个‘物色校长小组’。”<sup>③</sup>五人校务委员会中,陈淑圭为主席,王世静以委员兼任教务长,李美德以委员兼任庶务长,黄惠珍以委员兼中学主任,黄惠珠以委员兼任秘书。这个委员会负责处理大学事务。不久,“物色校长小组”确定王世静接任校长。

据目前所掌握的差会档案资料,卢爱德本人倾向于向政府注册继续办学(并不如陈芝美所说的打算停办华南女大)。华惠德说:“1927年6月,上任不足18个月的卢爱德博士提出辞呈。因为她

---

① Ralph A. Ward, “Making Christian Schools More Christian”,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18)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pp. 479~483.

② 陈芝美,清末美以美会牧师陈文畴的后人。早年留学美国,返国任职厦大教育系。其后长期担任福州英华中学校长,福建区基督教教育干事,华南女大校董会主席。1949年后,陈氏参加三自,是福州地区三自革新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956年任福州第一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1958年10月,他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病逝。陈芝美妻子王世秀是华南女大校长王世静的姐姐。参福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89年。

③ 陈芝美:《中国基督教卫理公会“会督”美帝分子黄安素》,福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172页。

相信：伴随中国政治革命而来的会是教育革命和宗教变革。所有基督教组织都应该移交给中国人领导负责。先是管理权，后是财政权。”<sup>①</sup> 卢爱德在1927年向校董会所作的报告也曾说：“无论校董会同意与否，大学领导层一致认为注册是必须尽快完成的工作。我们相信权力的交接可以平稳地进行，更相信权力交接不会对华南建校以来浓厚的基督教氛围有丝毫影响。”<sup>②</sup>

但即使传教士们愿意与政府配合，遵照立案要求，也不意味着她们可以容忍教会内部华人提出的同样要求。当卢爱德“听到华南女职员要她辞职的议论时，她觉得这要求是‘非常不合情理的’……其他传教士也将其视为不忠诚的表现。用传教士的话来说就是‘叛逆’(sedition)”<sup>③</sup>。这也许就是陈芝美认为卢爱德最初偏向高智意见，打算关闭华南女大的原因。无论如何，在黄安素的规劝之下，卢爱德放弃了校长一职，改任学校的“顾问”。1928年，卢爱德因病离开了华南女大返回美国。其后，卢爱德长期留在上海，负责美以美会全国性杂志《华美教保》(*China Christian Advocate*)的编辑工作。

尽管卢爱德在华南女大任职不到两年。但她对华南女大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早在1925年2月，美国、加拿大的美以美会在华盛顿开会讨论海外传道事务。卢爱德把基督教教育视为培养人格的教育，认为：“基督教团体在东方地区实现基督教化的过程中，为这些人民培养她们自己的基督教领袖是最快的途径，也是

---

①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38.

② *Ibids.* p. 39.

③ Graham, Gael Norma,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U. M. I Dissertation Service: A Bell & Howell Company, 1994, p. 406.

唯一的方法”。<sup>①</sup> 卢爱德在华南女大办学的根本动机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基督教化。但她和出身布道家的程吕底亚不同。程氏从布道家的角度出发，认识到服务实践在华南女大办学中的重要性。卢爱德则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强调服务实践在华南女大教育中的应用，在理论和建制上全面引入了实用主义教育的服务理念。在政治环境变化时，她移交权力，实现大学领导层从外国传教士向以王世静为代表的华人信徒转移。卢爱德为华人治校、大学转型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卢爱德治校是华南女大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 （三）华人治校——王世静时期（Lucy Wang/1928~1951）

王世静<sup>②</sup>是华南女大的第一任华人校长，也是最后一位校长。王世静治校时间长达23年。她领导下的大学经历立案发展、躲避战乱、改造结束三个阶段。

1. 早年身世。王世静（Lucy），字仲止，1897年1月29日生于福建闽侯（福州）一个“累世通显，益崇礼法”（梁启超语<sup>③</sup>）的官宦世家。<sup>④</sup> 祖父王仁堪，字可庄，光绪丁丑科（1877年）殿试状元，授修撰，后历任贵州、江南、广东等地学政及镇江、苏州知

---

① “The Foreign Missions Con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May, 1925)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② 199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中，王世静这位基督徒教育家竟然在“1937年任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团长”，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46页。

③ 梁启超：《林夫人寿序》，《西清王氏族谱》，卷一，福州王氏铅印本，1934年，4页。王世静祖父王仁堪曾任广东学政，是维新党人新会梁启超的座师。故而王仁堪夫人寿辰时，梁应王世静家人之邀，特撰文祝寿。

④ 王世静为清道光工部尚书王庆云、光绪年间广东学政、苏州知府王仁堪的后人。王庆云字雁汀，系道光时进士，后历任顺天府尹、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等职。参福建通志局编纂，《福建通纪》，卷四，台湾：大通书局，1968，2307~2310页。

府<sup>①</sup>等职。王仁堪属清流党人。在镇江知府任上，王仁堪处理过著名的丹阳天主教教案。在教案处理上，他对基督教、天主教的态度非常强硬。史载：“时外使屡责保护教堂，仁堪请奏定专律，谓：‘条约若无何惩办明文，每出一事，任意要挟。宜明定焚毁教堂，作何赔偿；杀伤教士，作何论抵；以及口角斗殴等事，有定律可遵。人心既平，讹言自息’。”<sup>②</sup>由此可见，在祖父王仁堪心目中，基督教、天主教纯粹是外国势力。王世静父亲王孝绳承父荫，先后在武汉、北京等地担任京汉铁路提调、学部咨议、邮传部丞参等职。<sup>③</sup>王世静在姐弟中排行第三，从小就和哥哥世达、姐姐世秀、妹妹世婉一起随父亲在武汉、北京等地生活长大。1911年，王孝绳病故。母亲何蕙仪带着四个孩子回原籍福州王氏家族。这年的王世静14岁。在回忆早年生活时，王世静说：“出生在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和凡事男性优先的时代，‘女生能做什么’，‘女孩子算什么’等等这类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少年时期的生活告诉我，中国女孩根本没有愉快生活的可能。小时候，我经常痛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个男孩。年纪稍长，我就想尽力去做一些那时人

---

① 王仁堪任职苏州知府时，审理过鲁迅祖父周福清的乡试弊案。这场直接导致鲁迅家道中落的科场案中，王仁堪是重要的当事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光绪癸巳，殷如璋，周锡恩衔命南下，主试浙江。至苏州，船泊阊门外。时苏州府为王可庄太守仁堪，循例谒见。谈次，忽有人以密函至，立待复书。功令：典试者在途，不得与戚友通音问。防弊也。殷得密函，请王启视。王阅之，色变，即呼拿下书者。书中所言，皆贿买关节语，并一万两银票一张，署名者周福清……”徐珂：《浙江乡试关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3，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3093~13094页。

③ 王孝琦等修：《西清王氏族谱》（卷二），福州王氏铅印本，1934年，9~10页。

们认为女孩子不可以做的事”<sup>①</sup>。王世静早年随父在武昌、北京等地曾在当地的教会女校中学习<sup>②</sup>。目前无确切资料显示当时的她对基督教会有何认识。父亲王孝绳对女儿的教育也不是认真重视。孝绳在写给王世静的弟弟世达的诗中说：“汝姊知书解弄琴，慰情聊自夸芥臼；惜阴努力乃汝悦……”<sup>③</sup>

新设立华南女大是王世静生活的转折点。1913年，世静、世秀<sup>④</sup>姐妹俩进入福建华南女子大学前身——华英女学堂就读。王世静时年16岁。她回忆说：“华南为我敞开了大门。在华南求学的时候，我听到基督的召唤，‘凡劳苦负重来就我者，皆锡尔安。’‘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正是在大学的殿堂里，在爱的生活中，我找到了耶稣基督的道路。从此，人生开始变得光明起来。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应许和奇遇。我开始意识到帮助广大中国妇女追求更充实的生活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机会。”<sup>⑤</sup>王世静从此把华南女大当作自己的家。在就读期间，她们加入福建美以美会，受洗成为基督徒，还是华南女大基督女青年会的骨干。

程吕底亚后来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得意地称：“当王世静姐妹俩来学校申请注册时，准许她们入学看来是有些困难的。她们不是所有的科目都合乎我们的标准，况且她们又不是基督徒。我想

---

① 王世静：“My Call”，*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1936 October) Shanghai: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 5.

② “Lucy C. Wang (王世静)”，*Who's Who in China* (Vol. 3 1931)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p. 252.

③ 王孝绳等编：《西清王氏族谱》，卷一，福州王氏铅印本，1934年，6页。

④ 王世秀到美国晨边学院求学，得硕士学位，返国后嫁给陈芝美。她与王世静一起参加过抗战时期蒋宋美龄在庐山举行的全国妇女领袖会议（1940年）。作为卫理公会平信徒代表，她组织过“福州基督徒布道团”，自任团长。1949年8月，王世秀更直接领导成立了有三十五位执事的“福州基督教青年布道队”，积极从事跨宗派的布道传教工作。

⑤ 王世静：“My Call”，*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Oct. 1936) Shanghai: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 5.



那天上午接受她们入学一定是上帝的指引。”<sup>①</sup> 由于两姐妹是当时在华英女学堂中就读的两位“官家”子女，她们成了学校宣传办学成绩，扩大社会影响的招牌。王氏姐妹也非常积极参加学校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很受女传教士们的赏识。和爱德（K H. Willis）回忆道：“七年前（按：1917年）我刚到福州。大学的一位教师陪我参观校园，说‘你想去看一朵玫瑰花吗？’。我就这样认识了王世静。她那时还是一位年青、可爱的女孩。双颊桃红，甜甜的笑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sup>②</sup>1919年王世静赴美国晨边学院学习。1920年化学专业毕业后，获巴勃（Barbour）奖学金<sup>③</sup>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继续深造，1923年获化学硕士学位。同年，她回国执教厦门大学化学系，任副教授，月薪100元。据和爱德说，王世静之所以到厦大任教，主要是因为要清偿她读大学时所欠的费用以及帮助妹妹世婉到日本东京女子医学专科学校求学。1924年秋，她回到母校华南女大任化学系教授（薪金30元）<sup>④</sup>。

---

① Naomi Doebel, “Arrival Here of Lucy Wang, Youthful College President, Event for Missions Convention”, *Cedar Rapids Gazette* (Oct. 6, 1934)

② Katherine H. Willis, “What Becomes of Hwa Nan College Girls”,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Jan. 1925)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③ Barbour Scholarship 的设立者 Lewis Barbour, 在1912年偕夫人周游世界时，发现远东地区（中国、日本、韩国）女子教育落后，医学情形更差。回美即捐巨款给母校密歇根大学，专为远东女生设立奖学金。条件是女生须大学毕业，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有两位教授的介绍信，便可申请。王世静和吴贻芳都曾受过该奖学金的资助。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196页。

④ Katherine H. Willis, “What Becomes of Hwa Nan College Girls”,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Jan. 1925)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28年董事会任命王世静担任校长。对美以美女传道会而言，王世静个人的家庭背景，学识以及办事作风<sup>①</sup>各方面都是她们心目中合适的人选。王氏家族是清末民初福建一大望族。王父虽然早亡，但王的叔伯都是当时学界、政界名流。这个士绅家族在清季以举业传家，民国时代则对现代教育格外重视。叔父王孝泉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政学士，著名闽籍学者，曾帮助华南女子大学第一任校长程吕底亚购买大学的地址。他先后在教育部、福建省财政厅供职，又任教于华南女大、福建协大等高校。伯父王孝缙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海军部咨议等职。另一位叔父王孝缙也是辽宁省实业厅厅长<sup>②</sup>。这个家族还参与了福建政府女子教育的创立工作。1905年，王世静姑祖母王眉寿（陈宝琛夫人）创办福建省第一所民办女校——“乌石山女塾”。1907年王眉寿又担任首间官立女校“福建女子职业学堂”的监督。<sup>③</sup>

当然，王世静本人素质才是差会方面属意的根本原因。她留学美国，接触过西方文化，交际能力强。联董的档案称：“无论到美国还是中国，王世静都有足够的个人魅力和人交上朋友。”<sup>④</sup>更让差会对她另眼相看的是她对华南女子大学的感情。王把华南女大当作了自己的家，“过去、将来，我都属于华南”。<sup>⑤</sup>1927年8月间，美以美会为了掌握北伐后福州地区教会的情况，特派

---

① 王世静曾在个人考评表中评价自己说：“事事留心负责，对人对事力求公正处理”。见《教育工作人员履历表》，福建省档案馆 39-1-104。

② 《王仁堪》，《福州历史人物》，第1辑，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55~59页。

③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286页。

④ “Lucy C. Wang, President of Hwa Nan College”, YDSL, UB Archives, Box177, Folder3209.

⑤ 王世静：“My Call”,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October 1936) Shanghai: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 5.

Dr. Diffendorfer 到福州调查。在招待晚宴上，王当着美国驻福州领事以及福建省国民党军政大员的面指责当局对教会学校的政策。在场的美国传教士兴奋地描述道：“这位留着短发，受过美式教育的年轻人站起身，说她曾是华南女子大学的学生，一位基督徒。她和学生们都信仰三民主义，但是她们反对把《圣经》排除在课程之外。王世静用清晰的官话直陈她的看法。发生的这一切使得这些大人物们吃了一惊，因为中国过去可很少有女性敢于这样表达意见的。”<sup>①</sup>

对王世静而言，基督教既是个人的宗教信仰，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让我担任华南女子大学校长的呼召临到我的身上。它一方面似乎为我打开了一条为中国妇女运动服务的道路，这是我从接受基督教教育起就梦寐以求的。另一方面，我又为承受这么巨大的责任而惶恐不安。”<sup>②</sup>“我是这所大学培养的，对她的感激难以言表……大学的校训‘受当施’源于我敬仰崇拜的主基督耶稣的教导。应该以他的人格作为榜样，追随基督爱的精神。愿竭心尽力，实现耶稣的教导，基于对华南女大的忠诚，为中华女性实现大学教育的理想。为了中华妇女界，我不能逃避责任……”<sup>③</sup>

1928~1929年，王世静再度获密歇根大学巴勃奖学金，赴美进修教育专业。大学的行政事务工作由陈叔圭，华惠德等人代理。

---

① Walter Mueller, "Eight Days in Foochow, the Forbidden City",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August 31, 1927) Shanghai: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 6.

② 王世静: "My Call",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October 1936) Shanghai: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 5.

③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 p. 55.



1929年7月，王世静回国接接管校务。1930年1月18日，华南女大为王世静举行校长就职典礼。<sup>①</sup>王世静踌躇满志地誓言：“本人王世静，为见证上帝的荣耀，为中国基督教女性的进步，谨此接受美国托事部和校董事会赋予我的责任，就任华南女大校长一职。本人当竭尽所能履行职守，提高大学学术水准；培育中华女界的领袖，丰富国人的家庭生活，促进教会活动；永远保持大学基督教的性质和牺牲服务的精神……”<sup>②</sup>

2. 立案与发展。然而，上任初始的她面临着校内外诸多困难。在基督教教育界，以葛德基（E. H. Cressy）为首的教育传教士开始推动华南并入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的联合计划<sup>③</sup>；在校外，如何取得政府的立案则是关系大学存废的大问题。

从1928年至1935年间，争取立案是王世静治校工作的核心。早在192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颁布《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福建省教育厅公布《未经立案学校之取缔办法》。1928年8月，中央教育部又公布《私立学校规程》5章38条。这些条例规程规定了私立学校须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其组织、课程等须遵照现订法规办理，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目。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或院长，外国人占董事会的名额，不得超过1/3。如未立案或条件不合格的大学，政府不承认学生学籍等等。<sup>④</sup>民国政府严格控制私立院校的宗教活动在课程之外。甚至在大学的图

---

① 福建师范大学主编：《世纪之树——福建师范大学90年》，82页。

②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 p. 55.

③ 华南女大与福建协和大学的合校风波在第六章有详细阐述。

④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442页。

书馆内都不许张挂与宗教有关的图画。<sup>①</sup> 1929年福建省教育厅颁布了《私立学校立案须知》，限期要求私立学校立案。由于王世静在1928年至1929年间赴美学习，立案事宜被耽搁，迟迟无法立案。在此期间，省教育厅发出两次布告，指出立案“限期已过，各校遵令立案者，固属多数，两次不照办者，亦复不少，殊属玩忽已极，若不严行取缔，曷足以符中央统一教育之令指”。布告要求于学年开始前呈报立案，否则于下学年初不准招收新生。<sup>②</sup>

同在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不仅于1931年立案成功。1932年更改变其原先不招收女生的政策，开始招收女生入学。<sup>③</sup>在此情形之下，如若再不及时立案，“大学将面临被政府取缔的可能”。<sup>④</sup>华南女大董事会决定正式向教育当局申请立案。1931年8月，校董会授权王世静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立案工作，开展立案工作。她领导的委员会在短时间内积极组织登记财产，编制表册，于1931年10月9日正式向国民党政府中央教育部递交了校董会立案表、大学立案表、组织大纲和学校一览。

王世静后来回忆说，当时“跑到南京接洽，这时候是朱家骅

---

① 《反宗教教育运动势力之增长》一文中引南京教育部1930年文，内称“帝国主义借文化宣传为侵略之工具，迷惑青年思想，施亡国灭种之毒计”，“根据科学及社会之实际而实验教育，本为国家所赞许。宗教则为一种虚无飘渺之想象，不成为教育之理论，即毋庸容许其实验”。“此后各校所有宣传宗教之图画，应予以一律禁止陈列或悬挂。其关于宗教之书籍报章及杂志等，除在大学及高级中学限于与选修科目有关及堪供哲理上参考者，得酌量陈列，其余一律禁止。”《教育杂志》，卷22，第八号，上海：商务印书馆。

②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443页。

③ 张其昀等：《中华民国大学志，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420页。

④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at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 p. 60.



先生兼任教育部部长，因为国内又有缓办法科文科，侧重理科的倾向，所以本校只得到设立理科学院的准许，还不能够文理并设，本人以为时机还未成熟，所以耽搁了好几个月，又跑回来……到了（民国）二十一年冬天，王世杰先生接任教育部部长，本人听到这个消息，又把本校所以必须设立文理两科，以及经费来源、毕业服务社会情形、图书仪器各种设备、教职员资格，及待遇各科学程等等资料带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南京接洽”。当时王世静带病孤身前往，“在南京和其他地方活动了很久，说明一所专门的女子大学对中国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华南女子学院在培养国家人才方面的特殊贡献”。<sup>①</sup> 其实，教育当局倒不是有意为难这所女子高等学府。王世静 1931 年到南京呈请立案时，教育部之所以不接纳大学立案申请，主要是因为“该学院常年经费仅十一万余元……核与大学规程第十条规定，相差甚远”<sup>②</sup>。查 1929 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大学规程》第十条规定：文学院每年经费须有 80,000 元，理学院须有 150,000 元，文理合计 230,000 元<sup>③</sup>。华南女大的经费不到规定的一半。由此来看，华南女大的立案申请是很难通过的。但教育当局没有完全拒绝立案要求，批文中说：“惟该学院创办有年，不无相当基础，应先准予校董会立案。”因此，“校董会立案表存，余件并还。”很显然，教育当局不是要关闭华南，而是准许校董会立案，希望“其不敷经费，仍由该学院校董会于最近期内，增筹充足”<sup>④</sup>。1933 年，大学经费依然没有显著增长。但因为教育

---

①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at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 p. 63.

② 《福建教育厅训令，第 995 号》，福建省档案馆 39-1-20。

③ 《大学规程》，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年，569 页。

④ 《福建教育厅训令，第 995 号》，福建省档案馆 39-1-20。

当局人事变动，加之王世静努力陈说<sup>①</sup>：“本校教职员薪俸虽然不多，可是资格都是很好的，咱们甘愿本着牺牲服务的精神，来这里担任教职，这一点是基督教学学校的优点”。“本校历届毕业生，出去服务的百分比，当教员的，竟在百分之五十一以上，其余或是学医生或是服务社会，都比一般学校毕业生来得高强，在社会上贡献也比较多，所以教育当局，受到这两点的感动。”1933年6月，南京教育部遂准许华南临时立案，校名称为“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34年6月，华南女大在教育部永久立案。

借着申请立案成功，王世静巩固了自己在教会和大学中的地位。黄安素甚至说：“大学立案工作的完成是当代中国教育史的一件大事。面对立案危机，王校长成功地使原本不可能的使命变成了现实。”<sup>②</sup>随着立案成功，大学教学也步入正轨。1933年，大学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赞助。1934年9月，大学得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正式证明，永久享有该大学文、理学士学位的授予权。1935年华南女大加入美国基督教13所大学联合董事会。<sup>③</sup>为了改变大学经费过于依赖美国差会的状况，增加经费来源及扩大大学在东南亚地区华侨中的影响，王世静于1937年1月间前往香港、广东、马尼拉、新加坡和爪哇等地探访当地的华南校友和当地的女子大学，演讲宣传华南女大的办学成绩。通过这次访问，她不仅为大学募得捐款，更以个人才识赢得了当地华侨社区的钦佩和欢迎。东南亚一份当地报纸评论道：“王世静是位中国伟大的

---

① 《校史表演》，《华南学院校刊——三十五周年校庆纪念专号》1942年5月，23~24页。

②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the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 p. 63.

③ 福建师大：《世纪之树——福建师范大学90年》1998，90页。

教育家，她的演讲强烈地吸引着本地的听众。”<sup>①</sup>

3. 战乱中的华南。王世静从东南亚返回福州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华南从此开始了12年战乱纷扰的办学时期。这12年大学发展最独特的现象就是：战乱频仍，社会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大学办学日益艰难；而同时大学在社会受欢迎程度不断上升，报读人数剧增。

“七七事变”后不久，福建金门于1937年10月被日军占领，厦门各地遭日军袭扰。1938年5月12日，王世静把董事会关于迁校南平的意见，交给全校教职员讨论。大学决定于6月21日启程。学生可随校内迁，也可随家疏散或内迁。<sup>②</sup>福州华南女大的校舍由庶务长华惠德负责，作为战时难民营供不时之需。内迁路上，国民党军队要强征华南女大的轮船，甚至扣留了船夫。王世静从容镇静地前往军营，亲自向当地驻军交涉。不到两个小时她就带着船夫回到了船上，师生最终安全到达南平。同行的美国教员傅华星(Frances Fulton)感慨地说：“中国是个男性当权的社会，但有些女性也是可以办大事的。”<sup>③</sup>

到达南平后，王世静致力组织学校运转。当地美以美会让出自己的中学校舍、医院作为学生校舍和实习场所。尽管如此，王世静办学还是遇到不少困难。经费拮据（物价飞涨，美国的办学基金未能及时寄到），师资短缺（美籍教师因为战乱而返回美国）。1941年农历元宵前的晚上，在福州的大学建筑彭氏楼突然起火燃

---

①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the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 p. 72.

② 《准予备案迁南平》，福建省档案馆藏号 39-1-24。

③ 引自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the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 p. 83.

烧，大楼坍塌<sup>①</sup>；1944年福州华南女大再次被日军和当地民众洗劫一空。大学被火的事件对华南冲击很大。据学生回忆，“当余老师（按：大学训导长兼化学系主任余宝笙）对我们谈到王世静校长当时为这起飞来横祸心情沉重不食不饮时，她自己也热泪盈眶。”<sup>②</sup>王世静在写给美国差会的一封信中说：“今后将面临的困难，我实在是不愿再想。人生只有一次，只有竭尽心力而为，其余的就交托上主的手里了。”<sup>③</sup>当时学生因战争缘故，经济普遍出现问题。华南女大院方为支持学生就学，设置了多项工读办法，以解燃眉之急。当时为学生提供的工读办法有“抄写；语言（教传教士中文）；缝纫；摇铃；抄乐谱；补习；闭自修室窗户及爱德楼前后门暨熄灯；剪发；监督小贩以及外来工友维持秩序；指导见客；各系临时指派工作”<sup>④</sup>。通过努力，华南女大还是维持了正常的运转。原先反对华人治校的美以美会督高智（John Gowdy）也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学能像华南女大在短短的十年中进步这么快。”<sup>⑤</sup>

---

① 据原华南兼职教师郭肇民说，当时“福州原校舍由男职员余又健（教徒，古田人）看管”。“不料，1941年农历元宵节前的一个晚上，马莲彭学院突然起火燃烧，火势迅猛，大楼坍塌，楼中寄藏的东西，受到很大的损失。事出院当局追究责任，负看管专责的余又健成了众矢之的，难辞其咎。余虽发出声明书，自行剖白，院里仍给他以解职的处分。这座被烧塌的大楼直到抗战胜利学校迁回福州后才重行修建，但建筑质量已大如前，再也找不到油光滑亮的柚木地板了。”郭肇民：《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史概述》，《福建文史资料》，20辑，108页。

② 余少玉、江得爱等：《缅怀敬爱的余宝笙老师》，福建华南女子学院编，《余宝笙院长纪念集》，福州，1993年，21页。

③ “The Letter From Lucy Wang 10 January 1945”，YDSL, UB Archives, Box177 Folder3209.

④ 《工读生的规定范围》，《华南学院校刊》，第15期，1942年9月，5页。

⑤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the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 p. 87.



抗战胜利，内战又起。大学虽然可以搬回福州，但要修建被焚毁的教学大楼，修复费用约为 50 万元。<sup>①</sup> 大学常经费只有十几万元，无法支付这笔费用。因此，当其他内迁的学校相继回迁时，华南女大仍留在南平，直到 1946 年 1 至 3 月才分三批完成迁校工作，以致这个学年度的春季学期推迟到 3 月 11 日开学。<sup>②</sup> 内战时期，大学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经济困窘。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崩溃，大学财政状况继续恶化，1946 年秋季，大学一度无法向教师支付薪金。王世静联系校友募捐增设专项奖学金，帮助学习优秀学生免交学杂费。

在另一方面，抗战结束后，美国差会方面与王世静都急于修复因战争而中断的联系。1946 年王赴美国述职（在王世静赴美国期间，大学校长一直由教务长许引明代理）。1947 年 3 月 13 日，波士顿大学授予她人文科学荣誉博士的称号。<sup>③</sup> 1947 年 4 月，美国联合董事会召开战后复兴会议，王世静应邀参加。她向联董报告了华南女大在抗日战争期间办学的情况，会后又应邀到美国和南美各地大学或学院演讲。她在各地的演讲，表达了愿和美国大学或学院协作的愿望，建议制定一项交换访问学者的计划以促进两国教育界和妇女界的友好往来与相互了解。王世静的活动由美国托事部安排，目的是扩大了华南女大在美国的影响，使大学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设在美国的中国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拨出 5 万美元专款用于重建大学的彭氏楼。

抗战以来，国民政府奉行的是穷政府大教育方针，企图用高

---

①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the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 p. 93.

② 《回榕以来大事记》，福建省档案馆，藏号 39-1-162。

③ 同注①，p. 111.



等教育机构集中管理青年学生。这一政策从抗战延续到内战时期。结果是大学生人数猛增的同时，教师待遇不断低落，教学质量严重恶化<sup>①</sup>。加之北方地区长期战乱，大批学生和教师南下。有的就在华南女大找到栖身之处；国内乱局又使得许多家长都把子女前途寄托在出洋留学上。因此，尽管国民经济已经破产，1946年到1948年相对稳定的华南女大居然发展到其鼎盛时期。文史系增聘了原金陵女大训导长、教育学教授张芴兰博士，化学系聘请了福建省立自然科学研究院几位研究员来校兼课。<sup>②</sup>毕业生、肄业生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1946年秋季学生总数达228人，其中新生就有107人。<sup>③</sup>1947~1949年的毕业、肄业生数量几乎接近1946年以前的总和。<sup>④</sup>

4. 改造与结束。从美国返国后，王世静身患重病。她遵照医嘱在福州、上海等地医院治疗。1949年初，余宝笙哥哥余文光大夫（时任莆田圣路加医院院长）邀王世静到莆田调养。1949年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崩溃，解放战争的战火终于逼近福建。1949年6月间，王世静重新回到大学工作<sup>⑤</sup>。同年7月间，国民党溃兵在福州四处拉人劫物。就连被视为有外国保护的教会学校也受到侵扰征用。王世静组织学生教师看守校园，但是她告诉差会方面，“英华书院昨天已经被600名士兵占用。我们不知道还可以坚持多

---

① 关于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教育政策的失误，可参见庄泽宣先生：《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中华教育界——抗战十年来中国教育总检讨专号》，复刊第一卷，第一期，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

② 《学院概况调查表及教职工花名册》，福建省档案馆，藏号39-1-89。

③ 《私立华南女子学院毕业、肄业生人数》，福建省档案馆，藏号39-1-69。

④ 同上注。

⑤ “The letter from Lucy Wang” (June 14, 1949), YDSL, UB Archives Box 177, Folder 3209.

久。一旦他们提出要求，该怎样拒绝呢？”<sup>①</sup>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在新旧时局变换之际，王世静和华南女大也不是没有丝毫疑虑和不安。面对如何处理政权更替下的诸多问题，王世静说：“现在尤其焦虑的是我们如何面对目前形势继续生存下去”<sup>②</sup>。然而，新政府的开明政策打消了她许多疑虑。1951年，福州军管会宗教科科长张传栋在华南女大举办教牧工作人员座谈会。王世静事后写给差会的信上说：“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政府的发言人提醒我们注意这么一个事实：信奉基督教和不信教的人士在任何机构中都享有平等的自由，就是在思想教育课中也不要造成信教与不信教的对立。这次会议的精神是好的，因为它给我很大的鼓舞。前面的道路不会平坦，但我有了信心。”<sup>③</sup>

1949年9月，西教士富品德(Hays)在华南女大举行的教育年会上说：“你们校长能接受差会的经费，差会将一如既往照寄。”<sup>④</sup>12月8日，王世静和校董会陈芝美、卫理公会福建区会督力宣德(C. V, Lacy)等人召开的董事会还在讨论“增聘师资、充实设备、建筑新礼堂、新建教员宿舍、暨有关宗教、经济、建设诸问题”<sup>⑤</sup>。很明显，当时大学各方面都没有失去继续办学的信心。

这时间内，王世静改组了校政委员会，取消训导处，增选学生代表和工人代表参加校政管理。在统战政策下，王世静积极与

---

① “The Letter From Lucy Wang” (July 26, 1949), YDSL, UB Archives, Box 177, Folder 3209.

② “The Letter From Lucy Wang” (October 17 1950), YDSL UB. Archives, Box177, Folder 3209.

③ *Ibids.*

④ 陈怀桢：《琐忆建国以来福州基督教界活动的情况简述》，福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8页。

⑤ 《校闻》，《华南学院校刊》，第9卷，第2期，福建华南女院，1950年，1页。

新政府合作。吴耀宗先生出面倡导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王世静也是首批签名的四十名教会领袖之一。<sup>①</sup>她作为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知名人士，多次被邀请参加福州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各种政策传达会，学习有关方针、政策。<sup>②</sup>根据新形势要求，华南女子大学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变更。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方面，取消三民主义、公民伦理等课程。请军管会讲解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三大宪章与福州市军管会、市政府的工作报告。组织教职员工每周定期集体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sup>③</sup>。华惠德说：“在新政权统治下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乐观的情绪在大学占了上风。因为有实在的证据表明，宗教活动是自由的——大学教会活动，主日学继续很好地开展着。作为选修课，宗教课程的开设得到政府允许。每天早晨的教堂活动也可照常进行。”<sup>④</sup>大学方面甚至向政府提议：“过去反动政府，对于私立学校，颇多歧视，今后希望教育当局，对于私立学校，多予援助，并与以平等待遇和指导。”<sup>⑤</sup>王世静也没有放弃个人的信仰，在新生动员会上呼吁师生团结时说：“遇事要善意批评，彼此互助，各人不要单顾己事彼此用爱心相结合，做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sup>⑥</sup>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中央教育

---

① 《福州文史资料》，第 11 辑，167 页。

② 《教育工作人员履历表》，福建省档案馆，藏号 39-1-104。

③ 《若干工作总结报告》，福建省档案馆，藏号 39-1-110。

④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124.

⑤ 《本学院一九四九年秋季半年工作总结报告》，《华南学院校刊》，第 10 卷，第 1 期，福州：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出版委员会，2 页。

⑥ 王世静：《本学院开学日动员大会开幕词》，《华南学院校刊》，第 10 卷，第 2 期，1950 年 12 月。

当局对旧教育体制实行的是“坚决改造，逐步实现”（教育部长马叙伦语）<sup>①</sup>的方针。因此，政府对旧教育的改造行动仍不剧烈。但在1950年秋，形势急剧变化——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同年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配合战争需要，“逐步实现”的方针变成了急风骤雨式的各类运动。战争气氛中，全国上下开始展开镇反运动，镇压与前国民党政权、美国势力有关的各类分子。在教育方面，1950年12月29日，中央政务院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提出了肃清美帝国主义的影响，维护中国人民文化教育宗教事业自主权利的方针”<sup>②</sup>。中央教育部开始组织学习、参照苏联模式改照教育体制。1951年1月16日至1月22日期间，中央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作为大学的代表，王世静和陈淑圭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提出处理这些教会办大学是“反对美帝的政治斗争”，并且最终确定了处理这些院校的原则、方针等问题。<sup>③</sup>1951年3月6日，政府“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操场召开镇压反革命宣判大会，参加人数6000人”<sup>④</sup>。这些新变化使得华南女大已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根据政务院的命令，福建省政府接管了外国津贴的教育、卫生事业。奉政府命令，华南女子大学与福建协和大学合并为福州大学。1951年5月6日，王世静将华南女大全部印章10颗上交省文教部<sup>⑤</sup>，华南女大就此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684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32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35页。

④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仓山区区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年，23页。

⑤ 《福州大学仓山部呈报核销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函》，福建省档案馆：39-1-109。



停办。

此后，王世静改任福州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2年政府取消福州大学，改立福建省立师院。王世静任师院副院长、图书馆馆长。<sup>①</sup>人民政府为王安排了各种公职。1952年3月21日，王世静曾在“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斗争，“在会上检讨自己亲美奴化思想”<sup>②</sup>。1957年，王世静被政府选为代表，“赴京听取毛主席《十大关系》报告，王并接受毛主席的接见”。<sup>③</sup>同年，不少华南女大校友成为反右斗争的打击对象，受到不公正的斗争。8月“部分教牧工作人员和部分信徒自发地毁掉英美传教士在福州的坟墓，并举着他们的骸骨游行示威。参加游行有五百余人……”<sup>④</sup>1958年王的姐夫陈芝美（福州三自发起人）也被政府宣布为右派分子。对此种种，王世静“心存疑虑，思想负担很重”。<sup>⑤</sup>她的身体历来不好。1958年8月，她退休回家养病<sup>⑥</sup>。1983年9月，王世静于福州病逝。

---

① 福建师大：《世纪之树——福建师范大学90年》，1998年，90页。

②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仓山区区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年，484页。

③ 福州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8，23页。

④ 福州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8，24页。

⑤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仓山区区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年，484页。

⑥ 解放后曾有海外传媒报道，王世静与华南校友在1951年华南取消后，被政府关押入狱。“Memories Linger of Morningside Affiliate Built in China 50 Years Ago” *Sioux City Journal* (August 19, 1962).



## 二、从德本康夫人到吴贻芳—— 金陵女大（1915~1951）

### （一）教育传教士办学——德本康夫人（Matilda Calder Thurston/1915~1927）

1. 早年生活。德本康夫人，1875年5月16日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郡（Hartford, Conn.）。德本康（Thurston）是后来的夫姓。她的本姓是柯（Calder），全名是 Matila S. Calder。父亲原是苏格兰人，早年移民美国，是非常虔诚的清教徒。母亲有苏格兰——爱尔兰血统。1888年，13岁的她受洗入教。德本康夫人的宗教信仰虔诚，而且酷爱教育。“她很小时，就喜欢玩开学校的游戏。未进学校时，已渴望能做一个小学教员；她在中学时期，受了一位数学教员的影响，忽萌进大学的志趣”<sup>①</sup>（据校友刘恩兰说，这位数学教员名叫 Mrs. Banks）。很显然，她在中学阶段接受的是自由派神学观点。学校教师教导年幼的她“去认识整个宇宙，以了解人类生存的基本背景。”<sup>②</sup>17岁时，她从哈特福德郡公立高中毕业。同年秋，进入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蒙特霍利女子大学（Mt. Holyoke College）。“那时的普通观念，以为人既做了蒙大的学生，就不能不去传教。”但德本康夫人对海外传教并没有什么兴趣，她热衷的是天文学。1913年，她在个人自述（在蒙特霍利女子大学）上说：“我那时虽则听得许多关于传教的重要和

① 《德校长传》，《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8年6月，2页。

② Liu En-Lan, “A Sketch of the Life of Mrs. Lawrence Thurston”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 1928. 6. p. 4.

经验，我也很敬慕同学们的工作价值，但是我从没有想到我自己也要那样做。在四年级那一年，我们第一选读‘海外传教科’。我当时想，必须选读‘印度传教’一门，以增加我自己的知识。我现在还明显地记得，那年的十二月的某晚，一种思想像闪电似的在我脑中闪过——去应付别国的需求，是天父委我的使命，我如果不履行那使命，我就是违背天父的意志。虽则在那时，我们都以为那是又苦又危险的工作。”德本康夫人随即向教会提出了海外传教的要求。她大学毕业后，一面在新泽西州 Middletown 的高中教书，一面等待着海外传教的机会。4年后，教会决定差派德本康夫人到土耳其 Marash 学院任教。

临行前的暑假，她结识了耶鲁大学学生德本康 (J. Lawrence Thurston)，两人很快相爱订婚。德本康是耶鲁大学 1898 级学生自愿海外传教运动的成员，耶鲁——中国协会（雅礼差会）主要创始人之一。1902 年 9 月，德本康夫人结束在土耳其的工作，回到美国结婚。10 月，德本康夫妇受雅礼差会派遣前往中国。在他们的努力推动下，雅礼协会决定在湖南长沙建立一个教育中心。<sup>①</sup>1903 年暑假，德本康先生患上肺病，被迫回国，1904 年病逝在加利福尼亚州。德本康夫人回忆说，“凡是遇到那种际遇的人们，都是很需要工作的。我那时候找到了在各大学间旅行的工作——充当学生运动的干事”。在此后的两年，她一直参与“学生自愿海外传教运动”的秘书工作，曾与美国东部 14 个州的四十余所大学的负责人接触联系。“过了两年之后，我又参与传教工作，而且就到了中国。我在长沙和雅礼差会的人在一起工作了五年，做各种意外紧急的事务。大半的时候是在学校中教书，但是在医药方面的

---

① Reuben Holden, *Yale-in-China, the Mainland: 1901~1951*, New Heaven: 雅礼协会, 1964. pp7~67.

工作却也不少。像我这样资质平庸而又未受训练的人，却要帮助开刀、配药、包绷布，甚至在没有人手的时候为病人上麻药。”她在长沙亲身经历了抢米风潮、保路风潮等社会动荡。1911年，德本康决定离开长沙，“因为雅礼差会并没有计划开展妇女方面的工作”。<sup>①</sup>当时的德本康夫人已“决意回国，不再回到中国来了”。<sup>②</sup>但是长江中下游6个女传教士的一份呼吁书改变了德本康夫人的生活。

2. 创立金陵女大。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说，1909年中国基督教已着手调查建立女子大学的可行性。“1911年至1912年之际，教会人士在上海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会议制订了在长江流域组建一所女子联合大学的计划，并向正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教会发出了一份呼吁。”<sup>③</sup>这个名为“Appeal for a Union Women’s College for Central China”的呼吁书由一个名为“Committee on the Proposed Union Women’s College”的筹委会发起。具体发起人分别是苏州监理会的 Miss Martha E. Pyle、杭州美南长老会的 Dr. Venie J. Lee、南京美以美会 Miss Laura M. White、上海美国长老会 Miss Mary E. Cogdal、苏州美南浸信会的 Miss Sophie S. Lanneau 以及南京基督会的 Miss Emma A Lyon。她们六人在1911年联署了这份呼吁书。呼吁书首先列举了在长江流域各地的教会大学，“但这些大学都是男校，在这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长江流域，竟没有一所女校够得上大学的水平！”这些女传教士受到清末长江中下游中国本土女学兴起的影响，希望成为中国本土女学的示范。

---

① “Mrs. J. Lawrence Thurston (Matilda S. Calder)”, 1913,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 2842, Page 0461.

② 《德校长传》，《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8年6月，3页。

③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4页。

因此，倡议书最后说，“这所基督教大学不仅会成为中国人建立女子教育系统的示范，还能向重建的中国提供合格的教师”。<sup>①</sup>

这个呼吁书很快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教会的响应。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国浸信会等差会决定参加这项建校计划。她们决定联合建立一所协合大学，因为“唯有协合大学才能和长江流域的中等教育保持紧密联系”<sup>②</sup>。当时，美国长老会决定派遣德本康夫人到中国参加建校工作。1913年9月20日，德本康夫人到达南京，一面学习中国话，一面在南京长老会明德女校上课。1913年10月6日上午，筹委会在苏州召开会议，会上决定由上述五差会各派两个代表组成校董会，德本康夫人受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她在日记中说“现在，我的身份是第一个被任命的大学教师”<sup>③</sup>。1913年11月11日，德本康夫人已知道自己将成为新大学的校长。当日，她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她正准备筹委会的会议。“Miss Pyle 希望在会上议决三件事：（1）组织学校管理委员会；（2）在纽约，建立与金陵大学合一的托事部，以便金陵大学的托事部也可以为女子大学服务；（3）选举我作校长。”<sup>④</sup> 11月12日，筹委会在南京开会。德本康夫人到下关码头迎接筹委会成员，并一起视察了南京紫金山附近、鼓楼（Drum Tower）东北面的一块地址。筹委会希望日后这块坟地可以作为大学的校址。14日，筹委会开会，Miss Pyle 是会议主席，诺玛利（Miss Nourse）任秘书。会上，德本康夫人由长老会推荐，经讨论后被一致推选

---

① “Appeal for a Union Women’s College for Central China”, YDSL, UB Archives, Box155, Folder2965, p. 0725~0733.

② “Proposed Yantse Valley College for Women”, YDSL, UB Archives, Box126, Folder 2610, p. 1103.

③ “Thurston’s Diary, Letter”,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54, p. 0215.

④ *Ibids*, p. 0226.

为校长。<sup>①</sup>筹委会还成立了宪章、文书和地基三个委员会，具体处理各项事宜。

这次南京会议最终确定了在南京兴建女子大学的详细安排。因此，11月14日这天也就成了日后这所女子大学每年庆祝的创立人日(Founder's day)，或称校庆日。对于会议结果，德本康夫人颇感满意。她说：“我想，现在的我就像是一位创立康涅狄格州大学的绅士”，“虽然我不是宪章、文书、地基三个委员会的主席，但我理所当然对这些工作负有最直接和最重要的责任”<sup>②</sup>。此后的建校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因学校建在南京，南京古称“金陵”，所以学校名称也从原来的“Yang-tse Valley College for Woman”改为“Ginling Woman College”。德本康夫人说：“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名最初出现在1914年4月17日筹委会的一份报告中，它取代了‘长江流域女子协和大学’这一校名，后者与其说是校名，毋宁说是一个法律和地理说明。”“1914年11月，校名被校董会正式采纳。那次会议的其他活动制订了进一步的计划，研究课程被采纳，目录被核准。入学必须以完成高中的语文、英文、数学、科学、历史和宗教课程为先决条件。”<sup>③</sup>“1915年2月，校董会在上海开会，通过章程，并依照章程产生执行委员会。该年4月，执行委员会与地基委员会在南京开会。定校名为金陵女子大学，预备在1915年秋开学；决定由合作之5公会各筹650金洋作为该年常经费。”<sup>④</sup>

---

① “Thurston's Diary, Letter”,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54, p. 0226.

② 同上注。

③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8~9页。另外，文中的校董会应称作管理委员会，1928年之后，才有校董会的名称。

④ 《德校长传》《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8年6月，5页。



1915年9月15日，金陵女大开学，德本康夫人从此开始了12年的校长生涯。在德本康夫人治理金陵女大的时期，学校的发展可分作三个阶段。

(1) 初创时期(1915~1919)的金陵女大经费有限，无力购地自建校舍。1915年春，德本康夫人等租下了南京城绣花巷李鸿章第五个儿子的府宅，同年4月装修。校门口挂着一块牌匾——“大美国金陵女子大学”。<sup>①</sup>9月，第一批学生入学。“据说那第一班共有9个学生，倒有6个教员，因为物质上设备的缺乏，她们初入学校时，时常不乐。”<sup>②</sup> 初创时期，金陵女大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

在学生方面，1915年开学前，德本康夫人在考察北京、上海等地女校时，曾说：“我们获悉了一个确定的、计划前来就读的学生的数额，准备接受20人。我们期望的最大数额不过15人。如果少于10人，我们将感到意外，但并不沮丧”<sup>③</sup>。照这个标准，德本康夫人只能对开学时学生数感到意外。因为“1915年9月17日早晨，教堂正式开放时，只有8个学生和6个教员出席”，“开课时只有11个学生。这一年，共有13名学生注册。她们来自4个省的9个城市，分别从6所学校毕业，代表了3个彼此协作的教会，其中一人当时还不是基督徒。5人在升大学前教过书”<sup>④</sup>。到了年底，只剩下9个学生在校学习。

教学方面也存在问题。作为中国最早的女子高等教育，学生和教师都没有经验。“当米德小姐(Miss Mead)建议学生在学习

---

① “Exploring the Unknown Forest”, *The Pioneers*, p. 7.

② 《德校长传》《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8年6月，6页。

③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10~11页。

④ 同上注，13页。

时制订一个计划，以便将一个时期的英国文学记在心里时，女孩们夜里三点钟便爬了起来，一直干到开始上课，以完成这一计划。结果她们惊讶地发现，老师并不要求她们上交自己的计划，压根儿没意识到米德小姐只是让她们掌握这种学习方法。女孩们学习中文、英国文学、修辞学、宗教、基督生活、卫生学和绘画。她们可以在科学和哲学两个小组之间自由选择一个，前者主要学习化学和数学，后者主要学习哲学和英国历史。但她们似乎感到难以做出选择。在第一学年之后的几年里，教学计划要求覆盖全部课程，没有选择。学生学习程度不一，必须学会如何更加独立的学习，加强语言能力。除了中国古典文学之外，每门课都用英语教学。甚至两位中文教师也情愿用英文讲课，这使校长大失所望。”<sup>①</sup> 在金陵女大的“图书馆”，1915年的藏书不超过40本，包括一套百科全书。<sup>②</sup>

最令德本康夫人感到头疼的是师资问题。1916年5月18日，她在致美国托事部的信中，开首一句话就是：“我们急需更多的老师。眼下，没有教职员能够胜任化学、生物、植物、动物各门科目的教学”，“我们需要有专家来开始我们的专业”。<sup>③</sup> 1917年1月19日，德本康夫人的信中再次对学校师资问题表达强烈不满，她说“师资是个大问题”，尤其是理科教师很缺乏，“学校的理科如此薄弱，这着实令我难过……我不觉得我们在前两年在理科教学上作过任何有价值的事。这些科目需要专家，只受过通识教育的人可以教历史、英文，甚或是哲学等课程，而无需主修过这些专

---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第14~15页。

② “Exploring the Unknown Forest”, *The Pioneers*, p. 7.

③ “the letter from Mrs. Lawrence Thurston to Trustees” (1916, may 18<sup>th</sup>)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42, p. 0463.

业。但假如你不是化学、生物等专业，根本就不可能上好这些课程”。艺术类师资同样是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兑现今年的承诺——为愿意学习钢琴的学生开办钢琴班，南京城里也没有合适的老师给她们上课”<sup>①</sup>，“有一位学生付了两年的钢琴学习费，但从来没有上过正规的钢琴课。因此决定不再付钱，直到有钢琴老师为止”<sup>②</sup>。若我们翻看这几年金陵女大的教师记录，也可以看出同样的问题。除了德本康夫人本人外，来校任教的先后有：Goucher, Elizabeth E, 1914 年到校（下同），任教英文（下同）；Mead, Frederica R, 1914 年，英文；Nourse, Mary A, 1915 年，历史、地理；Nicolls, Lottie Lee, 1916 年，化学、经济；Rivenburg, Narola E, 1916 年，宗教；Shipley, Mary, 1917 年，英文、历史；Brown, Lydia B, 1917 年，音乐；Reeves, Cora D, 1917 年，生物；Chester, Ruth M, 1917 年，化学；Griest, Rebecca W, 1919 年，历史、英文；Vautrin, Minnie, 1919 年，教育。在中国籍教师方面，1915 年金陵女大曾聘请了一位 Lee Va-li 教授化学、数学，但 1916 年即离校他往。金陵女大的中文课均由南京城内其他学校的男教师兼职授课，并没有专任教师。<sup>③</sup>

1918 年 5 月，德本康夫人的年度报告回顾了创校前三年的总体情况。她说：“第一份年度报告（1915 年）因为过于悲观而被批评，但那只不过是对困难和失望的坦率表达。到了那年年底，我们已经看到了充满希望的将来。第二学年（1916 年），我们实现了更多的愿望。第三学年（1917 年），我们的信心在增加。学生不再

---

① “the letter from Mrs. Lawrence Thurston to trustee” (1917, January 19th)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42, Page 0465 to 0470.

② “Among the Thorns”, *The Pioneers* p. 9.

③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 年，附录一，附录二。



是办学的困难，反而是令我们感到鼓舞振奋，她们是大学将来发展的希望。”

她在这份报告中，统计了三年来的师生变化<sup>①</sup>。

表 3-1 1915~1918 金陵女大师生变化表

	1915~1916	1916~1917	1917~1918	备 注
教师数	6	6	10	
学生平均数	9	17	36	每年有学生退学或插班，因此人数有变动
省份	4	6	8	
城市	9	12	21	
中学数	6	9	16	
差会	3	7	10	
平均入学年龄	23	23	20	

从上表来看，金陵女大在建校前 3 年，在学生人数、招生范围等方面确实有了长足进展。但在这份年度报告中仍然反映出办学的困难。除了师资问题外，金陵女大的教学标准也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大学在前几年一直被两个不同方向的意见所困扰。支持我们的一个差会已经要求我们降低入学标准，因为她们觉得不可能在她们所属的中学开办理科课，而且我们的英语要求也太高了。她们要求我们加办一年预科，教授英文和理科知识以使学生们达到我们的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又因为英文水平太低而被人们批评，连大学的资格也受到挑战。”<sup>②</sup>

① “Annual Report”, 1918, YDSL, UB Archives, Box154, Folder2961, p. 0584~0596.

② 同上注。

无论如何，初生的金陵女大在没有预科校的情况下成功创办了女子高等教育，这本身就是一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重大进步。这也是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的不同之处。在1915年至1919年间，德本康夫人治理下的金陵女大还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面对办学困难，德本康夫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为保证学校的教学进度，她本人不得不充当了多门功课的老师。几年内，她先后上过圣经课、天文课、大学代数、三角、几何。另外，她还得指导大学合唱团，甚至负责财务。对于管理委员会指派的人选，德本康夫人如果认为不合适，就会毫不留情面地辞退。德本康夫人的信中谈到，“Miss Nicholls 不是恰当的人选，所以，趁她还没有给新生上化学课之前，我就请她离开金陵”<sup>①</sup>。另外，和美国史密斯女子学院建立姐妹大学关系也是德本康夫人任内的一项重大的进展。1916年5月18日，德本康夫人向托事部建议，和美国史密斯女子学院联系，争取她们支持金陵女大的一个专业<sup>②</sup>。德本康夫人的建议得到史密斯女子学院的积极响应。当时，在金陵女大任教的米德小姐（Miss Mead），原来在华北工作的李文斯小姐（Miss Leavens）都是史密斯女子学院的校友。当时，她们负责史密斯学院的基督教工作协会。这个女大学生海外自愿传教组织把金陵女大列入自己的外国伙伴计划。从1916年开始，史密斯女子学院每年向金陵女大提供固定的捐款和人员援助，而且数量不断增加，成为金陵女大办学的重要支持者。<sup>③</sup>

---

① “Annual Report”, 1918, YDSL, UB Archives, Box154, Folder2961, p. 0584~0596.

② “the letter from Mrs. Lawrence Thurston to Trustees” (1916, may 18<sup>th</sup>)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42, p. 0463.

③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4页。



1919年金陵女大有五位学生毕业<sup>①</sup>。由于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在美国同属一个金陵大学托事部，金陵女大是通过金陵大学在纽约州立大学注册，并获颁办学执照的。因此，学生的毕业文凭同时写上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大的名字。<sup>②</sup>但无论如何，这批学生的毕业意味着金陵女大完成了初步的创建工作。

(2) 发展时期(1919~1926)。1919年七八月间，德本康夫人离开中国，回美国休假<sup>③</sup>。1921年2月8日，她才重新回到中国工作<sup>④</sup>。德本康夫人离校期间，由教导主任华群女士<sup>⑤</sup> (Minnie Vautrin) 代理校长一职。

但德本康夫人“回美后，并不休息，她用尽各种方法，去为金陵筹募校舍建筑费。不幸那一年并不利募款，所以一场努力，成绩渺然。因此她就不得不在美国多住一年”<sup>⑥</sup>。

实际上，建筑永久校舍是金陵女大办学之初就在努力进行的工作。在1913年，金陵女大的筹委会已看中南京鼓楼东北部的一

① “The Pioneers” YDSL, UB Archives, Box131, Folder2674, p. 0182.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24页。

③ 德本康夫人这次休假回美国的准确时间，不同材料有不同的记载。德本康夫人、蔡路德《金陵女子大学》上记载的时间是7月；而联董档案中有关德本康夫人的个人履历是8月，“Mrs J. Lawrence Thurston”，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42, p. 0462.

④ “Mrs J. Lawrence Thurston”，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42, p. 0462.

⑤ 华群，又华美丽，(1886~1941)金陵女大第二任校长吴贻芳，于1947年5月，撰有《华群女士述略》，文中介绍：华群女士“公元1886年生于伊利诺州，”“初毕业于伊利诺州师范学校，任教员数年，获有积蓄，始入大学，得文学士学位。民国元年来华，任安徽合肥三育女子中学校长。年满返国休假，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得硕士学位。民国八年秋，女士应本校之聘，任教育学系主任兼教导主任，精心筹划，建树既多，执训迪，同学尤爱戴。前校长德本康夫人倚之如左右手……”《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53页。

⑥ 《德校长传》《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8年6月，5页。

块土地，从1916年开始，金陵女大开始购买这块土地。德本康夫人说：“对于一位妇女来说，要去从事一项其数量不下于20英亩、分别属于10个不同的所有者的土地购置任务，是近乎不可能的事。在三年的时间里，这副沉重的担子几乎完全从校长的肩上卸了下来，落到了司徒雷登博士的肩上。”“当他离开南京前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时（金陵女大的校长德本康夫人也休假回美国并借机为金陵的发展做工作），他已经办妥了27英亩土地的签字，盖章后就同卖主交换契约文本的手续，这笔交易价值大约1.3万美元，包括11个池塘，60个拐角地和1000多个坟墓！”<sup>①</sup>司徒雷登当时是金陵神学院的院长，负责为金陵女大买地。德本康夫人则忙于永久校园的规划。1918年，金陵女大的管理委员会决定一家纽约建筑公司驻上海办事处负责校园的规划设计。德本康夫人则负责和该公司的默非先生（Mr. Henry Killam Murphy）接洽，具体讨论建校图纸。她们“首先制订了能招收容200名学生的学校发展计划——每个年级50名”。在商谈中，“这些建筑是采西方式样，或中国传统等问题被仔细讨论。最后，校园采用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1919年校庆日那天，“德本康夫人向学生展示了一份已完成的校园鸟瞰图”<sup>②</sup>。同年6月，德本康夫人和默非先生“为新建筑打桩，划定了即将建筑的楼群的四方界限”。<sup>③</sup>尽管有了很完善的规划，但建筑资金还没有着落。1919年德本康夫人回美国休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金陵女大的建筑筹款。

1920年12月13日，德本康夫人参加了美国金陵大学托事部

---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24页。

② “Achievements” *The Pioneers* P32.

③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28页。



金陵女大委员会。在会上，德本康夫人向委员们询问：各创建差会是否愿意增加每年对金陵女大的投资？是否有可能安排金陵女大的毕业生在美国就读？对大学的中国人有什么要求？中国籍教师的薪资是按照传教士的标准，抑或以经济原则（commercial basis）？目前，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合并在一个美国托事部下有何利弊？是否有打算将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的美国托事部分开？金陵女大用何种名义购买土地、建筑校舍？在建校资金没有着落的情形下，是否可以先行建设临时性校舍？

从金陵大学托事部金陵女大委员会的回答看，美国托事部方面对德本康夫人的提议抱着非常消极的态度。托事部并不同意金陵女大设立自己独立的托事部，理由是纽约州教育部门只同意在南京地区为一所大学注册。如果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的托事部分开，金陵女大的毕业生无权获得纽约州立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金陵女大也须以金陵大学托事部的名义购买土地，建筑校舍。托事部不愿意担保金陵女大毕业生来美国就读，并对派遣金陵女生来美国留学的必要性提出很多质疑，托事部甚至建议由鼓吹金陵女生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出钱赞助金陵女生到美国就读。至于金陵女大中国教师的薪资问题，托事部认为不应对照传教士的标准，而应以经济原则付给薪资。这个决定实际上为金陵女大设立了两个工资标准，造成华洋教师待遇长期不平等。对于德本康夫人兴建临时校舍的提议，托事部也在经费使用上设置了很多的条件。<sup>①</sup>

尽管德本康夫人在托事部那里没有取得满意的成果，但此行最终解决了校舍建筑经费问题。问题的解决与金陵女大是一所多个差会联合开办的“协和”女子大学有关。当时，美国的一些妇女领

---

① Dr. Robert E. Speer, "Minutes Ginling Committees of the Board of Trustee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jing" (1920. 12. 13) YDSL. UB Archives, Box124, Folder2591, p. 0849.

袖发动了一场募捐运动,要为东方的女子大学筹募 300 万元的经费。其中重要一项条件是:受捐助的必须是多个差会合办的协合式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国,金陵女大、燕京大学女部和华北女子协和医学院获得了捐赠。金陵女大从中得到 60 万美元。为了获得这笔捐款,德本康夫人个人付出不少的努力。“她花了大量时间代表金陵对许多城市和院校的团体组织发表谈话。通过她个人的努力,金陵又获得了一笔 10 万美元的捐款作为教学楼建筑基金。”1921 年,德本康夫人回到中国时,金陵女大已经有了足够的资金建筑自己的校园了。1923 年,金陵女大位于陶谷的校舍正式使用。<sup>①</sup>除了 1923 年搬入新校址外,1925 年,原设在上海的中华妇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并入金陵女大也是学校发展的另一大进展。体育师范学校的并入,壮大了金陵女大的实力,金陵女大成为当时国内拥有最强体育专业的女子学校。体育专业也成为金陵女大最具特色的专业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本书第五章作专门的讨论。

总的来看,1920 年至 1926 年间,金陵女大的发展比较平顺。除了上述两个重大进展外,金陵女大在经费收入、教学标准各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步。“1923 年至 1924 年之间,学校又获得了 3 个宗教团体及社会团体的支持。伦敦传教会派出师以法小姐(Miss Spice)来金陵服务,英国国教会和美国新教教会分别承诺,付给他们派出的一位教师的工资。这使金陵的社会团体的数量增加到了 40 个,其中 8 个是差会团体,1 个是中国医学会,1 个是史密斯学

---

① 对于新校舍,德本康夫人表示非常满意。但对新校园的评价也是不一致的。她说“中国风格的建筑受到外国人的普遍欢迎,而中国人却不这样看。学生们不喜欢校园内安静的退修室,不喜欢屋顶和骑楼上美丽的线条,我感到很难过”“Report of Ginling College”(1921, 12), YDSL UB Archvies, Box154 Folder2901 p. 0541。



院基督教工作及女校友协会。”<sup>①</sup> 从德本康夫人的信中,已经很少看到对大学师资、生源方面的抱怨。金陵女大还完善了自己的教学标准。1919年,金陵女大不再根据学生的英文水平,改以学生中文水平编排中文课程的年级。这个很自然的原则,竟然被视作当年金陵女大“在课程上最关键、最困难的改变”<sup>②</sup>。

(3) 动荡时期(1927~1928)。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挥师北伐。北伐军很快进入两湖地区。德本康夫人原来工作的长沙雅礼学校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基督教学校教学停顿,师生关系紧张。在金陵女大,1926年秋季学期“接近结束时,某种导致关系紧张的因素生长起来了。一些外部的影响开始对学生发生作用,激发了她们的批判精神。一些学生被鼓动起来,她们向教职工提出‘要求’。结果,教职工对她们提出的一些合理的要求表示愿意加以考虑。重组学生组织的风声也传开了。学生联合会被学生自治会吞并了”<sup>③</sup>。一些人被教工和学生推选出来,组成教工学生联合会议,

---

① 对于新校舍,德本康夫人表示非常满意。但对新校园的评价也是不一致的。她说“中国风格的建筑受到外国人的普遍欢迎,而中国人却不这样看。学生们不喜欢校园内安静的退修室,不喜欢屋顶和骑楼上美丽的线条,我感到很难过”“Report of Ginling College”(1921,12),YDSL UB Archvies,Box154 Folder2901,59~60页。

② Vautrin,“Report of Gینگling College”(1921,3),YDSL,UB Archives,Box154,Folder2961,p.0600~0603.

③ 德本康夫人所指的“学生联合会被学生自治会吞并”一事,金陵女大学生自治会于1919年3月14日正式成立,而所谓“学生联合会”,应是指学生联合会金陵女大分会,该会于1919年由南京城内各校学生代表组成学生联合会总会,1927年,北伐军入城前,金陵女大学生开会,议决“学生分会无多事务,理事部提议,可否并入学生自治会,另设学生会干事三人(通过)”。(《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7年12月)应该说,学生联合会金陵女大分会原本就不被金陵女大师生,尤其是教师的认可,学生也很少参加联合会的活动。它被取消并入自治会是很正常的,谈不上什么大的变化。至于金陵女大学生组织的情况,本书第五章会有专门介绍。



负责讨论所遇到的问题”。<sup>①</sup>不过，德本康夫人似乎并不担心。1927年2月1日农历除夕，50多名因战乱没有回家的学生邀请教职员参加她们的除夕晚会。席间来自福州、广东的女学生还演唱了两首歌曲。德本康夫人在次日的信中写到：“学生们都很高兴。我们很难想象在湖南省发生的那些事，我也不相信金陵女大也会遇到那样的遭遇。金陵女大在教会外有很多朋友，外面的人大多认为我们是进步的学校。我相信我们能比其他学校更容易适应新政府的统治。女校比男校好多了，没那么狂野——女孩子要比男孩子文明得多。”当时，南京的外国领事馆、商人都准备撤走，一些人还希望英国派兵保护。德本康夫人对此很不以为然，她甚至认为上海比南京更危险，因为军队并不能解决问题。“中国并不想和列强开战，英国人也不想和中国开战。形势非常复杂。”“中国人坚持认为妇孺的撤离是不必要的，别把形势往最坏处想。我也同意这个看法。”<sup>②</sup>

与自信的德本康夫人相比，金陵女大管理委员会显得慎重许多。1927年2月10日，Miss Bender 致信美国金陵女大托事部。信中重点是讨论怎样满足中国政府的法令，增加华人在管理委员会中的职位，及由此引发各种问题。这封信中包括6个提案：

①“各委员会的主要席位应尽快交给华人代表”，对于这一点，托事部和管理委员会都没有异议。但有人提出：“是否在可能华人占主体的同时，差会代表也占多数？因为差会代表在25名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占15位。”讨论的结果，差会代表中至少有5人必须是华人，才能既做差会控制管理委员会，又符合中国政府的要求。

---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63页。

② “the letter to Miss Hodge from Thurston” (1927, Feb, 2<sup>nd</sup>),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44.

②原宪章中对基督徒身份的确认是“所有基督教会 (Evangelical Churches) 的成员”，讨论中提议改为“所有信仰基督教 (professing Christians) 的成员”。理由是有“许多人信仰基督教，却不是教会的成员。许多情况下，他们受洗入教，却出于对宗派主义的憎恶，不加入任何教会群体。要加入某个组织以表达对宗教的信仰，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外国人的观念”。

③提议把宪章中“差会” (Mission) 改为“组织” (Organization)。

④是否修改“促进金陵女大忠于基督教福音信仰的合作委员会” (Cooperation Boards for the Loyalty of the college to the Evangelical Faith) 的职责。提议不修改。

⑤更清楚规定：校长有任命所有华人教职员和代课教师的权力。

⑥关于金陵女大在美国独立设置托事部的提议。<sup>①</sup>

从内容来看，金陵女大管理委员会的这些提议主要是为了应付局势的变化，适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但这封信只字未提华人担任校长或副校长等问题。很显然，管理委员会想通过部分的改组，让金陵女大渡过国民革命这场风暴。后来的发展证明，德本康夫人和管理委员会都低估了中国人民收回教育主权的决心。根据德本康夫人的回忆：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进攻南京城。1927年3月24日，南京城内秩序失去控制，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被枪杀。北伐军士兵也几次“访问”了金陵女大。数日后，金陵女大所有外籍教师匆忙逃往上海。“3月24日之后，一个由校友、教职

---

① “the letter from Miss Bender to Members of Ginling College Committee” (1927, Feb. 10<sup>th</sup>), YDSL, UB Archives, Box124, Folder2592. pp. 0997~0999.

工和学生组成的特别行政委员会承担了学校的行政责任。整个4月份都异常紧张，因为那个时候南京还控制在激进派手里。虽然努力重新开始了一些班级的课程，但正常的学习很难维持。5月，国民党开始‘清党’，温和派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这种情况维持了近两个月，使得暑假补课的计划得以付诸实践。一个足以满足需要的教职工队伍又形成了，这是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教师队伍。”<sup>①</sup>“学校从全国各地联系了一些中国教授，利用暑假开办补习班。”<sup>②</sup>暑期补习的时间是六个星期。7月份，大学如常举行毕业典礼。9月22日，金陵女大重新开学上课。

与此同时，金陵女大管理层的调整也在紧张酝酿着。5月份金陵女大的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开会。会上，金陵女大首届毕业生徐亦蕓<sup>③</sup>当选为执委会的主席。而“在华教工中的外籍教工，包括校长，向学校提出辞职……这一重新调整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保证学校通过官方注册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随后，金陵女大决定邀请第一届校友吴贻芳回校接替德本康夫人的校长职务。吴当时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尚无法及时回国。在南京方面，金陵女大方面已组成了

---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70页。

② 邓裕志：《难忘的岁月》，《金陵女儿》，1995年，31页。

③ 徐亦蕓（1894年1月5日～1981年2月1日），“祖籍昆山，祖父是基督徒，在昆山主持教会工作15年。父亲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和文学教授”，“母亲精通古典文学，曾任昆山浸礼会女子学校校长”，徐亦蕓早年毕业于上海晏摩氏女中。1919年，金陵女大毕业后，先后任教东南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教育行政。1923年获教育硕士。1924年，徐亦蕓与上海名医牛惠生结婚。1928年，被推举为金陵女大校董会主席，长期帮助吴贻芳的工作。1949年，徐亦蕓前往美国生活定居，先后在多间美国任教。1961年获美国公民权。徐振玉：《吴贻芳的知心挚友——徐亦蕓》，《金陵女儿》，金陵女大校友会编印，1995年，2～6页。

有五个中国籍教师参加的行政委员会。Ellen, Koo Y. T 任行政委员会主席，负责各项事务。教学秩序恢复正常。

然而，在上海避居的德本康夫人心情并不好。虽然7月份，德本康夫人曾回到南京参加毕业典礼，但很快又离开了南京。1927年9月25日，德本康夫人在一封信中写道：“今天，我们离开南京已经有6个月了！这6个月来，我生活迷惘，不知道随后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过些日子自己会在何方，不知道该怎样拿定主意，或找谁出主意。这是段非常沮丧的日子。有时，我真想一走了之。”<sup>①</sup>当时的她正为是否回南京工作而烦恼。一方面，德本康夫人不愿在吴贻芳回来前放弃校长职权；另一方面，金陵女大又面对着外界要求外籍校长立即辞职的巨大压力。

华群等人都劝德本康夫人不要回金陵女大。华群说“许多人向我打听你何时回校。我个人认为，你还是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回校为好。眼下金陵女大的中国师生非常反对外来的压力，最好是先由学生向你发出回校呼吁后，再决定回校。”外籍教师(Miss Marth Hackett)则建议德本康夫人休假一年，“假如吴贻芳能够治理学校，你再要求回校任教不迟。假如你现在回来，看到这么多变化，你会感到很痛苦的。一年后，中国人将会有点治理学校的经验，也会对事情多点理解宽容的态度”。Miss Koo 说得更明白：“虽然我很想念你，盼望你回校和我们在一起，但你呆在上海会更好些。你现在回金陵，只会招致外界对金陵的批评，为我们增加更多麻烦。因为有人总在打听你的情况，了解在吴贻芳来校前由谁代理校长一职。我们这已经组织了一个行政委员会，目前运作良好。当然，在我们金陵大家庭中，我们不分彼此；我们

---

<sup>①</sup> “Diary of Mrs. Thurston” (1927, Sep. 25) YDSL, UB Archive Box143, Folder2844, p. 0677.



需要你的建议、合作和帮助……”<sup>①</sup>

看着这些同事的来信，德本康夫人的心绪不佳。这时德本康夫人又得知：金陵大学中国教师反对邀请外籍教师回校。她遂将一腔怒火倾泻在这些中国男教师身上。“他们就是不希望金陵大学外籍教师回校。如果形势安定，哪怕只是稍稍安定，这些人再想用不安全为托辞把外籍同事拒之门外，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帮金陵大学男教师还想要吞并金陵女大，让女生到金陵大学那儿上课，他们认为中国人还没有完全掌控金陵女大的大权。他们竟会有这样的想法，真是太可悲了！”<sup>②</sup>最后，德本康夫人用浸信会校董 Mr. Hanson 给沪江大学校长魏馥兰 (F. J. White) 的话作为自己的总结：“从美国人对关系的认识来说，关系彻底破裂对一个机构并不是件好事。如果中国的朋友们选择彻底决裂，并坚持到底的话，他们会觉得不礼貌和羞耻的”。<sup>③</sup>

10月2日，德本康夫人决定既不回南京，也不休假，而是在上海处理金陵女大的事务，她和秘书 (Mrs. Berger) 在上海圆明园路23号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由此，金陵女大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德本康夫人上海办公室；一个是南京金陵女大中国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德本康夫人本人很少回金陵女大，主要在上海代表金陵女大参加各类会议。1928年1月，她代表金陵女大参加了葛德基总干事主持的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许多新任华人校长，如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沪江大学樊正康、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燕京大学洪业等人出席

---

① “Diary of Mrs. Thurston” (1927, Octo. 2)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44, p. 0678.

② “Diary of Mrs. Thurston” (1927, Octo. 2)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44, p. 0678.

③ *Ibids.*

了会议。会上主要讨论国民政府统治下基督教大学定位、办学宗旨。德本康夫人对这些人的谈话作了认真记录，并在随后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对这次会议的观感。

在信中，她仍对中国政府对基督教大学的规定以及华人基督徒在1927年的表现耿耿于怀，“我仍然相信政府所有的干预基本上是不友善的，而那些想以此削弱英、美影响的人又在不断地推波助澜。华人基督徒被这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民族主义蒙蔽了他们的眼睛”。<sup>①</sup>

会上集中讨论的是三个议题：

①对葛德基调查报告的讨论：1927年，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总干事葛德基（E. H. Cressy）对全国各地基督教大学教育作了一次普及性调查，收集了1926~1927学年基督教大学教育的各项统计数字，然后葛德基用美国大学的标准对这些基督教大学的工作作了一些评价<sup>②</sup>。1928年4月，这份包含着大量调查资料的报告由上海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联合会出版。然而在1月份各地基督教大学校长开会时，对葛德基的这个统计有很多的批评。德本康夫人说：“这些新任中国校长反对用统计数字来评价我们的工作，我对他们的话极有兴趣”，“几乎每个发言的中国人，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燕京大学洪业、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等都认为，用美国大学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作法是不合适的”。德本康夫人同意这些人的意见，她说：“我想，葛德基这份调查使大家感到困惑。虽然我本人对资料、统计表很有兴趣，但也被葛德基

---

① “the letter from Mrs. Thurston to Mr. Wallace” (1928, Jan. 20<sup>th</sup>) YDSL, UB Archives, Box 113, Folder 2845, p. 0717~0723.

② Earl Herbert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26*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28, April).

罗列的三卷统计数字搞糊涂了。我想许多比我更有数学、科学头脑的人会挑战这些资料的价值”。

②讨论基督教大学的联合计划(Correlated program)。这次会上对这一问题也作了大量讨论。德本康夫人在这个问题和葛德基产生激烈矛盾,认为这项计划是对她及金陵女大的挑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牵涉整个金陵女大的发展过程。本书第六章将会有详细全面的阐释。

③关于基督教大学服务方向的问题。葛德基提出:基督教大学必须以基督教社区作为服务对象,为社会培养教牧人员、教育、医疗人才。对于葛德基的提议,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并不赞同。林认为:仅仅服务基督教社区是不够的。服务基督教社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大学必须服务于整个中国社会的生活。林也反对将培养教牧人员作为基督教大学的服务功能,他认为:作为职业,教牧工作并不是太重要。通过学生个人生活的影响比增加教牧人员,更能促进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德本康夫人详细纪录林的观点。当林谈到基督教大学服务基督教社区,还要服务整个中国社会生活时,德本康夫人在按语中写道:“我忽略了这个大問題——服务中国,至少和服务基督教社区是一样重要的”。<sup>①</sup>

这次会议对德本康夫人有一定的触动,她对这次会议的记录长达7页。不过这也是她以金陵女大校长身份参加的最后一次大型会议。1928年6月1日,吴贻芳回到中国,6月8日抵达南京金陵女大。6月30日,德本康夫人正式辞去金陵女大校长一职。7月1日,吴贻芳接掌校长职务。同月,德本康夫人向美国托事部方面送上自己最后一份年度校长报告。此后,德本康夫人作为教

---

① “the letter from Mrs. Thurston to Mr. Wallace”(1928, Jan. 20<sup>th</sup>) YDSL, UB Archives, Box 113, Folder 2845, p. 0717~0723.

师、校长顾问和楼房建筑监督人的身份继续留在金陵女大。1936年夏，德本康夫人返美休假，1939年又回到南京，在原金陵女大校园内担任妇女儿童活动的会计。1943年，被日本人遣送回美国。

德本康夫人回美之后，将主要精力放在撰写金陵女大校史上。但她的写作似乎并不成功。1944年，Mrs. Arthur M. Sherman 在一封信中说：“我退回了德本康夫人的手稿。……这个出版计划早就声明，这本著作将面向公众。但我读了前面四五页对金陵女大组织架构以及该校成就的描写后，我认为这不是公众感兴趣的东西，甚至教会中那些不熟悉中国基督教大学，讲得具体点，不熟悉金陵女大的人们不会有兴趣看这本书稿。”她建议暂时不予发表，只留作将来的参考<sup>①</sup>。德本康夫人和蔡路德两人重新撰写金陵女大校史，并由联董出版。1958年4月18日（周五）晚，德本康夫人病逝在马萨诸塞州的 Auburndale，享年83岁。<sup>②</sup>

3. 德本康夫人的办学特色。《金陵女子大学》一书末尾曾对德本康夫人治校成绩有这样的陈述：“金陵的第一任校长对学校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是那些不知道学校创业历史的人难以报答的。许多使学校禀赋了自身独特品性的最优秀的传统可以回溯到德本康夫人担任校长的那个时代。她的勇气和信念足以战胜任何艰难险阻。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大学理想将为变得越来越现实。”<sup>③</sup> 作为一位创校者，德本康夫人有资格获得这样的评价。但是，人物的性格和思想从来是复杂的。下文尝试从治校风格、教育思想两方面来具体讨论她的办学特色。

---

① “The letter from Mrs. Sherman to Mrs. Mills” (1944, March, 8) YDSL, UB Archives, Box 113, Folder2852, p. 0019.

② 徐亦蓁, “A Tribute to Mrs. Lawrence Thurston”, YDSL, UB Archives, Box134, Folder2697, p. 0869.

③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156页。



治校风格方面,和许多创业者一样,德本康夫人办事刻苦认真。创校初年,德本康夫人被戏称为“Jack of all trades”。因为她不仅教授《圣经》课、天文学、数学等课程,还负责指导学校歌咏团,做财政、文书工作,检查学校报表,准备典礼上的演讲等<sup>①</sup>。德本康夫人和程吕底亚同属于自由派。德本康夫人本人酷爱教育和天文学,甚至允许学生选读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过,程吕底亚有更多的布道家气质,而德本康夫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较少参加直接的福音布道工作。从这点来看,德本康夫人又与华南女大第二任校长卢爱德颇为相似。德本康夫人对工作有严格的要求。据华群回忆,1938年感恩节前夜,德本康夫人为了准备次日的演讲,“一整天都待在住所,将发言稿作最后修改。全南京肯定找不出第二人写发言稿这么煞费苦心,不惜时间的”<sup>②</sup>。为了金陵女大,德本康夫人付出过许多心血。1925年1月,德本康夫人在美国和托事部谈判结束,准备回中国服务。德本康夫人的父亲已82岁,她姐姐劝说道,“我想你去探望父亲并了解他的情况后,就不会计划回中国了……你要去中国的消息令父亲非常难过”<sup>③</sup>。德本康夫人经过考虑,仍然返回中国。她告诉金陵女大同事,“我的离去会给父亲致命打击,你们可以想见,我做出回中国的决定有多么的困难”。<sup>④</sup>

1928年6月,德本康夫人从校长一职引退时,金陵女大的一些师生在校刊上撰写了许多纪念性文章。如刘恩兰的‘A Sketch of the Life of Mrs. Lawrence Thurston’,华群的《德校长传》;《我的德校长观》(笔名程陶);《德校长给我的印象》(笔名李泽

---

① *The Pioneer*, p. 40.

② 《魏特琳日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703页。

③ Liu En-Lan, “A Sketch of the Life of Mrs. Lawrence Thurston”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 1928. 6.

④ *Ibids.*

贞)；《德校长“无我”美德的面面观》(笔名施泽)；《星夜脑海中德校长人生的象征》(笔名卓依)等。这些文章对德本康夫人治校成绩都给予肯定。学生们也谈到对这位创校者的印象。她们列举了德本康夫人诸多品性，“远大的眼光”、“坚强的意志”、“镇静的态度”云云，“总之，德校长的思想高尚，眼光远大，行事公正，待人以恩，立身以悯世为宗旨，不顾名利，向着‘无我’的道路上跑。那么，文化侵略的征号，我们的德校长是无分的了”。<sup>①</sup>从字面理解，德本康夫人的治校工作是深受师生尊崇的。

不过，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德本康夫人治校期间较受争议的另一面。《我的德校长观》的文章中，作者对德本康夫人的认识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在这时期里，因为德校长的伟大庄严的样子，和她痛快决断的办事手段，使我见了她，不知不觉的恭敬里面，带着了七八分畏惧的色彩”。“第二时期，因为加入了她的圣经研究班，所以和她接触的机会较多，知道她的数量，也就此增加了不少，但是敬中的‘怕’字，还是不能尽除。”“第三时期，常听人讲她‘专制’，我起初也有点以为是这样。以后渐渐觉得不对了。为什么呢？我想是做过领袖的，无论大的地位，或是小的地位，都能谅解到做领袖的困难处……”<sup>②</sup>为了论证人们冤枉了德本康夫人，这位学生还专门举了1927年到1928年德本康夫人滞留上海的例子。“国民政府因为要收回教育权，就要命西人所办的学校，一律改为中国人做校长，所以我们打算请本校第一届毕业生吴贻芳博士继任校长之职。但是在未定规以前，德校长不愿随便放弃她的职权，因此多数的人，就以为她‘把持’校长的地位。我初以为她是有这个意思，后来和她谈谈，看看她的

---

① 施泽：《德校长〈无我〉美德的面面观》，《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8，6，25页。

② 程陶：《我的德校长观》《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8，6，19页。

态度，知道她的苦心，真是冤枉她太厉害了！”<sup>①</sup> 尽管这位学生本意是为德本康夫人作辩护，但她的辩解透露出：金陵女大确有许多人对德本康夫人治校风格的不满。“有许多人以为德校长是一个严父，不是一个慈母，所以许多同学不敢与她接近。”<sup>②</sup> 德本康夫人之所以给许多人以“专制”的“严父”形象，与其个人办事风格有关。从她的书信、报告中，我们常常可以领教其率直的作风。她认为教师不符合大学要求，会立即请她离校。前述 1916 年管理委员会推荐来校教授化学和经济的 Miss Nicolls，德本康夫人不满意她的表现而要求其离校。她与继任校长吴贻芳有不少争执<sup>③</sup>，甚至与多年合作的华群女士也发生过激烈的争吵。<sup>④</sup>

至于德本康夫人的教育思想，我们以她 1916 年就任校长之初，1928 年校长离任时的两篇演讲为例略加分析。1916 年 2 月 1 日，德本康夫人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基督教教育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目标与困难》<sup>⑤</sup> 的演讲。她说：“我们需要受过教育的基督教妇女为她们的姐妹广传福音，并且我们盼望着有一天，教会能够动员所有中国妇女的力量去传布天国的消息。”具体谈到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时，德本康夫人强调要培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妇女领袖。“在高等教育期间，要向学生灌输改变

---

① 程陶：《我的德校长观》《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8，6，20 页。

② 李泽贞：《德校长给我的印象》《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8，6，22 页。

③ 德本康夫人在吴贻芳任校长期间的活动以及两人的关系，下一节会作较为详细的阐述。

④ 华群在 1940 年 3 月 2 日的日记中说：“我和瑟斯顿夫人（德本康夫人——引者）吵了好几次，这使我感到疲惫不堪。我承认，这些天我脾气急躁，而且也很累，但也确实是她惹火了我。她话里有话地说，很多事情是在过去的几年间就应该做完的，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做这些事”《魏特琳日记》，760 页。

⑤ Mrs Lawrence Thurston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ese Women, Aims and Problems” *Educational Review*, (1916, Oct.) pp. 95~101.



家庭、城市、教会和国家的理想。我认为，要在所有妇女可以从事的领域中培养领袖人才。”至于金陵女大，德本康夫人希望通过金陵女大的教育促进基督教女子中等教育的成长。值得注意的是：德本康夫人在演讲时还谈到了一些创办女子高等教育的深层次问题。一是女子教育在基督教会中的地位：当时的教育工作受到教会中部分人的反对。教会很多人对教育传教士，尤其是女教育传教士的工作不以为然。德本康夫人指出：“正如传教士教育工作被国内外一些缺乏信心的传教士所反对一样，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受到阻挠，许多人不相信它是重要或必须的。有趣的是：妇女工作，尤其是妇女教育工作，大多是由妇女差会负责。”她呼吁：“即使你们没有时间详细了解或没有能力指导，我们也要求你们信赖女子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我们要你们承认我们的努力——为中国的女性提供更宏大，更丰盛的生活（the larger, richer life）。”二是独身主义的问题：女子高等教育在西方国家受人批评时，常被指责不适应家庭生活的需要，尤其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奉行独身主义。德本康夫人认为那并不总是女子的错。“那些喜欢在家庭关系中高人一等的男士们并不愿意选择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假如中国女孩渴望学习进修，准备在结婚前从事教师工作，她们肯定不喜欢让婚姻束缚住个人自由。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教育令她们鄙视家庭生活。即或有少部分女性愿意选择独身，从事教师、护士、医生，或社会工作，这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大危险。经济上独立自主女性的大量出现，是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无需担心。”三是女校中的男教师问题：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正式提出过，德本康夫人将其视为一大问题。她说：“女校付给的薪金不高，不足以吸引最优秀的男教师。而且，在女校任教远不如在男校任教吸引。出于礼貌得体，男教师还不可能太年轻，这样我们又丧失了任用那些有魄力、精力旺盛的年青教师的机会。”因此，

德本康夫人希望女校多聘用女教师,尽量用女教师从事女子教育。

如果说这篇演讲只是德本康夫人教育思想的初步构想,1928年11月的辞职演讲则是德本康夫人办校13年指导思想的总结。辞职演说中,她总结了自己十余年的办学实践,提出两点基本思路。一是坚持基督教教育的方针:她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所基督教管理,活跃着基督教精神的女子大学。大学应该保持高水平的教育,培养社会效率,促进精神发展和最高人格”。二是“西体中用”的思想:她强调要吸收中国传统的优秀部分。“我们在创校时自然有一个教育的目标。这个教育目标包含着许多西方文化的理念。当时,学习外国课程蔚为风尚,我们也提供了这些课程。因为那时有些称为西学的思想广受人们的尊敬,人们认为中国需要这些西学。”“但金陵自豪的是,我们从不贬低中国的传统理念,这是学生在来金陵求学前的固有传统。我们发现强调国学是很困难的,但我们的理想是:国学科目一定要有高水平,中国文化传统应该保留。大学的建筑反映了这一努力。坚持中国传统中优良的部分,是今天金陵理想的一部分。”<sup>①</sup>

纵观德本康夫人两篇演讲,基本办学思路实质上没有太大变化,都坚持“基督教管理,充满基督教精神”的女子高等教育方针。这也是当初六个女传教士呼吁创建长江流域女子大学的初衷。

## (二) 华人校长治校——吴贻芳时期(1928~1951)

在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家中,吴贻芳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位,也是被研究较多的一位华人校长。以笔者所见,除了大量的回忆性文章、纪念集之外,对吴贻芳校长研究的学术性成果有:王奇生的《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载于吴梓明编:《基督教大学华

---

<sup>①</sup> “Thurston’s Letter”, YDSL, UB Archives, Box144, Folder2860.



人校长研究》<sup>①</sup>；《吴贻芳》（载于《民国人物小传》第十册<sup>②</sup>）；王小鹏的《对社会至诚服务之明证——从吴贻芳教育思想研究看教会大学文献对近代中国教育研究的重要性》（载于《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论文集》<sup>③</sup>）。另外，香港中文大学黄洁珍的哲学硕士论文《从吴贻芳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史静寰与何晓夏的《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sup>④</sup>等论著中都有对吴贻芳的认真研究。本书的研究参考上述学术成果，根据耶鲁大学所藏之联董档案材料及其他材料，对吴贻芳治理金陵女大的活动作详细的整理和分析。

1. 早年生活。吴贻芳 (Constance, Wu Yi-Fang), 字冬生, 祖籍江苏泰兴县, 1893年1月26日出生在湖北武昌。曾祖父是翰林, 祖父是举人。父亲吴守训, 字孝膺, 秀才出身, 曾任牙厘局局长, 1904年任湖北当阳县知县。外祖父陈豪, 字蓝洲, 原籍浙江。“同治九年(1859年)优贡, 以知县发湖北”, 历任湖北房县、应城、蕲水、汉川、随州等处地方长官, 晚年退居浙江杭州。<sup>⑤</sup>

根据吴贻芳1936年向Helen Loomis的介绍, 父亲吴守训是家中独子, 而祖父在吴守训结婚第二年就病故, 因此吴贻芳的家族成员不多, 家中最大的长辈就是她的祖母。吴家有三个兄弟姐妹, 除了一位兄长外, 还有姐姐吴贻芬、妹妹吴贻荃。吴贻芳7岁时, 跟随兄长向一位塾师求学。姐姐吴贻芬则没那么幸运, 因为

---

① 吴梓明编著:《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 《民国人物小传》,第10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8年。

③ 吴梓明主编:《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

④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⑤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3,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3083页。

家人认为贻芬年龄已经 12 岁,不适宜跟一位男教师求学。小时候,吴贻芳还缠过小脚,后来才放大。<sup>①</sup> 清末中国本土女学的兴起,改变了吴贻芬、吴贻芳两姐妹的生活。“吴贻芳 11 岁时,杭州吴贻芳外祖母家传来消息,当地成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吴贻芳的小姨也进了这个学堂念书。”<sup>②</sup> 姐姐吴贻芬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盼望到杭州女学堂求学。为了让家人同意,吴贻芬甚至吞金自杀相威胁。家人最后允许吴贻芬到杭州求学。但家人认为姐妹同行较为安全妥当,所以也让吴贻芳陪姐姐到杭州读书。1904 年至 1906 年的两年半间,姐妹俩在杭州女学堂求学。至于这所女学堂的具体名字,王奇生、史静寰、何晓夏、黄洁珍等人的研究均认为是教会女子中学——弘道女子学堂。史静寰在《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讲道:“1904 年其姐吴贻芬为抗议父母不允去杭州读书一事,竟吞下金戒指,险些身亡。这一行动换来了她和姐姐同入杭州弘道女子学堂的机会。”<sup>③</sup> 但是,《吴贻芳纪念集》记载:“这一年的春天,十一岁的吴贻芳和大姐一起来到杭州外祖母家,进了公立杭州女子学校。这所学校是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冲破封建礼教,由维新人士举办的一所女子学校。”<sup>④</sup> 据此,这所学校应不是基督教女校——弘道女学(杭州弘道女校在 1867 年由美国长老会创建)。事实上,吴贻芳 1936 年自己回忆说:“杭州这所女校是由一群要发展中国现代教育的人士创建的。学校大部分女生都产

---

① 黄学潮:《母校育我,我爱母校》,《金陵女儿》,2000 年,23 页。

② “Biography of Dr. Wu” (1936), YDSL, UB Archvies, Box 154, Folder957.

③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

④ 《吴贻芳纪念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126 页。

生了男女平等的新思想。她们不愿再做男人的玩物。”<sup>①</sup> 因此，吴贻芳姐妹进入的第一所女校应该是1904年成立的杭州女学堂。

正因为这所女学堂不是基督教女校，英文水准不高，吴贻芳姐妹俩在1906年决定转到上海天主教启明女校学习英文。这所女校主要是面向非基督教女生，不以传教为目的。但启明女校校规极严，姐姐吴贻芬非常不习惯启明女校的生活，而且姐妹俩的英文进步不大。1907年春季，她们决定回到武昌。在武昌，姐妹俩继续向一个教师学习英文和数学两科。1908年，吴贻芳姐妹俩再次离家求学。这次，她们就读的学校是苏州监理会景海女校。1909年11月，吴守训亡故，姐妹俩回家奔丧。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吴贻芳一家人随同其他亲友避居上海。在北京清华学堂求学的哥哥也因学校暂时关闭，回到上海。不久，吴贻芳的哥哥亡故。吴母不堪悲痛，一个月后也因病离世。姐姐吴贻芬也在母亲入殓前夜，自缢轻生。短短数月内，吴贻芳的兄长、母亲、姐姐相继去世。吴贻芳身边的亲人只剩下年迈的祖母和幼小的妹妹。在丧乱流离之际，二姨父陈叔通<sup>②</sup> 照顾了吴贻芳一家。陈叔通让吴贻芳

---

① “Biography of Dr. Wu” (1936), YDSL, UB Archives, Box 154, Folder 957.

② 陈叔通，名敬第，字叔通。在其《六十自述》中说，“忆余甲戌生”。按甲戌年是清同治13年，即1874年。故当是1874年生。幼年时，随父陈豪在湖北。少年时，与吴贻芳父亲吴孝膺是亲密文友。及长，历任浙江官书局，曾与汪康年倡办近代教育。1897年后在杭州求正、养正两学堂任事。1904年，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1906年回国后，任奉天将军赵尔巽的幕府。1908年10月，离职还乡。民国建立后，陈叔通北上，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在北京时，陈叔通与吴雷川交往密切。不久，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图谋称帝，陈叔通避居天津，参与梁启超发起的反袁运动。其后，南下上海，任职商务印书馆。陈叔通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民主人士，与胡适、高梦旦、张元济、马叙伦、陈散原等人相交甚深。新中国建立后，陈叔通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1953年，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陈叔通任主任委员。1966年逝世。参《六十自述》，陈叔通：《百梅书屋诗存》，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7~40页。



一家搬到杭州。1913年，吴贻芳作为特别生进入杭州弘道女校（Hangchow Union Girls' School）四年级。1914年，吴贻芳一家人随陈叔通搬往北京。陈叔通介绍吴贻芳到北京师范女校及附属小学任教。1915年，吴贻芳又随陈叔通搬到上海。此时，原弘道女校教师诺玛利推荐吴贻芳到金陵女大就读。1916年2月，吴贻芳作为插班生进入金陵女大。

在金陵女大，吴贻芳学习勤奋，尤其喜欢化学系蔡路得、生物系黎富思两位教授的授课。1916年，吴贻芳当选为金陵学生自治会会长。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吴贻芳带领学生走上街头，投身到这一伟大的历史洪流中去”。<sup>①</sup> 在金陵女大，她选择了基督教作为一生的信仰。1918年，吴贻芳在上海北四川路晏摩氏女中的浸礼会怀恩堂受洗入教。1919年6月，吴从金陵女大毕业。在其毕业前，德本康夫人一封寄给美国托事部的信中说：“在今年6月毕业的学生中，吴贻芳是最出色的。所有人都非常赞同大学聘用她。教职员们认为：她来校任教，将帮助解决因本人休假而造成的许多问题。我们觉得她的水平不逊于任何留学回国的文学学士……她将是我们的教师队伍的重大补充。”<sup>②</sup> 另外，德本康夫人还谈到政府学校在教师薪金上的巨大优势以及吴留校任教后的薪金安排。德本康夫人这封信显然是想让吴毕业后留校任教。但是，德本康夫人的愿望没有实现。吴毕业后，应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方还的聘请，任该校英文教员兼英文部主任。住址在北京石驸马街女教职员的四合院宿舍。

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期，吴是北京女子教育界的

---

① 《吴贻芳纪念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127页。

② “the letter from Thurston to Miss Bender” (1919, Feb. 7<sup>th</sup>)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43, p. 0528.



活跃分子。解放后，冰心回忆说：（1919年）“那时我是协和女子理预科的学生，她来协和女大演讲。我正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位子上，看见她穿着雅淡而称身的衣裙，从容地走上讲台时，我就羡慕她的端凝和蔼的风度，她一开始讲话，那清晰的条理，明朗的声音，都使我感到在我们女大的讲台上，从来还没有过像她这样杰出的演讲者！”<sup>①</sup> 1922年5月，经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校长推荐，吴贻芳获巴勃奖学金，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系留学。在美国，吴贻芳还是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会长，1925年，又被推选为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1927年，吴贻芳正在密歇根大学准备博士论文《黑蝇生活史》的写作。这时，她收到了金陵女大的校长聘书。

金陵女大校长候选人曾有两位，分别是吴贻芳、郝映青。两人都是金陵女大校友。郝映青是1920年届金陵校友，1923年至1927年间担任女院中文系教师，1928年赴美留学。当时德本康夫人主张由郝映青继任校长，黎富思教授则属意吴贻芳。由于黎的坚持，加之吴贻芳正攻读博士学位，最终被确定为校长人选<sup>②</sup>。1928年，聘任吴为金陵女大新校长的提议由金陵女大执委会提交到金陵女大管理委员会。在金陵女大管理委员会上<sup>③</sup>，有2票反对吴贻芳就任金陵女大校长一职。1张来自中国人 Dr. Djang Fang，1张来自传教士罗道纳 (Mr. Roberts)。他们之所以反对这项动议，并不是因为对吴贻芳个人有成见。Dr. Djang Fang 说：“很抱歉，我并不认识吴贻芳。但我觉得现在通过这项重要的决议是不妥当的。”

---

① 冰心：《一代的崇高女性》，《吴贻芳纪念集》，140页。

② 胡秀英：《怀念校长》，《吴贻芳纪念集》，159页。

③ 据校友李葆真回忆，推选吴贻芳的会是在金陵校友严莲韵的家里召开的。李葆真：《爱母校至深至长的严莲韵》，《金陵女儿》，金陵女大校友会，1995年，37页。

仅仅因为吴贻芳是中国人就任命她作校长这个重要职位。这会造成两个不良后果。首先会让人觉得：是目前局势迫使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新校长也可能达不到前任的标准。”“渐进的改良比突然的变化好。是否可以先让吴女士担任两年的副校长，让她适应目前中国复杂局势，再将其培养成校长。”罗道纳说得更直接，“我反对金陵必须任命中国人作校长，也反对中国人占据管理委员会的多数，除非他们能够承担金陵女大的财政”。

然而，校董会的大部分成员支持这项任命，包括金陵大学新任校长陈裕光和包文(Dr. Bowen)。尤其是包文在会上对吴贻芳给予很高评价，他说：“我看，吴贻芳是新校长的最合适人选。虽然有人会对校长更迭感到遗憾，但在中国形势剧变之下，这是无可避免的。我想德本康夫人和所有的中外教职员都会支持吴女士。据我所知，校友们也对吴女士非常信任。她在美国获得令人尊敬的高学位，且热心于中国女性的教育和领导工作。虽然眼下南京的政治社会形势很不稳定，但她是有能力办好学校的”。<sup>①</sup>表决结果，吴贻芳就任校长的动议以 18：2 的大比数通过。随后，美国的金陵托事部也核准了这项动议。1928 年初，吴贻芳参加了在美国亚特兰大市召开的金陵托事部会议。不久，吴贻芳完成在密歇根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启程，途经温哥华，日本返回上海。她在日本，致信美国金陵女大托事部 Miss Bender。在信<sup>②</sup>中，吴贻芳提出了四点要求：

第一，吴贻芳坚持自己是试任金陵女大校长的一职，本人更

---

① “Votes of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Control on Election of Miss Wu as Pressfor of Ginling College” (1927.7) YDSL UB Archives, Box134, Folder2704.

② “the Letter from Wu I-Fang to Miss Bender”(1928, May 28) YDSL, UB Archives, Box124, Folder2592, pp. 1032~1034.

愿意从事教师这个行业。“人们觉得我适合担任校长一职，是因为我正好是金陵的首届毕业生。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弱点，我在美国所学的也和校长无关。既然金陵呼召我回去任校长，我愿意试一试。我要求：假如试用一段时间不合适的话，我要辞去校长职务。执委会和校董会也应该毫不犹豫地辞去我的职务……不过，虽然我不想在校长的这个职位上太久，但只要是我在任上，我就会尽我所能做好校长的工作。”

第二，吴贻芳呼吁美国教会继续给予金陵稳定的财政支持。她针对有些美国人指控中国人在试图夺取大学的控制权时说：“我们想要的只是金陵继续存在下去，培育基督教领袖，更好地为人群服务。谁掌握职权并没有什么差别。”

第三，谈到新任校长的工作时，吴贻芳指出在完全了解形势前，自己不会做出太大的变化。至于教职员的标准，吴贻芳说：“除了强调外国教师的中文水平外，我们希望根据候选教师的素质来决定聘请与否”。

第四，与德本康夫人的关系问题。（下文会有专门讨论）

1928年6月1日，吴贻芳回到中国上海。7月1日正式主持金陵女大的校务。11月3日上午10时，金陵女大举行新校长的就职典礼。典礼由校董会主席徐亦蓁致开会词，其后宋美龄、德本康夫人、吴贻芳、俞庆棠和赵运文等人依次发表演讲。会上还宣布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贺词。同年的《教育季刊》和《金陵女子大学校刊》都对此作了详细的报导。其中，吴贻芳的演讲词说：“本校开办之目的是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学，亦是要培养人才，从事于新中国的各种工作……学校于国学科学，同时并重，既培养了中国学者的思想又能得科学家的方法，然后到社会上去，才能应各种的新需要，运用自己所学，贡献于各种新工作……现在受高等教育的女子还是很少，所



以对于社会有一种为领袖的责任。若做领袖，高尚的人格，实在是最紧要的资格。所以学校一方面不能不注意学生的生活同环境，使学生容易养成健全的人格，将来能做有实益的领袖。”<sup>①</sup>

2. 初期的治校活动(1928~1937)。就职典礼后，吴贻芳正式接任金陵女大校长一职。在校内外，吴贻芳都是一位活跃的妇女领袖。下表列出十年间吴贻芳主要的校外活动。<sup>②</sup>

表 3-2 1929~1936 年吴贻芳主要校外活动

年份	主要活动
1929 年	赴日本参加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会上遇见华南校长王世静
1931 年	在上海出席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
1933 年	第三次出席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7 月出席芝加哥世界妇女大会，随后到美国 33 个大中城市宣传中国基督教大学
1934 年	5 月，到华南和东南亚等地访问
1935 年	当选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副主席
1936 年	代表中国基督教协进会赴伦敦参加世界宣教大会
1937 年	联董秘书葛思德 (Garside) 请吴贻芳代美国基督教界邀请宋美龄访美，未果

除大量的社会活动，吴贻芳的主要工作是稳定金陵女大的教学工作，处理金陵女大办学中的问题，实现金陵管理层的顺利过渡。在这些问题中，有两个是比较棘手的。一是向国民政府立案；二是处理自己与前校长德本康夫人的关系。

立案是吴贻芳校长任上所作的第一项重要工作。为了立案，金

①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 年，205 页。

② 黄洁芬：《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神学部硕士论文，未刊稿，1996，134 页。



陵女大作了一些调整。如 1930 年将管理委员会 (Board of Control) 更名为董事会 (Board of Directors)<sup>①</sup>。1930 年 12 月,金陵女大完成了注册立案的工作 (具体的立案工作在本书第四章中有详细介绍)。立案后金陵女大管理委员会 (Board of Control) 更名为校董会 (Board of Director), 美国的金陵大学托事部金陵女大委员会 (Ginling Committee of Nanking University) 则更名为创立人委员会 (Board of Founders)。同时依据大学组织法,金陵女大正式称为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对立案问题持积极合作的态度。正如 1930 年 6 月,吴贻芳在 *Educational Review* 上撰文指出的:“我的态度是:必须遵行政府的规定。否则,我们的学校无法生存的。”“假如关闭学校,我们的孩子怎么办?他们只会受社会上非基督教宣传的影响。”相反,“假如孩子们在基督教学校受教育,即使没有讲授宗教,学校的气氛也足以鼓励其自由思考,健康成长”。她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教师。”“年轻的女教师必须理解教育,服膺基督爱和服务的精神。她们必须将全身心奉献给这些孩子。假如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女性,我们就能保持学校的基督教精神,这也是基督教学校的真正目的。”吴贻芳最后呼吁:“为了孩子,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尽可能开办学校。”<sup>②</sup>吴贻芳的这种态度对金陵女大立案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影响。

除了立案问题,如何妥善安排德本康夫人的工作也是个棘手问题。前文已经介绍过,德本康夫人在 1927 年推举吴贻芳任校长之后,仍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没有交出校长职权。德本康夫人的这一举动惹来了不少非议。因此,金陵女大校方仍认为有必要对

---

① The letter from Wu Yi-Fang to Miss Hodge, (1934, Nov. 30), YDSL, UB Archives Box147, Folder2905.

② Wu I Fan, "A Possible Way Ahead for Our Christian Schools" *Educational Review*, Vol. 22 (1930. 6), pp. 362~363.

德本康夫人的职责作一明确规定。校董会规定，德本康夫人在金陵女大从事的有六项工作：

1. 根据课程委员会的安排，在宗教系教授一门或一门以上的课程。
2. 教授一门天文课，或更多的课程。
3. 促进金陵女大在海外的宣传，和在华的外国朋友保持联系，帮助解决学校的财务问题。
4. 和外国差会、朋友保持建设性的友好关系。
5. 担任新校长的西方顾问。
6. 担任大学建筑委员会委员。

显然，这六项规定希望明确德本康夫人的职责范围，确保吴贻芳校长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仍然保留着德本康夫人对大学发展的参与权。

德本康夫人支持对吴贻芳的工作。1928年，一位学生说：“有一次我记得德校长很恳切的代吴新校长祈祷。”<sup>①</sup> 不过，德本康夫人觉得吴贻芳经验不够成熟，自己应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1928年9月23日的一封信中，德本康夫人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个人的安排。我正准备帮助吴女士做各项调整。毕竟，她已离开中国五年多，在校政管理上没有经验。”<sup>②</sup> 1928年8月，德本康夫人致信美国托事部，对金陵女大的立案工作和学校管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办学宗旨的陈述问题上，德本康夫人批评有些人只想满足蔡元培这位无神论者的要求，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严重妥协。“蔡元培（时任国家大学院院长）要求的是宗教与教育完全分离。

---

① 施泽：《德校长‘无我’美德的面面观》，《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8年，25页。

② “Report of Ginling College” YDSL, UB Archives, Box147, Folder2896, p. 0645.

而我个人希望在办学宗旨中明确地表达学校的基督教目的。”当时，金陵大学、沪江大学立案时，用牺牲、服务等字眼代替基督教。她对此非常不满，声称：“我宁可删除所有相关字眼（按：基督教、牺牲、服务），只宣称我们要保持高水平的教育标准。这也好过用暧昧的字眼来表达基督教目的。牺牲、服务并不必然等同于基督教，这些词既可以描述上帝的国，也可以是共产主义的形容词”。<sup>①</sup> 德本康夫人的观点对金陵女大校方立案工作是有影响的。在办学宗旨的阐述中，金陵女大始终没有用“服务”、“牺牲”等字眼。

1929年，德本康夫人回美国休假。1930年9月回到中国，到金陵女大任教。1930年12月，金陵女大立案成功。同月2日的一封信中，德本康夫人说：“今天官方到校检查金陵女大的工作。这是我们立案工作的最后阶段。吴博士希望在这周内完成立案工作。”德本康夫人认为，立案工作之所以久拖未决是中国教育部门时常人事更迭，这令吴贻芳疲于应付。她本人对政府立案要求非常不满，“我讨厌做出任何妥协，也不喜欢被逼做那些原本可以选择做或不做的事。我很高兴看到立案工作可以结束”。但德本康夫人随即对立案对金陵女大造成的影响提出批评。她说：“立案后学校的行政出现极大变动。学校放弃了必须学生出席早祷会及以宗教为必修科的要求。每日晨会，只有30%的学生出席，而这学期早些时候还有50%的学生出席晨会。一年级学生出席率甚至不足20%。每次到礼堂看见空荡荡的座位，心情非常痛苦。学校的士气确实在下降。其实，每日灵修除了宗教价值外，还可以唤起全

---

① “The Letter from Thurston to Miss Bender” (1928, August, 16<sup>th</sup>), YD-SL, UB Archives, Box127, Folder 2630, p. 0996.

体师生的团队精神……”<sup>①</sup>

1931年3月的一份个人报告中，她谈到自己在为少数学生上宗教课，又带了一个研究《以斯拉记》的读经班。谈到自己与吴贻芳的关系时，德本康夫人说：“吴博士时常和我商量。我想，她会觉得和我讨论问题是有益的。就目前的我而言，我们间没有什么紧张关系，吴博士也是如此。我并无意指挥她或任何人，而是愿意以任何形式帮助她减轻工作负担”。<sup>②</sup>可惜，德本康夫人这种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1932年5月31日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您问我关于吴博士的情况——为什么她不给我更多的工作？她是否真的愿意我留在金陵？这些问题要花太多时间去回答，也会涉及这所有的人。不过，部分原因是缺乏想像力。相对年轻的中国领导人总要比他（或她）的前任更为专制——金陵女大也不例外。过去，大学的管理更为民主些。吴博士管得太多了。”“她在日常工作，甚至一些小事情上也要插手。她对其他中国人的信任程度也不如我。”“作为顾问，我还是希望得到特殊的对待。不过，有些问题是因为她思虑不周，组织计划欠缺经验造成的。而有些问题不过是中国人优越感的无意流露而已。中国人和我们一样有优越感。他们反对外国人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打碎了他们天生的优越感。留学生对传教士的态度也部分反映了这种自大心理。”“吴博士总爱用一种中国贵族式的眼光看待事物。她接受基督教才14年，还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来消除她在种族、文化上的旧偏见。”<sup>③</sup>

---

① “the Letter from Thurston” (1930. Dec. 3rd), YDSL, UB Archives, Box144, Folder2860, p. 1088.

② “the Letter from Thurston” (1931. Mar. 31), YDSL, UB Archives, Box144, Folder2860, p. 1112.

③ “the Letter from Thurston” (193255. May. 31), YDSL, UB Archives, Box144, Folder2861, p. 1176.



另外，德本康夫人对吴贻芳积极参加“新生活运动”也不太满意。“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开始推动的。这场运动要求国民生活讲求纪律，注意个人清洁，克己，还定出许多规则让人民遵守。“新生活运动”是以儒家“礼、义、廉、耻”为基础，改进道德生活，以达到“复兴”国家的目的。由于国民政府大力推广，这一运动很快遍及全国。1936年，宋美龄开始负责全国的新生活运动。对于这一运动，吴贻芳是支持的。1934年4月27日的一次周会上，“她讲及金陵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即衣食住行须整齐、朴素、简单、清洁，并务求合乎礼义廉耻，次言中国人民生活须军事化，即迅速而有纪律，末言吾人实行新生活，务求切实，以身作则，切忌唱高调”。<sup>①</sup>同年，金陵女大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参加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6月，金陵女大的校刊也刊载了《新生活运动之大检查》。1939年，金陵女大组织了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吴贻芳亲自出席首次会议。当时，吴贻芳之所以积极参加新生活运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她对新生活运动认识。她认为，基督教之义务是推翻旧有的传统，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若能将新生活运动强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理想相结合，落到生活的实处，将促进提升个人人格，改造中国社会。二是吴贻芳本人对国民党政权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抗战之前，她和宋氏三姐妹的关系都很好。1933年，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向金陵女大捐赠了一幢实验中学的新宿舍。1934年，蒋介石夫妇还参加金陵的毕业典礼。不过德本康夫人等西方教师对于新生活运动很不以为然。她们认为吴“花了大量时间去参与新生活运动的地区性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生活运动所缺乏的恰

---

① 黄洁芬：《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神学部硕士论文，未刊稿，1996，266页。

恰是生活。它的纲领仅仅涉及了生活的外在标志。除非其内在精神十分充实，否则人们是否穿好制服，扣好外衣上的纽扣，这些外在表现实在是无关紧要的”。<sup>①</sup>

对于德本康夫人的种种质疑，吴贻芳多次强调采取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她个人以学生尊重老师的心态对待德本康夫人，但在大学事务上只会以大学的需要来处理。吴贻芳对德本康夫人的工作也有过批评。吴贻芳的书信中也曾对德本康夫人的宗教教育科颇有微词。<sup>②</sup> 吴贻芳拒绝过德本康夫人的提案，如1937年德本康夫人多次致信吴贻芳，表示自己拟定了一个计划，要为学校的宿舍建设筹集资金。吴贻芳向托事部说：“为了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多次，也和大学许多资深教职员讨论过。大家认为，金陵更需要捐款，而不是建筑。”<sup>③</sup> 如前所述，早在1928年回国的途中，吴贻芳就对两人的关系表明了立场——她个人极愿与德本康夫人合作，“很自然，我将邀请她留在金陵。不仅是我不想作任何伤害她感情的事，而且我也需要她的帮助。但我也有最低限度的保留——我既然就任校长一职，这就要求我抛开个人感情，凡事从大学的利益出发。因此，在与教职员、校友和学生们商议之前，我无法作任何决定。当个人感情与大学利益发生冲突时，我怎么可能为了前者而置后者于不顾呢？”<sup>④</sup>

意见相左、观点差异，这是许多大学新、旧校长接任时都会遇到的问题。而吴贻芳、德本康夫人之间意见分歧，却反映着中

---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87页。

② 黄洁芬：《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神学部硕士论文，未刊稿，1996，51页。

③ “The Letter from Wu I-Fang to Miss Griest” (1937, May 27), YDSL, UB Archives, Box148, p. 0233.

④ “The Letter from Wu I-Fang to Miss Bender” (1928, May 28) YDSL, UB Archives, Box124, Folder2592, p. 1032~1034.



西文化在教育理解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位“诤友”变成了“挚友”。1983年，吴贻芳回顾德本康夫人的工作时说：“1928年她主动辞去校长职务后，将主要精力用于完成校舍建筑，如大礼堂、图书馆和女教师宿舍等，兼任教师，始终勤勤恳恳，不再插手校务。”<sup>①</sup>而德本康夫人、蔡路得在1954年合著的《金陵女子大学》中，对吴贻芳有这样的评价：“吴贻芳博士曾经担任金陵校长，并积极参与国内，国外其他组织的活动。凡是熟识吴博士的人都会意识到，金陵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在最为困难的年代富有能力的忠实的领导。金陵在全中国所获得的高度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人们对金陵校长的尊重的感情。她的兼顾各方的判断，她对于金陵在完全被战争打乱了正常生活时亦能找到继续其事业道路的坚定信念，她在制订新的必要的调整细节时所表现的耐心，是学校精神得以保存的基本因素。没有她的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毅力，很可能金陵在战争年代将做不出任何积极的贡献。”<sup>②</sup>

显然，吴贻芳和德本康夫人最终都对彼此的工作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而德本康夫人、蔡路德两人对吴贻芳在“战争年代”“最困难的时候”的治校工作评价尤高。这里的“战争年代”是指1937年之后爆发的中日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事实上，吴贻芳的治校能力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3. 战乱中办学（1937~1949）。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陵女大所在的南京地区是日寇的主要进攻方向。1937年8月15日，日军空袭南京城。由于正值暑假，许多学生纷纷来信询问女院是否会在秋季如期开学。经过讨论，吴贻芳等校领导决定，一方面允许学

---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113页。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157页。

生就近在公私立大学就读；另一方面，在上海、武昌、成都三个地点，分别与当地基督教大学（圣约翰、沪江、华中协和、华西协合等校）合作设立办学中心，让无法来校的金陵师生开课上学。随后，武昌、上海、成都等地的办学中心先后开办。最初，成都是规模最小的办学点，只有三位金陵女大学生在成都求学。后由于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美以美会华西会督黄安素等人极力劝说，金陵女大生物系黎富思教授当时恰巧在峨眉山休假，成都的办学中心才得以顺利开办。<sup>①</sup>

吴贻芳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呈文（1937年）说：“本院地处首都，又系女校，学生来源计有十余省市，今在此种情势下，各家长多数不愿送各生反京肄业；且集处此间，不但防空设备难求安全，即课业亦难静心学习。若为另觅安全地点，迁往教授，则校舍等又非咄嗟能办，故拟暂用分区教授办法，俾可各得便利。”“查本学院学生，现在聚集及最易集之地点，经统计结果，以上海、武昌二处为最。至于安全，莫如成都。兹除本学院仍在静候南京局势稍佳，能开学时即开学外，特就上列三处接洽合作，以维持学生毕业。”<sup>②</sup>当时，吴贻芳派遣蔡路得、克馥兰、黄丽明、谢文秋、胡惜苍教授到上海；张肖松、龙冠海、刘恩兰、陈钟凡等教授到武汉华中大学；成都方面由黎富思负责。

随着战局吃紧，南京金陵女大准备迁往内地。1937年12月1日上午9时许，吴贻芳离开南京金陵女大前往武昌。不久，南京沦陷。南京金陵女大由华群小姐领导的驻校维持委员会负责。1937年12月5日，吴贻芳和金陵女大到达武昌，1938年1月迁到成

---

① “The Letter for Wu I-Fang” (1937, Oct. 10), YDSL, UB Archives, Box148, Folder2911, p. 0351.

②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58页。



都。同月，武汉华中大学的办学点关闭，一起迁往成都。1938年3月，吴贻芳经香港回到上海。4月9日，金陵女大校董会在上海召开。在未到上海之前，吴贻芳原打算继续上海办学点的运作。但经过仔细考察，吴贻芳和校董们一致决定停办上海办学中心。<sup>①</sup>“上海的金女大学生以下列三种方式处理：一、随学校去成都；二、继续在上海借读；三、转到上海其他大学就读。结果有五名学生随六名教师前往成都；三十一名学生在上海其他教会大学借读，直至毕业；其余学生全部转入圣约翰大学。”<sup>②</sup>至此，金陵女大只剩下南京驻校维持委员会和内迁华西的金陵女大。南京驻校维持委员会由华群任主任，程瑞芳、陈斐然等人为委员，负责留守学校，保护设备。南京大屠杀期间，这个维持委员会管理下的金陵校园成为保护中国妇孺的避难所。

吴贻芳本人则负责华西金陵女大的领导工作。<sup>③</sup>金陵女大在迁往华西之初，她“曾认真考虑在华西地区找个半农村环境建校，试行一种使学生在战争环境中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的教学方案。可是，第一是在华西中小城镇中找不到适当校舍，又兼西迁后设备不足，不能独立办学；第二是课程若不按当时教育部颁布的执行，学生的学位将不为政府所承认。因此最后还是接受了华西大学的邀请，到成都华西坝办学”。<sup>④</sup>1938年9月起，金陵女大在成都招收新生。金陵女大的办学遇到很大困难。1942年5月25日吴

---

① “The Letter from Wu I-Fang to Mrs. Thurston” (1938, April 16), Box148, Folder 2912, p. 0442.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104页。

③ 在抗战爆发之初，吴贻芳曾致信司徒雷登，问及自己是否应该辞职，由美国传教士任校长，以便让南京的金陵校园保存下来。司徒雷登的回信中说：“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辞去现在的职务。”The Letter for Wu I-Fang, (1937, 12, 31) Box148, Folder2912, p. 0411.

④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105页。

贻芳给徐亦蓁的信说：“我们正面对两个严重问题，一是经济困难；二是与其他大学的合作。”<sup>①</sup>

经济困难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学生经济困难。根据金陵女大1941年向国民政府的报告：“有学生家长不愿甘作顺民，而避至后方，度其极艰苦之生活者，此种人本身之经济即乏来源，何况其子女，此实上不得给予称贷者。更有学生之父已歿，寡母在外，孤苦无依，讵能再负担其子女之费用？间有家长来自非战区后，已觅有工作，然所入甚微，而食指颇繁者，则遵钧部之规定，予以乙种膳贷。承钧部陆续汇下膳食垫款一万八千元，早经垫付膳食外，本校亦已付四千余元。”<sup>②</sup> 其次是办学经费短缺，虽然金陵女大在华西坝恢复正常教学工作后，教育部、四川省府即拨出补助费合计2万元。但大学经费一直相当困难。1942年，金陵女大的一份呈文指出：“最近两年物价日高，经费不敷，于是再由校董会在美国募捐临时费，以资弥补。至本年预算，差数为十九万余元，较前虽更巨，然认为可照前两年办法，在美募临时费弥补。不意本月八日太平洋战事爆发，美邦人士，当尽量用其财力，为本国计，此亦人之常情。以此本学院校董会在美国募捐，希望殊渺；即有必为数无几，至不敷之款，难于弥补，则已显然可见。”不仅如此，金陵女大向美国订购的许多教学设备也因为战争关系而被迫付出额外的费用。1942年，金陵女大向教育部申请“抢救费”，“值香港与仰光次第沦陷，影响殊巨。仰光危急时，本校在美所购之化学等系仪器，药品一批，抢救费即耗去四万元”。<sup>③</sup>

---

① “Excerpt from a Letter from Dr. Wu I-fang to Mrs. W. S. New” (May 25, 1942), YDSL, UB Archives, Box148, Folder2920, p. 0960.

② 转引自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70页。

③ 同上注，71页。



为解决经费上的困难，吴贻芳一面积极向政府、社会筹募款项，一面为学生提供工读机会，以解决经济困难。“金女大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让她们在课余或假期做些工作，如打字、管图书馆、收发信件、接电话、为体育课钢琴伴奏等，给予报酬。又设立奖学金，发救济物品或补助。学费也较前下降。”<sup>①</sup>在教学方面，金陵女大和同在华西坝的金陵大学、华中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以及燕京大学一部分开展合作，允许各校学生互相修读学分，充分利用教学资源。根据吴贻芳在1940年的报告，当年金陵女大与其他学校互相选修学分的情形如下<sup>②</sup>：

表 3-3 1940 年春季学期金陵女大与其他大学的交流

大学间交流	交流学生数	课程	学分数
金陵女大到金陵大学	38	23	162
金陵女大到华西大学	20	6	47
金陵大学到金陵女大	28	5	114
华西大学到金陵女大	12	4	40
华中大学到金陵女大	1	1	4

表 3-4 1940 年秋季学期金陵女大与其他大学的交流

大学间交流	交流学生数	课程	学分数
金陵女大到金陵大学	35	17	161
金陵女大到华西大学	64	21	277
金陵女大到齐鲁大学	2	2	7
金陵大学到金陵女大	23	7	57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105 页。

② “The Letter from Wu I-fang to Miss Hodge” (April 2, 1941),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918, p. 0817.

华西大学到金陵女大	17	3	53
齐鲁大学到金陵女大	5	3	15

从上述两表来看，当时金陵女大与金陵大学、华西大学的交流最为密切。应该说，校际交流弥补了金陵女大教学力量的不足，稳定了大学的发展。但是，吴贻芳对进一步校际交流是抱有戒心的，担心葛德基等人会趁此提出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进一步合作，甚至合并的计划。吴贻芳在给徐亦蓁的信中，也请她在美国方面留心这个问题。<sup>①</sup>

除了操劳校务外，吴贻芳积极为中国抗战服务。1937年8月1日，她应宋美龄之邀，参加“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Chinese Women's Association for Relief to the National Defenders）。吴是该会的执委会成员兼财务负责人。这个妇女组织为前线伤员准备绷带，负责医疗救护等工作。吴贻芳用了大量时间从事这项工作<sup>②</sup>。1938年，吴贻芳、王世静等人参加了宋美龄在庐山召开的妇女领袖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邓颖超、刘清扬、沈慧莲、刘蘅静、沈兹九、曹孟君、张蔼真等”，会上将原来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进行扩大改组，领导妇女工作，吴贻芳任该会的执行委员。另外，吴贻芳还担任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常务理事。1938年7月，吴贻芳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12月，吴贻芳代表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参加印度马德拉斯举行的国际基督教协进会。1941年3月1日，吴贻芳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会上，吴贻芳当选为五人主席团成员。1943年3月，“吴贻芳又

① “Excerpt from a letter from Dr. Wu I-fang to Mrs. W. S. New” (May 25, 1942), YDSL, UB Archives, Box148, Folder2920, p. 0960.

② “The Letter for Wu I-Fang” (1937, Oct. 30) YDSL, UB Archives, Box148, Folder2911.



参加了晏阳初、桂质廷、吴景超、李卓敏、陈源等人组成的‘六人教授团’，利用他们在国内外的声誉，去宣传敦促美国赶快开辟第二战场”。<sup>①</sup>在美国期间，吴贻芳除了参加访问团的集体活动外，还向美国基督教妇女界，大学界发表多次演讲。其间，吴贻芳还在宋子文的建议下，一度离团飞往英国访问。<sup>②</sup>1944年初，吴贻芳单独飞返中国，经昆明回到成都金陵女大。1945年，雅尔塔会议决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大会，国民政府派遣了以宋子文为团长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吴贻芳是中国代表团的唯一女性。4月25日，吴贻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吴贻芳访美再次引起美国社会各界的注意，获颁荣誉博士学位，发表演讲，参加典礼等活动接踵而来。同年，吴贻芳参加了联董方面举行的战后基督教大学发展计划讨论会。会议结束后，吴贻芳到纽约做手术，并在乡村疗养，12月，飞返上海<sup>③</sup>。

吴贻芳回到上海时，抗战已经结束。吴贻芳领导金陵女大开展返回南京校园，重新复课的繁重工作。当时，日军占领后的金陵女大校园一片残垣断壁，教学设备被劫掠一空。吴贻芳一面派人重修校舍，一面安排迁校工作。由于纽约托事部、校友会和张群等人的捐款支持，金陵女大的重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46年4月起，华西坝的金陵女大自行开始搬迁工作。搬迁工作分作三批：大部分师生从成都出发，北出陕西省，经秦岭、剑阁、宝鸡，转乘火车经徐州回到南京。一部分在8月份由水路出发，从重庆沿江南下；另有少数同学乘飞机直返南京。1946年9月，学校在南京陶谷旧址开学。“在从内地迁回来的大学中，金女大是复课最

---

① 《吴贻芳纪念集》，130页。

② “吴贻芳致王世杰信” (July. 1, 1943), YDSL, UB Archives, Box148, Folder2923, p. 1101.

③ 《吴贻芳纪念集》，130页。

早的。”其后，吴贻芳埋头处理金陵校务。国民党政府想任命其为教育部长，吴坚辞不就。1947年，更辞去基督教协进会副主席一职。为了保证金陵女大的经费收入，吴贻芳等人还联合发起了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募捐委员会。”通过她的努力，金陵女大在内战不息，经济崩溃的情况下，学生人数有了迅速增长，“1946年第一学期有332人。1948年超过480人。”<sup>①</sup>

4. 改造与结束。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已接近全面胜利，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同年12月8日，吴贻芳致美国托事部的一封信中，吴报告说：3/4的学生和许多教职员离开了南京，但是校方决定不迁校，并作好了在新政权领导下开学的准备。吴贻芳以教职员的名义列举了许多不应迁校的理由，例如：“南京失守，中国也没有其他地方安全”等。另外，她提出了在新政权领导下开学的四项条件：1. 宗教工作允许自愿参加；2. 共产党人不可以任命大学职员；3. 维持大学的教学自主权；4. 大学有权决定招收或开除学生。吴贻芳的这封信是希望稳住美国托事部，说服她们不作出迁校的决定，继续在新政权领导下支持金陵女大。<sup>②</sup>当时有人曾主张迁校台湾，吴贻芳坚决反对。<sup>③</sup>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25日，金陵女大停课一日，学生上街欢迎解放军入城。5月2日，刘伯承、陈毅接见了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和吴贻芳。吴贻芳说：“他们非常热情友好，询问解放军有没有干扰学校。在交谈中，有一点被特别提到：虽然他们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但这不涉及对华友好的美国人民。只要外国人不反对共产党政权，欢迎他们继续留在中国。”5月16日下午4

---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106页。

② “The Last Word From Ginling, Dated December 8, 1948” YDSL, UB Archives, Box149, Folder2931, p. 0406.

③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106页。

时，吴贻芳和其他大学的几十名学者教授应刘伯承（时任南京市军管会主席）邀请参加会议。会议是请这些学者对教育发展发表意见。刘伯承致开幕词，指出人民支持解放事业，今后的建设需要各类人才。吴贻芳在会上发了言：“一方面成人教育，初级教育要大量扩展，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建设需要技术人才，培养专门人才的大学教育也应继续开办。”此后，吴贻芳、陈裕光与有关当局交流办学意见。政府负责人告诉吴和陈，有人认为旧教育制度是反动政府一手策划的，应该立即废除。但政府认为这一教育制度沿用了20余年，多几个月也无妨。不过诸如总理纪念周、党义、军训、童子军和训导主任等必须立即废除<sup>①</sup>。大学内部，学生也要求吴贻芳为首的校方进行改革。解放战争胜利后，学生们的革命热情高涨，许多学生志愿参加解放军的政治文化工作。留在学校的学生也积极追求政治进步。金陵女大原定5月9日召开教职员会议，商讨教务改革。在5月8日晚，40名学生召开非正式会议。会上学生们提出许多要求，如废除训导办公室、废除英语综合考试、体育课更换运动服、新生体育课由每周四节改为两节、减少英文指定参考书等等。次日，大学执委会决定和学生自治会开会讨论学生的要求。5月29日，吴贻芳更收到学生们要求改革校务管理的请愿书，要求组成由学生、教职员、工友参加的校务管理委员会。她们并指责校方处理学生要求过于迟缓。吴贻芳理解学生的要求。她说：“我们看看外面的形势，就会很明白学生情绪不稳定的原因。很多学生和家里通讯断绝，她们担心家人的安全和自己的经济情况。解放军节节胜利，

---

<sup>①</sup> “Letter from Dr. Wu Yi-Fang to Dr. R. J. McMullen” (June 6, 1949), YDSL, UB Archives, Box149, Folder2932, p. 0415~0417.

吸引着许多年轻学生参加它的工作……”<sup>①</sup>9月，作为特邀代表，吴贻芳参加了中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她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1年1月，教育部召开基督教大学校长会议，决议接受人民政府的经费，改为公办。同年秋，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李方训任主任委员，吴贻芳任副主任委员。1952年夏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在金陵女大旧址上兴办南京师范学院，吴贻芳任副院长。后来，吴贻芳历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副省长、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省主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83年，她在学生协助下完成了《金女大四十年》，为金陵女大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1985年11月10日，吴贻芳病逝在南京。<sup>②</sup>

5. 吴贻芳思想评述。吴贻芳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传奇人物。她从一个晚清没落士绅家庭的遗孤，到民国基督教大学的校长，到人民共和国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从宋美龄家中的座上宾到中国共产党信任的爱国民主人士。她是个生物学家，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吴贻芳一生的思想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爱国民主人士的心路历程。早年，她和宋美龄合作推动新生活运动，负责战时妇女运动指导工作，参加过国民政府参政会。其间，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1943年赴美访问时，吴贻芳说，内战不可能爆发。物价飞涨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并没有太大影响。“考虑到共产党人的激进思想和教义，我个人认为，虽然现在年轻人非常不满中国的现况，但人民也不会接受共产党人的统

---

① “Letter from Dr. Wu Yi-Fang to Dr. R. J. McMullen” (June 6, 1949), YDSL, UB Archives, Box149, Folder2932, p. 0415~0417.

② 《吴贻芳纪念集》，134~137页。



治。”<sup>①</sup>但1944年吴贻芳归国不久，就在感慨国民党统治下民生凋敝，物价飞涨。1949年3月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时，吴贻芳在致联董负责人芳威廉的信中说：“我意识到，新政权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大多数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与中庸精神。但现在说这些似乎言之过早”。“在过去50年的革命、变革中，（国民党）政府在战后表现腐败无能，令人民感到失望。”<sup>②</sup>4月24日，人民军队解放南京城。初步接触中，吴贻芳对中国共产党人有了真正的了解。6月，她在致明思德的信中谈到自己对新政权的直观感受：“我被解放军领导人的风采深深感动，也欣赏他们肩负的伟大使命。士兵们纪律非常严明，不像旧军队那样扰民。”<sup>③</sup>此后，她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副省长等职，是中国民主党派的活跃分子。1973年，吴贻芳在《八十生辰感言》中说：“在我八十年的岁月中，经历着新、旧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1904年我12岁时，进了维新派创办的‘杭州女学校’，老师经常教导我们：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险，你们要用功读书，立志救国。”“1916年我抱着所谓‘读书救国’的愿望，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读书，并立志于所谓‘教育救国’。”“1928年，我回国，担任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目睹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我国继续遭受列强帝国主义的欺负和宰割，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的内心十分矛盾和痛苦。”“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全国人民经过短短23年的努力，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

---

① “Speech in United State” (1943, May), YDSL, UB Archives Box148, Folder2922, p. 1038.

② “The Letter from Wu I-Fang to William Fenn” (Mar 2, 1949), YDSL, UB Archives Box149, Folder2932, p. 0411.

③ “The Letter from Wu I-Fang to Dr. R. J. McMullen” (June 6, 1949) YDSL, UB Archives Box149, Folder2932, p. 0417.

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过去我所向往的所谓‘读书救国’、‘教育救国’不过是出于书呆子的幻想。”<sup>①</sup>

在个人操守、民族意识以及信仰三方面，吴贻芳从来没有过改变。

吴贻芳的家庭生活是非常不幸的。她自小失去父母双亲、哥哥、姐姐。妹妹吴贻荃又在1934年突然失踪。<sup>②</sup>面对苦难的人生，吴贻芳有着坚强的意志。她为人清清白白，严守个人道德操守。她时常向学生“讲一个关于莲子的谜语：‘象牙罐儿紫檀盖，里面生着一颗小白菜’”。谜底是莲心，一清二白。她以此教育学生要做正直的人。吴贻芳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如前文所述，德本康夫人曾在20世纪30年代批评吴有“中国人天生的优越感”。1943年，吴贻芳赴美访问。一次演讲会上，德本康夫人为吴贻芳做了一番介绍时，称吴“代表着东西方最优秀的文明”（represents the best in the East and the best in West）。但吴贻芳当场否认了这一点。她认为，自己虽然从东西方文化中学习了许多东西，但从来就是一个中国人。吴说：“在密歇根大学毕业离校前，教授的太太邀请我茶聚。那时，她问我：‘如果你回中国，难道不会觉得要作许多困难的调整，以适应中国文化吗？’我回答说：‘我打算回国，而且不需要作任何调整’。她说：‘可你已经美国化了，我把你当作我们一员，而不是陌生人或外国人’这令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任何改变。回到上海，牛夫人和我姨父

---

① 周培源等著：《中国知识分子近言录》，第二集，香港广宇出版社，1973年，24~29页。

② 吴贻荃也曾就读金陵女大，并赴美深造。但回国不久，就失踪了。当时，吴贻芳在国内外遍寻不获。这件事对吴贻芳打击非常大。邓裕志：《难忘的岁月》，《金陵女儿》，2000年，31页。



一起迎接我。我住在姨父家。半小时后，姨父告诉我：‘你从头到脚都没有改变’。”<sup>①</sup>

吴贻芳是位基督徒。她在金陵女大学习期间选择了基督教信仰。1935年，她当任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多次参加国际性的宣教会议。1961年，任中国基督教第二次全国会议副主席，连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晚年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吴贻芳的基督教信仰属于自由派——信仰是生活的意义、道德的凭据，强调社会福音。据她身边的朋友介绍，吴贻芳之所以信仰基督教，有两个原因。一是受金陵女大师生，尤其是同班同学徐亦蓁的影响。徐亦蓁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看到刚入学的吴贻芳还未摆脱家庭不幸造成的阴影，消极悲观，就时常关心开导吴。而吴本人也发现“金陵女大的基督徒师生有着为人服务的精神，基督徒同学们总在谈论着将来要为国家做贡献”；二是吴贻芳对科学和宗教信仰的理解有了改变。“自从吴进入苏州景海女校后，她视科学为当代世界唯一的真理，认为宗教是迷信，要废除所有的宗教。在金陵，通过对天文学、生物学的学习，她意识到宇宙的神奇，科学的局限，相信在这些自然规律之上一定有个更高的规律。”<sup>②</sup>她在30年代曾有一个比喻：“譬如电灯，诸凡机器电线电泡一切设施咸备，若没有发电机以为原动力，就不能发光。”<sup>③</sup>在她心目中，基督教信仰就是社会生活、科学创造的“原动力”。1943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Cleveland的一次妇女会议上，吴贻芳发表一篇题为《基督

---

① Speech by Dr. Wu Yi-Fang at the Ginling Luncheon, (May7, 1943) YDSL, Box148, Folder2922, p. 1044.

② “Founders’ Day Program, November 1955~Boston Chapter Dedicated to Wu Yi~Fang”, YDSL, UB Archives Box154, Folder957, p. 0138~0139.

③ 吴贻芳：《基督教教育之特殊贡献》，《基督教教育季刊》卷6、第2期，1930年6月，9~10页。

教与世界秩序》的演讲。演讲中，吴贻芳较为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伴随着各种发达的科技，当今社会在迅速进步。但这些进步的目的何在？假如人类的能力和成就不是为生活的道德诉求，这些进步只会导致更多的混乱。除了建立正确的人神关系，我们应该考虑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基督教组织的社会服务，基督宗教在中国显示了社会的福音/social gospel。”“这真正表现了基督的爱。”<sup>①</sup> 因此，吴贻芳参与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她和王世静都在吴耀宗发起的三自宣言上签字。她相信，社会主义从社会制度的层面真正实现了服务人群、提高道德的目标。建国后，石西民（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曾询问吴贻芳信仰基督教原因，吴的回答是：“她一到礼拜堂里，参加一些活动，觉得感情有所寄托，道德精神也高尚起来，渐渐地也就成了习惯，这与迷信无关。”<sup>②</sup>

正如王奇生所说：“在吴贻芳 93 年的人生长河中，金女大是她奉献最多，成就最著，也是意义最大的事业。”<sup>③</sup> 本书的描述也着重于吴贻芳在金陵女大的教育工作。吴贻芳的办学经验、教育思想是本书想要探究的中心问题。在 1930 年 6 月一篇文章中，吴贻芳就对自己的治校政策作了很详细的阐述。这篇文章<sup>④</sup> 中，吴贻芳对教育提出三点看法。第一、教育应注重个人。“学校的人数，无论多少，师生间能够多一层接触，便多一层谅解；所施的教育，也多一层成绩。”因此，“首当从事注意特殊的个人教育，对于学

---

① 吴贻芳：Christians and World Order YDSL, UB Archives Box124, Folder2704, p. 0092.

② 石西民：《悼念吴贻芳女士》，《吴贻芳纪念集》，141~142 页。

③ 王奇生：《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吴梓民编著：《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年，192 页。

④ 吴贻芳：《基督教教育之特殊贡献》，《基督教教育季刊》卷 6、第 2 期，1930 年 6 月，9~10 页。



生的训育和化导，一个一个要特别的注意；要知道今后的基督教教育，是重在质而不在量的，每一人有一人的价值和性格，我们应视其人而‘因材施教’。”第二，发展全人教育。要“慎选教员”。“有许多人，对于‘公德’、‘私德’虽很明了，但对于自己事功，每忽视而不知慎重，故不能立身立德；甚或貌为旷达，不检细行。如吕端之‘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一辈，实是大错！要知习惯贵在‘慎之于微’，而学校尤当注重慎微的陶冶，方能使整个的人生”“因为要使学生人格完全与否，是全在教职员平时所予以耳濡目染的模范之良否啊。所以基督教教育，目下所应特殊注重的，确非单独注意于课本上的授受，是在司教职者能在他的整个生活中时时表现基督的真精神，以熏陶学子”第三，是要“启牖原动力”。这个原动力就是基督教信仰，这点与吴贻芳个人信仰有关。“许多幼稚和青年的人，都能自己辨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何为正路，何为斜路，但徒知而不能行，故必须有人先为之启迪，然后方能循序渐进的上去。”吴贻芳在文章末尾谈到：“做教师的第一须对于学生有真的兴趣；次对于功课有真的学问；而至至关重要的，便是品性温良，人格须高尚，方能为学子表率。”这些话也是对吴贻芳教育工作的真实评价。

### 三、本章小结

本章研究是从校长治校的角度回顾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的历史概貌。从本章德本康夫人、程吕底亚、卢爱德、吴贻芳、王世静五位校长的治校经历中，作者已大略勾勒出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的历史概貌。

德本康夫人、程吕底亚、卢爱德三人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女大学生。她们属于美国早期妇女知识分子群体。另一方面，三人又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海外传教是她们人生的追求。中国是她们的海外传教工作地。在中国传教过程中，三人都选择了女子高等教育工作。因此，三人是“教育传教士”。本书的第二章中已谈到，晚清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结果导致基督教女子大学的创立有两种模式。一是基督教女子教育直接发展成为基督教女子大学；二是由于中国本土女学的影响，基督教出于竞争的需要创立的基督教女子大学。前者属于自发的性质，而后者则有更多的规划。德本康夫人、程吕底亚不同的创校经过，就是两种创校模式差异的反映。但德本康夫人、程吕底亚对基督教教育性质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作为创校者，她们的工作为两校日后发展奠定下稳固的基础。三人之中，卢爱德是位值得注意的人物。她作为教育学家，从教育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基督教女子教育的现实状况。她在华南女大校长任上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为中国人执掌校政准备了一定的基础。

1928年后，金陵、华南的校长分别是吴贻芳和王世静。王世静与吴贻芳的个人经历颇有相似的地方。她们自幼出身在晚清仕宦之家。小时候，两人都曾在湖北武昌居住。幼年时两人经历过亲人离世的痛苦。1911年，王世静的父亲过世。而吴贻芳的母亲、兄长、姐姐都在1911年去世。她们俩人分别在金陵女大、华南女大学习时信仰基督教。20年代，两人赴美留学，同获巴勃奖学金资助，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王世静是化学硕士，吴贻芳是生物学博士。两人都是在外籍校长被迫辞职的时候，就任女子大学的校长。王世静、吴贻芳两位华人校长初掌校政期间都遇到过不少困难。王世静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争取立案，为大学生存发展奔波。除了尽快立案外，吴贻芳还要妥善处理与前校长德本

康夫人在校政方面的分歧。抗战时期，王世静、吴贻芳的治校能力有了更大的发挥。她们分别带领金陵女大、华南女大度过艰难的战争时期，不断充实、壮大学校的规模。全国解放后，王世静、吴贻芳都能够配合人民政府，顺利完成了新旧教育体制的更替。

因此，尽管创校模式不同，个人风格不一。但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的发展历史却是基本相似的。无论是传教士，抑或华人教育家，她们追求的都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理想。1928年，华南、金陵都经历了外籍校长向华人校长的权力移交。在金陵华人校长治校初期，前任外籍校长与华人校长之间在校务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反映了中西文化对教育不同的看法和张力。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而且，这种复杂性在两校社会角色变迁之中有更为突出的表现。

## 第四章

# 社会角色的演变：从校训诠释谈起

---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教育机构属于社会组织，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所谓社会角色，是指社会所制定的行为期望，指示个人或组织的行动<sup>①</sup>。社会角色与社会变迁理论息息相关。社会变迁理论认为，在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中，各个社会次系统都履行一个特定的社会功能，同时是自我指涉或自我再制系统，具有社会自主性。故而，社会情境是一多元脉络（polycontextuality）的整合（integration）<sup>②</sup>，任何次系统存在之必要条件是功能系统之间的互动（interaction）<sup>③</sup>和沟通（communication）。在互动、沟通中，社会群体、组织不断建立、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根据这样的理解，社会变迁的过程必然要伴随着社会角色的转化。在转化过程中，互动沟通、身份认同是实现社会角色的重要因素。

- 
- ① 社会角色（Social role）：指一组社会所指定的行为期望，指示个人（社会机构）如何行动。角色可以说是社会互动的剧本。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行为期望。参蔡文辉：《社会学》，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10页。
- ② 参张嘉尹：《多元脉络的观察与社会一体的想象——一个系统理论的观点》，《思与言》，第38卷第3期，2000年9月，45~74页。
- ③ 互动（interaction）：在社会规范约束下的交互反应往来。参蔡文辉：《社会学》，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19页。



作为社会组织，华南女大、金陵女大有自身的理想和追求，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但她们的社会角色离不开社会整体环境。纵向来看，两所女子大学都经历过剧烈的社会变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横向来看，华南女大、金陵女大地处中国不同地区。金陵女大地处近代中国文化的腹地——江苏、上海地区。华南女大所在的福建，在民国时期只是个地处中国边缘的沿海省份。两地的近代化进程各不相同，政治经济环境差异明显。因此，纵向分析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社会角色变迁，横向比较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社会角色的差异，将能帮助我们 从社会层面深入理解近代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华南女大、金陵女大的社会角色怎样变化，社会外部环境与学校身份认同之间如何互动、沟通，等等。

上述问题可以校训的诠释说起。在高等教育史研究中，校训历来为人所轻视。但对办学者而言，校训是学校办学宗旨的具体表述；对于学生来说，校训也是母校精神的象征，留给她们最难忘的记忆。在华南女大、金陵女大，校训的诠释是随着地区、时间的不同而发生争论和变化的。校训的争论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她们在服务社会抑或服务教会之间的互动选择。<sup>①</sup>

---

① 校训变化是基督教女子大学与社会变迁之间互动沟通、身份认同的表现之一。本文只是以其为引子，带出华南女大、金陵女大在教会和社会之间不断调适的办学历程。对于校训的解释，事实上始终未曾完全统一。况且事物发展进展总是相互交叉，夹杂在一起，不能截然分开的。本章的时期划分，只具有研究上的相对意义。

## 一、“受当施”：华南女大社会角色的演变

华南女大的校训是“受当施”。“受当施”源自《圣经·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sup>①</sup>最初，华南女大根据美以美女布道会的会训(Saved for Service)确立了“受当施”<sup>②</sup>的校训。1928年，华南女大又依据“受当施”的精神，订定自己的中文校歌，词云：“藤山之脊，闽江之涓；宏开学府，树立坤维；地灵人杰，蔚成女师；猗欤我华南，丕显丕基。女宗明镜，人文新曦；成己成物，不激不随；服膺弗失，曰受当施；懿哉我华南，令则令仪。甄陶多士，允赖先知；吾道其南，斯文在兹；緬彼漆室，辅世匡时；渊乎我华南，有守有为。”华南女大教授王孝泉在介绍校歌时指明：校歌中“受当施”是华南女大的“特别校训，最应该时时存在心里，不要丢掉的”。<sup>③</sup>1947年，长期参与华南女大管理的陈淑圭回忆说：“‘Saved to Serve’是华南的老校训(the old motto)。听来似乎不太进取，但它却是华南初创的基础和蓝图。”陈并指出：“有人反对这个校训，

---

① “In all this I have given you an example that by such work we must support the weak, remembering the words of the Lord Jesus, for he himself said,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NRSV) 联合圣经公会《新约圣经》(并排版), 香港: 圣经公会, 1997年, 402~403页。

② 华南校训“受当施”的英文名随着时代变化而有不同的版本, 如“Saved to Serve”, “Having Received, I ought to give”。

③ 王孝泉:《本学院校歌浅释》,《华南学院校刊——三十五周校庆纪念专号》,第12期,南平:华南学院,1942年5月,30页。王孝泉,字振先,华南女大第三任校长王世静的叔叔,时任学院文史系主任。



因为它代表着那曾被人误解的时期”<sup>①</sup>。从文献记录来看，1927年之前校训“受当施”多译为“Saved to Serve。”在20世纪30年代，华南女大校方更多地把校训“受当施”翻译成“Having received, I ought to give。”1949年后，华南女大又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办学目标。以下分三个时期讨论华南女大社会角色的变化。

### （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08~1927）

从1908年到1927年，这是华南女大发展的草创阶段，同时也是北洋军阀统治福建的时期。王世静说：“福建之有华南大学，可以说不由于当日环境的需要，而由于程前校长至诚的前知。”<sup>②</sup>所谓“至诚的前知”当然是溢美之词。实际上，这句话道出了民国初年华南女大早期办学的现实处境：“当日环境”（民国初年福建本地社会）无力建立起女子高等教育；福建首家大学——华南女大是以程氏为代表的美以美会推动而建立起来的。

清末民初，福建地方的社会经济基础并不足以支撑一所女子大学。当时福建主政者皆为各路军阀，社会政治经济混乱，人口持续负增长。“1912年到1921年间是负15.5%，1921至1931年是负19.93%。”<sup>③</sup>当时，福建各地土匪猖獗。直到1927年在各县清剿土匪，“各县之交通，始渐恢复，县城方面，始稍平静。县城之外，距离稍远的，治安便有问题”。<sup>④</sup>1927年福建省教育厅曾组织督学分别到44个县作全面的视察，事后编印《督学视察报告》一册，对福建省10余年来地方教育的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

① Carol Chen (陈淑圭), “Progressive Education in the Days of Old (Hwa Nan College, 1915~1918)”, *World Outlook* (November 1947), p. 483.

② 王世静：《永远刻着我的印象中》，《华南学院校刊——程前校长纪念专号》，1941年12月30日，南平：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7页。

③ 李国祁：《民国史论集》，台北：南天书局，1989年，92页。

④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342~343页。

报告指出：福建官办教育存在许多严重问题，经费支绌，开支不当……校舍不适用，设备甚简陋，卫生不讲究；教学内容陈旧，教法落后；人才缺乏，师资队伍不合格者居多数等。其中，女子教育尤其不受重视。“民国成立多年，女子教育仍然没有地位，男女生一般都不同校，女子入学的甚少。‘各县女子小学，多单独设立，每县只有一所’。至于女子中学，更是凤毛麟角。……至于社会教育，‘不过挂招牌而已，办理多是敷衍’，‘虚糜经费，尤算腐败’。”之所以如此，其因在于政治极度腐败。“教育之改善与政治之刷新，极有关系。各县教育受不良政治影响者，如土匪充斥、阻梗交通、校舍驻兵，妨碍进展。他如军队干涉校政，把持教育税收，诸如此类，何莫非政治不良有以致之？”<sup>①</sup>

与此相反，基督教会在福建省内势力庞大。该省教会是全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尽管人口总数不断减少，福建地区却是当时基督教徒占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省区<sup>②</sup>。1921年卢爱德在其教育学博士论文中亦指出：当时各省官办女子学校中，福建省居全国倒数第二位。而在教会女校方面，福建省居全国正数第二位。<sup>③</sup>在教会中小学女生人数上，福建排名全国第一，是山东省教会女生数的近一倍。<sup>④</sup>因此，教会女学在该省女子教育领域中占有绝对优势，构成了当地社会女子教育的主体。从教会角度来看，重视

---

① 同上注。

② 1920年福建每万人中有基督徒22.6人；高过第二位的广东省17.4人；比金陵女子大学所在的江苏省8.9人要高出许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084～1099页。

③ Lewis, L B,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 Introduction*, (The Ph. D Dissertation of Lewis at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1), pp. 39~40.

④ 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082页。



女子教育事业也是美以美女布道会的固有传统。这个以“Saved for Service”为会训的女布道会热衷兴办各类女子教育。在亚洲，该会最早的三所女子大学，分别是1881年在日本长崎(Nagasaki)成立的活水女子大学(Kwassui College，该校于1921年向日本政府注册)、1886年在印度Lucknow创立的Isabella Thoburn College、1886年5月在韩国汉城创立的梨花女子大学(Ewha College，现为世界最大女子大学)<sup>①</sup>。迄今为止，这3间女子大学仍然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女子大学。

华南女大是美以美女布道会在中国设立的女子大学。华南女大创立者的目标很明确：“施行基督教教育，乃是助人了解基督的最好方法，我们因即采取了19世纪基督教义的精华，设立了这个女子的高等教育机关。”<sup>②</sup>

由于华南女大并不建基于民初福建社会，而是教会发展、差会推动的产物。因此，“受当施”(Saved to Serve)体现了华南女大初期差会办学的特点——强调对教会的直接服务。这些教育传教士(Educational Missionary)以福建教育的领导者自居。1920年，美以美女布道会代表在参观福建古田县政府学校后声称：“我们自然盼望有朝一日，中国可以为她的人民提供教育，但我们也

---

① 印度和韩国的这两所美以美会女子学院都有招收中国美以美会女生，“Story of the Five Colleges”，*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31, January)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p. 22 ~ 25. 另参，Marjorie A. Dimmitt, *Isabella Thoburn College: A record from its Beginnings to its Diamond Jubilee*, 1961, World Outlook Press.

② 华惠德：《值得我们回忆的几椿事》，《华南学院校刊》(第十三期)，1942年5月，10页。

确实相信……政府将不得不向我们寻求教育方面的领导人材。”<sup>①</sup>

首先，华南女大校训“受当施”（Saved to Serve）本身就是世界美以美女布道会的口号“Saved for Service”的衍生。而且，“Saved to Serve”的主导权掌握在差会传教士手中。1927年前，传教士始终牢牢掌控着华南女大的主导权。美籍教师数亦超过中国籍教师（8：5）<sup>②</sup>。她们对中国文化，中国教育的理解明显有差会办学特点。1912年来校任教的康师姑（E. L. Clark）女士即是华南女大的一个典型。她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神学院。她“到中国是想认识探究中国的古老文明，但是在福州她没发现任何可以值得尊敬的文明，相反她本人与中国人接触时越来越挑剔苛求”。她们甚至在校园里升挂美国国旗，鸣枪示众。1916年“1月4号，康师姑早早起床，将国旗挂在松树的顶端。然后，和其他女传教士开了五枪左轮以示崇敬。传教士们觉得她们热爱国家及沙文主义是神圣而自然的”，“当时有许多中国人在旁边围观”，“康师姑没有意识到如此庆祝仪式非但不是一场爱国主义的宣传示范，反而使她们与当地的社会相疏离。”<sup>③</sup>另一方面，她们虽然致力于提高女权，但对中国男子不太以为然，甚至有优越感。康师姑称：“绝大部分华南男子的体型都比我小。”“在她的日记中，公开认为她可以打败中国男子。在一场网球比赛中，她和美国同伴把中国男生打得大败，她说：‘中国小伙子完全不是我的对手，他们懦弱瘦小。对任何小伙子所谓的男子气概，我都觉得可以轻蔑地将他们

---

① Graham, Gael Norma,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U. M. I Dissertation Service: A Bell & Howell Company, 1994, p. 186.

② “Hwa Nan Report” (1927) *Foochow Woman's Conference, 1919~1930*.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31.

③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84, pp. 149~150, 163~164.

击溃。’”<sup>①</sup> 在各科课程中，中国文化科目备受歧视。不仅国文科课本要学生自备，国文学和汉文论两科学分还是各科最低的，分别只有 1.5 和 1 个学分点。而其他科目全在 3 分以上，比如：英文 4 个分点，宗教教育学 4 个分点。由于华南女大实行选科制，这严重贬低了国文学、汉文论的地位。<sup>②</sup>

其次，华南女大直接服务于华南地区的教会发展。当时的美以美会传教士，兼福建省基督教教育协会秘书薛良善 (C. M, Lacy Sites)<sup>③</sup> 指出：“我们在此地是母国教会的代表和组织，那里的教会差遣我们到中国传布福音，其中一些人有着治病的恩赐，一些人有着布道的恩赐，一些人则有教学的恩赐……作为有着教学恩赐的传教人员，我们工作的目标可以用两个形容词和两个名词来描述：有智能的基督徒，有自我发展能力的教会。”“传教学校有两个基本目标：首先是发展有能力的基督徒，其次是为将来的教会培育精干的领导者。”他也承认：“在西方，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这些限制。将来，中国教会的基督教教育也可以向广阔的天地发展。但是现在，假如传教士不想有负本国教会对他们的信任，传教学校就须执守上述两个基本目标。”<sup>④</sup> 薛良善牧师虽然很清楚西方基督教教育早已突破了直接服务教会的限制，但仍然认定中国基督教教育有义务直接服务教会。原因很简单：中国基督教教育是西方差会支持的。

---

①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84), p. 205.

② 《华南女子大学章程》(1925 年)，转引自高时良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609 页。

③ 薛良善，一称薛来西，清末福建美以美会传教士薛承恩 (N. Sites) 的后人，出生于福州。在美国长大后，1906 年返回中国传教。

④ C. M. Lacy Sites,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Fukien”,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6, 1914)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p. 37.

薛氏的观点在来华教育传教士中是非常普遍的。闽中基督教教育协会副会长兰柏特(C. J. Lambert)<sup>①</sup>在一次演说中说：“我们教育工作的目标既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涉足于人们所谓中国‘教育’体系中。”<sup>②</sup>程吕底亚声称：“我们接受申请的范围越来越大，而且当我们高高兴兴地欢迎从各种官办学校、官家女儿和其他社会势力来的毕业生时，任何时候我们都这样恪守那主要的想法：训练基督教会的领导者。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的是：学院不过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链条的一环，从最小的日间学校，到中学学校，直到大学。我们将一致帮助华南的人们进入天国。”<sup>③</sup>华南女大招生时，在职牧师的女儿入学可以享受学费优惠。在课外活动中，此时华南女大最主要的社会服务是暑期圣经学校和主日学。“主日学成为华南教育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在大学周围农村，这类主日学至少有十来处。平均参加学生数在500至600人之间。”<sup>④</sup>到1927年，华南女大主日学发展到最高峰，有1000多学生参加华南女大主日学。1927年中国教育会总干事葛德基(E. H. Cressy)在比较各基督教大学特色时，指出华南女大的特点是：“毕业生大部分进入基督教会领域服务，38名毕业生里有34名基督徒；与福建教会工作的紧密联系；教职员及学生中弥漫着

---

① C. J. Lambert，又名蓝拔，朗彼息。福州陶淑女中校长；1922年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成员。

② Miss C. J. Lambert, "Opening Address of Vice-President", *The Education Review* (Vol. 9),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 Association), p. 345.

③ 高时良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599页。

④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222.



强烈的基督教氛围”。<sup>①</sup>

五四运动期间，华南女大学生参加了福建地区的示威活动。传教士虽不愿直接干涉学生活动，但随即告诫会内人士：“学会如何将自己的言行作为上帝的彰显（Study to show thyself approved unto God）应该是爱国女性对待这一问题的看法”。<sup>②</sup>

主持校政的程吕底亚更愿意强调基督教的普世性，对华南女大和中国世俗社会的联系不感兴趣。程吕底亚主理校政期间，校方“不喜欢女教师参加校外活动（如参加省会教职员联合会或加入省教育会）”<sup>③</sup>。在客观上，福建省教会教育在当地女子教育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学生学习和就业的机会大都依靠教会学校。而且，混乱的政局使得政府无力推广社会教育，监管教会教育，更谈不上引导教会学校参与社会服务。华南女大教育缺乏在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平衡。

当然，这并不代表1927年前的华南女大没有尝试改变直接服务教会的状态。第二任校长卢爱德治校期间，华南女大开始酝酿寻求在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平衡。卢爱德相信：“女子大学的目标当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为大学教育而大学教育’；而应该是‘大学教育为中国服务’。然后，使‘中国为建立上帝之国服务’。在这一代女学生培训积极服务的基督妇女应该是大学的使命。”<sup>④</sup>

---

① E. H.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28, p. 15.

② Katharine Lent Stevenson, “Methodist Women and Patriotism”,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18, May)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 154.

③ 郭肇民：《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史概述》，《福建文史资料》（第20辑），福州：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组，1988年，107页。

④ Ida B. Lewis, “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Educational Review* (Oct. 1917)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pp. 272~278.

这实际上是要要求教会教育机构直接为社会发展服务，以达到间接服务教会发展的目的。这一观点已有别于上述薛良善、程吕底亚等人的观点。如上一章所述，1926年卢爱德上任后，就开始实际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起用华人教职员担任领导职务，提倡教学和生活相结合，由公共卫生系在农村地区建立公共卫生模范家庭，为村民们作示范（参上章）。这些具前瞻性的理念和尝试为华南女大的转型成为可能。虽然卢爱德治校时间不足18个月，无法贯彻这些理念，但她对华南女大的规划为王世静、陈淑圭等人继承。在她们的领导下，华南女大转入在服务教会与服务社会之间构建平衡的阶段。

## （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

1. 从北伐到抗战。从1927年起，华南女大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女子运动蓬勃展开。1927年开始，国民政府主政。“南京颁行的《中华民国民法》，不再把妇女定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规定：已成年；满20周岁；或虽未成年而已结婚，并有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判断力及认识力，即具备完全行为能力。”<sup>①</sup> 妇女在法律上取得了职业的平等权。另一方面，福建政治社会发展渐上轨道，经济复苏，人口总数回复正增长。国民党主政时期的福建教育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盐捐提留）。“1936年，省教育经费达到最高数200万元，占全省支出经费总数的10.3%。这一年教育经费的分配数额为：高等教育经费占5%；中初等教育经费占70%；教育行政费占8%；教育预备费占2%；社会教育经费占15%。”<sup>②</sup> 但此时的政府教育仍然相当薄弱。教育当

---

① 何黎萍：《试论近代中国妇女争取职业及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历程》，《近代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第2期，232页。

②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377页。

局集中力量整顿的是中学教育和社会教育。从1936年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可看出：高等教育的政府投入是最低的。福建省所有的高等教育全为私立。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基本上无所作为，只是根据1929年到1931年间，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等法规对这些大学进行若干“整理”、“补助”和“评奖”。政府教育总体力量仍然薄弱，截至1934~1935年度，全省6年制中学中，教会中学就有3001所；而同时政府办中学只有1572所。由此可见，教会办学仍然是福建省教育的重要力量<sup>①</sup>。

政府对基督教学校采取既加以限制，又力图利用的政策。一方面，政府强制要求教会学校注册立案，取消宗教必修课，宗教活动自由参加。为加强思想统制，国民党在教育界强制实施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所有公私立学校均须加设党义课，总理纪念周等。另一方面，福建省政府也着力拉拢教会，利用基督教帮助发展地方教育。1932年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程时焯参加福建基督教教育会年会时，以《中国政府对基督教教育的期望》为题发表演讲。他呼吁教会学校尽速注册登记，认真遵守宗教教育有关规定。他一方面批评教会学校强调的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英文教学，说：“教会学校应更具灵活性。你们的学校不太愿意与时俱进。比如：你们应该在学校设立更多的工科、农科课程，而不仅是旧式的经院式课程——这只适合西方而不适合于中国；你们对英文强调太过。英文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它并不是学习的目标，更不是‘生活’。你们学校中有的老师虽然是中国人，却用英文和人沟通，实在荒谬。”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教会学

---

<sup>①</sup> George Warren Hinman, "Education in Fukien", *Chinese Recorder* (1936, July), p414~415.

校可以帮助政府发展教育：“教会学校应该尝试满足社会的特殊需要，比如女子教育，在这方面政府工作非常落后，最近福州举行的教师暑期培训，365位教师中只有55位是女性；民众教育，教广大民众掌握阅读能力，这种教育形式应该与你们的宣教工作相配合……”<sup>①</sup>

与此相应的，福建教会也在调整政策。中国基督教教育干事、华南女大宗教教育讲师罗黎晞承认：“教会学校最先只是福音工作的附属。但不久，教育开始成为主要目标，尽管传教目标不曾被抛弃。”<sup>②</sup> 教会教育政策改变的要点是，大规模退出小学教育；保留相当数量的教会中学；着力加强大学教育。<sup>③</sup>

大学教育是教会不肯放弃的重点领域。地方政府在高等专科以上的教育投入极少（教育经费的5%）。然而，据1931年统计，福建平均每百万人口中有大专学生261人，位居全国第一。<sup>④</sup> 这一成绩离不开教会系统在大学教育方面的努力。教会觉得仍然有能力保持对大学教育的控制权。“教会学校对国民党的介入，是有戒心的。教会人士对国民党的种种措施抱着敷衍塞责，阳奉阴违的

---

① Ruby Sia (谢绍英), “A Significant Gathering At Kuliang” *Educational Review* (1932) p. 107~108.

② Roxy Lefforge, “Som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Educational Review* (1934), p. 313.

③ 据谢绍英统计：1923年，福建省内有教会小学1000余间；而1931年只剩下400余间。(Ruby Sia, “Christian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Regime In Fukien”, *Educational Review* 1931, p. 94)。另据葛德基/Earl Herbert Cressy 1935年的统计，当时福建各类六年制中学比例分别为：政府1572间，基督教3001间，其他私立1982间。(Earl Herbert Cressy, “Christian Education in Fukien”, *Educational Review*, 1935, p. 256)

④ 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767页。



态度。”<sup>①</sup>当时的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说：“1932年我回闽时，本省的教会学校都已依照南京教育部的规定，经教育厅核准立了案。这些学校多在教学时间内上宗教课。以信教情况作为操行分数的标准，甚至瞒着教育厅，任意变更主要课程的时数。”<sup>②</sup>程时燧批评教会学校坚持的人文教育不适合中国，太过强调英文。教会教育人士就针锋相对地指出人文教育的必要性：“基督教教育，包括独立的宗教教育，必须是建基于保持人文价值的教育哲学。”<sup>③</sup>教会大学始终坚持以英语作为主要科目的教学语言，还要求当地教会与学校相互配合，推广基督教教育。“中心地区的基督教会应和基督教学学校相配合培育其会友的全面基督徒性格，养成国家信赖的基督教公民。”<sup>④</sup>

从上述事实来看，1927年后政府在教育上试图有所作为，加强对教会学校的监管；但福建教会凭借着大量的教育资源，极力保持办学的独立性。政教双方在教育方面处于磨合调整的关系中。

在新形势下，华南女大开始融入中国教育体制。在立案中，华南女大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课，宗教活动自由参加。华南女大改由王世静，陈淑圭为首的华人教职员工负责。校董会中三分二以上人员都必须是中国人的等等。而且，立案工作不仅是延续华南女大的办学生命，还是华南女大办学方面和教育当局互相磨合达成共识的过程。

---

① 赵山：《福建教会办学百年史略》《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8辑），福州：福建教育史志编写办公室，1992年，157页。

② 郑贞文：《在福建教育厅任职的回忆》，《福建文史资料》（第12辑），福州：福建教育史志编写办公室，1986年，31页。

③ Roxy Lefforge, “Som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Educational Review* (1934), pp. 313~318.

④ Roxy Lefforge, “Som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Educational Review* (1934), pp. 313~318.

(1) 立案促使王世静为首的华南女大校方认真反省教学宗旨和动机，调和基督教精神和教育规律之间的关系。1930年，华南女大在编写的各类立案材料中，以王世静为首的校方陈述了对大学教育的理解，作为对收回教育权运动和非基运动的响应。她们说：华南女大宗旨是“本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栽培中国女青年得受文学上、科学上、职业上之高等教育并养成牺牲服务之高尚人格”<sup>①</sup>。“华南学院是应着女子教育的需要而产生的。福建女子教育，虽不算是发达，然各县之中等以下的学校，颇为不少。如果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机关，以为她们毕业升学之预备，那么，女子教育的前途，岂不是要受了无形的阻碍吗？”“事实告诉我们说：女子的智能实在不让于男子。照他们目前进步的速率观察，女子教育的程度，显然有提高之必要。而且福建素称海滨邹鲁之邦，文化之盛，向来不让他省；而女子教育，岂独后人。所以华南学院的设立人，感到中国目前的需要，甘愿负起这重大的使命……于十几年前成立了这一个中国南方唯一的女子学院，要使福建的女子，人人都能够有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教育而教育，为养成女子最高的人格而教育，这应该是大家所公认的吧！”<sup>②</sup>

“近来国人对于教会学校往往带着黑色的眼光，作盲目的批评，动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口头禅相诟病；如果属实，我国人自然是应该要大声疾呼作鸣鼓而攻的奋斗。然如我们华南的教育，宗旨是何等纯正，态度是何等的光明……‘主义’‘文化’诚然是有的，而那里找得到‘帝国’和‘侵略’的痕迹呢？所可惜的，经济未充，校中种种的设备，还不能够有尽量发展，那不

---

① 《私立华南女子学院组织大纲》（第三条），1932年，福建省档案馆，39-1-6。

② 1930年华南集体编写：《华南女子学院概况》，福建省档案馆，39-1-30。

得不希望于国内外教育热心家作充分的赞助啊!”<sup>①</sup> 这些文字固然是为应付政府立案而作的申辩，也可视为华南女大校方的自我理解。它进一步确立对女大的教育理解和日后的发展路向。最明显的莫过于女大将所谓“为教育而教育”和“为养成女子最高的人格而教育”并行不悖地摆在一起。“为教育而教育”是向国家教育当局的宣示；至于“为养成女子最高的人格而教育”，因为华南女大校方实际上视基督教为最高的人格，故而此句亦可以解读为基督教而教育。显然，女大正在国家与教会之间寻找平衡。

(2) 政府立案也促进了华南女大的办学规范化。教育当局固然关心外国差会办学中的经费和传教等问题，如“该学院经费大部分系美国各教会拨给，此项经费有何保障？又该学院系宗教团体所设立，其每日举行之晨会，有无强迫学生参加情事？并仰转饬具报备查”<sup>②</sup>。更重要的是教育主管对办学标准的要求。除了经费标准外，政府方面对华南女大学科建设、权力架构等重要问题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例如：教育当局认为，（女大1932年的立案呈表）“分文、理、家政三科，文科设国学、哲学、英文、历史、教育、音乐六系，理科设生物、化学、数理、体育四系，家政科设家政一系，在校学生八十余人，其中除英文、教育、化学、生物四系外，其余各系现时均无学生”。“复查该学院经费不敷情形，已如上述，自应就原定科系，酌量裁减，以谋适合，所有文科尚无学生，各系及体育系暂行缓办，英文、教育、家政均改办附属专修科。”“又该学院学生一览表内，尚有医预科、普通科、卫生系等，该项科系，或经本部通令废止，或于大学规程中无规定，自应停办以符定章”。在女大权力架构方面，原先呈报的组织大纲将

① 1930年华南集体编写：《华南女子学院概况》，福建省档案馆，39-1-30。

② 《福建省教育厅训令第995号》，福建省档案馆，39-1-20。

最高权力赋予由福建美以美会传教士和教会人士占多数的校董会。教育部认为这与《私立学校规程》第12条(2):“关于学校行政由校董会,选任校长或院长完全负责,校董会不得直接参与之规定”相违背。因此,要求“第八条载:本学院之最高职权属于校董会,应删去”<sup>①</sup>。这一改动消减了校董会干预校政操作的空间,贯彻了校董会监督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而保证王世静在女大事务上的独立权利。1933年,王世静再次赴南京申请女大立案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教育部和华南女大方面最终敲定将华南女大原定的11系减为国文系、英文系、史地系、教育系和化学系、生物系、数学系等7个系加一个家事附修科。此后的发展证明:这样的系科设置适合女大办学理念,也符合女大的办学实际。

从上述两点来看,立案注册过程给以华南女大基督教女子教育调整和整顿的机会。而政府的要求固然有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限制(如收回教育主权,华人主校以及党化教育等),更有根据教育规律和社会需求作出的规定。所以立案工作实际上促进了华南女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在反省自己在中国的角色。卢爱德1930年致信葛惠良(Cartwright)说:“看看美国大学界、经济界已经没有什么基督教特色,我们就不应该为在中国的失败而感到奇怪。”<sup>②</sup>葛惠良的回信也认为:“我怀疑,是否我们将自己局限在建筑、学府和机构之中而令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未能彰显?”<sup>③</sup>但大部分传教士仍然视教育工作是中国传教运动的重要部分,“如果在

---

① 《福建省教育厅训令第995号》,福建省档案馆,39-1-20。

② Graham, Gael Norma,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U. M. I Dissertation Service; A Bell & Howell Company, 1994, pp. 439~440.

③ 同上注。



此领域失败，我们将全线溃败”<sup>①</sup>。女传教士对时代变化也不尽满意。会计部主任爱以利女士 (Reik) 1934 年说：“现在一切都变了。每年入学学生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缺乏优越感，越来越没有责任感。她们来学校只是因为父母要她们来读书。大部分人来自基督教家庭；她们生来就是基督徒。未曾经历信仰的挣扎，她们看来并不比美国年青人更珍视这一信仰。她们更像家庭中成长的普通孩子。现在更多的职业开始对女性开放——经商、医药、护士、社会工作，还有教育与家政。这些女生比较具野心，如果我不说她们过于自私的话。”<sup>②</sup>

然而，此时主校者已转入以王世静为首的华人基督徒手中。1931 年，华籍和美籍教师的比例是 10 : 7。华人基督徒掌握了学校的基本行政权力，华籍教师对基督教教育理解不同于之前的主校者，办学特点亦不尽相同。

1927 年，华南女大师生虽然没有参加福州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但她们有自己的看法。许引明说：“华南既是中国的，也是基督教的。我们不相信激进派学生所称中国应该用武力控制所有学校，我们彼此间应该合作。”“因为教育是中国统一的唯一希望。”<sup>③</sup>王世静也说：“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基督教会和学校在各地都受到激烈反对，人们坚信基督教是中国发展的障碍。但对我们来说，基督教才是中国的唯一希望，中国之解放牢记在有真实基督

---

① Graham, Gael Norma,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 A Bell & Howell Company, 1994, p. 411.

② Miss Elsie I. Reik, “Changes in College Girls”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34, June)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p. 231~232.

③ Grace Nies Fletcher, “Pioneer Women of New China”,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32, June)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 209.

精神的中国基督徒心中。在基督教机构中，基督的教导是改变人们心灵精神的力量……只有基督的爱才是中国唯一拯救。”<sup>①</sup>显然，华南女大华人师生是将基督教和教育视作救国的希望，试图将宗教、教育和救国结合，通过基督教精神更新中国。如何实现基督教信仰、高等教育和爱国热忱三者的结合？华南女大师生的回答是“服务”。

从学生的角度看，华南女大教育并不缺少爱国传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华南女大女生就组织医疗救护队，向革命军提供医疗服务。1919年全国爆发五四学生运动，华南女大女生甚至参加了游行队伍上街示威。华南女大学生更多的以社会服务形式参加各类爱国活动。这既是作为中国人的自觉，也是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1922年春，华南女大的学生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这次盛会上，她们带回了許多令人振奋的消息。整整一周，她们都在大学教堂的朝会上作报告。”<sup>②</sup>就在同年，学生决定在10月10日举办爱国教育日，到乡村地区宣传爱国道理，同时组织“爱国社”专职负责。在华南女大，爱国活动和宗教活动同样也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卢爱德说：“在国家纪念日中，校园里灯火通明；人们聚集起来聆听爱国歌曲。游行活动也是她们校园生活的部分。和本地学生一样，华南女孩子们举着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外国侵略’、‘民族万岁’等在

---

① Lucy C. Wang, “Hwa Nan College”,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31, July) Boston; Woman's For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 248.

②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29, Feb.)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 p222.

大街上游行。”<sup>①</sup> 华人女基督徒不仅珍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同样希望通过这一信仰的精神来达致中国妇女自由解放。因此，在为教会服务的同时，华南女大也强调为中国妇女运动的贡献。在与东南亚华侨的谈论中，王世静声称：“今日中国的女性可以和男性一起分享所有领域的职务。她并且坚信：华南女子大学作为中国南方唯一的一所专门女子大学，完全有责任在提升妇女界，特别是海外华人妇女的生活水准上作出贡献。”<sup>②</sup>

在华人校长的领导下，大学服务的内涵发生了转变。1932年，大学打破与社会不相往来的传统，允许教师余宝笙参加全省教师欢送教育厅长程时燿的大会，余并在大会上发言。教务长陈淑圭指出：“什么是所谓基督教学校的特点呢？”她认定：“基督教学校应该是一所充满爱心的学府。”<sup>③</sup> 她们着意于强调扩大大学的服务对象，强调为国家社会的世俗性服务。大学目标不再是“维系一间小型的基督教大学，以保持与福建地区基督教妇女需要的紧密持久联系”（卢爱德语，见上文），“而是一间在满足中国妇女需要方面不亚于任何机构的小型女子大学”。<sup>④</sup>（王世静语）

校方提出要“通过个人和服务以彰显”基督教精神<sup>⑤</sup>。爱以利尽管对立案带来的转变颇有微词，但她也承认：“我们的目的之一

---

① Ida Belle Lewis, "College Life at Hwa Nan",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28, Sep.)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307.

②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the South China*, p. 73.

③ *Ibids*, p. 49.

④ Lucy C. Wang "My Call",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1936 October) Shanghai;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⑤ Ida Belle Lewis, "College Life at Hwa Nan",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28, Sep.)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就是让这些女生有个全新的服务精神——努力让她们明白施予和服务不会妨碍她们的独立精神。有时我们很难回答她们什么地方应该放下自我，从事服务”。<sup>①</sup> 这里的服务不再只是指为教会宣教工作的服务，大学甚至尝试同教会的宣教服务工作保持一定距离。1929年，华南女大没有如往年那样在大学中为主日学儿童举行圣诞活动。王世静说：“今年大学主日学圣诞庆祝活动改在教堂内举行，因为我们觉得主日学工作应该以教会为中心。”<sup>②</sup> 大学内中国文化科目地位有了提高。从1930年开始，国文作为大学必修课，学分点与英文科相等，甚至更高。1936年大学根据政府要求，成立社会教育推广委员会。“一方面是为从事社会工作的职业妇女提供受训的机会；一方面则是拓宽本院基督教服务的领域。在其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要求社会规划和工作的建设性领导。作为一间以‘受当施’（Have received, I ought to give）为校训的基督教高等学府，华南建立这一科系（引者，指社会工作专业）是最适宜的。”<sup>③</sup>

正如本章开首时所引陈淑圭的回忆，“Saved to Serve”这个旧校训被人视为是“代表着那曾被人误解的时期”。“被人误解的时期”即是指立案前的大学。由于认为“Saved to Serve”的宗教色彩太过浓厚，王世静在1937年1月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的《华南女大专号》上，已不再称校训为“Saved to Serve”，而称

---

① Miss Elsie I. Reik, “Changes in College Girls”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34. June)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p. 231~232.

② Lucy C. Wang “Hwa Nan College and Middle School” *Foochow woman's conference, 1919~1930*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31, p. 53.

③ W. S. Bissonnette, “A Christian College Meets the National Crisis”,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1936 October) Shanghai: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 12.



为“Having received, I ought to give”。她补充说：“服务的范围扩大了。现如今我们的校友成为中国领袖的妻子和母亲，而她们自己也是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各界的领袖。”<sup>①</sup>1935年，华南女子大学奉省政府命令负责民众教育。华南女大被指定在附近几个村子中开展民众教育。1936年社教工作正式开始。负责人陈淑圭说：“因要扩大我们的服务范围，特增设一妇女服务部，其工作包括义务小学、少女半日学校、民众图书馆、家庭访问、妇女卫生指导，以及各种公开秩序。”<sup>②</sup>“受当施”英文译名的改变不单是词语上的变化，更可视作为华南女大教育从差会办学向中国基督教办学转型的象征。这一象征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在差会办学色彩减弱的同时，华南女大力图保持基督教特色；二、宗教服务从直接转向间接；服务对象逐渐扩大，社会服务成为华南女大办学的重要部分。华南女大华籍教师认为：为国家服务就是为教会服务（可以对照第一阶段传教士宣称：为教会服务才是为国家最好的服务）。

鲁珍晞曾说：“1927至1937这十年时间，不论对教会大学还是对国共两党来说都是一个转折时期，探索时期和彷徨时期。教会学校如果不想重复20年代的灾难的话，就必须以中国化和为中国服务作为自己的基本目标。”<sup>③</sup>此时，华南女大华籍教师开始酝酿为民众服务、成立社会服务推广部等措施作为自身中国化的论据。但此时的华南女大也没有实现教会和社会间的平衡。1933年

---

① Lucy Wang, “Hwa Nan Graduates”,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37, Feb.)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 45.

② 陈淑圭：《妇女服务部的宗旨与目标》，《华南学院校刊》，社教专号，半月刊，5页。

③ 鲁珍晞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297页。

罗黎晞著文说：“美国平信徒调查团调查报告的要点是，旧式的圣经妇女传道的日子正在过去。他们认为：在基督社区中家庭、妇孺中工作的应当掌握在受过更高深训练的现代女性。”<sup>①</sup>而且，立案固然使华人掌握了行政管理权，但依然无法处理华南女大财政权的交接。华南女大的财政权掌握在女传教士手中。美国差会直接将钱寄给华南女大的庶务主任，原先任教务长的华惠德（Miss Ethel Wallace）就改任庶务长一职。华南女大庶务长华惠德（Wallace）和会计爱以利（Reik）长期操纵华南女大财政大权，华南女大所有教师的薪水全由她发放。爱以利“把教会的美金津贴和学杂等费，统存于英商汇丰银行支票，由领款人自行前往支取现金”。<sup>②</sup>可以说，1928~1937年是华南女大试图在服务国家与服务教会之间寻找平衡的时期。华南女大华籍教师有了行政管理权，但是财政收入的控制权仍然握在传教士手中。

2. 从抗战到内战（1937~1949）。抗战期间，华南女大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1）教育被纳入战争体制。国难当头，教育成为战争动员的重要手段。1942年，教育部通令各学校实施社会教育计划。福建省教育厅发动“战时民众教育计划”。它要求所有公私立高等院校学生参加政府的民众战争动员活动，组织培训民训学生集中学习，在全省各地分期设立战时民众学校一万所（后称战时国民学校）。同时，战争动员打破福建教育集中沿海城市的旧格局，许多高等教育机构迁入闽西北内地山区。他们服务对象不得不从城市开始

---

① Roxy Lefforge, “Modern Evangelists at Work in Fukien”,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33. Dec)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② 郭肇民：《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概述》，《福建文史资料》（第20辑），福州：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组，1988年，105页。

向农村转移。

(2) 国民党政府借战时教育政策，试图加强教育管理，全面渗透各类教育机构。抗战期间，政府开始为高等院校学生统一发放补助费。1939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开始统一建立国民教育制度。1938年，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课程会议，会后公布文、理、法、农、工、商及师范学院的共同科目表。1938年9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行文华南女大，命令实行全国统一课程。1940年，政府又厘定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育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确定高等院校的师资标准等等。1943年，华南女大成立三民主义中央直属分团。王世静名义上任指导员，实际主事者是陈颐<sup>①</sup>。

(3) 由于战乱，外国差会势力从福建大幅退出。中国社会对华南女大的财政支持有了提升（参考第六章有关女大历年财政收支表）。战争令传教士放弃了财政管理权。华南女子大学到1944年全院只剩下华惠德一位女传教士在校任教；福建协和大学甚至连外籍教师都没有。华人教职员由此全面掌握大学的行政管理和财政事务。

(4) 教育部门发展迅速，师荒严重。福建省“在抗战期间，高等学校的数量也不因战争而减少，而是增加2倍之多，大学生数比战前增加了3倍多”。<sup>②</sup>战前，高等教育全属私立学校。但抗战期间，福建省政府先后成立音乐学院、医学院，甚至酝酿福建省立大学。官立学校开始在数量上居多数。随着教育的发展，各院

---

① 陈颐，字仰程。近代福建省中华基督教会会友。曾任教华南女大，福建协和大学及美国贝满大学。此人在政治上跟随国民党政权，历任福建省政府顾问、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考核委员、三青团中央监察、国大代表等。陈颐在华南女大任教时，是三民主义青年华南分团干事长。参陈颐《民国奇才交往录》。

②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553页。

校出现了严重的“师荒”问题。尤其是各地中学，根据檀仁梅 1942 年统计：“本省今后三年内中等学校师资的需要量最少在 300 人以上，而可能的来源每年只有 120 人，相差未免太多。”<sup>①</sup> 社会对教师，尤其是女教师的需求迫切。学者认为：“这时期的福建教育是福建近代发展历程中最好的一段时期，它使福建教育畸形发展的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发展了闽西、闽北的教育，培养了一些农村及抗战需要的人才。”<sup>②</sup>

抗战时期，华南女大内同样有宗教活动：“每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必举行早晨崇拜，巩固个人的信仰，增进团契的力量”，“每星期四，必举行教职员祈祷会一次以增进灵修”，“学生在青年会的，每星期开职员团契会一次”等<sup>③</sup>。师生共同组成的宗教生活委员会专门负责基督教活动。每天早晨半小时晨会也由学生、教师和校董轮流主领。“根据宗教生活委员会的提议，大学开设了特别的宗教讲座。每一学期大学都将延请客座讲员来校发表一系列与宗教题目有关的演讲。”<sup>④</sup> 来校演讲者有陈文渊、杨昌栋、江文汉等人。

由于战时的特殊情况，“宗教领域内的许多课程时常受限制”<sup>⑤</sup>。主日学活动不再是校外活动的中心。1941 年大学只有 6 间主日学，200 余位学生。与大学早期千余人的主日学相比，人数和规模已大为逊色。王世静说：“本院校训，是‘受当施’素抱基督

---

①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538 页。

② 郭少榕：《近代福建教育发展历程探略》，《教育史研究》，第 4 期，1999 年 12 月，90 页。

③ 《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迁校南平以后活动概况》，《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三号，22 页。

④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 p. 36.

⑤ 同上注。



教牺牲服务爱人如己的宗旨。况且国难当前，在前方的将士，浴血以卫国家。在后方的民众更应该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来拥护这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长期抗战”<sup>①</sup>。爱以利也认为：“基督徒在战争中要把其信仰放在一边。这是悲剧？是的！但却是实话。它更符合基督教的信仰而不能说只是民族主义。”<sup>②</sup> 战争环境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变化。

(1) 战争促使华南女大教育面向中国底层社会——内地农村。战时动员活动让华南女大师生接触到内地的农村生活。1938年，华南女大教师力玛丽（Miss Mary Lacy）视察永泰地区华南女大学生战时动员时，向美国差会报告“我无法告诉你们每件事，因为每天都有新的冒险；每个村庄都有令人激动的景象。我睡过桌面、床板、破床甚至地板，……假如你们看到我对着那些既感敬畏又觉滑稽的老大爷，高呼‘打倒日本，中国万岁’等口号并试图向他们说明时，肯定会错愕不已”，“一些大学女生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干活，但现在她们要到河边和其他农村妇女一道洗自己的衣服，或者到阴暗的茅屋里向母亲们展示如何卫生清洗茶具”。<sup>③</sup> 这场战时社教运动虽然时间甚短（三个月），但规模很大。华南女大学生“三支社教队中一支队伍的统计数字表明：她们共探访了7500个家庭，举行14场次话剧表演，观看者达16500人次，开办4个训练班，为100名妇女传授急救方法”。“对学生们来说，乡村生活的实际体验是课堂上学不到的……如果没有和乡村群众一起

---

① 《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迁校南平以后活动概况》，《教育杂志》（卷31），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22~23页。

② Elsie L. Reik, “Hwa Nan College-September 1937”,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Oct. 1937) Shanghai: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 10.

③ Elsie Reik: “Just a Letter”,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38, July)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生活，亲身观察，倾听她们的呼声，学生们还不会真切地意识到这些群众的需要。受农村贫困生活的触动，学生们热切地要求满足农村群众的需要或改良社会环境……‘我们的姐妹急需帮助’”。<sup>①</sup>内迁南平后，华南女大随即计划在南平城市内儿童举办服务工作。“然而自敌机轰炸后，每天都有大批城市居民逃到山村，因此为城市儿童的服务已不可能”，“遂决定把工作限定华南所在山区的儿童服务”。<sup>②</sup>战争拉近了华南女大和中国农村的距离。当华南学生的战时动员队快要离开农村时，“村民已不再怀疑学生，并用放鞭炮、送锦旗的传统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sup>③</sup>

(2) 现实处境使得华南女大服务社会的机会增加。1938年5月，宋美龄召集全国各党派妇女团体代表在庐山举行会议。邓颖超、吴贻芳等共54位妇女界领袖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福建区的代表，王世静、王世秀姐妹赴庐山开会。会上研讨战时妇女合作抗日工作，并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统一全国妇运。王世静回到福建后，即成立战时保育委员会（Child Welfare Bureau）福建分会（负责照顾战时孤儿，阵亡家属），王世静任会长<sup>④</sup>。1941年校长报告中说：“（今年）大学的另一项大事是我们社会推广妇女部的重新设立。这一领域的工作得到了人们的衷心支持。南平火柴厂的经理捐款2500元支持这一服务项目，因为其工厂的青年女工和工人子女可以得到这一中心的服务。”“去年报告中提到了

---

① *ibids.*

②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 p. 36.

③ *Ibids*, p. 79~80.

④ Wang Lucy, *Highlights of the Conference of China's Leading Women: Called by Madame Chiang Kai Shek at Kuling, May 20~25, 1938* Foochow: The Christian Herald Industrial Mission Press, 1938, p. 12.

政府要求我们在社会服务专业中开办课程，培训社会少女的师资。”王世静不无得意地说：“十余年前，政府主席根本不会向华南寻求帮助，培养领袖。但如今，全省上下都指望着我们为妇女工作培训领袖。”<sup>①</sup>华南女大“受当施”重点转移到社会服务。当时，社会推广妇女服务部是抗战时期华南女大社会服务的核心。1942年12月的院长报告写道：“我们现在于华南的山脚下已有栋规划甚佳，建筑良好的两层建筑作为社会服务中心。两位华南毕业生专门负责。中心为附近失学的妇女儿童全天开办课堂。所用简易课本主要由家政系，教育系同学编写。”中心有儿童营养茶室、婴儿健康检查、儿童健康促进社、母亲会、家庭妇女进修社、少女识字班、儿童主日学、贩童夜校。此外，还负责收留逃亡的婢女。“为那些暑天负重赶路，道经此地的妇女提供茶水。”<sup>②</sup>华南女大举办妇女服务不仅是要服务社会妇女，还要以此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陈叔圭提出：妇女服务部应该“设备各种服务活动，使每生至少能参加一种并对妇女民众至少能做一种切实的贡献；鼓励学生对于服务职业的研究；指导学生对于服务职业的选择；加强学生对服务人生的信仰，使从实地经验中认识服务的意义与价值”。<sup>③</sup>

(3) 在抗战期间，华南女大和教会、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华南女大迁离福州，离开福建教会的中心地带。战争也阻碍了差会、大学之间的联系。大学的中国本土色彩愈益浓厚。1944年，卫理公会教育部干事陈芝美辞去校董会主席，改由国民政府

---

① “Annual President’s Report” YDSL, UB Archives, Box176, Folder3198.

②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the South China*, p. 95.

③ 陈叔圭：《妇女服务部的宗旨与目标》，《华南学院校刊》，1943年3月15日，社教专号，南平：华南女大，6页。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担任。政府除了给予华南女大定期补助外，还为学生提供各类奖助学金。社会各界也开始在校内设立各项奖学金，如南平商人林弥钜。中国政府和社会在华南女大经费收入中开始占有重要比例。华南女大还重新订立了校庆时间。抗战前，“那时的校庆是在9月15日，据说本院最初由美国纽约省大学立案，准予取得学位权，正是9月那个时候；所以就定这一天为校庆纪念日。自1933年本院向教育部正式立案后，大家都觉得以9月15日为校庆，不能算是满意，抗战声起，本院迁来内地，风声鹤唳，数年不安定的生活，使人们不能有个很好的心绪来注意这件事体。直到本年大家都感到改定校庆的日子不能再迟延了……”<sup>①</sup>1942年，华南女大将校庆的日子定在5月1日（1904年的5月，程吕底亚在上海全国总会上提议建立华南女子大学）。

伴随上述具体实践的是华南女大服务理念新诠释。陈淑圭在30年代曾把“爱心”作为基督教学校特质，此时又提出：“服务”人群才是基督教学校的真正特质。“基督教学校的特殊任务即是培养服务的人生观，与实施崇真理、爱人群的教育。”<sup>②</sup>在她们的努力下，华南女大社会服务工作赢得社会前所未有的评价。“抗战时期，由陈淑圭主持的华南女大的社教推广委员会做了许多当时政府做不了的，或不屑去做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博得了社会的好评。当时驻南平、古田一带的八十师师长李良荣对华南女大的社教活动，很感兴趣，当他于抗战后担任福建省主席，组织福建省政府委员会时，陈淑圭被提名担任福建省政府委员，是国民

---

① 薇：《记本院三十五周年校庆》，《华南学院校刊》，1942年5月31日，3页。

② 陈淑圭：《妇女服务部的宗旨与目标》，《华南学院校刊》，1943年3月15日，社教专号，南平：华南女大出版委员会，5页。



党统治时期福建省政府唯一的女委员。”<sup>①</sup> 抗战期间华南女大的爱国活动也有突出的表现。战争期间，华南女大组织在校师生节衣缩食，每人平均认购十块银元的救国债券。按照福建省教育厅的要求，华南女大组织学生深入城镇农村，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此外还组织多种形式的募捐活动，义卖、上演话剧和举办音乐会等，把所得收入用于慰劳前线将士、救济难童及捐献“青年号”飞机等等。<sup>②</sup> 1941年福州第一次沦陷，日军向北进攻。李良荣率部在古田大湖地区抗击日军，但军粮接济不上。南平军勤处准备了20万块光饼，急需包装送往前线。为此，华南女大师生“全体出动参加，使一切制作特别加快，且每袋光饼里，附着一张本学院字条，给每个战士们鼓励”<sup>③</sup>。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福州市第一次沦陷时，留守福州华南校园的华惠德、余友健等人“组织难民收容所，准许妇孺老弱携带随身对象人所避难”<sup>④</sup>。1941年华南校园失火，这一难民收容计划中断。

总之，抗战爆发后差会对华南女大的影响急剧减弱，大学宗教教育和主日学活动等宣教活动虽然坚持进行着，但面向中国社会、面向内地农村的社会服务已成为华南女大教育工作的主要方向。从此，华南女大教育的中国化达到新的阶段。这一状态延续到国共内战期间。华南女大回迁福州后，基本上沿用了抗战时期的社会服务制度。

---

① 郭肇民：《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史概述》，《福建文史资料》（第20辑），福州：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组，1988年，103页。

② 《世纪之树——福建师范大学90年》，89页。

③ 《本学院收到大湖阵亡烈士周年纪念会函送‘大湖之战’二百册深抱不安与感谢》，《华南学院校刊》（第14期），1942年6月，6页。

④ 郭肇民：《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史概述》，《福建文史资料》（第20辑），1988年，108页。

### （三）人民政权下的新尝试（1949~1951）

1949年后中国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其标志是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纲领的核心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爱国民主分子。”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相适应，教育体制也必须作出根本调整。1949年12月，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又说：“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它提倡封建的、买办、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它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者服务。现在，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在中国宣告终结，中国旧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基本上被摧毁了。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sup>①</sup>。

当时，基督教教育界不少人对教会学校前途持悲观态度。福建基督教教育协会曾于1949年初举行最后一次年会。年会开过后，与会人员分别时说：“今后办学难，没有把握，听天由命而已”<sup>②</sup>。福建卫理公会此刻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福州卫理公会在1950年11月曾举行“临时年议会”。“这次会议由卫理公会华西会督陈文渊主持。参加这次大会有卫理公会八个教区的教区长……”<sup>③</sup>王世静作为学校代表也参加这次会议。大会上，卫理公会决定成立“革新促进会”<sup>④</sup>。但之后卫理公会的情形并不太妙。教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684页。

② 陈怀桢：《记福建基督教教育协会末届年会》，《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31页。

③ 陈怀桢：《琐忆建国以来福州基督教界活动情况简述》，《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3~14页。

④ 同上注。

堂、教牧人数减少<sup>①</sup>，1951年又因为隐瞒存款不报，福建卫理公会宗教教育委员会全部存款被没收充作三自革新的经费<sup>②</sup>。

1949年秋季，为准备开学，华南女大全院教职员开了一周的会议。会上“重新反省过去的办学动机及方法，对这些动机和方法在新政权下作重新的评价。讨论是自由的。坦率承认以往的错误将使大学可以放手解决日后的难题”。<sup>③</sup>话虽如此，学生们都在担心宗教和英文的发展前途。1949年后参加宗教活动的学生数大幅减少，只有20%（40余人）参加华南女大晨会、祈祷会等活动；英文系学生大部分转到其他系；学生毕业分配由政府统一处理。1950年的华南女大毕业生中大部分进入政府公安机关、东北民政部门和其他政府急需部门，分配到教会学校已是少数。

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教育系统，政府通过一系列部署改造华南女大基督教教育的性质。在校内发动进步学生进行思想斗争；在校外通过社会舆论进行宣传教育。这些措施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建设必要而正确的措施。不过，运动中也有些不和谐的声音。一些基督教学校负责人没有及时转变思想。1950年《华南学院校刊》的工作总结时也婉转地提到在“同学中有不用民主批评，如匿名批评之类，其中未必都批评得对，引起许多误会。”<sup>④</sup>华南女大校内的政治教育、唯物论学习对华南女大师生思想有很大的触

---

① 会友（包括慕道友）从6万人减少到3万6千余人；土改后礼拜堂从原来的312个减少到188个。参：《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关于整顿中华基督教会，卫理公会的请示报告》（宗基字176号）。

② 陈怀桢：《琐忆建国以来福州基督教界活动情况简述》，《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4页。

③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122.

④ 《本学院1949年秋季半年工作总结报告》，《华南学院校刊》（第十卷），第一期，1950年6月1日，2页。

动。有位学生在毕业论文中谈到：“许多革命者为为人民服务是比基督徒做得更彻底，为什么？做基督徒的是否不负责任？”“礼拜还是照常去做，但是常常坐在礼拜堂里听不进去，好像所讲的跟我的思想格格不相入。”<sup>①</sup>周苏藤<sup>②</sup>1970年代初在美国为“Midwest China Oral History Project”作口述调查时说：如果说教会学校犯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我恐怕这是个痛苦的事实。当我在校就读，甚至当上老师之后，我都没有意识到这点”，“在中国共产党几个星期的控诉之下，我逐渐认识到文化侵略的事实。作为传教士和差会熏陶下的产物，大部分人不自觉地成为美国文化、美国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崇拜者。大家都渴望着有机会到美国。换言之，我们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认为它高中国文化一等。当意识到这点时，我感到非常痛苦和羞愧”<sup>③</sup>。周苏藤虽然没有改变信仰，但她后来回忆这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时说：“这是第一次我须认真地自问，我的基督教信仰到底有多少价值？”<sup>④</sup>

建国后的主客观变化令华南女大重新解读自己的办学理念。她们一方面与旧政权分清界线，声称“本学院在解放前专门注重文理教育，与反对派政治设施相当隔膜”；一方面指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前，本学院是以为为人民服务的眼光办教育。自然和现在以政治来配合教育，教育须与政治联系有显著的不同”“本学院宗旨是本着‘牺牲’‘博爱’‘服务’的精神。校训是‘受当施’，所以平日都是以此自勉互勉，尤其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思想后，

---

① 张××：《宗教信仰改变过程的检讨》，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毕业论文，1950年，30页。

② 周苏藤，华南女大1934级校友。第四章会有对她的专门介绍。

③ Graham, Gael Norma,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U. M. 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 Bell & Howell Company, 1994), p. 448.

④ 周苏藤：《蒙爱岁月》，诗巫：砂拉越卫理福音书局，2000年，41页。



更不能不进一步来教己教人”<sup>①</sup>。华南女大还表示，“在新民主主义教育下，认为师生都能体会新时代的来临，必须团结一致，自我学习，向人民大众学习，学习以后，要为人民服务”<sup>②</sup>。这里华南女大的“为人民服务”指的是过去大学的社会服务工作。华南女大认为这类服务可以作为自己立足新社会的基础。“华南过去与现在，始终抱定以服务为目的，用各种不同方式来提高各阶层妇女的知识水准。”<sup>③</sup>她们认为在新政权下，“应该再次强调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以此来重新建立与新社会的关系。<sup>④</sup>大学教堂的牧师讲道时也对师生说：“我们现在要多做服务的工作，过去我们对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不够了，共产党比我们做得更彻底，我们若再不努力一定会跟不上时代。”<sup>⑤</sup>因此“自福州解放以来本学院社教服务部各种活动是逐渐增加，服务的地区也渐渐扩大了，服务对象也增加了不少”。<sup>⑥</sup>

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强调的是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牺牲”、“博爱”这类字眼不符合当时的阶级斗争路线。因此，建国初华南女大的“为人民服务”与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渴望政治进步的人们对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上的服务也不满意，正如一位学生所说的：“其实尽管你怎么努力，

---

① 《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教育概况》，1950年，福建省档案馆，39-1-97。

② 《本学院1949年秋季半年工作总结报告》《华南学院校刊》（第十卷），第一期，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出版委员会，1950年1月，2页。

③ 《本学院1949年秋季半年工作总结报告》，《华南学院校刊》（第十卷），第一期，1950年1月。

④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122.

⑤ 张××：《宗教信仰改变过程的检讨》，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毕业论文，1950年，30页。

⑥ 《社教部服务消息》，《华南学院校刊》，1950年10月，10页。

还不是那些慈善事业罢?! 对人民究竟有多大帮助? 还不是为了将来自己能得着赏赐!”<sup>①</sup>

## 二、“厚生”——金陵女大社会角色的变迁

金陵女大的校训是“厚生”。“厚生”一词源自《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的经文——“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厚生”的英文翻译是“abundant life”。这个校训正式出现的时间尚不可考。1919年，在金陵女大首届毕业生（吴贻芳等人）撰写的《先锋》（*The Pioneer*）一书中，学生谈到自己毕业后的目标时引用过《圣经》经文“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她们诠释这段经文时说，来到金陵是准备服务，获得奉献人群的能力，使中国受压迫的女性过上丰富的生活（enrich the stunted womanhood）。为此愿意贡献自己的一生<sup>②</sup>。但在这本小册子中，笔者没有发现“厚生”（abundant life）的字眼。1926年的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1926年12月）刊载了学生 Dzo Deh-Djen 一篇文章，题目是“*Our Ginling Motto*”。<sup>③</sup>在这篇文章中，这位学生说：“第一次听到‘厚生’校训是在德本康夫人的教堂演词中”。1928年，德本康夫人在其辞职演讲中说：“爱是金陵女大建校的基础。这种爱来自上帝的爱，通

---

① 张××：《宗教信仰改变过程的检讨》，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毕业论文，1950年，30页。

② The class of 1919, *The Pioneer*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9) p. 4.

③ Dzo Deh-Djen, “Our Ginling Motto”,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 (1926. 12) p. 10.

过耶稣基督得以彰显。它给所有人以丰盛的生命 (abundant life), 赐予知识丰富世界的生活, 赐给人们更高的智能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sup>①</sup> 德本康夫人认为:“厚生就是在各方面得到至善至美的发展。在多项发展中, 学生人格的塑造, 基督生命的培育最为重要。获取丰盛生命的学生才懂得给人类社会多作贡献。”<sup>②</sup> 吴贻芳任校长之后也对“厚生”校训作过解释。她的诠释与德本康夫人的诠释略有不同:“人生的目的, 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 而是要用自己的智能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 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 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sup>③</sup>

解放后, 金陵女大校友们对“厚生”的解释更多。1995年和2000年, 金陵女大编辑出版了两本《金陵女儿》, 校友们在书中畅论金陵女大的校园生活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经历。不少人谈到自己对“厚生”的解释, 现择其要者列表如下:

表 4-1 金陵校友对“厚生”的认识

姓名	入校时间	主要工作经历	对“厚生”的解释
邓裕志	1920年	女青年会全国总干事;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	“要用自己的智能和能力服务社会” <sup>④</sup>

① Mrs. Lawrence Thurston, “Address by the Retiring President”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 (1929. 1), p. 6.

② Wang Shuh-hi, “Our Mother’s Ideals and Aims, and My Appreciation of Her”,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 Vol. 10 (June 1928) p. 16.

③ 黄续汉:《我所敬重的老校长吴贻芳》, 载《中国妇女》1983年11月。

④ 邓裕志:《难忘的岁月》,《金陵女儿》,1995年,32页。

李明珍	1930年	苏州景海女中、上海中西女中、上海音乐学院等校的音乐教师	“要明确在校用功读书,学好本领,不是为了将来成名成家,追求名利,贪图自己的享受,而应当多考虑他人,放眼世界,为国家,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才能使我們的人生更有意义,更为丰富!” <sup>①</sup>
傅伍仪	1946年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	在解放后的革命工作中,“隐约感到革命者‘为人民服务’与女大的‘厚生精神’是一致的。后来查了辞海,‘厚生’的两字简言之是‘充裕人民的生活’,详细意思:‘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 <sup>②</sup>
刘光坤	不详	教育工作者,参加过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学生时代”“只知‘厚生’(abundant life)意思是指丰富、充裕的生活”“步入中老年后,我才逐渐加深对‘厚生’精神的理解,领悟出其内涵,那就是要超脱平凡的物质生活,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他人的事。” <sup>③</sup>

这些不同的理解显然是社会变迁在金陵女大校训诠释中留下的层层痕迹。虽然德本康夫人、吴贻芳和校友们都强调“厚生”校训是要求用自己所有的生命去造福人群,从而令自己的生命更丰富,颇有“立己立人”的意味。但是,“造福人群”、“丰富生命”的具体含义则有明显差异。德本康夫人的诠释侧重校训对基督教的意义,而吴贻芳强调服务社会、人群的价值。解放后,金陵女大校友继承吴贻芳的思想;加以发挥,提出“为人民服务”与“厚生”精神相一致的观点。这些变化有其时代背景。下文将详细

① 李明珍:《我的回忆》,金陵女大校友会编:《金陵女儿》,1995年,114页。

② 傅伍仪:《“厚生精神”与“为人民服务”》,《金陵女儿》,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大,2000,107页。

③ 刘光坤:《我对“厚生精神”的感悟》,《金陵女儿》,2000年,114页。



介绍金陵女大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关系，以丰富我们对金陵女大的理解。

(一)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1911年~1927年)。

金陵女大处于长江下游地区。近代行政区划为江苏、上海两地。两地是近代中国经济、文教的中心，也是外国基督教着力发展的地区。《中华归主》将江苏、上海两地归入同一省级行政区。据《中华归主》的统计：江苏和上海两地区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外国传教士；教会的发展略次于山东、广东、福建等省。教会高级小学学生数居全国首位，就职于基督教学校的中国教师人数则仅于福建省。<sup>①</sup> 据曾芳苗的研究，1905年前，江苏、上海两地先后建立的基督教女校有：

表 4-2 江苏、上海地区基督教女校设立表 (1905 年以前)<sup>②</sup>

学校名称	创立时间	地点	所属教会
裨文女学	1848	上海	
清心女中	1861	上海	长老会
圣玛利亚女书院	1881	上海	圣公会
镇江女学	1884	镇江	美以美会
明德女塾	1884	南京	长老会
汇文女校	1886	南京	美以美会
中西女塾	1892	上海	监理会
培珍女学堂	1897	南京	贵格会
晏摩氏女学	1897	上海	南浸信会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1》(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86~311页。

②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38页。

毓秀女学	1900	上海	圣公会
景海女学	1902	苏州	监理会
浸信女学	1905	扬州	南浸信会
慧灵女学堂	1905	苏州	南浸信会
道显女学堂	1907	苏州	圣公会
麦伦女学堂	1908	上海	伦敦会
苏州浸信女学	1905	苏州	南浸信会

从上表来看，近代江苏、上海地区的基督教女子教育也相当发达。在该地区兴办女学的差会数目要比福建地区为多。根据王树槐的统计，民国10年（1921年），在当地兴办女学的差会有：监理会、圣公会、北长老会、南长老会、基督会、贵格会、公理会、南浸信会、伦敦会、女青年会以及一些多宗派合办的女学。<sup>①</sup>但是，福建区域文化与江苏区域文化之间仍然有着重大的差别。江苏自古文风极盛。明清以降，这一地区是中央政府的经济命脉。赋税之重，甲于全国。江苏、上海地区有长江、京杭大运河、海口之利，交通贯穿全国的东西南北。陆上有津浦线，陇海线通过，交通便捷。这些是近代福建地区无法企及的。而金陵女大所在的南京城又分别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及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可以说，近代福建与近代江苏，上海地区的差异，是文化中心区与文化边缘区的区别。民国时期福建省的大学寥寥无几，但“自1889年算起，30年时间，南京城里就兴办了约20所大学”<sup>②</sup>。以女子教育为

①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4年，574页。

② 王桂芳等：《金陵文化概观》，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13页。

例，1910年间的两地女校分布情况如下：<sup>①</sup>。

表 4-3 1910 年福建和江苏、上海三地的女校分布表

地区	教会女校	政府女校	总计
福建	650	19	669
江苏、上海	244	263	507

从上表可以看出，福建省女子教育大部分掌握在教会的手中，政府女校数量少。江苏、上海的情况则不同。这一区域教会女校数目少于福建，但政府女校远多过福建。基督教女校在这一地区没有优势。自古以来，江南地区不仅男子读书多，女子读书亦较他省为多。虽然近代前中国没有女子学校，但富贵人家女儿也可在家庭中延师教导。“道光时，蔡殿齐编了《国朝闺阁诗抄》10卷，列举女诗人100名，其中江苏籍者占26名。”<sup>②</sup>江苏、上海两地是近代中国女学最发达的地区。近代江苏、苏州的兰陵女学、振华女学和无锡的竞志女学都是著名的女子教育机构。早在1907年，江苏实行留学生考试，“取女生去美国威尔士立女学，为我国官费女子留学西方之始”<sup>③</sup>。1912年江苏省设立教育司，由黄炎培任第一任司长。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对非教会女校的调查发现：全国非教会女校的女中学生共计3249人，江苏、上海两地排名第一，有女子中学9所，中学女生数953人；福建省只有女中1所，中学女生111人。<sup>④</sup>总之，金陵女大所在长江下游地区是近代全国交通、政治、经济 and 文教中心地区。基督教女子教育固然发展迅速，

① Lewis, L B,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 Introduction*, The Ph. D Dissertation of Lewis at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1, pp. 39~40.

②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257~269页。

③ 陈书禄主编：《江苏文化概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4页。

④ 俞庆棠：《晚清三十五年来（1897~1931）之中国教育》，190页。

但必须面对政府女子教育的巨大挑战。不过，民国初年南京城也是动荡不安的城市。由于南京城政治地位重要，是政治势力争夺的地方。民国初年，南京时常有“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通，火车装兵”的状况。北洋军阀对基督教办学基本上没有任何监管。金陵女大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创立的。从表4-3的比较中，我们发现，长江下游地区基督教女子教育并不占绝对优势。女传教士们虽然以基督教发展作为创建金陵女大的根本目标，但是也要考虑同地区中国本土女学的竞争。这一点在本书第3章德本康夫人创校过程中已经提到。因此，尽管早期金陵女大的基本办学思想和华南女大相似——强调为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服务，但是金陵女大的办学非常强调大学教育的中国特色；要求为中国社会各界培养信仰基督教的女性领袖。

金陵女大对中国文化较为重视。从课程设置来看，中国文化科目在金陵女大受到重视。1915年的金陵女大规定：文、理两科学生毕业前都必须修完20个学分的国文课程，英文课程16学分、宗教课程10个学分。单从学分配置来看，国文课程是学分要求最高的学科。国文科开设的课程有：中国语言、中国典籍、中国哲学、诗歌及古代文学、中国文学史、当代中文写作<sup>①</sup>。德本康夫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颇具好感。吴贻芳回忆说：“她十分赞赏绣花巷临时校址的月洞门、曲径回廊和房屋的形式，所以将永久校址建成中国传统形式。”<sup>②</sup>不过，德本康夫人的办学方针仍以服务基督教会发展为根本。她所谓的“中国文化特色”只是女子基督教教育形式上的中国化。以基督教为主要内容的宗教课程仍然是金陵

---

① Board of Control, "Bulletin of Ginling Nanking, China 1915" YDSL, UB Archives, Box128, Folder2632, p. 1076.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12页。



女大必修课。这些宗教课程虽然不是希望学生毕业后去直接传道，但也要求“给予高等教育妇女圣经背景知识，有助她们个人生命的成长，有事奉神的心志”。课程还强调“如何应用先知的信息在中国的社会里”。<sup>①</sup>金陵女大也曾开展主日学的工作。但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金陵女大儿童主日学从来就没有达到华南女大儿童主日学的人数和规模。和华南女大一样，服务社会与服务教会通常是同时进行的。1925年，《金陵女子大学校刊》上发表一篇题为《设立成年妇女学校》的文章。文章主张中国妇女运动除了“要求参政，要求财产继承权”之外，还应该设立“成年妇女学校”，让平民妇女也应接受教育，培养“家政、烹饪、园艺、生理卫生学、儿童教育法、心理学”。另一方面，作者又强调成年妇女学校“宜设圣经专修科”<sup>②</sup>。

培幼小学是这一时期金陵女大社会服务的典型例子。据1924年的《金陵女子大学校刊》记载：“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课余社会服务的事业，可以说是与本大学同时产生的。自从1915年秋，赁定复成桥李某房屋开学后，至今已近十载，而此十年之内，学生对于社会服务之事业，日见发达；其中要以培幼义务小学为最优。”“培幼小学成立于1917年2月。是时本大学仅设二班，同学共15人。先是1916年春，本校开山始祖共9人，热心服务。创设儿童主日学校。成效显著，继而察知邻近儿童多有无处受国民教育者，故于主日学校外又增设半日学校，德本康校长极力赞助，准借校内东花厅南面小厢房二间，作为课室，并帮同置备桌椅20份。凡国民小学应用图书等件，俱已略备。于是定期招生。”“因当时无

---

① 黄洁珍：《从吴贻芳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部哲学硕士论文，1998年，173页。

② 柳大鏗：《设立成人妇女学校》，《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5年6月，12页。

专任教员，只就 15 位同学中择一人为校长，总理一切，至于功课则由两级同学 15 人分别轮流担任。书籍等费亦概由同学供给。”1920 年“改半日学校为全日初等小学校。男女兼收，并聘请专任教员一人，总理一切。同学等仍尽力助理功课，及谋校务之进行。当时除各人量力捐资外，又开游艺会一次，募捐约 200 元，充教员薪金”“自 1921 年起，培幼小学之经费概由本大学女青年会承担”。<sup>①</sup> 1923 年，因金陵女大搬迁入新校址，培幼小学停办。1924 年 2 月，继续开办。同年，女青年会托金陵女大职员王某购得与大学相连的土地二亩，在暑假期间兴建了一座校舍。是年“9 月开学，陆续来校报名上课者：有 45 名（男生 18 名女生 27 名年龄 7 岁至 14 岁）。年级分一二三四。课程按新学制，学费每学期应缴一元，无力缴费者颇多。书籍等件由本校供给，聘请全日教员贾玉仙师母，另有同学助教数种课程……”<sup>②</sup> 很显然，金陵女大最初办理的是儿童主日学，后来才增设社会慈善性质的小学教育。社会服务的负责机构是金陵女大基督教女青年会。

和华南女大学生一样，金陵学生并没有忘记对国家的责任。1924 年“社会学系及青年会为改进附近农民生活，先建筑乐群社，然后建平民诊疗所”。平民诊疗所主要是协助附近居民减少疾病和传染病，而乐群社则以改进中国社会生活为宗旨。1925 年，金陵女大学生还成立了爱国团。爱国团成立纪事上说：“我校同学自五卅惨案以来，莫不痛心疾首而欲谋为亡羊补牢之策，顾今日学生所视为可以救国救民之要图不过游行演讲捐款等事，此数者大都激于一时义愤功效微末，且劳民伤财，父老疲于捐助而又司空见惯，或为血气之勇。甚且指为受党人驱使。譬之为洪水猛兽，我

---

① 裕生：《培幼小学之经过及现状》，《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4 年，31～34 页。另，黄洁芬认为培幼小学创建于 1924 年，显然与史实不符。

② 同上。

同学有鉴于此，屡思有所作为，为永远爱国救民之策。”金陵爱国团与1922年华南女大学生成立的“爱国社”相似，都以推广国货、平民教育等内容为主。爱国团由金陵女大学生会朱穆慈、蔡葵等人负责，下设国货调查部、平民教育部、制国歌部、管理阅报部。各部具体制订行动计划<sup>①</sup>。制国歌部曾作歌词两阙，其中《满江红》一阙云：

“荆棘纵横伤国事，壮怀激烈空相负。锦绣河山，几多豪杰。日色昏暗鸟哀鸣，白骨苦寒谁死节，看平原处处染腥红，英雄血！五九耻，犹未泄，五卅恨，何时灭。要外抗强权，内除国孽，胡骑遍地烟尘。情关家国兴亡切，是谁道巾帼不英雄，无高节！”<sup>②</sup>

尽管如此，但在1927年以前，校方的办学目标很清楚。治校者关心的是中国基督教发展。“本大学之所以建立，是为推进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培养合格的领袖人才；为基督教服务事业培养基督教女性；为促进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发展。”<sup>③</sup>真正的改变从1927年开始。

## （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1. 从北伐到抗战爆发(1927~1937)。1927年3月23日晚间，程潜指挥的国民党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军）进入南京城。3月24日清晨，“国民党士兵有组织地抢劫了英、美、日的领事馆，打伤了英国领事，在全城攻击和抢劫了英、美、日的领事馆”，“下午，3时30分，两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英国巡洋舰，向美孚煤油公司的住宅区周围发射了一阵组成屏障的炮弹，以掩护约50名外国人

---

① 《附爱国团成立纪事》：《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6年6月，22~24页。

② 同上注。

③ Board of Control, “Bulletin of Ginling Nanking, China 1915” YDSL, UB Archives, Box128, Folder2632, p.1076.

逃离。”<sup>①</sup> 史称“南京事件”。另据当年的《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的记载：“3月23日，老幼难民二三十人逃避本校，本校教职员同学自愿协助；3月24日，昨晚至今午，枪炮之声不绝于耳。本校同学仍镇静读书，晚团聚科学室，以便照应。教员等应保护治安之责；3月25日，南军人城，本校受军事影响，左右邻舍及昨晚难民，亦多来劫抢什物。幸有军官等来弹压，损失极少。”<sup>②</sup>

一篇署名“云英”的《国民革命声中之金女大》学生文章，生动地描述了政局动荡中的金陵女大。“国军23号入城，24号晨八时半停课，欢迎党军。因为本校的西教员多于是日下午离校。同学虽欲按部就班，亦不可得。因从此一变，当然有许多急宜解决的事，所以有两星期光景，过那聚会的生活。这种生涯，竟是‘一日三秋’。同学既不能一心求学，而家中‘促返’的电报又‘逐日而来’，所以人数一天一天的减少了，到了后来，留校的同学只有二十左右。况且那时对内对外事务繁多，二十余人精神虽好，到底感觉得‘独木难支’的苦。”不久，“有十余位同学就自动的去入了党。一切民众的运动，也无不竭力参加。亦有同学到党部做革命工作。一切遵照党里章程去做”。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城时，“党务机关渐多，每一机关多到校来接洽，要我们去做事。校中教员同学，从来没有政治关系，个个多是纯粹得不得了，不知党派为何物，对党部工作，我们认为应当做的，多愿服务。两星期后，真正的革命军到南京，于是先前的党部多被打倒，我们同学也有两个‘莫明其妙’地在打倒之列，幸得他们知道我们的底细，才算无事。那时，我们对党的知识很浅，刚刚兴高采烈干革命工作，忽受此打击，于是我们又莫明其妙起来，同时又有许

---

① 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697页。

② 《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7年12月。



多机关来接洽，叫我们去做事，我们不知到底那一个是真正的革命机关，于是由大会议决，用‘不合作’手段，关门自修”。当时，占领南京城第六军、第二军的政治部主任是李富春、林祖涵。“在3月24日夺取南京后，在两个政治部的领导下开始了成立总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惯常活动。”“4月1日，江苏省党部从上海搬到南京，它是一个左派集团。”这就是同学所说“先前的党部”。不久，蒋介石借故调走第二军、第六军，调嫡系第一军第一师进入南京城。4月9日，蒋介石到达南京，实施严格的戒严令。随即蒋介石发动了“一批武装流氓——雇用费每天4元——攻打和砸毁了国民党的省、市党部，捆绑了它们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省农民部和商人部的负责人，宣传部和妇女部的干事，书记处的职员”。这就是将“先前的党部”“打倒”的所谓“真正的革命军”<sup>①</sup>。

无论如何，这场政治乱局彻底改变了金陵女大与外界社会的关系。“革命军进城后一两天，就天天有数班人来参观。我们因为同学少，所以推定数人，不到外面，专在校中，陪人参观。”当时，参观的国民革命军对金陵女大的批评有两点：一、“我们庄丽的校舍害我们不浅，别人一见总以为住在里面的人，真是了不得，加我们以‘贵族式的女子’的头衔。经过他们的一番的参观，他们才知道实际上我们毫无贵族式的脾气”；二、“藏书楼中文书太少，同学中文程度低，实在我们早已想到这个问题，也在极力改善。幸亏他们天天来参观，来批评，于是我们那素不愿赞扬自己的舌头，也动了几动。于是在参观时，将我们的工人夜校、暑期平民学校、培幼学以及一切社会服务的事业皆一一详告。凡到校参观过的人，多惊异赞扬。同时也忠告我们，自己宣传，使外面不好空气消

---

<sup>①</sup> 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713页。

灭”。<sup>①</sup> 国民党右派清党之后，一些金陵女大女生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区党部，“也有同学担任市党部妇女部的秘书及干事”<sup>②</sup>。各种社会政治力量都希望金陵女大学生参加。年轻学生们热情高涨。她们说，新成立的市学联“也非常信任我们，无论什么事，若用选举法，本校终是列入的。凡来函要派代表的，我们多去，还有各党部或协会开会成立游艺大会，我们也参加演剧唱歌等。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所发起的农妇运动，我们的成绩最好，曾领第一名奖。这奖的一面党旗，中有‘实践厚生’四字”。<sup>③</sup>

随后的变化已是大势所趋。根据192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大学院颁布的《私立学校条例》规定：“凡私人或团体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私立学校须受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及指导”，“私立学校校长须以中国人充任”，“私立学校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私立学校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sup>④</sup>。1928年，吴贻芳就任新校长一职。国民党政府对这所中国最大的女子大学是比较重视的，希望通过金陵女大开展妇女运动。在吴贻芳的就职典礼上，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贺电，宋美龄也来校致词。宋美龄说：“对于民众，诸君须以先知先觉引导之；对于中国国民党，诸君须努力实行党纲；对于社会，诸君须以热忱牺牲之精神而服务。”<sup>⑤</sup>

为满足政府的要求，金陵女大作了多方面的变化。1927年，金陵校董会已有14位华人。吴贻芳接任德本康夫人的校长职务。1929年，金陵女大的年度报告说：“为了国际友谊，为了将基督教

---

① 云英：《国民革命中之金女大》，《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7年12月，36～39页。

② 同上注。

③ 同上注。

④ 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786页。

⑤ 何荣贞：《新校长就职纪事》，《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9年1月，64页。

的福音与中国人民分享，金陵女大得以建立并不断受到支持，借此希望东西方有一天能够彼此理解，为全世界的利益共同努力。”<sup>①</sup>很显然，这个办学宗旨的重点已不再是“基督教”。但是这样的办学宗旨是美国方面、中国政府都不满意的。一方面，金陵女大校董会，托事部都意识到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的必要性。她们希望在保持金陵女大基督教特质的前提下，完成政府立案工作。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教育部依据宗教、教育相分离的原则坚持要求金陵女大减少基督教性质。

具体而言，双方矛盾的焦点集中在金陵女大办学目标的阐述，处理宗教系存废等问题上。关于宗教系存废的问题，因为政府明确规定不能列宗教为必修科，学校也不能为任何宗教作宣传。金陵女大宗教系是在1926年成立的。吴贻芳任校长不久，就开始讨论宗教科归入选修科的问题。1928年10月17日，金陵女大执委会报告：如果保留宗教系，并且以宗教作为主修科，教育部将不会接受金陵女大注册。因此建议将哲学和宗教系合并为宗哲系。同月，校董会批准废止宗教系。1929年12月，吴贻芳的信件中更指出教育部要求宗教科目作为选修课直接并入哲学系，不能使用宗哲系的名称。吴贻芳说，只要宗教科可以作为学校的正规科目，划入那个学系并不重要。校董会支持吴贻芳的立场。1930年10月，校董会决定把宗教系改为哲学系。这个问题顺利解决。

较之宗教系的存废问题，如何在校章上描述金陵女大的办校目标是更为棘手的问题。1928年7月，金陵女大因立案注册问题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对中国人的爱国情绪表示理解，也承认中国政府的主权，但同时，校方希望保持学校基督化人格的办学宗旨。

---

<sup>①</sup> “Bulletin of Ginling College”, YDSL, UB Archives, Box128, Folder2633, p. 11.

雷川还指出：“宗教对人生是必要的。但它像我们日常的饮食，是不用写在纸上的。”朱经农则认为基督化人格（Christian Character）这个词也不必使用，因为在非基督徒的眼中，这个词并无异于传播基督教。最后，吴贻芳在信上说：“如果不立案，金陵女大也能办下去，但后果将是严重的。除了学校进口教学设备不能免税外，学生和毕业生也无法申请政府海外留学的奖学金，也不能在注册学校找到职位。尤其是金陵、沪江、东吴三所男女同校的大学已经立案成功，燕京、华中准备申请立案，金陵女大如若不及时立案，招生将会有极大困难。有几个学生团体查问为什么金陵女大要比其他学校需要更久的时间立案。”“在我看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现在申请立案以显示我们和教育部门合作的诚意，还是等到将来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申请立案？”<sup>①</sup>

这次，吴贻芳说服了金陵校董会和美国托事部。5月4日，校董会通过了新的办学宗旨。其中删去了“基督化人格”等字眼。但在办学宗旨的末尾，附上一句“以符合创校的五个基督教差会的原先目标”（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e five Christian Mission Boards which were its founders）。6月19日，金陵女大美国托事部批准了校董会提出的新版本。<sup>②</sup>但是，这个版本仍然没有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原因是办学宗旨末尾有“五个基督教差会”几个字。为此，吴贻芳再次在1930年10月间致信校董会，要求对办学宗旨再作修改，删去“五个基督教差会。”校董会和美国托事部同意吴贻芳的建议，删除了这几个字。办学宗旨

---

① “the letter from Wu I-Fang to Miss Bender” (1929. May 2) YDSL, UB Archives, Box 124, Folder2593.

② “Submitted For the Vote of the Ginling College Committee” (1929, June 19), YDSL UB Archives, RG11, Box124, Fodler2593, p. 1074.



变成“校董会在南京设立这所女子高等学院，旨在按最高的教育效率来促进社会福利及公民的崇高理想，培养高尚人格，以期符合创办人的宗旨”。这个办学宗旨最后获教育部批准。

与办学宗旨、课程设置的改变相对应，金陵女大对社会服务的态度更加积极。学生们“对贫苦大众，目不识丁的农民，邻舍的态度大大改变”。<sup>①</sup>每周都有同学去访问邻近居民，教导当地妇女编织。“1933年秋开办夜校课程给男生，另设下午班给女生。华群女士深感学生对中国的贫苦情况的关怀在这几年间激增，学生一向空谈爱国，直至此时才真正的把爱心实践在生活当中”。“1935年度至1936年度，学校筹款兴建邻舍中心，中心设有日校、小组交谊室、医疗健康中心，提供教育、宗教教育、职业训练、康乐活动给邻近的妇女。”<sup>②</sup>学生们有很强的使命感，她们说“中华民族衰落之四大病症；为愚贫私弱，如欲救亡图存，惟有去除愚昧，启发民智，施以文艺教育，以培养知识力，增加生产，提高生活程度，施以生计教育，以培养‘生产力’锻炼健全身体，减低死亡率，施以卫生教育，以培养健强力，除去自私心，促进民族精神团结，施以公民教育，以培养团结力”。<sup>③</sup>

2. 从抗战到内战（1937~1949）。七七事变之后，抗战爆发。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金陵女大选择了为国家、抗战服务的办学路线。“厚生”校训从此被赋予了新的意义。1937年10月29日，金陵女大校方向外地师生发出了一份电报：“我们民族的抗战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全体人员提出了挑战，要求她们积极地追求丰

---

① 黄洁珍：《从吴贻芳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部哲学硕士论文，1998年，156页。

② 黄洁珍：《从吴贻芳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部哲学硕士论文，1998年，157页。

③ 《乐群社民国二十四年秋季工作》，《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36年3月，11页。

富的生活，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sup>①</sup>不久，金陵女大被迫西迁，在四川成都华西坝复校。南京校园则由华群、程瑞芳、陈斐然、林弥励等人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负责留守。无论是南京的金陵维持委员会，抑或华西坝金陵女大，她们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当时，欧美国家尚未卷入战争。因此，一些留在南京的欧美国家侨民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救济委员会”，划定中山路以西、汉中路与陕西路之间、西康路以及从此路南端至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点一线为“安全区”。金陵女大校园就在安全区的偏西位置。安全区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宁海路5号。华群也加入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12月1日，安全区正式成立。1937年12月12、13日，南京陷落。华群为首的金陵女大南京校园维持委员会，开放校园，收容难民。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5月间，南京金陵女大成了保护中国妇女的避难所，不断有中国难民逃到金陵女大校园避难。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在城内奸淫杀掠，无恶不作。12月16日，华群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在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sup>②</sup>为了拯救难民，南京金陵校园维持会的成员们冒着危险，和日军周旋。在这场大屠杀中，华群为首的金陵校园维持会救下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孺。华群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说：“我不敢估计现在 we 有多少难民，有人认为大约1万人。科学楼

---

① 华群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25页。

② 华群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96~197页。

只开放了两个房间，一个大厅和一个阁楼，里面就住了1000人，因此，在艺术楼里一定有1200人，他们说，仅仅阁楼里面就住了1000人。在水泥路上，夜里一共有1000人。”<sup>①</sup>华群等人不仅要赶走来校园骚扰的日军士兵，还必须负责校园内难民的生活。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1938年6月，大部分难民离开金陵女大。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也结束了收留难民的工作。同年12月13日，国际救济委员会被正式解散。华群等人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金陵女大的教育事业。在金陵女大校园中，她们办起了家政科、实验科。家政科是“帮助难民掌握一定的技能，今后能自力更生。主要对象是30岁以下，稍有些知识的妇女”。<sup>②</sup>通过家政科，金陵女大为女难民寻找生产自救的出路。而“实验科是按照普通中学的要求办起来的，前来求学的不仅是南京本地青少年女生，还有来自九江、芜湖、江南、苏北各地的。走读生和住宿生最多时达206人。初一到高中都有。”在华群的邀请下，一些金陵女大校友冒着危险，回到南京帮助维持校园，开办教育课程。实验科教导主任是1929年毕业的金陵女大校友孙宝华。此外，南京驻校维持会还办了成人识字班、小学、幼儿园。这些教育活动为沦陷区的许多中国女性提供了一条在敌伪学校之外接受教育的机会。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占金陵女大校园。南京驻校维持会成员被逐出校园，直至1945年8月15日二战结束。

华西的金陵女大则是另一番景象。1938年4月16日，吴贻芳致信德本康夫人。信中说：“在离开南京后，我曾致信蔡路德，告诉她：我对金陵的教育有一些革命性的想法，尤其在这个危急的时刻。我发现成都、上海的一些同事都有同感。人总是要受到时

---

① 华群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207。

② 林弥励：《我参加过“留守校园”的工作》，《金陵女儿》，1995年，139页。

“仁寿距成都八十哩，服务处有工作人员四人，这里的发展良好，获得农村社区欢迎。她们亦帮助村民了解战事的发展，放映电影给村民欣赏。遇寒暑假时，有一部分学生前往参加工作，当地县政府也能予以协作。”金陵女大在仁寿县推广的活动有：识字运动；提供医疗治疗、适当营养、产妇卫生及公共卫生常识给当地农民；学生协助农村保存及推广旧式花样手工；着力提高妇女教育水准，关注学龄以下儿童教育之设备及家庭教育等。由于仁寿县离华西坝较远，交通困难，1943年，金陵女大将仁寿县的社会服务工作移交给当地教会，另选定离校20里的中和场作为社会服务工作中心。在中和场，金陵女大举办练习班，培养地方托儿所培养保育人才；成立妇女班，为邻近的妇女开设课程，教授国语、应用文、习字、记账、卫生常识、珠算等，还组织妇女在夏布上挑绣中国花样作茶巾台布用，寄到国外赚取外汇；暑假婴儿班，招收婴儿及至5岁的儿童，亦为婴儿班父母开设父母会，每周一次，专谈儿童培养和教育问题。其中，实验乡村托儿所设立于1942年秋，由四川省政府社会处与金陵女大合办，“四川省政府社会处并负担该所1943年至1944年，全年经费34000元”。

此外，城市服务处下属的儿童福利实验所也有政府的参与。当时“政府倡导儿童福利事业，需才甚殷”。金陵女大就在华西协合大学附近的小天竺街设立了儿童福利实验所。“这是一所完全服务于社会，造福儿童的机构，资金由金女大支付，主任及干事是金女大毕业生；并设立托儿所，设小学班，学生为失学儿童，邀请金女大学生授课。托儿所负责照顾40名2至5岁的孩童，减轻农村妇女的负担。”<sup>①</sup>据金陵女大说：“本校城市服务委员会，一为训

---

① “the Ginling college rural service station” (Shwen Hwa Cheng) (1947. Dec.), YDSL, UB Archives 159, Folder3008, page1204.



### （三）新政权、新尝试

早在抗战前夕，金陵女大已有少数倾向进步的学生。1936年，来自北京的周曼如同学组织读书会，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进步读物。<sup>①</sup>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在华西坝五所基督教大学中发展组织，加强宣传。在金陵女大，中国共产党设立了党支部，周曼如任党支部书记。在进步学生的倡导下，金陵女大参与发起了“华西坝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这个战时服务团，集中了基督教大学内思想进步的学生，开展各种社会服务、阅读进步书籍的活动。1940年6月，国民政府逮捕了部分参加战时服务团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的学生。周曼如等人转移到延安<sup>②</sup>。1947至1949年间，金陵女大内的党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参与了多次学生运动。据校友回忆：“1948年4月间，校园里不安地流传着国民党当局即将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的消息。吴贻芳校长出于对学生人身安全的考虑，召集了全校师生大会。她讲话要求学生不要过多过问政治，重要的是学好功课，国家大事由政治家去解决。”“坐在礼堂最后一排的一位同学一下子站了起来，大声顶了吴校长几句：‘校长今天讲得不对。校长平日常说要爱国，要有牺牲精神。现在政府只顾打内战，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中，我们能心安理得地闭门读书吗？’这样当面顶撞吴校长的事，在金女大是破天荒的。”<sup>③</sup>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同年6月，美国托事部方面的明思德(McMullen)致信吴贻芳：“美国所有人都愿意尽力支持中国基督教大学，但条件是这些大学必须有足够的宗教和学术自

---

① 张素芳：《回忆读书会、战地服务团，怀念取来火种的周曼如》，《金陵女儿》，1995年，165~170页。

② 沉谱：《难忘的岁月》，《金陵女儿》，1995年，170~171页。

③ 洪范：《高级建筑师——肖林》，《金陵女儿》，1995年，300页。

由。”解放初，人民政府也没有严格限制基督教大学接受外国的捐助，款项通过中国基督教大学组织（China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定期交给各间基督教大学。

1949至1950年间，金陵女大的办学基本正常。在政府指导下，金陵女大对校政作了部分的调整。1949年6月4日，华东区文教部与南京地区百余位大学教职员开会，会上列出有五件需立即废止的学校活动：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三民主义教育、军训、童子军、训导处。具体而言，金陵女大在课程设置、行政管理和宗教活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课程方面，金陵女大废除三民主义，加开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学校逐渐强调学习俄文，减低对英语的重视。至于宗教学科就不计学分，并且在其他学科的教学不得涉及宗教。”行政管理方面，学生、工友进入学校的决策圈。原学生事务主任蔡路德也把职务移交给中国人。1949年12月，新的学校委员会成立。会上决定，成立宿舍生活委员会取代学生事务工作，组织女青年队。至于宗教活动方面，吴贻芳说：“解放后，金女大校内的宗教活动没有随着停止，只不过采用了‘团契’形式，还想保存基督教的精神。那时期共三个团契，是自由参加的。参加者教师多于学生，每个团契人数最多时约二十人左右。”<sup>①</sup>

金陵女大努力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一方面，金陵校方并不愿放弃学校的基督教性质。吴贻芳在1951年1月仍然报告说：“学校的学生仍热衷于参与基督教活动，况且学校仍有一大群的基督徒。”另一方面，她们将维持金陵女大基督教性质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吴贻芳早在南京

---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15页。

解放前，就“请一位教师把《新民主主义论》翻译成英文，在外籍教师晚祷时向她们宣讲，让她们了解中国形势和发展方向”。1949年5月17日，之江大学及齐鲁大学校长致信吴贻芳，提及多间基督教学校学生开始研读和学习新民主主义理论。8月1日，吴贻芳更表示：“这个时期住在中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国民党政权垮台是因为自己的无能和腐败，人民希望有一变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要造福于人民，这是好人和劳苦人民应该得到的。我们所希望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也许不要严格地（在社会上）贯彻党的路线，而调整适应中国温和的传统。几十年来我们的人民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动荡，大规模的战争打了12年。我们禁不住要希望在共产党以最热诚的精神开始建设国家时，将考虑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基督教教育希望在教育妇女和培养人格方面作出贡献。我们是否做到，在我们没有尝试前还不能说。”<sup>①</sup>

在1950年的结业礼上，吴贻芳说：“以往我们是明白人民的需要，在1934年的时候我们已提倡要到农村去，可是这单是思想上的层面，只有少数毕业生真正的去到农村为人民。”吴指出，在解放后的一年间，“我们看到群众的需要，校中员生明白到建设国家需要由基层做工夫。毕业生知道在农村及小的市镇工作是较刻苦，但能真正的服侍那些需要帮忙的人”。同年7月25日，吴贻芳的信件中再度提到金陵女大办学服务宗旨的变化：“高等教育的基本工作是训练高级人员去满足经济及文化建设的需要。在新的政体下，大学机构不可再重蹈覆辙，昔日的学生只是为学习而学习，远远离开国家发展的真正需要。现今学生需要对一般文化有

---

① the letter for McMullen (Aug. 24, 1949), RG11, Box 159, Folder3005, p. 0988~0993. 译文转引自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296~297页。

深入了解，对新科学的成果有认识，随时准备全心全意服务人群。学生需要的是全面的发展，真正的能力，充实的学问，能分析和做创造性的工作。这理想有赖师生共同创造，国家则有义务去训练青年学生为人民服务，肩负建设新中国的重大任务。”

为此，金陵女大校方认为应该开展更多的社会服务工作。一方面，她们继续原先的社会服务工作。淳化镇的农村服务站工作如常。1949年夏季，金陵女大派出学生在2个农忙托儿所服务，帮助当地妇女砍柴、耕田，体验农村生活。冬季，为农民及其家庭办政治及识字班，训练当地男丁，培养农会领袖。1950年金陵女大的乡村服务工作报告说：“自从淳化镇在1949年4月24日解放后，乡村服务站的工作一如往常。因为和现政府合作，服务站的一些工作得到加强。一些工作也已被证明是对社会是有利的。”<sup>①</sup>另一方面，金陵女大积极配合新政权的工作，开展城市内的社会服务。1949年12月，南京市人民政府计划解决城市娼妓问题，在采取行动之前先做调查。政府邀请金陵女大社会系同学协助。于是金陵女大派出教师及25名学生，进行五六天的社会调查。“这些学生分为三组，到三个娼妓密集的地区。二名教授及两位导师指导调查工作。”金陵女大的这些工作反映了全校师生为新社会服务的愿望。正如吴贻芳所说：“在宗教自由的原则下，以基督教教育为理想的大学将继续培养年轻一代，为人民服务。”<sup>②</sup>

金陵女大之所以一再强调“为人民服务”，与新中国建立初的教育政策有关。根据1949年12月30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在目前条件下，

---

① “GinLing College Rural service station” (1949~1950), YDSL, UB Archives Box159, Folder3008, p. 1247.

② “Letter from Dr. Wu Yi-Fang to Dr. R. J. McMullen” (June 6, 1949), YDSL, RG11, UB Archives, Box149, Folder2932, p. 0415~0417.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政府无力监管境内的外国基督教办学机构。华南女大、金陵女大办学目标和课程设置反映了外籍传教士的意志和理念。1927年后，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国。中国政府通过立案要求，开始限制外国在华的教育机构。相应地，两校的人事安排、办学目标也作出了重大的调整。抗战之后，国民党政府借战争之机，加强所谓“党化教育”，又要求“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sup>①</sup>因此，抗战时期的金陵、华南受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尤其明显。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初期的国家领导人提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要“为人民服务”，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相应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因此，华南女大、金陵女大对自身社会角色诠释的过程基本上是相似的。决定社会角色变迁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处境。这体现了两校与社会变迁互动沟通的一面。

在互动沟通中，华南女大、金陵女大有自己的坚持。这种坚持体现了两校社会角色的另一面——身份认同。社会角色之所以成立，应该包括互动沟通和身份认同两方面。如果只是单纯的互动沟通，因应局势变化而变化，群体组织的社会角色是不全面的。华南女大、金陵女大的身份认同包括两部分：基督教、教育。在本书导论一章中，作者已经指出，基督教大学之所以有基督教的性质，并不一定因为其课程内容、人事安排等变量。他们的定位主要是通过办学理想、校训精神等显示的。在华南女大、金陵女大与社会的互动沟通中，“受当施”、“厚生”两个校训诠释固然有所差异，但从来没有被学校放弃过。校友们即使不是基督徒，也都服膺于校训的理想。虽然“受当施”、“厚生”校训源自基督教

---

<sup>①</sup> 《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秦孝仪主编：《战时教育方针》，教育部1938年7月印发，3页。

员纷纷题词祝贺，可谓盛况空前。<sup>①</sup> 在新生活运动中，金陵女大做了很多工作，深得国民党政府的欢迎。在抗战期间，华南女大也在校内设立难民收容处，希望做难民工作。可日军虽然两次短期进占福州，很快就撤走。华南难民工作没有发挥太大影响。

也许，概念诠释本身就是问题的关键。爱国主义是华南、金陵全体中国师生揭扬的旗帜。她们的爱国活动、言论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许多华人基督徒心目中，爱国精神、基督教信仰并不矛盾。真正的问题是，她们如何诠释自己的基督教精神、爱国主义。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是全人类共同的道德标准。但爱国的内涵、方式可能有不同的理解。除了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道路外，近代还有所谓“教育救国”、“人格救国”甚至“信仰救国”的言论。另一个问题是对基督教信仰的诠释。基督教信仰中有自由派、基要派、社会福音派。许多人对信仰的理解并不相同。基要派如倪柝声等人反对与国家社会事务有任何的联系。但自由派恰恰相反。吴耀宗、王世静、吴贻芳等人都积极支持建国后党的宗教政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在金陵、华南，“受当施”、“厚生”的校训强调社会服务的精神。一方面，这可以是对基督教精神的一种理解；另一方面，学校内的非基督徒也可从自己的角度来诠释这两个校训。若用当事人自己的理解，就如1915年华南女大首位华人教师谢绍英（Ruby Sia）所说：“这一代中国受教育女性负有重大的使命，而基督教女性的责任更加重大。假如她们要证明自己既是真正的基督徒，又是真正的中国人，那么她们就应该为国家做出其他阶层都未曾作过的服务。此种服务首先要求亲力亲为地发挥她们自己纯正的影响；其次就是为中国提供大规模的女子

---

<sup>①</sup>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20 周年纪念特刊”，《申报》1935 年 11 月 2 日。

高等教育”<sup>①</sup>。华南女大女学生也认为：“真正的基督徒是真正的爱国者”，“服务是基督教与爱国主义的共同特色。”<sup>②</sup>

---

① Ruby Sia, “Higher Education for Girls and the Proposed College Curriculum”, *Educational Review* (1915. Oct. ) p. 12.

② Ida Belle Lewis, “College Life at Hwa Nan”,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28. Sep. )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 307.

表 5-2 1926 年华南女大、金陵女大收入项目表

项目	华南女大	金陵女大	备注
学费	2203	13759	金陵学生 152 人， 华南学生 80 人
差会	37194	235911	
国外收入	1698	31511	
国内收入	0	774	
捐赠	0	318	
手续费	1828	9168	
杂费	4841	0	
总计	47764	79441	

分析上表，我们会发现金陵女大的经费要比华南女大宽裕许多。差会拨款、杂费收入两项，华南女大略强于金陵女大。金陵女大在学费收入、国内外收入、捐款等项都大幅领先华南女大。很明显，华南女大经费较少的主要原因是过于依赖美以美女布道会的资助，收入来源单一。这和华南女大是单一差会支持的女子大学有关。

立案后：

华南女大和金陵女大为了应付立案要求，分别对经费收支作了一定调整。根据华南女大 1932 年财政报表，年度收入如下表<sup>①</sup>：

① 《华南年度预算表》，福建省档案馆，39-1-4。



表 5-3 1932 年度华南女大经费收入表

收入来源		金额	所占比例
年有定额者	基金年息	19653	16.5%
	美以美会补助	77973	65.2%
	私人捐款	5520	4.6%
年无定额者	学费收入	2833	2.3%
	学生杂费	4347	3.7%
	杂项收入	3858	3.2%
	特别捐款	5422	4.5%
总 计		119606	

从上表来看，华南女大的经费收入比立案前（1926 年）有明显的增加。但是，学费收入、学生杂费仍不是华南女大的主要经费来源。其中，美国美以美会补助款一项就占了 65.2%。因此，华南女大的经费收入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

立案后，金陵女大的学费收入比例已逐渐越来越大。正如吴贻芳所说：立案后“学校有了发展，学生人数增多，这时期教会学校所收费用又较高，所以学生学杂费、膳费在整个学校收入中仅次于美国创办人委员会捐款”<sup>①</sup>。下表列出金陵女大在抗战前几年的经费收入情况<sup>②</sup>：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1983）《吴贻芳纪念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103 页。

②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台湾中央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66 页。

表 5-4 抗战前金陵女大经费收入表

年 份		1931 年	1933 年	1934 年	1935 年
学生款费	金额	21775	44495	37049	56637
	百分比	16.94%	8.42%	26.88%	33.57%
租息	金额	15153	17556	13201	11876
	百分比	11.79%	3.32%	7.01%	3.87%
捐助款	金额	55715	449551	58370	69897
	百分比	43.34%	85.09%	42.35%	41.43%
杂项收入	金额	35910	16746	20196	16494
	百分比	27.93%	3.17%	14.65%	9.78%
政府补助	金额	0	0	9000	13814
	百分比	0	0	6.53%	8.19%
总计		128553	528348	137816	168718

从这些资料看，金陵女大经费收入仍然高过华南女大。不过，两者的差距已经缩小。比如：1931 年金陵女大总收入是 128553 元，而 1932 年华南女大的总收入也有 119606 元。5-4 表中所谓的“捐助款”并不只是差会的捐助款，还包括史密斯女院的年度捐款。因此，金陵女大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种经费收入结构保证了金陵女大有较大的经费增长潜力。

在这一时期，另一项重大的经费收入变化是国民政府补助。1934 年，国民政府决定“奖励优良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发展起见，自民国二十三年度起，设置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额”，公布“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分配办法”。华南女大与金陵女大都曾获得政府的补助。不过在抗战前，中国政府的补助款从来没有超过金陵女大总收入的 10%，对华南女大的补助更少。

抗战后：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补助有所增加。但战争也使得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的学生学费收入明显减少，办学经费非常困难。据统计，政府补助款占了华南女大1943~1944年度经费收入的4%。1941年，政府补助占金陵女大的经费收入比例高达10.02%。下表是1941、1942学年度的金陵经费收入比例表<sup>①</sup>：

表5-5 抗战期间金陵女大经费收入表

项目		1941年	1942年
学生款费	金额	43500	75000
	百分比	9.08%	4.59%
租息	金额	76230	100217
	百分比	15.91%	6.13%
捐助款	金额	311390	1303436
	百分比	64.99%	79.68%
杂项收入	金额	0	14100
	百分比	0	0.86%
国库省款	金额	48000	143000
	百分比	10.02%	8.74%
总计		479120	1635753

2. 学费收入。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捐助款始终占最大份额。学生收费对大学经费的贡献只占很小比例。然而，以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看，华南女大与金陵女大的学费却是相当昂

<sup>①</sup>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台湾中央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66页。

贵的。根据 1939 年金陵女大的招生简章<sup>①</sup>、1931 年华南女大向教育部呈报的材料<sup>②</sup>，两校每位学生每学期缴纳的学杂费如下：

表 5-6 金陵、华南学杂费一览表

收费项目		金陵女大(1939)	华南女大(1931)	
基本费	学费	30	20	
	膳费	20	27	
	宿费/房租	5	3	
	杂费	6	—	
	图书费/租书费	1	3	
	医药费	1	1	
	合计	63	54	
特别费	生物、物理课试验费	4	2	华南只收生物费
	化学试验费	5	若干	
	音乐费	10	—	
	钢琴租	—	10	
	钢琴教授费	—	10	
	风琴费	—	5	
	毕业证书费	—	10	
	合计	19	37	
每学期最高收费总计		82	91	

从上表来看，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收费项目繁杂，学费不低。若以学生必须缴纳的基本费计，金陵女大学生一学年须缴纳 126

①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台湾中央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69 页。

② “1931 年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一览”，福建省档案馆，39-1-2。



校园维持费	校监薪金	242	—
	工饷	377	1622
	维修费	420	1843
	燃料费	—	1299
	水电费	496	737
	物料费	—	—
	租金	189	605
	家具费	3303	—
	合计	5852	6106
人事管理费	人事管理费	—	9014
学生费用	助学金贷款	—	525
	体育	—	—
	医药	—	1500
	学生活动	175	—
	合计	175	2025
图书馆	图书馆员薪金	—	475
	馆员助理薪金	368	122
	日常开支	—	39
	中文书采购费	368	—
	外文书采购费	633	1341
	期刊	528	—
	合计	1369	2505

教学费用	中文	2400	3075
	英文	5000	3390
	生物	3000	4851
	化学	2400	5348
	物理	—	1726
	数学	—	1755
	历史	2000	1904
	社会学	—	1548
	哲学	1000	—
	宗教学	2500	1827
	体育	2400	3349
	教育	3000	6424
	音乐	—	1633
	合计	23700	36830
非教育性 经费支出	杂项支出	—	370
	宿舍费	—	3928
	餐厅开支	3000	5153
	合计	3000	9451
总计		38088	75433

从上表来看，华南女大行政费占总经费的 10.4%，金陵女大行政费占总经费的 12.5%。华南女大的薪金水平低于金陵女大。但若与其他基督教大学相比，两校的薪金水平又是最低的。另外，图书馆经费很少。华南女大是 3.5%，金陵女大是 3.3%。大部分经费用于教学，分别占到 62%（华南）、48%（金陵）。所谓教学费用包括各学科的仪器设备、教师薪金。大部分学科经费的比较，金陵女大都占有优势。不过，华南女大则在英文、宗教两科上有较大的投入。综合分析，华南女大与金陵女大只能说是小规模的教学型高等教育机构。教职员薪金偏低，图书资料少。办学经费非常节俭。

立案后的经费支出，可以参看 1934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数字。

表 5-8 1934 年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经费支出分析<sup>①</sup>

岁出项目		金陵女大		华南女大	
总计		137761		107095	
俸给费	教员薪金	57227	41.5%	45690	42.6%
	职员薪金	16142	11.7%	13500	12.6%
	工饷	2057	1.5%	1657	1.5%
设备费	维修	8240	5.9%	7440	6.9%
	卫生	841	0.6%	128	1.1%
	图书	4545	3.2%	5074	4.7%
	仪器	4902	3.5%	9975	9.3%
办公费		12536	9%	2714	2.5%
特别费		17587	12.7%	20917	19.5%
附设机关用支		13684	9.9%	—	
每生岁占费		493.22	0.3%	1111.55	1%

从上表的经费总额来看，立案后的华南女大缩短了与金陵女大的差距。两校的经费支出中，仍以俸给费为主，占了一半以上。办公费仍然维持较低水平。值得注意的还有每生岁占费。每生岁占费实际是学生的培养成本。华南女大的培养成本要明显高过金陵女大。原则上讲，规模越大，学校单位成本越低。华南女大每生岁占费远高过金陵女大，说明华南女大的办学效益低于金陵女大。这个问题在立案前后都没有实质变化。根据葛德基的统计：1925 至 1926 学年度，在学生对学校经费的贡献率上，金陵女大是 19.58%；华南女大是 5.36%<sup>②</sup>；而差会对学校每个学生的培养费，

①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6 年），126~196 页。

② Earl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1926*,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Press, p. 242.

址建筑工作。华南女大选定福州仓山区岭后路作为自己的校园所在地。“新大学的校址选定在位于闽江之滨的南台岛的一片高地上。那时福州城区依然位于闽江的北岸，但已在不断向外扩展直到江滨地区以及南台岛。从大学的校园北眺闽江，远处的山峦鲜翠欲滴。南面有大片的肥沃原野和村庄，几处青山星星点点，背后座座高山环伺。”华惠德说：“如此美妙的景色实在是建校的绝佳地点。”“这块原先为福州年议会神学院所买的土地只是校园中心用地。大学还得购买附近土地，这可是一项旷日持久的艰巨工作。时常，土地买卖已成交，但最主要的工作还未开始——因为我们得去寻找山上乱坟的坟主。一些坟墓主人有尚在世的亲属，我们必须和他们联络以便安排迁葬。孟存慈牧师 (Rev. William A. Main) 当时任神学院院长。他为这项工作的完成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如果不是他竭力奔走，很可能一块地也搞不到。孟存慈先生调往上海后，黄安素会督 (Bishop Ralph Ward) 继续在这场土地交易中给予了宝贵的协助。而华雅各牧师在购买那块土地时就帮了很多忙。”1911年，华南女大新校舍正式破土动工。

“由于校址曾经是坟场，要确定一块地基成了一项旷日持久的艰巨工作。在修筑大楼南面门廊的地基下不远处发现了一个大洞穴。但这个门廊上要牢固地排立几根大石柱。因此，人们只得向这个洞穴填进大量的石料和石灰。地基最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好，非常坚固，上面的建筑可以抵受经常扫过山顶的台风。”“建成的行政楼称为彭氏楼。要知道，大学的最初礼物就是 Mr. J. D. Payne 为纪念其女儿而捐的款。另一项 10,000 美元的款项是美以美会外洋女布道会哥伦比亚河支会为纪念前任支会主席劳拉夫人 (Mrs. Laura Cranston) 而认捐的。这笔钱款被用于建筑大学的宿生楼——即谷莲楼 (Laura Cranston Hall)。另外，爱荷华州霍布特地方 (Humboldt) 的科斯特夫人 (Mrs. Mary Kester) 向大学捐



款8,000美元。这使大学可以购买邻近的土地作进一步的建设。”<sup>①</sup> 华南女大形成了以彭氏楼、谷莲楼、立雪楼3座建筑为中心的校园建筑。1914年秋，华南女大师生告别毓英女校，搬到新的永久校址。

华南女大的新校址占地42亩，共4座，面积共28126平方米。下面是该校学校建筑一览表<sup>②</sup>：

表5-9 华南女大学校建筑一览表

名称	价值
彭氏楼	95000
谷莲楼	92000
立雪楼	88000
操场	2252
教职员宿舍	30000
鼓岭避暑屋	1600

学生宿舍、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教学场所都设在彭氏楼、谷莲楼和立雪楼上。其中图书馆有3间，实验室5间，学生宿舍有78间。

金陵女大新校址也是金陵神学院院长司徒雷登帮助购买的。金陵女大选择南京市郊清凉山麓的陶谷地区，新校址占地260亩（今南京宁海路南段）。为建筑校舍，金陵女大在这块土地上移平了1000余座坟墓。不过，与华南女大捉襟见肘的建校经费相比，金陵女大的校舍建筑资金显得相当充裕，德本康夫人为金陵女大筹募到60万美元的建校款。经过多年的经营，金陵女大建成了15

① 华惠德著，朱峰、王爱菊译：《华南女子学院》（未刊稿），第73页。

② “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报表”，福建省档案馆，39-1-4。



座学校建筑。下表列出金陵女大校舍建筑与用途表<sup>①</sup>：

表 5-10 金陵女大校舍建筑与用途表

名称	完成年份	用途说明	总面积	备注
100 号楼 (中大楼)	1923 年	一楼为会议室和接待厅,二楼为室内运动场和健身室	143.78 平方米	美国史密斯学院捐款 5 万
200 号楼 (科学楼)	1923 年	生物、化学和物理等科系之教室及实验室	1540.61 平方米	
300 号楼 (教室楼)	1923 年	共有教室 16 间,1934 年前暂时图书馆兼行政办公室	1491.75 平方米	
400 号楼 (学生宿舍)	1923 年	内设寝室、交谊室、小食堂两人一间,可容纳百余人	1150.18 平方米	
500 号楼 (学生宿舍)	1923 年	内设寝室、交谊室、小食堂,两人一间,可容纳百余人	1150.18 平方米	
600 号楼 (学生宿舍)	1923 年	内设寝室、交谊室、小食堂,两人一间,可容纳百余人	1150.18 平方米	
700 号楼 (学生宿舍)	1924 年	内设寝室、交谊室、小食堂,两人一间,可容纳百余人	1150.18 平方米	
东院宿舍 (学生宿舍)	1929 年	体育简易科学生住宿		四合院式平房
学生宿舍	1930 年	原为教职员宿舍,后改为学生宿舍		二幢,于宁海路旁

①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台湾中央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80 页。

图书馆	1934年	兼办公室	1396.32 平方米	
大礼堂	1934年	楼上为大礼堂,楼下为音乐系办公室兼演奏厅	1444.36 平方米	
附中宿舍	1936年	可容纳60至72人		宋氏三姐妹捐赠
疗养院	1936年	小医院		校友严彩韵、严莲韵姐妹捐建
南山甲楼 (教员宿舍)	1937年		337.12 平方米	
南山乙楼 (教员宿舍)	1937年		1357.6 平方米	

教学设备方面,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的条件都比较差。试以藏书量说明之,下表是1925至1926学年度北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华南女大图书量的比较<sup>①</sup>。

表5-11 1925~1926学年度北大、金大、金陵女大、华南女大藏书量一览表

藏书量	国立北京大学	金陵大学	金陵女大	华南女大
英文书	26,000	14,121	4,828	4,000
中文书	140,000	49,592	6,418	1,300
总计	166,000	63,713	11,246	5,300

从上表来看,华南女大、金陵女大的藏书总量均不及国立北

① E. H.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 ~ 1926*.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27. pp. 226~227.

年来为大学服务的全部教职员名单。这些名单以文档的形式存放于该校基督教女服务部，甚至在前卫理公会女外洋布道会的文件中也没有这些资料。因此，这部校史缺乏一项基本的资料。”以笔者目前所见，福建省档案馆、联董档案中收藏有部分华南女大师资的材料。完整记录华南女大所有师资情况已无可能。下文将参考上述资料中心的数据，分析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的师资情况。

在师资力量中，中外籍教师比例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这一比例反映着学校发展中国化的程度。下表是金陵女大教师人数历年变化及中外籍比例变化<sup>①</sup>。

表 5-12 金陵女大教师人数历年变化及中外籍比例变化

年份	外籍教师		中国教师		总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915	3	60%	2	40%	5
1916	5	83%	1	17%	6
1917	8	80%	2	20%	10
1918	8	80%	2	20%	10
1919	8	73%	3	27%	11
1920	9	82%	2	18%	11
1921	12	80%	3	20%	15
1922	14	82%	3	18%	17
1923	25	93%	2	7%	27
1924	21	75%	7	25%	28
1925	17	63%	10	37%	27

①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台湾中央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99页。

上表中很明显地看出 1927 年是中外籍教师比例变化的关键一年。1927 年前，金陵女大的教师以外籍占多数。1927 年直至结束，中国教师已成为师资的主体。华南女大师资中外籍比例变化也大致如此。在创校之初，外籍教师占主体。但是到了 1931 年，华籍和外籍教师的比例变成了 10 : 7。中外籍师资比例的变化，反映了两所基督教女子大学中国化的基本进程。

以下数表从各项指针具体分析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教师队伍的异同。

表 5-13 1934 年金陵、华南教员职别人数及月俸对照表<sup>①</sup>

项 目		金陵女大	华南女大
总计	人数	44	20
	月俸	60~300	100~160
教授	人数	14	8
	月俸	200~300	160
副教授	人数		4
	月俸		160
讲师	人数	22	6
	月俸	80~140	160
助教	人数	3	1 (兼任)
	月俸	60	每学期 100
其他	人数	5	1
	月俸	80~140	职员兼任

<sup>①</sup>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6 年，126~196 页。



刘李舜筍	女	仙游	华南文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	曾任兴化咸益女校校长	生物学	120
吴芝兰	女	古田	华南文学士、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	福州毓英女校教员	数学	120
郭则杰 (肇民)	男	闽侯	日本大学法学士、全国大学及专门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检定合格党义教师	福建学院党义教员	党义/ 兼任	29
周贞英	女	平潭	华南文学士、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	平潭美以美小学督学;平潭毓贤女校校长;福清毓贞女校教员	生物学	120
邓惠贞	女	美国	美国波士顿大学学士		音乐	333
王振先 (孝泉)	男	闽侯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学士	历任教育部参事、福建教育厅科长、协和大学、厦门大学教授	国学/ 兼任	60
陈易园	男	闽侯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学士	历充国立北京大学、福建学院、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国学/ 兼任	100
爱以利	女	美国	美国西北大学学士、威斯康辛大学硕士	曾任美国威斯康辛州米罗瓦基中学校长	英文	333
陈淑圭	女	闽侯	美国康纳尔大学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曾任华南女大高中部主任;华南管理委员会委员长	教育	120



巴美德	女	美国	美国波芒拿大学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英文、艺术	333
康慎德	女	美国	美国白提士大学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曾任美国马萨诸塞州遮而寺学校英文教员三年、坎诺提克省桥波学校英文教员四年、新泽西州东阿莲学校英文教员三年	历史、英文	333
宋方雪琼	女	泉州	美国柯大学文学士、波士顿大学医学博士	曾任福清惠乐生医院代理院长	生理卫生学	120
程赛月	女	古田	华南文学士、美国哲吾大学硕士	曾任古田毓馨女校教员、华南女大高中部教员	宗教、哲学	120
陈佩兰	女	闽侯	华南文学士、美国柯里干大学家政学院硕士	曾任本学院高中部教员	家政学	120
施曼姿	女	美国	美国威廉参大学学士		音乐	333

表 5-15 1950 年华南女大教职员名册<sup>①</sup>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职务	学历	经历
王世静	女	51	福州	院长	密歇根大学硕士、晨边大学博士	厦门大学教授；本学院教务长
许引明	女	46	福州	教务长、生物系教授	密歇根大学博士	本院生物系教授、主任、代院长

<sup>①</sup> “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教育概况”，福建省档案馆，39-1-97。

陈叔圭	女	50	福州	家事教育系主任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本院教务主任、兼代院长
余宝笙	女	45	福建莆田	化学系主任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	本院化学系教授
吴芝兰	女	42	福建古田	物理系主任	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	本院教授
周贞英	女	50	福建平潭	生物系主任	密歇根大学博士	本院生物系教授
陈芝英	女	42	福建福清	副教授	堪萨斯大学硕士	本院家事教育学系讲师
王振先	男	64	福州市	文史系主任兼秘书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学士	前教育部参事;厦门大学教授
康慎德	女	57	美国	外国语系主任	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本院教授
爱以利	女	60	美国	外国语系教授	威斯康辛大学学士	本院副教授
何淑英	女	48	福建平潭	数理教员兼会计	波士顿大学数理硕士	本院附中数理教员
张萝兰	女	47	山东临沂	教育学教授	美国西北大学哲学博士	金陵女大教育系教授
佟德馨	女	28	广州	家事教育副教授	密歇根大学硕士	昆明广播电台播音员,云南高等法院书记官
傅华星	女	45	美国	音乐系副教授	学士	本院音乐教员音乐系教授

唐美媛	女	48	福建莆田	注册课主任	本学院毕业	莆田咸益女中教务主任,省立莆田中学教员
曾淑宜	女	47	福建平潭	庶务	本学院毕业	
吴高燧	男	45	福州市	文牍	福建省立二中毕业、公立法政专门毕业	福建印花烟酒税盐运使署科员
吴作英	女	36	福州市	教务员	香港梅芳高中毕业,广州大学肄业	南平中学,省助产学校教务主任
关 兰	女	27	福建莆田	校友部办事员		
林毓英	女	27	福建林森	护士	柴井高级护士学校毕业	柴井医院护士
陈德光	男	29	福州市	图书馆员	三一中学毕业	
林英明	女	33	福州市	社教助理干事	本学院附中毕业	
王世达	男	54	福州市	助理图书馆员	上海同济医科大学电工机械科毕业	
黄惠慈	女	35	福建古田	实验托儿所干事	私立协和幼稚师范毕业	私立文山学校附设幼儿园主任
林克钊	男	53	福州	印刷	中等程度	
罗怀慈	女	45	福建林森	庶务	上海慕尔堂专修科专业	上海务本女中教员

陈易园 /兼任	男	71	福州	文史系教授	日本早稻田 大学政学士	北大、协大、厦大教 授
许作梅	女	30	福建 林森	社教干事	本学院毕业	
黄觉民 /兼任	男	51	福建 林森	教育系教授	哥伦比亚大 学教育心理 学专家	福建省研究院院长
郭公佑	男	48	福州市	化学系讲师	金陵大学化 学研究所研 究员	暨南大学副教授
黄震 /兼任	男	50	福建 仙游	生物系教授	北京师范大 学生物系毕 业、日本东 京帝国大学 农学部	福建省农政处处长
德穆	女	67	美国	社会学教授	硕士	
良纫芳	女	57	美国	图书馆主任	学士	
刘俊恩	女	25	山西 太原	社教干事	北平燕京大 学	上海儿童促进福利 会干事
蒲天寿 /兼任	男	46	美国	校医	医学博士	福州协和医院院长



表 5—16 1936 年金陵女大教师名录<sup>①</sup>

姓名	科目, 职称	性别	籍贯	学历	月俸(元)	备注
缪镇藩	国文系主任、教授	男	江苏常熟	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	200	
陈钟凡	国文、教授	男	江苏盐城	北京大学文学士	300	教育部讲座教授
严思纹	国文、讲师	女	广西马平	武汉大学文学士	100	
戴葛士	英文系主任、教授	女	美国	耶鲁大学文学硕士	238	
克馥兰	英文、教授	女	加拿大	加拿大萨斯渴奇纳大学文学硕士	238	
余朴	英文、讲师	女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	238	
章德卫	英文、讲师	女	浙江吴兴	金陵女大文学士	75	
龙冠海	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男	广东琼州	南加州大学哲学博士	180	
穆思曼	社会学、教授	女	美国	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	238	指导社会服务实习
林玉文	社会学、教授	女	福建福州	金陵女大文学士	70	指导服务实习
朱激	历史系主任、教授	女	江苏宝山	密歇根大学文学硕士	140	

①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职员名录,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卷宗 668, 私立金陵女大 32。转引自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 50 页。



袁宗泽	体育、讲师	男		中央大学讲师	30	兼任
陈诚思慈	体育、讲师	女	北平	金陵女大	80	
周翰青	体育、助教	女	浙江 杭县	中央大学体育 科	85	
蓝乾碧	体育、助教	女	湖北 武昌	金陵女大	75	
刘恩兰	地理系主 任、教授	女	山东 安丘	美国克拉克大 学文学硕士	140	兼附属中 学地理
黄秀清	地理、助教	女	广东 三水	金陵女大	65	
黎富思	生物系主 任、教授	女	美国	密歇根大学哲 学博士	238	
陈品芝	生物、教授	女	福建 福州	密歇根大学哲 学博士	140	
邬静娴	生物、教授	女	浙江	密歇根大学理 学硕士	140	
蔡路得	化学系主 任、教授	女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哲学博士	238	
胡 棻	化学、讲师	女	湖南	美国斯密斯大 学硕士	238	
黄俊美	化学、讲师	女	南京	燕京大学理学 硕士	80	
沈乃森	化学、助教	女	浙江 绍兴	金陵大学理学 士	75	
鲁淑音	数理系代主 任、教授	女	南京	美国蒙梯和立 俄克大学硕士	140	

王明贞	数理、讲师	女	江苏 吴县	燕京大学理学 硕士	100	
李惠廉	数理、助教	女	广东 中山	金陵女大	65	
张肖松	心理系主任、教授	女	湖北 武昌	密歇根大学哲 学博士	140	
华群	教育系主任、教授	女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哲学硕士	238	
袁伯樵	教育、教授	男	浙江 绍兴	美国卡罗莱特 大学哲学博士	180	
高杨宝瑜	教育、讲师	女	江苏 吴江	美国皮勃代大 学硕士	70	兼任
许张镜欧	家事、讲师	女	上海	芝加哥大学研 究院	30	兼任
全祖懋	党义教师	男	浙江 东阳	南开大学文学 士	30	兼任

比较上面三份表格，可以发现金陵女大的师资力量要强于华南女大。1934年，金陵女大教师人数是华南女大教师人数的1倍有余。从职称结构来看，金陵女大中高级职称者较多。讲师一级的中级职称人数共22人；高级职称有14位；助教只有3位。华南女大的职称结构呈倒金字塔形，副教授以上的高级职称有12位；中级职称只有6位；助教3人。不过，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的教师总人数很少，这样的职称结构并不能真正说明什么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两校教师的工资结构、学历结构和性别结构。

1. 两校工资结构是不合理的。这具体反映在工资水平偏低，同工不同酬。由于一些外籍教师本人是传教士。她们的工资由差会按照美国标准发给。而中国籍教师工资从大学学费收入中获得。这造成了两者工资水平的较大悬殊。金陵女大教师的薪金分为几

个等级。一类是政府教育部津贴的讲座教授，如国文教授陈钟凡，他的月薪高过所有教师，包括校长吴贻芳；一类是以蔡路德、黎富思等女传教士，她们的月薪有 200 余元；一类是吴贻芳、刘恩兰等中国籍资深教师等专任教师，她们的月薪有百余元；一类是金陵女大毕业不久留校任教的新教师，她们的月薪通常只有几十元；一类是兼任教师，其薪水依课时而定。华南女大教职员工资水平可以分为传教士教师和中国教师两个等级。前者月薪是 330 元；而后者月薪多为 120 元。

2. 学历结构是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的强项。华南女大、金陵女大的教师多数毕业于世界名牌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波士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早稻田大学、牛津大学等等。而且，大部分女教师本人就是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的校友。另外在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留学归国博士、硕士占了很大比例。1936 年，金陵女大教师中共有博士 7 位、硕士 23 位、本科 16 人。1950 年，华南女大教师中共有博士 7 位、硕士 9 位、本科生 24 位。

3. 性别结构是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特殊的问题。女教师在学校师资中占主体，掌握实权。男教师人数较少。男教师中不乏国内外知名学者。如金陵女大的陈钟凡教授、龙冠海教授；华南女大的王孝泉教授、陈易园教授。早期的男教师多为兼职，抗战后，专任男教师比例有所增加。但男教师在学校的地位较为特殊。尤其在华南女大，男女教师分别较严格。“女教师有专用的备课室和休息室，男教师不得进入，男教师另有供他们备课或晤谈的休息室。此外，男教师不能进膳厅和女教师、女学生一起用饭。”<sup>①</sup>

---

① 郭肇民：《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史概述》，《福建文史资料》（20 辑），1988 年，100 页。

## （二）学生情况

要成为金陵、华南的学生，必须经过大学的考核。1939年的《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招生简章》规定考生资格：“新生需在高级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但录取名额不得超过录取总额的百分之十），转学生须在大学本科正式肄业一年以上。”考试科目包括：“本科分公民、国文、英文、算学（文科生可免试大学代数、几何）、理化（文科生可选考物理或化学一科目）、史地，录取各生如对某一科目考试成绩稍差者（公民、史地除外），须补习该科，不给学分。体育专修科仅考国文、英文、算术、常识（包括公民、史地、体育、卫生）。”<sup>①</sup>

金陵女大的人学考试单独进行，公开招考。每年暑假招生两次，日期由金陵决定后，通知各高级中学，或登报通告。第一次招生，择考生便利地点，设代考处；第二次招生在金陵校内举行考试。<sup>②</sup>据华群在1921年3月的报告，当年5月29日金陵女大在长沙、九江、天津、南京、上海、福州、邵武（福建北部圣公会传教中心）等七个城市设立入学考点。考试分作六部分：综合考试、词汇考试、理解能力测试、语法测试、英文写作、中文写作。这个考试标准是金陵女大招生委员会主席 Miss Goucher 参考上海沪江大学 Mr. J. E. Anderson 后作出的，也是金陵女大第一份标准的人学试卷。<sup>③</sup>另据校友肖鼎瑛回忆：“记得考试题是寄到江阴由辅实女中的一位英文教师主考的，她当场拆卷，按规定时间指导考生翻卷，认真监考。考题由浅入深，带有智力测验的性质。参

---

① 转引自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129页。

② 《校史概略》，《金陵女大年刊》1933年，YDSL, UB Archives, Box 152, Folder2955.

③ Vautrin, “Report of Gingling College” (1921, 3), YDSL, UB Archives, RG11, Box154, Folder2961, p. 0600~0603.

指标。金陵女大在兴建永久校址之初，金陵女大校长德本康夫人就以 200 人作为基准学生数。<sup>①</sup>1934 年，美以美女布道会曾向联董报告：华南女大人数将以 200 为限<sup>②</sup>。华南女大校长卢爱德也认为华南女大必须办成一个人数在 200 人左右的女子大学。但是华南女大学生数长期徘徊在 100 人以内。直至 1946 年，华南女大学生数才突破 200 人。而金陵女大早在 1935 年就达到 200 人的指标，此后不得不考虑将宿舍改为容纳 400 人的设计。以学生数为标准，华南女大的发展整整落后金陵女大 10 年的时间。

在学生家庭背景方面，华南女大、金陵女大的学生大都出生商界、政界以及其他专业阶层。工农下层的子弟很少。其中华南女大学生多数出身商业阶层的家庭，金陵女大女生的家庭背景多是政府的军政家庭。金陵女大许多学生是民国时期知名人士的子女，如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黄炎培的女儿黄学潮、章太炎的女儿章展等。表 5-19、表 5-20 分别是华南女大、金陵女大的学生家庭背景情形：

表 5-19 1948 年华南女大学生家庭背景<sup>③</sup>

家庭出身	所占比例
商人家庭	30%
教师家庭	15%
政府公务员家庭	15%
教牧家庭	10%
医务家庭	5%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27 页。

② “Recommendation From Minutes of the Foreign Department-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YDSL, UB Archives, Box176, Folder 3198.

③ 陈淑圭：“Students And Student Activities of Hwa Nan College” (Spring 1948), Archive of United Board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Box176, Folder 3194.



工农家庭	5%
父母退休或无业	20%

表 5-20 1936 年金陵女大学生家庭背景<sup>①</sup>

家庭背景	所占比例
商界	27.03%
军政界	29.73%
教育界	16.99%
教会界	5.4%
交通界	1.99%
医界	5.02%
法律界	0.77%
工程界	4.25%
农界	0.77%

在地域分布上，华南女大的生源基本来自福建本省，金陵女大的生源则遍及全国。以 1925~1926 学年为例：当年华南女大的学生有 97.5% 来自福建省，2.5% 来自外省。金陵女大的学生有 45.5% 来自所在地江苏省，55.5% 来自全国其他省份。<sup>②</sup> 至于学生的基督徒比例，华南女大是民国时期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一所基督教大学。金陵女大的基督徒比例也相当高。立案前 1926 年，华南基督徒比例 97.5%，金陵女大基督徒比例也高达 72%。下表是 1925~1926 学年间两校学生在信仰结构上比较分析<sup>③</sup>：

①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136 页。

② E. H.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1926*,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Press, p. 186.

③ *Ibids.* p. 164, 166, 168, 194.

表 5—21 1925~1926 学年间两校学生在信仰结构上比较分析

学生信仰状况	华南女大	金陵女大
信仰基督教	97.5%	82.9%
出身基督教家庭	85%	56.6%
来自基督教中学	100%	88.8%
毕业后在基督教机构工作	74%	46%

立案之后，金陵女大学生基督徒人数没有减少，但所占比例却呈下降趋势。下表是 1930 年至 1945 年间金陵女大学生中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比例变化：<sup>①</sup>

表 5—22 1930~1945 年间金陵女大学生信仰变化

年份	教徒		非教徒		合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1930	129	72.7	50	27.93	179
1931	141	73.44	51	26.56	192
1934	124	58.22	89	41.78	213
1935	118	49.58	120	50.42	238
1936	112	43.24	147	56.76	259
1938	63	54.78	52	45.22	115
1940	100	48.54	106	51.46	206
1941	89	38.86	140	61.14	229
1942	79	26.07	224	73.93	303

① 转引自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139 页。

1943	117	41.79	163	58.21	280
1944	155	49.05	161	50.95	316
1945	145	41.67	203	58.33	348

从上表来看，学生基督徒人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变量是非教徒人数的增加，它导致了学生教徒人数比例从 72.7% 降至 41.67%。这与 1930 年代后基督教大学逐渐世俗化的趋势是一致的。

尽管学生人数、信仰状况有所不同，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学生的校园学习文化基本相似。

华南、金陵两校学生学业压力很重。由于采用学分制，两校学生都要修读足够的学分方能毕业。根据华南女大 1925 年章程，学生入学第一年须修 33 学分，第二年须修 35 学分，第三年须修读 37 学分，第四年须修读 35 学分。共计 140 个学分。其中，一年级同学不得选修课程。而体育、唱歌为一至四年级的必修科。<sup>①</sup>华南女大对毕业班学生有毕业论文的要求。虽然尚不知这一规定何时开始，目前资料所见到的，1941 年起，华南女大已经有毕业论文的要求。金陵女大学生的课业要求也很高。据吴贻芳的回忆：“从 1935 年开始，毕业班学生必须写毕业论文。学生读满应读的学分，成绩总平均达到 70 分，才能在本主修系论文指导教师指导下，在四年级第一学期选定题目，通过专题研究，社会实践或科学实验，写出毕业论文。论文必须是个人自己的创作，不得抄袭他人的论著。到第二学期的第二星期交初稿，第八星期交正式稿，经系主任签字通过，认为已达到毕业要求，才能获得毕业文凭，接受学士学位。”为了更详细介绍学生学习生活，下表列出 1939 年

<sup>①</sup> 高时良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610 页。

的风气。金陵校友朱徘徊说：“夜间，你如果跑到图书馆去，无论是图书室、阅报室、杂志室张张桌子差不多坐满了人，但又鸦雀无声。有的在书柜上签字，有的在架上搜寻，进出的更提起了足跟。听见的只有书页声和墨水笔在纸上的运行声……我觉得金陵的学生，真不愧有‘埋头窗下’、‘孜孜不倦’的书生本色。在这一个气氛中，自然不得不抱着悉心研究的态度。”<sup>①</sup>除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华南与金陵的校园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从入学开始，新生们就能体验到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

(1)校园生活“家庭化”。华南、金陵两校都设有姐妹班制度。所谓姐妹班制度，是新生入学成立新班级后，与三年级的班级结成“姐妹班”。“姐姐班”关心帮助“妹妹班”的生活学习。这项制度起始时间尚不可考。1919年金陵女大首届毕业生的著作《先锋》中对此也只字未提。但据邓裕志回忆，1920年入学时金陵女大已有姐妹班制度。笔者1999年的调查得知，华南女大也实行了姐妹班制度。姐妹班制度不仅帮助新同学适应学校环境，还培养学生的群体归属感。毕业后，“有些‘姐姐’，‘妹妹’，历时多年还保持着亲密的姐妹情”<sup>②</sup>。在实行训导制前，金陵、华南两校就已设立了级顾问制度。由学校教师担任每个年級的级顾问。金陵校友朱徘徊说：“我们金陵学校内外的师生，不下七八百人，要不是校里对于已毕业离校的同学或教职员有着关切和毕业生及离校同学教职员对学校的感情，金陵‘家庭化’这句话是可以驳倒的。”家庭化管理要求有较高的师生比例，这对小规模的女子大学尤为适合。根据1926年葛德基的统计，华南女大的师生比例是1：5.2，福建协和大学的师生比例则是1：8.8；金陵女大的师生比例是1：4.6，金陵大学的

---

① 朱徘徊：《对于金陵的认识》，《金陵女大校刊》1935年。

② 邓裕志：《难忘的岁月》，《金陵女儿》，1995年，29页。

师生比例是 1 : 10.2。若以师生比例作为指标来观察,两所基督教女校的师生关系无疑要比同处一地的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大学紧密得多<sup>①</sup>。通常一个老师可以负责几个学生的生活学习,师生之间关系非常亲密。华南学生亲切地称女传教士华惠德为“华母亲”,称校长王世静作“家长”。华南、金陵的许多女教师未婚独身,她们将学生视为自己的子女,多加呵护。华南校友说:“在我们的记忆中,母校华南不但是严谨勤奋,自强不息的化身,也是一个宁静、和谐、温馨的大家庭。”<sup>②</sup> 身为校长的王世静在抗战时期,甚至没有一间单独的宿舍。教师与学生的宿舍都在同一座宿舍楼,“从没见过她们之中那一位要求学校要为她们配置单房”<sup>③</sup>。有位华南校友在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时说:“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我家经济困难,交不起昂贵的学杂费,没有去学校报到。陈叔圭派学生到我家叫我去学校找她,她得知实情后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解决我的学杂费,后来改为贷款方式直至大学毕业。至今我还很感激她。可以说当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她拉了我一把。”<sup>④</sup>

(2) 学生组织活跃,自治能力较强。学生组织分为学生自治会、女青年会以及各类研究社。在金陵,学生自治会成立于 1919 年,负责学生活动的管理统筹工作。以 1933 年为例,当年学生自治会下设研究股、游艺股、平民教育股、国货股、出版股、文书股、庶务兼会计等。金陵女大的女青年会成立较早,1916 年就已成立。这是一个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学生组织,主要负责学生

---

① Earl Herbert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26*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26), p. 102.

② 余少玉、江德爱、黄兴灵、李碧钦:《缅怀敬爱的余宝笙老师》,《余宝笙院长纪念集》,福州:福建华南女子学院,1996 年,31 页。

③ 同上注。

④ 2000 年华南校友调查报告。调查表参看附录二。



的宗教生活和社会服务工作，如1924年创立的培幼小学。1938年，金陵的学生自治会和女青年会合并成单一的学生组织——“厚生团”，分作进德部、益智部、健体部、利群部、总务部。进德部负责宗教生活，益智部担任学术研究和文字宣传，健体部提倡文体工作，利群部管理秩序整洁及卫生等。1947年，厚生团取消。金陵女大重新设立学生自治会、女青年会。华南女大自建校伊始即设有学生自治会和女青年会。以1944年为例，学生自治会设有理事、学艺部、风纪部、服务部、健康部、事务部。女青年会设有：会长、会计股、服务部、宗教部、合作部、文书股、庶务股、秩序股、宣传部等。<sup>①</sup>以目前资料看，华南女大学生参与出版的有《华大青年》、《南风年刊》、《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刊》；金陵女大学生参与出版的有《地理消息》、《金女大集刊》、《金陵女大集刊》、《金陵女子大学校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年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金陵女子校友通讯》。<sup>②</sup>

(3)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在金陵、华南的校园中，有形形色色的学生文娱生活。华南女大有“五月竿舞”(May Pole Dance)，每年一度的春季晚会和五月娱乐晚会(May Fete)。巴美德小姐(Miss Myrth Bartlett)在年度报告中说：“五月的两个娱乐晚会真是气氛欢快，人潮汹涌。内容有民间舞蹈、游戏和趣味答题等等，整场晚会主题曲是‘心中的皇后……是她令晚会生色’。”<sup>③</sup>金陵女大在每年五月也举行“五月竿会”，各系科的同学都会参加表演，一般对公众开放。据金陵女大校友曾星华说：“草地中央竖起一根彩带飘舞的杆子，选举‘五月皇后’，高年级学生还会带头绕杆跳

① 《本学院学生自治会及青年会》，《华南学院校刊》，1944年3月，1~2页。

② 王奇生：《中国教会大学学报校刊出版史略》，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57~358页。

③ 华惠德著，朱峰、王爱菊译：《华南女子学院》（未刊稿），47页。

死则同死而已耳。是以虽值寒假，工作不停。沪耗传来，奋勇更剧，每日亲赴鼓楼医院从事救护事业者，达四五十人。雨雪载途，寒风贬骨，同学服务之精神，固未尝稍懈也。斯时我级同学之留校者共十有二人。2月之首，适校长以念校心切，由沪中冒险归来，商之吾级同人。我等以国步多艰，未可轻于废学，申言抗日，尤须抖擞精神。于是毅然置群危于不顾，以趋安为后图。因之2月16日，金陵又复照常上课矣。本级通讯各友，函电交驰，除振庄因返闽中，不克重来外，其余皆陆续归来。未及三旬，又复桃李门墙，春风共坐。镐英长吾级，勤谨有加，因之吾级感情更加深厚，取事则为一心，团结日坚，努力匪懈。5月1日，吾级领洗者，有续汉、敬如、谭蒙等。自此以后，吾级皆为基督门徒，十架当前，同心向往。乃光阴荏苒，如流水之不归，岁月靡居，若征蓬之长逝。欢笑未了，行赋别离之歌，一旦分襟，期后会以何日，回首初逢，良深暮云之感，仰瞻来日，不无畏怯环生。但初识之无，雏形略具，暂告段落，势所必然。惟望光辉直耀神州，长灵风云之色，整顿文坛旗鼓，猛著祖生之鞭，任重道远，不让当仁，振觉斯民，以华宗国，则今日返依故里，未负慈亲教子之心，他年重谒金陵，不负师长树人之望，愿我级同人共勉之！”<sup>①</sup>

### 三、行政、教学及科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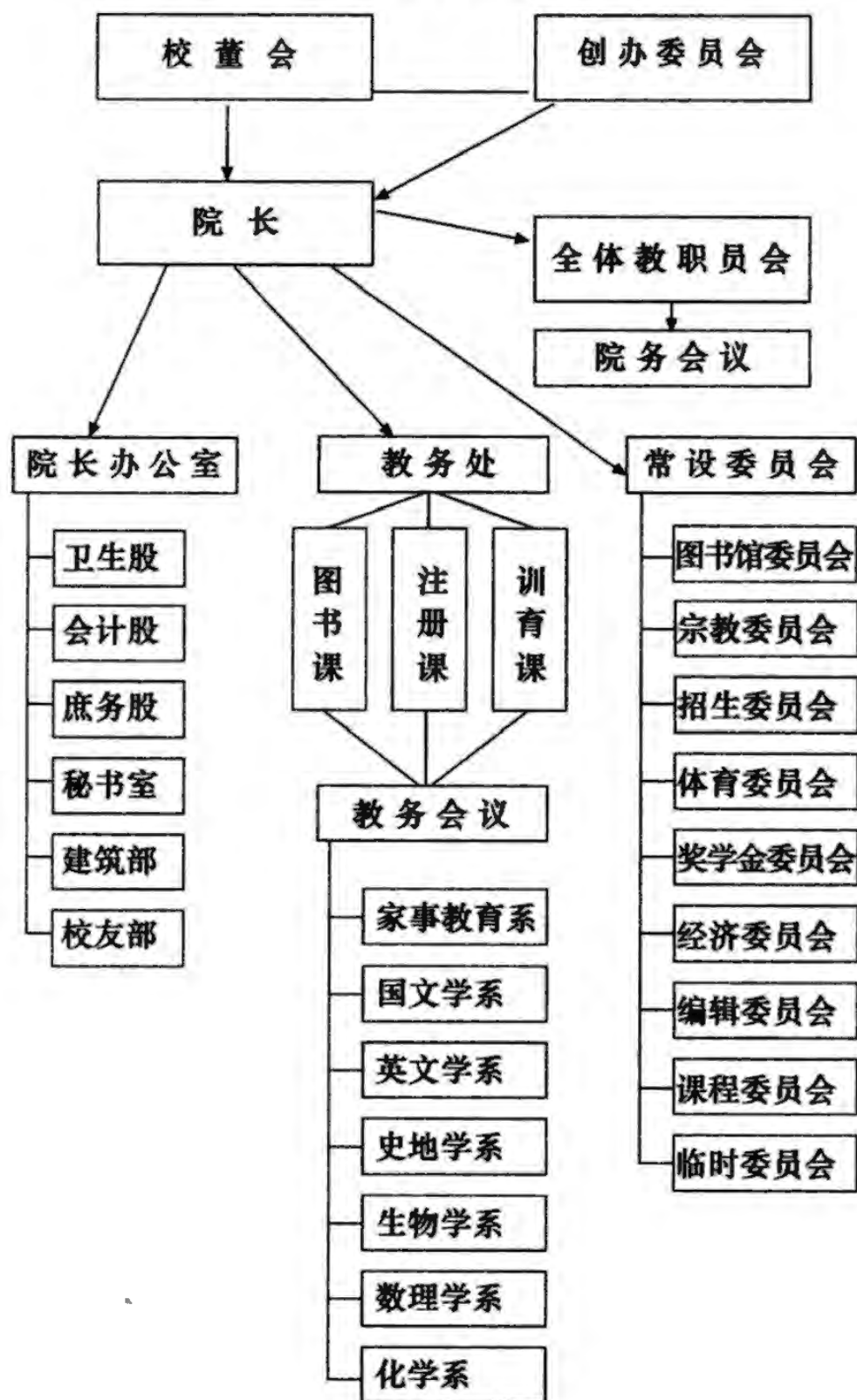
#### （一）行政管理

华南女大、金陵女大的行政特点是民主管理、教授治校。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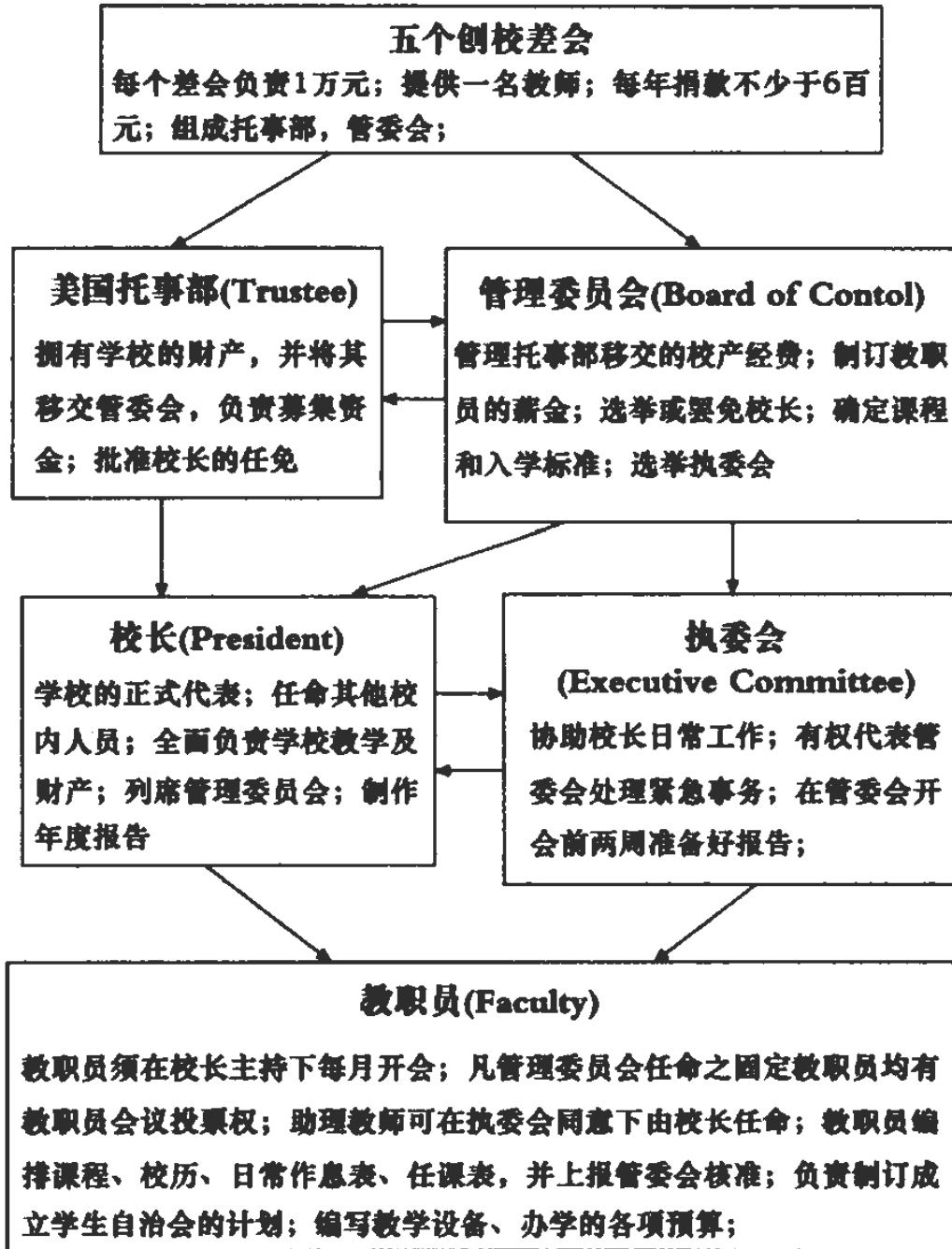
<sup>①</sup> 谭蒙：《一九三二级级史》，《金陵女大年刊》（1932年）YDSL, UB Archives, Box152, Folder2954.

表 5-24 抗战初期华南女大的行政组织系统图



金陵女大的行政架构基本类似。根据 1913 年订立的章程，这所新成立的女子大学的权力架构如下图<sup>①</sup>：

表 5-25 1913 年金陵创校委员会拟订管理架构图



从上述结构图看，金陵也是实行以校长为中心的教授治校制

① “Constitution of the Yang-tse Valley College for Woman”, YDSL, UB Archives, RG11, Box124, Folder2589, p. 0727~0729.

并没有其他学术著作传世。若了解她在华南女大担任的多项工作，就不难明白个中的缘由。据1942年10月15日出版的《华南学院校刊》记载，陈淑圭在这一学期除了担任教育系主任一职外，还参加了校务委员会、教务委员会、训导委员会、宗教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社教委员会等6个委员会的工作。平时还要负责学生生活辅导。其他老师（吴芝兰、王世静、王孝泉等）的情况也是如此。<sup>①</sup>在金陵女大，“许多教师都身兼数职。如在40年代，蔡路得博士既是教务主任，又兼化学主任；张芴兰博士即是训导主任，又兼教育学；院长室只有一位英文秘书和由总务主任闵侠卿兼的中文秘书；全校伙食只有一个人管。全校行政管理人员只有十几个”。<sup>②</sup>一方面，这当然是金陵女大人员精简的表现，可以节省经费，提高行政效率；但另一方面，繁琐的校务占用了这些骨干教师太多时间，牺牲了她们个人的学术科研工作。

## （二）教学科研的分析

1. 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杜威创立的教育思想。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以“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为号召，强调学习的自发性、实践性，“最能把教育、哲学、人生、社会，打成一片”。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在1919年至1928年间风行全中国。<sup>③</sup>华南女大和金陵女大的教育思想深受这一教育哲学的影响。以华南女大为例，第二任校长卢爱德，教务长陈淑圭等人都是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博士生。陈淑圭认为，基督教教育是“崇真理，爱人群的教育”，而“杜威教授说教育即是生活，生活即是生命的继续不断生长，陶知

---

① 《本学期各委员会及委员》，《华南学院校刊》，1942年10月。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13页。

③ 参考阮雁鸣：《杜威学说与中国教育》，香港：文教图书社出版，1966年。



华讲师为病儿举行心理测验，根据收集的资料分析和探索他们所以不健康的症结所在，然后对症下药，进行系统的个案追踪研究和治疗。”<sup>①</sup> 生物系毕业生胡秀英回忆：“在金陵的第二学期，校方评审班上选初级物理课学生的成绩，决定七个学生不必修读该课，为我们特设一门生物课程，由三位老师教授昆虫、鸟类和植物。每星期六，每人颈上带着望远镜，走遍学校、南京有鸟的林地和湖边；并且去了安徽滁州醉翁亭。”“植物方面，黎富思博士，带我们到花园，每人给一朵蚕豆花，教我们从外向内，一片一片的花萼、花瓣拆下，报告其大小形式色彩和其招引昆虫传粉作用。然后指出参考资料，要我们写报告。这种实地观察，参阅前人报告，创作自己的结论的科学训练，是金陵给我最大的赐予。”<sup>②</sup>

附属中学的设立也是贯彻实验主义教育的一个例证。两校学生毕业之后，教育工作是大部分人的工作岗位。为了增加学生的实习机会，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都设有附属中学。华南女大的附属中学设立较早，其前身是华南女大的大学预科班。“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地认识到，通向建立女子大学的头一个必要步骤是发展一所健全的高级中学，为被接受为正式的立案大学做好准备。”<sup>③</sup> 华南女大大学部成立之后，大学预科转为附属高级中学。校址毗邻华南女大校园。金陵的附属中学设于1924年秋，作为学生在毕业前的教学实习所，当时只设高三级一班。自1932年秋渐次添设班级，成为完全高级中学。1933年5月，金陵附属中学向南京市社

---

① 汤铭新口述、郝秀真整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儿童福利组工作概况》，《永久的思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105页。转引自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65页。

② 胡秀英：《金陵予我》2001年，胡秀英手稿。

③ 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598页。

会局立案，亦在教育部备案，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属高级中学<sup>①</sup>。

2. 学科建设。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的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立案、抗战爆发是课程设置的分水岭。创校初年，金陵女大只分为文、理两科。“学生学习中文、英国文学和修辞学、宗教、卫生学、美术等。他们并可自由在文科或理科中择一，前者有化学、数学，后者是心理学和英国史。”<sup>②</sup> 1925年后，金陵开始采用主修、辅修制（也称副修，下同）。“学生可以选一个主修系，一个辅修系。这个制度一直实行到1939年，才按当时教育部的要求，取消辅修系，只有主修系。”<sup>③</sup> 在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各大学课程分为：共同必修科目、分系必修科目、分系选修科目三类。故而，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都取消了辅修系。资料显示，金陵女大在1928年共设有生物学系、化学系、中国文学系、英文文学系、体育系、历史系、音乐系、数理系、宗教系、社会科学系<sup>④</sup>。立案后宗教系取消。抗战期间，金陵女大将英国语文系改为外国语文系，陆续停设了数学系、物理系、数理系以及哲学系。增设的专业有家政系、社会学系儿童福利组。另据吴贻芳在1980年代回忆，金陵文科主修系先后“有中文、外语、历史、社会学、音乐、体育、哲学等。理科主修系有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地理、家政、医预科和护预科等”。其中，“毕业生最多的是社会学系，次多的有生物、化学、历史、家政、体育、音乐等系”。<sup>⑤</sup> “当年社会系是‘红系’，毕业后谋事方便，‘条条通罗马’，新生入学，

---

① 黄洁珍：《从吴贻芳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部哲学硕士论文，1998年，173页。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金陵女子大学》，14页。

③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107页。

④ 《金女大新校长就职》，《教育季刊》卷4，第4期，1928年12月。

⑤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107页。

100 多人中绝大多数都选社会学系”。<sup>①</sup>

华南女大的系科延革大致相同。创校之初，学系设置比较混乱。立案后，华南应政府的要求，设立 7 个系兼家政专修科。1939 年取消主、辅修制度。下表<sup>②</sup> 列出华南女大开办各系科的延革：

表 5-26 华南女大系科延革表

科 目	开办时间	结束时间	备 注	
教育专业	1917 年	1952 年	并入教育专业	
宗教教育专业	1924 年	1930 年		
生物专业	1924 年	1952 年		
化学专业	1925 年	1952 年		
英文专业	1926 年	1952 年		
历史专业	1926 年	1940 年		1940 年为文史专业
公共卫生专业	1926 年	1930 年		1930 年被政府否决
国文专业	1928 年	1940 年		1940 年为文史专业
数理专业	1931 年	1951 年		
家政专业	1932 年	1951 年		
文史专业	1940 年	1951 年		

在华南女大，抗战前学生多报读文科专业；抗战期间，理科专业成为学生首选；抗战后，文理科学学生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化学和教育成为主要专业<sup>③</sup>，占学生总数的 50% 以上。

限于篇幅，本书无法一一详细介绍各个专业的具体内容。社

① 郑咏梅：《抗战时期金女大回忆片断》，《金陵女儿》，2000 年，48 页。

② 参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e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p. 127; 《教育部立案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一览》，1930 年，福建省档案馆 39-1-2; “Annual President's Report” YDSL, UB Archives, Box176, Folder3198.

③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1954), p. 127.

会学、教育、英语、化学等专业固然是金陵，华南的强项。但若与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相比，其规模和水平都相差甚远。因此，下文将集中讨论宗教教育、家政教育和体育教育等较有特色的专业。

### 1. 宗教教育。

在中国，宗教介入教育领域，是从基督教学校开始的。和其他基督教学校一样，华南女大和金陵女大创立初始，宗教教育就为办学多次强调。不过，“宗教教育”的宗教主要是指基督教。因此，她们的宗教教育只能称作基督教宗教教育。

华南女大在立案之前，就专门设立宗教教育专业，培训宗教教育人才。下表<sup>①</sup>所列的是1928~1929年度大学宗教相关课程的设置：

表 5-27 1928~1929 年度华南女大宗教科目表

系 别	课程名称	修读方式	学 分
宗教教育系	圣经溯源	二年级修	一学期 4 分点
宗教教育系	宗教大纲		一学期 4 分点
宗教教育系	旧约历史及宗教	专修必读	一学期 3 分点
宗教教育系	新约历史及宗教	三年及四年级专修	一学期 3 分点
宗教教育系	教会史	三年及四年级修	一学期 3 分点
宗教教育系	宗教史	三年及四年级修	一学期 4 分点
宗教教育系	圣经地理		一学期 2 分点
宗教教育系	耶稣对于今代人人生之教训	三年及四年级修	一学期 4 分点
宗教教育系	宣道法	四年级专修	一学期 2 分点
宗教教育系	文学美术中之圣经研究	四年级修	一学期 2 分点
宗教教育系	宗教科教授法	四年级专修	一学期 3 分点

1928 年立案之后，宗教教育专业被取缔，但基本宗教科目没

① *Hwa Nan College, Foochow China 1928 ~ 1929,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Archives of Drew Univ. at Madison p. 28.*



有取消。宗教列入各专业的选修课，甚至是必修课中。下表<sup>①</sup>列出与宗教相关的课程：

表 5—28 1930 年华南女大宗教相关科目表

所属专业	课程名称	开设目的	备注
史地系	教会史	研究最初教会之成立与发展，并特别注意于新教之扩张。	
史地系	世界宗教史	世界各种宗教之比较研究，并及于基督教之地位。	
史地系	中国基督教史	研究二十世纪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之发展，及其对于新中国之贡献。	
英文系	圣经之文学价值	研究西方文学与基督教思想之关系	
英文系	圣经中诗篇之文学研究	以文学眼光，研究诗篇之价值	
教育系	宗教教学法	研究圣经及宗教之解释方法，以阐明关于宗教之真理	
教育系	宗教教育之组织与管理	授予学生以组织宗教教育之目的及原理，并其管理之方法	
教育系	宗教教育之艺术	讲授宗教教育之利用图画、唱歌，及演述故事之技术，以引起儿童之兴趣	
教育系	基督徒人生哲学	研究基督徒个人生活之要点，如上帝之信仰、祈祷之价值、圣经之实用，及救赎之真义。	

① 《教育部立案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一览》，1930年，福建省档案馆 39—1—2。



教育系	养成基督徒人格之教育	授予学生以认识基督徒品格之特点，工作之标准，及其对于社会之影响	
教育系	基督教之社会思想	不详	

从课程设置来看，从建校开始华南女大大部分的宗教课程就是设为选修课；立案前后，宗教的相关课目也未曾减少。因此，立案对华南女大宗教课程的实际影响不大。“宗教教育”课程以基督教教义为主要内容，而且预设有价值标准。如上表的历史专业之中国基督教史课程目标是“研究二十世纪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之发展，及其对于新中国之贡献”；教育专业之宗教教学法是要“研究圣经及宗教之解释方法，以阐明关于宗教之真理”等等。

金陵女大的宗教教育也有类似的情况。立案前，宗教课是金陵女大的必修课。下表列出 1919 年金陵宗教系课程<sup>①</sup>：

表 5—29 1919 年金陵女大宗教系课程

课程名称	开设目的	备注
基督生平/The Life of Christ	四福音书的研究	每周 2 学时
基督教之成长/The Growth of Christianity	A 使徒行传和书信中的教会，强调保罗的生平及其对基督教的贡献；B 从一世纪教会到今日教会	每周 2 学时
基督教的准备/The Preparation for Christianity	A 旧约历史 B 旧约思想	每周 2 学时

① Bulletin of Ginling College (1919), YDSL, UB Archives, Box128, Folder2632.

哲学 27	人类宗教探求	授宗教之种类与发展	每周授课 2 小时
哲学 33	基督教发展史	分三期研究：(1) 初创时期；(2) 革新时期；(3) 19 世纪与 20 世纪时期。特别注重与东方文化接触之情形	每周授课 4 小时
哲学 36	远东宗教史	讲授印度佛教，及中国日本宗教之起源、发展及目前之地位	每周授课 4 小时
哲学 37	哲学及心理学的宗教研究	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研究宗教之性质，尤注意宗教与哲学心理学之关系	每周授课 4 小时，修读此课程前须读过 1、2 门哲学或得特别许可
哲学 38	宗教哲学	研究宗教性质、目的与理论和近代宗教著作家之附合	
哲学 45	基督教与近代思潮	讲授基督教与近代思潮	每周授课 2 小时
哲学 46	宗教教育学	讲授宗教教育学之原理，并略及其对于宗教教育学课程及实习问题之应用。尤为办理教堂及在学校担任宗教学者所需要	每周授课 4 小时

单就课程设置而言，金陵女大宗教教育水准要高于华南女大。在立案前，金陵女大在教授基督教的同时，已经引入比较宗教学、宗教心理学等课程。立案之后，金陵女大的宗教课集中转入哲学系，这有利于宗教学知识的系统集中学习。这明显优于华南将宗教课程分散入各个学系的作法。

但是，课堂教育只是华南与金陵宗教教育的一部分。为了保持基督教特色，两校都强调校园生活中的基督教因素。因此，宗教教育引进了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使其成为生活化的教育。1934 年，负责华南女大宗教教育的教师罗黎晞在《何谓宗教教育》一

书中提出，基督教宗教教育有三个目标：“一为当地社区培育基督教居民；二为国家培养基督教公民；三训练基督教的普世精神”。“基督教宗教教育要帮助孩子们成为家庭、学校、教会和国家的成员，使他们成为有用的基督教世界公民。”<sup>①</sup>很明显，罗氏坚信基督教宗教教育应该使学生不仅成为良好的市民，忠诚的国民，还要成为有国际视野的世界公民。基督教宗教教育俨然是最好的“公民教育”。华南女大基督教宗教教育设置于“家庭化”的校园生活。校方试图设置一个家庭化校园，让学生生活其中渐受影响；又安排种种宗教活动让学生参加。华南和金陵的校园工友们多为信仰基督教的女性。华南女大的校工们“深受宗教宣教的影响，愿意为‘上帝’，为‘救世主’服务献身，工作非常努力”。<sup>②</sup>抗战时期，负责金陵女大总务处膳食及管理工人工作的王师母也是位虔诚的女基督徒。来金陵前，曾长期在河南农村地区进行传教工作。<sup>③</sup>

卢爱德认为，“大学主要特质在于她的精神，若没有全面渗透入校园的基督教氛围，这种精神力量难以保持长久”。<sup>④</sup>为此，华南设立系列校园生活以保证基督教的宗教教育。1928年前，大学强制所有学生参加所有校园内的宗教活动。“早晨礼堂聚会，与主日教堂礼拜，每生均须出席，耶稣受难节之一星期，备有特别聚会，又有查经班之组织，以供学生研究真理。”学院学生分为学生自治

---

① Roxy Lefforge, *What is Religious Education* (Foochow: Methodist Herald Press, 1934), p. 77~89.

② 郭肇民：《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史概述》，《福建文史资料》，第20辑，109页。

③ 王馨恩：《怀念金陵——献给妈妈一份深切的爱》，《金陵女儿》，2000年，30~34页。

④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144.

基督教特点；在学生中，允许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一起学习，但应有足够数量的基督教学生以左右学校的各项政策，让学生群体保持基督教气氛；建立一些学科以促进学生的宗教知识，让基督教教义和信条成为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实际困难的因素。把宗教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应牢记，一位正直热情、有魅力的基督徒教师的个人影响可能比任何课堂教学都有效力。学校应提供机会让学生参与美好、灵性与理性的崇拜活动。在学生宿舍中提供基督教式的家庭生活。利用课外时间进行宗教教育和讨论”。<sup>①</sup>在大学内校方通过个人影响进行宗教教育；在大学外，校方通过服务教会/社会来强化学生信仰。卢爱德称：“我们不希望大学的发展会超过学生间个人接触的范围。”<sup>②</sup>正如华惠德所说的：“大学的基石在于宗教生活；而宗教生活则通过服务和个人影响加以实行”<sup>③</sup>。华南寓宗教教育于校园生活和校外服务的做法是成功的。1929年的大学报告指出：“假如志愿参加教堂服务可以视作一所大学宗教生活的指标，那么华南确是高水平的。”<sup>④</sup>一位西籍传教士说：“宗教被赶出了中国的校园吗？也许有些地方是如此，但绝不是在这儿。我想只要老师们真诚地和学生一起分享她的宗教生活，宗教就会在校园中存在。”<sup>⑤</sup>1930年，校方颇为自豪地宣称：

---

① Roxy Lefforge, "Som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Christian Educational in China today" *Educational Review* (1934), pp. 313~318.

② E. H.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26*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26), p. 261.

③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p. 30.

④ Grace D. Wong, "Hwa Nan College", *Foochow Woman's Conference, 1919~1930*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31).

⑤ Mary Mann, "Religion in Hwa Nan College", *Woman's Missionary Friend* (1930, Nov.) (Boston: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而定雅俗。”金陵宗教教育之所以让“肖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还得从金陵基督徒师生、宗教事业等方面说起。

在“肖我”的眼中，金陵“一般的教师，都是绝对新派”。“就平日讲授的意见而论，大概都根据基督的人格、人生观，及精神等等，来作耶教的真义。有时引用圣书的时候，无非将其中训语详细解释，或渐渐引用到现代问题。至于他们对于传教工夫上，甚觉大方自然。自我入校几年至今，他们只一次询问过我几句。”在同学方面，“凡非基督徒的同学在全体中不过十之二。然他们对于宗教的态度，也是极为融洽的。遇有礼拜，或其他宗教事业等，莫不与基督徒一致行动。静观他们的表情，并非屈从或被限制，实因全体同学中，非基督徒同基督徒从未分过界限，平时各走各的路，抱定两不相犯的宗旨，至于一切的课外事业，也据各人的才干而支配，并未有宗教的限制”。至于基督徒学生，“肖我”将其分成四派：一、“素称热心的”。“自幼生长在一个教会家庭，他们的耳濡目染，无非宗教训育和宗教事业，因此竟有独尊的误会。似乎除却耶教有几条优点以外，天下就没有并称的教义了。他们对于礼拜祈祷等等，是抱一个多多益善的主义。”二、“稳健派”。“凡遇宗教举动，就抱一个有无两可的态度。他们有时利害并不了然。因不喜多事，他们的信仰心，也就如堤前垂柳，随风飘扬摆了。”三、“冷静派”。“这一派同学的热忱，想被北冰洋的冷气冲散了。关于宗教事业，置之不问不闻。”四、“真有基督精神的基督徒们，他们的观念是去尽陈腐的迷信和虚文缛节。他们专诚吸取基督教优美的精神和纯粹的真理”，“对于各宗教的主见不偏不倚，思想纯正”，“可称为现代中国化的基督徒”。“肖我”还谈到学校青年会工作和日常礼拜。当时青年会“每星期晚间有宗教讨论，演讲者多半是本校师生。论题大都是各人对于宗教的心得或各种训勉言辞。此外，每星期四晚有默祷会半小时。全体同学毫



室，数年我参加主办这类主日学，教儿童歌、听故事、游戏。”<sup>①</sup>

## 2. 家政教育。

“家政专业”又称“家事学”，1873年美国大学开始设立家事专业。1914年和1917年，美国国会分别通过“Smith-Lever Act”，“Smith-Hughes Act”两个法案。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推广女子教育的家庭经济学，在城市设立女子公团俱乐部、女子职业养成所、乡村地区设立女乡村委员。联邦职业教育局(Federal Boar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负责管理包括女子家庭经济主题在内的职业培训。<sup>②</sup>到1943年有165所美国大学设有家事学学士学位课程，课程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儿童发展、家庭与社会关系、房屋与家庭管理、消费学、纺织与衣服、食物与营养、家庭看护等多个学科。美国家事学甚至设有专门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当时，家政专业是美国大学中重要的学科，也被视为女子职业教育的重要部分。然而，中国家政学发展受到许多新派人士的强烈反对。之所以如此，因为它涉及到妇女权力的问题。

女子是否需要家政专业？这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有关“贤妻良母主义”争论中的重要议题。许多人认为：学校进行家政教育即有推行贤妻良母主义之嫌，而贤妻良母主义背后又隐含着女性和男性在家庭权力结构上的不平等。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中许多人士对贤妻良母主义深恶痛绝，要求女性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sup>③</sup>。作为贤妻良母主义的象征，“家事遂为一般女子所看轻，关于这门科学，也少有人去研究”。<sup>④</sup>近代福州知名女性王孝英，曾任福州

---

① 胡秀英：《金陵予我》，2001年胡秀英手稿。

② Willystine Goodsell，胡衡臣著：《美国最近二十五年之女子教育》，《教育杂志》，第18卷，第3号，1926年3月。

③ 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年。

④ 素珍：《家事学在中国及美国发达之经过》，《华南学院校刊》，第22期，1943年1月，7页。

华南女大家政专科的科目：

表 5—31 1931 年华南女大家政专科课程表

课程名目	学习目的	学 分	备 注
家政学大纲	研究家政学之目的价值与范围	二学分	必修
衣服纺织学	以经济学及卫生学为主,研究各种纤维织物之质料及其应用	二学分	化学系学生亦须修读。每周授课一小时,实验二小时
衣服学	选择衣服之原理,及制造之方法	二学分	每周授课一小时,实验二小时
家庭布置学	研究美术原理,以应用于选择及布置家庭内一切器物	二学分	选修
烹饪学	研究个人与家庭之食品选择,烹煮及其供献之方法,并及于家庭经济与卫生	三学分	主修;每周授课一小时,实验四小时
儿童养育学	研究儿童之养育,自先天以至后天,自家庭以至学校凡关于儿童养育之方法,及营养不良之影响	三学分	选修
家庭看护学	研究家庭卫生之要点及看护家中病人之方法	二学分	选修
家庭管理法	研究家庭管理学之原理及其实用	三学分	必修
家事实习	学生寄寓于家政实习室,以便实习一切治家之法	四学分	必修
家政学教授法	研究家政学科之设备及其组织,编制家政科学程,并实地参观	三学分	家政学与教育学一并必修

1941 年,华南女大的家政专业一度与教育系合并称为家事教育学系,内设教育组和家事组。华南的家政专业有几个特点:一是强调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校方有专门家事实验室,让学生短期入住,负责维持家庭生活;二是主修少,辅修多。家政专业同

学不占学生多数（1948年主修家政专业的学生占5%<sup>①</sup>）；辅修家政的同学则不少。华南女大学生组成的家政社，1945年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参加<sup>②</sup>；三是所学偏重美国方式，“如美式窗帘、桌布图案的设计、家具、地毯的陈（铺）设、西餐的烹调，以及‘布丁’、‘果子山’等西式点心的调制及各式糕饼的制作，等等。在烹饪课中，学生还要学习美国家庭主妇在家宴客时的做法”。<sup>③</sup>华南女大的家政专业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主张“妇女回到厨房中去”的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对华南女大家政专业非常欣赏。他在参观华南女大时，“特地到了家政系，对该系所开设的课程和系中的各种设备甚感满意。通过参观陈仪认定华南女大办得好，尤其是开设家政系的做法可资仿效，于是下令开办福建省立女子家事职业学校”<sup>④</sup>。

但是，华南女大学生对家政学的理解既不同于倡言“女子回家”的陈仪，也不同于全面否定家政教育的王孝英。华南女大学生认为，家政学不是反对女子参政及职业权，也不是鼓吹女子回到厨房。它是男女都应讲求的科学。女子教育既为人之教育，就

---

① 陈淑圭：“Students And Student Activities of Hwa Nan College”（Spring 1948），Archive of United Board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Box176，Folder 3194.

② 《家政社活动概况》，《华南学院校刊》，第38期，8页。

③ 郭肇民：《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史概述》，《福建文史资料》，第20辑，102页。

④ 同上注。

女运动中的立场。长期主持华南女大家政专业教学的陈佩兰著文《漫谈男治外女治内的问题》<sup>①</sup>，专门回应社会上“结婚妇女应该从事社会职业吗？从事社会职业的妇女们应该保持独身吗？男子应该研究家政吗？”等问题。她认为这些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如何认识家庭关系，解决家庭问题。陈佩兰将其分为坚持男治外女治内的保守派，男女同样治外的激进派和治内治外男女平权的折衷派。她指出：保守派是基于“男子唯我独尊的心理”；“男子极端自私心理”；“尚有一种两性同具的心理，便是固执保守，并无其他原因”；而激进派则由于“自从五四以后，各种新思潮的激励，所谓‘办公’、‘应酬’的虚荣很摇动女子的心理，从崇拜方面来着想，个性强的女子便也想分一杯羹，跃跃欲试，个性弱者便自叹生不幸而为女子”<sup>②</sup>。

陈佩兰本人是个折衷派，认为上述两派都不可行。“所谓绝对式的贤妻良母主义，恐怕只能适合于落伍社会及国度里”，“至于反对贤妻良母主义者，是不平之鸣……不管她们闹到多么热烈，不久会偃旗息鼓的”<sup>③</sup>。因此，值得探讨的是“相对的贤妻良母主义”。她认同“女子专治内不管外事固然未当，女子专治外不管家事亦不合理，最好治内治外男女平权，女的应习家政，男的亦应习家政，至于各有专长，则可各在社会活动，将子女交与托儿所与幼儿园”。要真正实现这一理想，就应该“提高家政管理研究的价值，要使青年男女晓得要建设一个合理化与现代化的家庭，并不是‘厨房式老婆’或‘跳舞式甜心’所能胜任愉快，必须这一对家庭建设者主人主妇交互不断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教育自己，

---

① 陈佩兰：《漫谈男治外女治内的问题》，《华南学院校刊》，第41期，1947年5月，1~5页。

② 同上注。

③ 同上注。

才可以达到改善的目的与幸福的获得，所以家政教育实验对象应无可分男女”<sup>①</sup>。概而言之，陈氏的观点就是通过“教育”，尤其是“家政教育”来改变社会对家庭的观念，从而实现男女平等、建设新社会的目的。

金陵女大家政系设立相对较迟。吴贻芳在《金女大四十年》中说：“1940年在四川省教育厅建议下设家政系。家政系分儿童福利、营养、应用艺术三个组，课程有儿童发展、儿童健康、托儿所管理、普通心理学、营养学、膳食与疾病、烹饪学、应用艺术、生理学等，所以属于理科。家政系毕业生多在医院任营养师或在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工作。”<sup>②</sup>实际上，在抗战爆发前就有人向吴贻芳建议金陵设立家政专业。在1937年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会上，英国庚款委员会执行干事（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British Indemnity Fund）极力鼓动金陵设立家政专业，他并请葛德基、司徒雷登等人向吴贻芳游说。会后吴贻芳曾说，由于正在为地理和教育专业向英国庚款委员会申请基金，她不愿为此得罪这位执行干事，故而答应考虑他的提议。但吴贻芳又说：“照我看，我们和男性在大学设立家政专业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男人们老是追问我们，金陵既是所女子大学，为什么不设立家政专业？他们似乎只懂得家政学大众化的实际用途，而我们大学的老师认为，假若开办家政专业，就应该有大学的水准。这将意味着家政专业要有高度科学化的标准。”<sup>③</sup>由此可见，吴贻芳并非不愿意设立家政专业，但她认为，设立家政专业需要找到合适的教师，而金陵并不

---

① 陈佩兰：《漫谈男治外女治内的问题》，《华南学院校刊》，第41期，1947年5月，1~5页。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107页。

③ the letter from Wu I-fang to Miss Griest (1937, April 16),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910, p. 0255.



具备这一条件。抗战爆发后，金陵女大迁入四川。1939年大学报告中说：“金陵确有需要尝试设立家政专业。这不仅是因为女子大学应该设立家政专业，而且与近来大学发展的乡村重建工作有关。金陵的家政专业还应该与金陵大学的农学专业合作。”<sup>①</sup>1940年9月金陵家政专业成立。家政教育专业，一则注重家庭管理与家庭经济，一则注重食物营养与卫生<sup>②</sup>。为解决师资问题，吴贻芳还请华南女大家政专业负责人陈佩兰来校任教。金陵家政专业内容也与华南女大的家政专业相似<sup>③</sup>。家政专业颇受社会欢迎。据吴贻芳1941年的报告说：“家政专业广受欢迎，已成为金陵第三大专业，学生修读人数仅次于社会学系和英文系。”<sup>④</sup>

### 3. 体育专业。

近代中国体育史上，金陵女大女子体育专业是全国知名的学系。金陵女大体育专业的产生，必须从中华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谈起。“1913年旧中国教育部下达学校课程必需增设一门体育课程后，各校尤其是女子学校急需女体育教师。上海女青年会配合此形势，于1915年8月创办了一所女子体育师范学校。”<sup>⑤</sup>初时学生只有5人，到1919年已增加到29人。1920年3月的《青年女报》登载：“我上海中华妇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于女子身体之健全，有莫大之裨益。创办已历5年，成效显著，列

---

① “Minute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1938, Dec. 8), YDSL, UB Archives, Box148, Folder2914, p. 0575.

②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63页。

③ report of the home economics department, (1945, December) YDSL, UB Archives, Box 156, Folder2983.

④ the letter from Wu I-fang to Miss Hodge, (1941, April 12), YDSL, UB Archives Box 143, Folder2918.

⑤ 傅浩坚：《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2000年，香港浸会大学，53页。

届毕业 28 生，皆出就教习，无地不有，使女界前途，无论学校家庭，定能得完美之体育。以前校址，在昆山路 11.5 号，嗣以学生加多，房屋狭小，不敷分布，由全国女青年协会，集款置地。在荆州路 37 号建筑新舍，面积宽敞，空气充足，虽离城较远，似觉寂寞，然于卫生上获益匪浅。校址占地 17 亩，中有花园操场，网球场，篮球场，暨种种游戏运动之处。校舍宿舍计分三部。一最宏畅之健身房。纵 57 英尺，横 38 英尺。布置完备，光线透足，一层为学生办事及背书室。现有学生 35 人，内 16 生将于暑假毕业，可以出任教务，现课程计二年毕业。将来更求美备，拟改三年。课分两种，一是专修，如体操、游戏、运动、跳舞、拳术各种技能之实习。一是论理，如体功学、运动功用学、化学、测病、按摩、急救等理论。此种科学，为强壮体质之基础。我校宗旨协助人生体质之发达，养成世界完全壮健之女国民。”<sup>①</sup> 1921 年，该校校长是传教士白伟勒，副校长是金陵女大 1920 届毕业生郝映青。据统计，“该校办学 10 年，有 9 届毕业生，共 150”<sup>②</sup>。1925 年 9 月，这所体育师范学校从上海转移到南京与金陵女大合并。随同合并而来的，是该校的 4 位教员以及 16 位学生。“基督教女青年会不仅腾出学校给金陵，而且同意在 5 年内，每年支付 5000 美元，作为体育教育的费用。它还承诺帮助招收学生，指导有关学校尽可能合理地使用毕业生。”<sup>③</sup> 5 年后，女青年会不再负责金陵女大体育专业的经费资助，金陵女大体育专业完全独立。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的并入为金陵女大体育专业奠定下坚实的基础。“这是我国唯

---

① 《中国女界须知》，中国女青年会，《青年女报》，1920 年 3 月，13 页。

② 傅浩坚：《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2000 年，香港浸会大学，53 页。

③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53 页。

一的由教会兴办，培养女子体育师资的高教系科。”<sup>①</sup> 金陵女大体育专业的宗旨很明确：“在养成优良之体育指导，因年来国内对于是项人才之需要，殊形急迫。观乎晚近运动时之错误汇集，弊端百出，而尤以女界为甚。究其补救之道，唯有仰赖受有高尚教育及专门训练之女指导之努力而已。昔之教育者，往往以体育一项，付托于毫无训练之普通教师，或毕业生中之运动宿将，或小学教员之手。殊不知教育之背景，与夫科学之基础，实较精良之技术为重要。且唯有受过专门训练之体育指导，庶可与谋训练现代良好之公民。”<sup>②</sup>

在金陵，体育专业分为三类：“一为普通科，为全校学生所必修。自一年级至四年级。每生每周须有四小时之运动。其目的，不特使每一学生，有健全之身体，免除娇弱之习气，及矫正不良之姿势，且欲使其养成运动之习惯……又本科对于三年级或四年级学生，施以一学期之团体游戏或娱乐游戏之教授法，裨出校后，在缺乏体育教员环境之下，亦能略事指导，以应急需。”“二为体育专修科，学程定为二年。专为中学毕业后，以应社会之急需而设，其程度与大学略同，并照给大学学分。如再继续二年或三年，仍可得大学学士学位。此科学生，在入学之二年期间，定为特别生，但得同享大学学生生活之一切权利。毕业后，专供中小学校体育之师资，或女青年会及其他社会机关之娱乐指导。”“三为体育主修科，学程为四年或五年，给予大学学位。选修此科者，须自本科二年级起。其课程较体育专修科更为复杂，包有大学普通科之必修科目，必习之运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关于体育与

---

①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61页。

②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章程》（1936年）YDSL, UB Archives Box129, Folder2645.

一次体育会；包括班赛会和个人赛”。<sup>①</sup>

若是报读体育专修科，英文要求可以适当降低。校园内设有室外运动场和室内体育馆，供体育专业学生使用。根据曾芳苗的研究，金陵体育系配合设置的课程有<sup>②</sup>：

一是基础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有中文、英文、生物学、物理和化学（任选一科）、解剖学、生理学、教育学和心理学、伦理学。

二是专业科目：包括专业理论和技术实践课。

(1) 学科有体育行政、体育史、体育原理、人体机动学、体育建筑与设备、运动生理卫生、急救按摩和各种运动项目、运动发展史及其理论部分、教材教法、毕业论文等。

(2) 术科有体操、田径、游戏、舞蹈、篮球、排球、垒球、网球、射箭等。

(3) 选修课程：包括主修、副修，或个人爱好。如民众体育、统计学、社会学、哲学、逻辑学、英国文学、音乐等。

为方便介绍，下表列出一位1942年级体育专修科学学生的修读科目。<sup>③</sup>

---

① 胡秀英：《金陵予我》2001年，胡秀英手稿。

②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62页。

③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成绩单”，YDSL, UB Archives Box130, Folder2664, p. 0678.

表 5-32 金陵女大 1942 年級体育专修科某学生修读科目表

学年	修读课程	备注
1942~1943	一年级国文、一年级英文、普通生物学、普通物理学、个人卫生、教育心理学、社会体育、小学体育、体育活动、普通社会学、体育指导与裁判、音乐通论、体操教学法、三民主义、军事看护	
1943~1944	二年级英文、体育活动、童子军、解剖学与人体机动学、体格检查及改正操、体育原理及体育史、体育行政、体育教学法及试教、舞蹈原理及教学法、教育概论、伦理学、健康教育	
1944 年 6 月	体育活动、体育指导与裁判、体育原理及体育史、童子军、体格检查及改正操、体育行政、健康教育	毕业考试科目

金陵女大体育专业为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1936 年第 11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女团员“几乎都是金女大的校友”。<sup>①</sup> 金陵女大体育师资是全国一流的。主要师资如陈英梅、谢文秋、黄丽明、崔亚兰、陈月梅等人，都毕业于美国卫尔斯理女子大学体育专业。以 20 世纪 20 年代担任过金陵女大体育系主任的张汇兰为例，张是“我国第一位女体育学博士；第一位女篮球裁判；全国高等体育院校的第一任女教务长；全国第一位获‘国家体育荣誉奖章’的女教师；198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她颁发了首次设立的‘荣誉奖’”。<sup>②</sup> 张汇兰曾在 1924 年 12 月《金陵女子大学校刊》上撰文，文章题为《中国女子体育之需要》<sup>③</sup>。文中详细阐述了她的对中国女子体育发展的认识，也反

① 陈泳声：《一个与世纪同龄的金陵女儿的汇报》，《金陵女儿》，1995 年，22 页。

② 肖嘉玲、鲍蕙荪：《获五项“中国第一”称号的张汇兰》，《金陵女儿》，1995 年，8 页。

③ 张汇兰：《中国女子体育之需要》，《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4 年 12 月。



映了金陵女大发展女子体育的基本思路。张文大致上有三个论点：

①社会上缺乏真正合格的女子体育师资。“有的体育教员不过受了小学教育，或一两年中学教育，和一两年专门的体育训练。有的学堂聘请美国教员，设有专门体育的研究。他们固然有时是一个很好的球员，然而未必是一个好的体育教员。有的学堂聘请男教员，男子教员对于女子之心理与生理方面有研究的很少。纵然有几位，我们也不能专靠他们，因为这是我们女子的责任，不但如此，现在中国体育教员多半注重男子体育。研究体育者，与编写体育教材者，多以男子为标准，因此女子体育之教材，不能适应女子特别之需要，于是将男子教材稍加更改，以施于女子。这就是女子适应教材，不是以教材适应女子。这实在与教授体育的本旨正相反。所以我们若是要发达女子体育，当先有一种真正女子体育家，研究女子身体构造特殊，及心理特殊，然后方知女子体育当特别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女子体育教员在教授时当然较男子教员洞知女子之特性，施以适当的方法，达到体育的目的。”文中指出，女子体育师资必须具备人格、普通知识、技能知识、专门技能、自修与研究等基本素质。因此体育专业必须以4年的光阴进行多方面的培训，才能达到这些素质要求。

②体育教育不仅可以强健学生身体，还“可以使人受品格上的训练，显而易见，体育是教育最重要之工具”。体育“有最好的机会使学生的生活和人格，经过一番实验。健身房和运动场上，所有境遇内都含有属于德性、群性实验的机会。所以利用运动场，不但能发达身体，增进健康率，并且更能以利用栽培人的道德和社会的性质。简括言之，运动场就是文化时代最优的伦理社会实验场”。

③中国女性在体育教育上应与男子负同等的责任。“体育不单是一种技术，乃是教育之工具，造就良好思想，担负儿童教育之

责任。诸位！这种责任不仅在男子身上，女子至少应负同等之责任。希望我们女子自己可以研究中国女子体育而应用科学原理编写适合中国女子的教材，不致采取外国的体育教材，或借用男子的教材，或是专靠外国女子体育家担负我们当担的责任。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自己尽我们的天职，由狭义言之，为中国女子造幸福；由广义言之，为中国立巩固之基础。”

### （三）科研工作

金陵和华南科研工作相对薄弱。吴贻芳说：“金女大对科学研究开展不够，科学仪器设备不够完善。由于教师不足，专业教学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培养学生的创见能力注意不够。学校对通过独立探索写得颇好的论文没有进行表扬鼓励。学校没有办过专门的学术性刊物，所以有些教授的著作只得在校外各类刊物上发表。教师中的特殊贡献，或者说他们学术上的成就，也没有提出来让大家了解研究。”<sup>①</sup>

科研工作不尽如人意，有多方面的原因。经费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本章第一节对两校经费收入的分析，金陵和华南长期经费紧张，需多方搏节才能维持学校的运作，更遑论昂贵的科研费用。民国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补助政策有其倾向性。一般而言，政府的补助偏向非基督教大学，对基督教大学的补助偏向男女同校的基督教大学，在学科中偏向理工科。这些对金陵女大、华南女大非常不利。按1936年的国民政府私立大学补助款分配计划，私立厦门大学获补助款最多，达90000元。基督教大学中以燕京大学最高（60000元）。金陵女大只获补助12300元（金陵大学获30000元），华南女大的补助款只有8000元（福建协和获补

---

<sup>①</sup>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1983年），《吴贻芳纪念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08页。

助款 10000 元)。<sup>①</sup> 1937 年 7 月 10 日, 吴贻芳在一封信中说: “教育部的私立大学补助款分配方案已经拟定了。金陵女大再度获得 12000 元。其中 4000 元是中文教授的讲座费; 2000 元是艺术系的课本、器材费; 4000 元为物理、数学专业的讲座费; 2000 元是理科专业的课本、器材费。” “金陵女大的补助费没有增加, 我当然很失望。但再仔细研究补助款的分配, 我发现教育部主要偏向应用科学, 尤其是工科。因此, 象华南女大、金陵女大这样的女子大学不可能得到比前年更多的补助款。”<sup>②</sup> 吴贻芳和王世静等人也曾尝试向一些机构申请研究经费, 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简称中华基金会)<sup>③</sup>、英国庚款委员会。金陵和华南都得到中华基金会的少量财政支持。不过, 这些经费多用来充实急需的教学设备。吴贻芳还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过国学研究费。1929 年底, 吴贻芳致信托事部, 表示希望加入哈佛—燕京学社<sup>④</sup>。当时, 哈燕社资助的国内基督教大学有燕京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和福建协和大学等。同年 12 月, 金陵女大社会学系、中文系教师开会讨论申请加入哈燕社研究计划。“与会者觉得, 金陵女大应该向哈燕社申请图书经费和研究年费。”她们开列出几项研究项目, 诸如中国古典音乐、中国艺术、中国诗歌、教育、社

---

① 《二十五年度补助私立各大学》,《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36 年,74 页。

② “the letter from Wu I-Fang”, (1937, July 10<sup>th</sup>) YDSL, RG11, UB Archives, Box148, Folder2911, p. 0313.

③ 1924 年, 美国国会根据联合决议, 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在中国使用。于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 将这笔大约 12545000 美元的款项交给一个基金会掌管, 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中华基金会于 1925 年 6 月正式成立。由顾维钧、范源濂、杜威、孟禄等人任董事。费正清编, 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下),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436 页。

④ “the Letter from Dr. Wu to Miss Bender” (1929, Sep. 14), YDSL, UB Archives, Box 137, Folder2734, p. 0064.

会史、地理学等。由于哈燕社专注中国文化研究，金陵女大缺少必要的研究队伍，申请失败<sup>①</sup>。

其实，金陵和华南都有一些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比如金陵女大的陈中凡教授、龙冠海教授与华南女大的王孝泉教授。以陈中凡、王孝泉为例，陈中凡原名钟凡，字觉圆，别名少甫、觉玄。1888年，生于江苏盐城。自幼跟从叔父陈玉澍求学。先后入镇江承志学堂、淮安中学、两江师范学堂。1905年入光复会。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1917年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为研究员。不久任北大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北京女子师范国文专修科教员。其后在东南大学、广东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35年应聘为金陵女大讲座教授，直至1951年金陵女大被取消。陈中凡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史家。传世的名著有《古书读校法》、《诸子书目》、《经学通论》、《诸子通谊》、《书目举要补正》、《中国韵文通论》、《周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两宋思想述评》、《清晖山馆文集》等<sup>②</sup>。1982年病逝于南京。华南文史系主任王孝泉，字振先，华南女大第三任校长王世静的叔叔。日本早稻田法政学学士，先后任职福建省财政厅、教育厅和福建协和大学。他生平著述颇多，现已知有《福建财政史纲》（1936年初版）（Washington, D. C. :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77年重印）、《中国古代法理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中国厘金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比较而言，王孝泉与陈中凡工作最长、最稳定的地方分别是在华南女大和金陵女大。陈中凡在金陵女大工作共16年。而王孝泉也长期在华南女大任教。但是，陈

---

① “the Letter for Miss Bender” (1929, Dec. 9), YDSL, UB Archives, Box137, Folder2754, p. 0067.

② 姚柯夫编：《陈中凡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中凡和王孝泉在受聘入金陵、华南之前，都已是知名学者。大部分成名之作都是在受聘两校之前完成的。1943年陈中凡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文科集刊》(第一集)发表《西汉划时代的思想家——扬雄》、王孝泉也曾在1944年《华南学院校刊》(文史专号)发表过《论章实斋先生对于我国文史的贡献》。不过，这只是极少数的例子。他们的主要学术成果都发表在(校外)其他学术杂志。总的看来，华南和金陵为他们提供的是稳定的工作环境。没有自己的学术阵地，则是华南和金陵在科研方面的一大缺失。

#### 四、本章小结

本章从内部教育环境比较分析金陵、华南的异同。总的来看，金陵和华南是属于小规模的教学型大学。

金陵女大、华南女大行政管理都采取校长领导下的教授治校制。学生基督徒比例相对较高。她们奉行实用主义的教育模式，强调学习与实践的结合。科研能力不强。两校教育各有自己的特色专业，如华南女大家政专业、金陵女大体育专业。

从教育角度看，华南女大社会影响、教学实力远逊于金陵女大。这些差异在经费收支、校园建设、师生人数，以及系科建置诸方面表现得很清楚。本章的内容也很清楚说明这些差异。造成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校模式的不同。华南是单个差会资助的女子大学，而金陵则是多个差会联合支持的结果。收入来源的单一化使华南的经费收入长期处于紧绌之中，不利于招聘更多的外籍教师，更加不利于扩大捐助范围。相对而言，多个差会协同办学是金陵的优势。在第三章中已经谈过，金陵建造校园的经费之



## 第六章

# 性别角色的追寻：以合校争论为例

---

本章论述的是华南女大与金陵女大的性别角色，探讨两校在维护女性权力方面的努力。性别角色、女性权力本身就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涉及到性别理解的差异。故此，本章将以历史上华南女大和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的合校争论为例，从中讨论华南女大、金陵女大对性别角色的理解，以及维护女性权力方面的努力。在此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华南女大、金陵女大对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尤其对女子教育方面的基本立场。

民国时期女性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她们在社会权利架构中常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在许多人心目中，女性是柔顺、依附于人的形象。而金陵女大、华南女大中，师生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又是怎样的呢？在1937年金陵女大排演的话剧《杨小姐的秘密》、舞剧《嫦娥》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女子大学对女性社会形象的理解。舞剧《嫦娥》由孙淑铨、章映芬编剧，杭陈越梅、蓝干碧等人负责服装，陈诚恩慈等人负责布景，赵华娟等人负责音乐。据主办者称，“这次的演出，一方面是表演有价值的体育活动，一方面是为本校体育馆及游泳池筹募款项”。故事情节取材于嫦娥奔月、克桂砍树与月中白兔两个中国民间故事。在《嫦娥》一剧塑造了一

郑烈大学毕业了，受任了上海公安局局长，他是一个有理想而正直的青年，接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取缔‘大华俱乐部’”。最后，杨小姐被公安局逮捕，而“杨郑烈痛苦的知道了这个秘密”。编剧者在说明中总结说：“在这个悲剧里，我们看见了社会上种种矛盾的现象。在个人是伟大的牺牲，在社会却成了人群的毒害，在职务上是奉公守法，在个人的关系上却造成了绝大的错误。”<sup>①</sup>这两出戏剧反映了金陵女大学生对女性社会形象的反省、体会。

华南女大、金陵女大的政治态度也不保守。如一位华南女大女生所说：“虽然过去妇女在参政上，因环境关系，不无缺陷，因而失败，然而那总是过去的时代。今日二十世纪的时代中，怎么还允许那朽败了的灵魂存在着呢？”<sup>②</sup>与其他妇女组织不同的是，金陵女大、华南女大校方之提倡女权，其指导思想是崇尚服务工作，于对抗性的社会运动多采取回避的态度。金陵女大曾有一个称为“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即南京学生联合会金陵女大分会，该会于1919年由南京城内各校学生代表组成学生联合会总会。但金陵女大分会对其他学校分会活动并不热心，她们自称“本校师长对于本会素抱规劝之旨，故自有分会以来师生始终相安，殊少纷纭之意见，惟同学素抱稳健主义，与总会诸校友意见不一，不无出入处，故冷血之雅号，成势所不免耳”。<sup>③</sup>“稳健主义”确实是金陵女大在妇女运动中的基本特点。金陵女大学生认同中国妇女解放的目标。不过，她们说“现在我们在学校，不但从口头上高谈解放自由，(还)要从实际中磨炼自己”。<sup>④</sup>1924年一位金陵学生指

---

① 《杨小姐的秘密》，1937年，YDSL, UB Archives, Box129, Folder2643, p. 0582.

② 林洗：《妇女参政问题》，《华南学院校刊》，第35期，1944年5月，12页。

③ 张佩珍：《本校学生联合分会概况》，《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4年6月。

④ 云：《今日吾国之女子》，《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6年12月。

出“治人先治己；学校系养成人才之所，亦训练治己之处也”。  
“近来领袖二字，不知误杀几许青年！自认为领袖者，登台则手舞足蹈，讲论道德人格；挥毫则痛加批贬。但‘领’人所作之事，一己尚不能实行；不能‘领’己，焉能‘领’人？深望能以‘领’人之精神‘领’己，则人亦将举以为法也”<sup>①</sup>。1925年，一位金陵女生回顾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运动”时说：“女子参政运动理论上之根据，实际上之要求，欧美各国女权先进诸国已有定论。且在其女权运动史上早将女子参政的可能、需要，铸了铁证不容疑义。”（现在）“我们就应该计划个稳健、着实的步骤。”接着，这位同学提出组织团体、开展研究等计划。最后，她说：“我断定一分的实利，一分的光明，比万丈虚名好。我从今后愿邀同学一起斋戒说大话，用大名词。”<sup>②</sup>

“稳健主义”当然并不影响金陵女大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关注。金陵女大校史概览称，民国后女子中等教育逐渐兴起，“惟毕业生若再求深造，则以国内无女子大学，非赴欧美留学不可。然留学所费颇巨。仅资产富有者，始克成行。同时各中学校亦感缺乏受过高等教育之女子充任教职员，故由各中学校长提议，协办一女子大学”。<sup>③</sup>金陵学生以中国女子教育领导者相期许。第一届毕业生在《先锋》一书上说：“当中国每千位适龄女童只有三个能上学时，我们还可以感到自豪吗？”“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的特权和运气而窃喜，那么，金陵的大学教育根本不值一文。”<sup>④</sup>金陵女大陈岭梅认为：“知识上的差异，实一切不平等的渊源，故要求教育上的

---

① 《大学女生之责任》，《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4年6月。

② 飞碧：《女子参政运动的商榷》，《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5年3月。

③ 《校史概略》，《金陵女大年刊》，1933年，YDSL, UB Archives, Box 152, Folder 2955.

④ *The Pioneer*, p. 38.

导火线是省府主席陈仪<sup>①</sup>的一系列言行<sup>②</sup>。1938年福建省府自福州迁永安时，下令女职员留职停薪；1940年福建省府再令省营事业停用女职员，省立高级商专停招女生；省立农学院录取名次在10名以外之女学生，不收录<sup>③</sup>。这一系列事件是针对妇女教育权、职业权的严重歧视。事件背后“是有一套政治理念伴随着的，那就是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字公侠）的‘理想国’”。<sup>④</sup>陈仪此人是个贤妻良母主义者，一贯主张妇女回家。陈仪有个日本太太，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遂借抗战之机限制女子权利。1938年，陈仪在其《我的理想国》一书中说：“高等教育，女子是不必要的。即使女子也需要高等教育，那也可以为她们特设学校，只须家政、音乐、美术三科就够了。至多再添设体育一科，至于文科、理科、法科、工科等，实在无此必要。”<sup>⑤</sup>1941年2月，陈仪在华南女大演讲时又说：“本人对于女权素来很尊重，一向主张男女地位应该平等，但是，我以为工作的分野，则应以能够充分发挥双方的特长为原则。一般的说来，女子的特长，也可说是女子的美德：是慈爱、温柔、审美、细密……因为男女特长的不同，男女之间的工作，自然也不能一样。”<sup>⑥</sup>陈仪的言行令举国哗然，厦门大学女

---

① 陈仪，字公侠，又字公洽，号退素，浙江绍兴人。早年就读日本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1927年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职。1934年，蒋介石镇压“闽变事件后”，入闽就任福建省府主席。在其治闽期间行政建设方面颇有建树。1941年2月去职。1945年任台湾官公署行政长官、警备司令，是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直接责任者。1948年陈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因受蒋介石疑忌，在上海被捕，1950年枪决于台北。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03页。

② 吕芳上：《抗战时期的女权论辩》，《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89～90页。

③ 同上注。

④ 同上注。

⑤ 同上注。

⑥ 同上注。

生和福建妇女会等组织纷纷起来抗争，要求陈仪收回成命。全国其他地区报纸、期刊也刊载了20余篇文章响应。同年8月陈仪去职；新上任省主席刘建绪迫于各方压力，“立即取消了禁用女职员的通令”。1941年，“国民政府饬令各机关不得借故禁用女职员”。<sup>①</sup>陈仪事件只不过是第二波女权辩论的开始。不久，广西和重庆地区的报纸又继续为妇女职业问题发生过多次笔战。

这两波女权辩论，华南都没有直接参与讨论，甚至没有直接评论陈仪的言论。这与华南女大校方，尤其是女传教士不赞同学生直接参与激烈的政治运动有关。王世静回忆，程吕底亚“告诉我们，游行的理论是救不了中国的。她催促我们应该为国家做些事”。<sup>②</sup>女传教士对女子参政运动存在着不同意见。蒲星氏于1946年称：“对于妇女参加政治工作，在美国已经逐渐达到，中国则距离尚远……我的意见，妇女必须谋自身的健全，知识能力，充实丰富，然后才可谈到参加政治工作”<sup>③</sup>。但这并不意味所有的女传教士在妇女运动中都持消极的态度。1916年，康师姑在致家人的信中书说：“太令人惊喜了！这些小家伙竟然说：妇女应该像男人一样帮助自己的国家；女子的智能虽然与男人不同，但同样是有价值的。她们应该走出家门，应该有更多的权力领导社会生活……”<sup>④</sup>

她们与其他妇女运动不同的只是实现方式。华南女大校方在

---

① 吕芳上：《抗战时期的女权论辩》，《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89～90页。

② Lucy C. Wang, “An Appreciation”, Hwa Nan’s Celebration of Lydia A Trimble Jubilee, 1939, YDSI, UB Archives, Box177, Folder3271.

③ 蒲星氏：《梦想的大学》，《华南学院校刊》，第42期，1947年，1页。

④ Graham, Gael Norma,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U. M. 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 Bell & Howell Company, 1994), p. 239.



人……随乎人者，则因历史风俗习惯之不同，积渐影响其能力。苟能改造历史，转移风俗，养成新习惯，则凡男子所能胜任者，安知女子不可以为优？”“男子人也，女子亦人也，在教育机会均等以前，女子所求者，在于享均等之权利，教育机会均等以后，女子所求者，又在广设所好学科，广开职业途径，使女子于治家或充任小学教师以外，兼有服务社会供职国家之机缘。”总之，“一、男女教育均为‘人’的教育，似宜就其性之所近，发展所长，不宜绝对区分，致生畸重畸轻之弊。二、女子宜有职业，更可服务社会，训练妇女，宜用相需相成的眼光，俾为多方面之进展。不宜限定数种职业或数种学科转以湮没其才质。三、各级教育标准，宜按各人身心发育之程度，不能纯用客观之眼光，从前学校教育，病在凌杂无章，近今学校教育，又病在呆板繁重”。<sup>①</sup>

与陈仪“女子不需高等教育”的论点针锋相对，校长王世静于1940年2月在福建《南方日报》上撰文《私立女子教育问题》，专门讨论高等教育对女性的重要性。文中首先强调教会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我们福建，在私立各种教育中，女子教育自小学中学以至大学，都有他的相当历史和地位，这也是不可抹煞的。”文中论点是：（1）反对政府对女子教育的规限，为女学争取生存空间。“我国女子因受数千年政体压制和民间思想的锢蔽，大多数还守着不出户的习惯，自动求学和允许与男子同时求学的，仍居少数。万一政府把提高和限制的绳尺，遽加女子身上，是无异阻止她向上的途径。私立女校奉功令的，只好相率关门。”“我并不是只顾招生不顾程度的人，但是这种状态之下……凡在可能范围之内，都有容许私校招收的余地。”（2）女子教育应强调精神和人格的训练，

---

<sup>①</sup> 《教育部颁发女子教育问题十项意见书》，《华南学院校刊》，第10期，1942年3月，6页。

政府应适当予以物质补助。“应注重于精神发展,而略于形式设备。私立女校经费有限,所以能维持永久逐渐发展的,全靠教职员学生,本着牺牲服务爱人如己的精神,耐劳耐苦,努力不懈”。当局“应该从精神方面,特别鼓励,养成国民自动吃苦的能力。对于形式方面,或酌加补助……”<sup>①</sup>

综上所述,金陵女大、华南女大都以发展女子教育为己任,对发展女子教育并不保守。她们接受的是美国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妇女运动的影响。自由主义妇女运动强调社会改良,提高女子教育,实现机会平等。这就是她们所说的“稳健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在妇女运动中持保守的立场。理解这一点,对下文分析华南女大与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大与金陵大学的合校争论<sup>②</sup>是非常重要的。

## 一、华南女大与福建协和大学的合校争论

民国时期,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之间,华南女大与福建协和大学之间曾不断就是否合校展开争论,两所女子大学多次面临被合并的危险。以华南女大为例,据华南与福建协和争论的当事者回忆:(1949年前的)“十几年中,两校曾多次提出联合的问题,但不仅不成事,双方还因此搞得不友好起来……”<sup>③</sup>

---

① 王世静:《私立女子教育问题》,《南方日报》,南平,1940年2月。

② 在描述合校争论之前,在本书中,合校争论分为合并(incorporation)与合作(cooperation)两个不同的范畴。合作是双方彼此独立,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合并则涉及到行政权力的关系。

③ 陈贞寿:《福州大学简史》,《福建文史资料》,第23辑,福州:省政协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0年,4页。

## （一）第一次合校争论

在福建地区，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只有两个：华南女大和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大（以下简称华南）由美以美女布道会/W.F.M.S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在1908年创立，是一所专门女子高等教育学府。而福建协和大学（以下简称福建协和）缘于“1910年爱丁堡世界传教士会议，因为该会议号召传教士在世界各个战略中心建立教会大学；会议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提议中国的战略中心应该是北京、南京、成都和福州这四个城市”。随即，“代表六个对此感兴趣的差会所组成的福建差会委员会于1911年宣告成立”<sup>①</sup>。事实上，参加福建协和大学的有美以美会、美部会、圣公会、厦门归正会。1916年，福建协和大学正式成立。美以美会对福建协和大学影响很大。该会传教士庄才伟 (Jones, Edwin Chester)、高智 (John Gowdy)、会友林景润、牧师杨昌栋都是该大学的校长。只有1947至1948年的华人校长是美部会的陈锡恩。福建协和大学最初成立时，只是所男校。但1932年，协大开始创设女部，女生共20人。1936年，协和大学有学生136人，其中女生32人（当年华南有学生共76人）；协和大学女部参考燕京大学女部的办学方法（设立单独的女子宿舍、男女合班上课等）。然而，协和大学校方希望与华南女大合校，组建一所更大规模的学府。

事实上，华南与福建协和的合校倡议最早始于1922年巴顿调查团。该团对福建基督教高等教育考察后认为：“此区因内容有限，应行维持目前福建基督教大学（按：福建协和大学）为唯一机关，办理初高级专校之课程……神学之高深功课，应由协和神学院之教员团办之，作为专校课程之一完全分子……因鉴于华南女子高

---

<sup>①</sup> 鲁珍晔：《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107页。

和建筑不能令人满意。但他们也承认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善。可他们只想着要我们加入福建协和大学，帮助福建协和发展。除了使设备增加外，合校将令我们一无所有。是的，他们说会让我们维持自己的身份……但我们这里工作的人都知道是他们（按：葛德基）想要吞掉我们（swallow us）。我们已经掌握到葛德基他们向你们证明和解释的‘总体性计划’——但葛德基不会注意什么细节。对他们而言，细节可以留待日后考虑。但‘细节问题’正是我们最关注的。”<sup>①</sup>

葛德基计划得到了福建协和与美国联董方面的热烈响应。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以及1932年成立的美国联董（A. B. C. C./Associated Boards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sup>②</sup>，都强烈要求华南和福建协和等基督教大学进行合校工作。

美国联董正式成立时，福建协和大学等10所中国基督教大学成为联董创始成员。华南女大曾于1922年获纽约州立大学（SUN-Y）临时特许，可以向学生颁发纽约州立大学文凭；但学院需要获得正式永久立案。以纽约州立大学的标准，颁受正式永久立案的大学至少需要50万元的年收入（华南当时的年收入只有9万余元）。唯有加入联董，华南才有可能获永久立案。联董也欢迎华南加入，但条件是华南必须同意与福建协和大学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福建协和大学方面更迫切希望两校实现联合办学。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于1934至1935年到美国活动。“为促进联合，林景润愿意将校长职位让给华南校长。双方合校之后仍用华南的校名，或

---

① “The Letter from Hwa Nan’s Board of Managers to Fukien University” (June 28, 1928), YDSL, UB Archives. Box 114, Folder 2476.

② Martha Lund Smalley, Karen Jordan, *YDSL, UB Archives: Record Group NO. 11*.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1982.

更适当的名字，或是华南方面喜欢的其他校名。”林景润认为，“问题很简单：是保留两间在政府教育势力竞争下迟早完蛋的小学院；还是联合她们，从而成为社会上‘可服务福建人民的高素质’学府。”<sup>①</sup>

然而，华南固然想加入联董，希望从联董中获得募集资金上便利，顺利获得纽约州立大学的永久注册；但却不愿与福建协和合校。对于联董与福建协和大学的要求，华南与他们函电往来，谈判了多次。

1932年6月24日，华南校董会秘书富品德(Hays)致信联董执行秘书葛思德(B. A. Garside)。信中声言：“华南关注所有的合校计划。但是我们的态度非常清楚：学院的独立性不可以受到丝毫损害。对于目前的合校计划，我们的态度也是如此。华南为中国这一地区的妇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假如目前的合校计划对华南学院生活有丝毫改变的话，学院是不会答应的。”<sup>②</sup>富品德的信很快有了回音。8月1日，葛思德回复富品德说：“贵信中‘假如目前的合校计划对华南学院的生活有丝毫改变的话，学院是不会答应的’的词句令我们失去了合作的基础……当然，我确信这不是您原本要表达的意思”<sup>③</sup>。此后的两年，华南、美以美女布道部与联董、福建协和方面唇枪舌剑，讨价还价。华南虽然不乐意与福建协和合作，却又不愿意被联董以及其他基督教大学排斥在外（当时只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华南未参加联董）。联董则坚持华南与福建协和的合作是接纳华南成为会员的先决条件。联董

---

① Roderick Scott,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4), p. 72.

② “The Letter from E. P. Hayes to B. A. Garside” YDSL, UB Archives, Box 176, Folder3199, p. 1176.

③ “The Letter from B. A. Garside to E. Phaypes”, YDSL, UB Archives, Box 176, Folder3199, p. 1178.



加入联董之后，华南与美以美女布道会即改变了对“A计划”的态度。王世静等人开始以拒绝迁校为由，反对“A计划”。1935年4月24日，王世静致信葛思德：“至于今年秋季华南迁出现校址的事项，我再次重申：这是不可能的。一所大学怎么可以在别人的校园内保持自己的独立呢？”王世静认为“当初合作委员会清楚讲明：华南会搬到福建协和附近的新校址内……”<sup>①</sup>（按：可以参考协和教务长徐光荣所谈A计划中，华南搬入福建协和校园的说法）。其实，华南根本就不赞同与福建协和的合校计划。为支持自己的论点，华南还请来福建省教育厅向华南董事会发表声明。声明中除肯定华南的办学成绩外，特别指出：“迩来社会上传闻政府将实行男女合校。此纯属不实之谣言……教育当局切望你们有更坚定的精神，去完成建设女子大学的任务，无须为谣言所滋扰”<sup>②</sup>。

同年，美以美女布道会致信联董，以王世静等华南教职员反对华南搬离原仓前山校址为由，正式向“A计划”提出异议。她们威胁说：“许多时候都发现：让中国同伴觉得凡事都由美国方面不讲情面地执行，是极不健康且危险的”，“同样的计划曾在齐鲁

---

① “The letter from Lucy Wang to Mr. Carside” (April 84, 1936), YDSL, UB Archives. Box114, Folder2476.

② Bureau of Education of the Fukien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e Letter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Hwa Nan College”, YDSL, UB Archives. Box114, Folder2476.

大学实行过，结果几乎导致整个文理学科的崩溃”<sup>①</sup>。1936年5月19日，华南的美国托事部投票通过反对与福建协和大学合校的决议。当年6月，美以美女布道会正式去函联董拒绝参加合作委员会联席会议。第一次合校计划就此搁浅。

## （二）第二次合校争论

抗战爆发后，13所基督教大学之间的联系合作有所加强。1939年，美国美以美会与监理会联合成为美国卫理公会。长期支持华南女子学院的美以美女子布道会（W.F.M.S）也随之被撤销，并入卫理公会女子服务部。1946年全国13间基督教大学校长开会，议决：“把战前的13校并为8校，其中除3校不得超过1500人外，余不得过1000人”<sup>②</sup>。在此情况下，华南与福建协和的联合又提上议事日程。

此次合校在神学教育的合作方面取得一定成绩。抗战时期，

---

① “The Letter from Nicholson to McConnell” (July 11, 1935), YDSL, UB Archives, Box 176, Folder3199, p. 1208. 所谓齐鲁大学的案例，据传教士郭查理（Charles H. Corbett）的描述，山东齐鲁大学是在1901年义和团事件至1910年间，山东地区基督教学校经历两次大规模的合并，在济南建立的。当时主持登州文会馆的美国长老会教士狄考文（Calvin）、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库寿龄（Couling）等人都强烈反对合并动议。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差会之间的分歧。比如库宁认为：“浸信会不能和长老会在人员、资金方面保持合作。”但随着合并的成功，狄考文、库宁等人都放弃了原先的反对态度。根据巴顿调查团的想法，山东地区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合并集中是减少教育资源浪费的途径。从1924年开始，原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医学院并入齐鲁大学。齐鲁大学开始男女同学。1925年，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报告认为：“一年来的实践证实了我们对医学专业男女同学的可行性。女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有自己的地位，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在处理男女同学问题上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Charles H. Corb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1955. pp. 61~67, 123~127. 很显然，齐鲁大学本身并不认为合校令自己的文理科陷入崩溃。

② 庄泽宣：《抗战十年以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2页。

华南、福建协和大学就开始酝酿与福建协和神学院在神学教育上的合作。“1943年，章文新教授（Jones, Francis Price, 美以美会传教士）来闽。在福州的协和道学院（即福建协和神学院）召开福建神学教育研究会，参加者有福州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卫理公会等三公会的负责人，以及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真学书院及协和道学院的代表，各公会领导人主张道学院与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作，改为大学程度。”“凡是正式高中毕业入协和神学院者，念完两年之后，男生可到协和大学再念两年，女生可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再念两年，而后毕业。”<sup>①</sup>神学教育的合作为再度联合打开了缺口。但华南校方仍对合作计划怀有戒心。1943年王世静致信美国差会：“我很高兴金陵吴贻芳校长向你们反映了中国女子学院的办学困难（按：吴在座谈中坚决反对男女合校）。我深信，组成战后重建委员会的工作必须把女子学院的因素考虑进去，应该有足够的条款保障她们在战后为国家发挥独特的贡献。”<sup>②</sup>

由于章文新等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正式开始介入合校运动，华南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令王世静为首的华南校方同意加入联合，卫理公会华南区教育总干事陈芝美（王的姐夫）以及卫理公会远东区总干事葛惠良（Cartwright）多次向王劝说。劝说的重点当然还是一个——钱。葛告诉王：“假如有足够的钱，使得华南可以保持以往的学术水平，大部分人都乐于见到华南作为女子学院继续存在。”但葛氏认为：由于战后中国物价飞涨，办学费

---

① 杨昌栋、刘扬芬、严子祺：《卫理公会神学教育机构的沿革》，《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福州：福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29页。

② “The Letter from Lucy C. Wang to Evans” (Sep. 22, 1943), YDSL, UB Archives, Box 176, Folder3209, p. 0595.

用剧增，合校是必然的措施。葛惠良的信中还说：“因为陈芝美是王世静的姐夫，所以他们这层关系在劝使王世静加入合校计划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影响。”<sup>①</sup> 在他们劝说下，王世静终于同意与福建协和大学、协和神学院合作。王世静说，经过“多番考虑，为了中国基督教教育和基督教运动的利益，我们华南会放下以往的尊严，投入联合的计划中”<sup>②</sup>。三所学校亦达成了合作的协议。1946年，福建协和大学、华南与福建协和神学院每校选出5位代表，组成联席委员会。委员会选举陈芝美为主席。联合会确定“三校联合后以福建协和大学原校址魁歧为校址”等重要决定。但美国卫理公会女子服务部（前身是美以美女布道会）组成的托事部再次对联合运动投下了反对票。1946年9月，王世静前往美国华南托事部述职。王世静报告了抗战以来的办学情况：“希望学院在与福建协和大学合作的新校园中可以有自己的教堂、家政系、音乐系以及社会服务中心的足够空间。”但华南托事部显然对合校计划不感兴趣，她们告诉王：“既然联合校园的发展还是将来的事，托事部认为不必操之过急”<sup>③</sup>。事实上，她们并没有作好华南迁校，与福建协和合校的打算。筹建华南新校址的工作同样是遥遥无期。<sup>④</sup>1946年后华南、福建协和与福建协和神学院再没有相关的跟进协议。

---

① “Copy of Letter from Dr. Frank T. Cartwright to Rev. E. H. Ballou, Foo-chow, March 7, 1946”, YDSL, UB Archives, Box 176, Folder3198, p. 1148.

② Dr. Cartwright, “Reports and Communications from China” YDSL, UB Archives, Box 176, Folder3186, p. 1178.

③ “Minutes of Meeting Hwa Nan College Committee” (Sep. 10, 1946), YDSL, UB Archives, Box 176, Folder3186, p. 2221.

④ “The letter form Lucy Wang to Louise Robinson” (Feb. 5, 1947), YDSL, UB Archives. Box114, Folder2477.

### (三) 合校争论的结束

朝鲜战争爆发后，华南与福建协和与美国方面断绝了往来。1950年12月，两校行政和教学经费改由福建省政府补助。1951年2月16日，两校务委员会应政府要求共同组成联合筹委会（按：第三次）。政府为推动两校联合，在福建协和校部组织了“爱国主义动员周”活动，“把两校员工生集中到魁歧部统一组织学习”。据称，“经过这一系列有计划的思想教育工作，初步做到了‘思想接办’，‘思想联合’，而联合筹备阶段也就在4月12日学校成立典礼的热烈欢快的气氛中胜利结束”。<sup>①</sup>

华惠德1954年在《华南女子大学校史》中回顾了合校争论。她说：“多年来，有关华南女子大学和福建协和大学联合的事宜一直在讨论着。可由于两校相距太远，彼此的合作十分困难。对许多人来说，华南学院从如此美丽的地点搬出去，损失太大。合校后的好处无法补偿这一损失。”“福州圣公会主教恒约翰(Hind)也反对这项动议，因为华南对福州地区宗教生活的影响是合校之后所无法弥补的。数年之后，他说：‘人们都乐于见到在人口密集区里设立巨大的基督教中心的价值。如果学校只是单纯为了学习和研究，它完全有理由坐落在宁静的郊外（按：指福建协和大学所在地福州郊区魁歧）。但如果它还有传布福音的目的，那么它完全有理由基于社区和福音传道的需要而设立在人口密集区（按：指华南所在地福州仓山区岭后路）。从一位传教士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华南留在福州有着巨大的作用。”<sup>②</sup>“甚至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干

---

① 陈贞寿：《福州大学简史》，《福建文史资料》，第23辑，福州：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0年，5页。陈文中的魁歧部，即是福建协和大学的校址，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仓山的校址相距甚远。

②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1956), p. 69.



事贾腓力博士 (Dr. Frank D. Gamewell)<sup>①</sup> 也赞成小学院, 反对大的联合。他说: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 我始终坚信正规学制的小规模学院在促进基督教对个人生活方面的作用。我也认为在朝向大规模的联合中 (按: 指葛德基计划), 我们失去了原先必要而基本的要素。从建校初始, 我就对华南有所了解, 亲眼看着它在程吕底亚校长的领导下发展壮大。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在中国没有一间学府可以像华南这样对中国产生更明智而持久的基督教影响。’” 华惠德最后说: “在音乐方面, 华南和福建协大还是可以彼此合作的。举例而言, 1935 年圣诞节前一周中, 两所学府共同组成的合唱团举行了烛光音乐会。”<sup>②</sup>

对于华南的不合作, 福建协和大学自然非常不满。1954 年, 原福建协和大学教务长徐光荣 (R. Scott) 将两校合校失败的矛盾详细抖露出来: “华南她们拿出大把的理由来反对联合”。徐光荣列举了双方的争论焦点。<sup>③</sup>

---

① 贾腓力 (Frank D. Gamewell), 美以美会传教士。1881 年来华, 1889 至 1900 年任美以美会北京汇文大学 (The Methodist Peking University) 教授, 1901 至 1908 年, 任美以美会在华教育干事, 1912 至 1930 年任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总干事。一度负责编辑《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②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1956), p. 69.

③ Roderick Scott,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4), pp. 72~73.

表 6-1 徐光荣所列华南、福建协和合校争论的主要观点

争论焦点	华南女大的理由	福建协和大学的观点
女性教育	华南学院是为中国受教育女性着想。计划联合后,中国只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间女子专门大学;可两间女子大学对中国而言已经太少了	妇女的事业已经在中国赢得胜利;在中国对女人的歧视还少过美国
差会控制	华南服从于单一差会的管理(笔者按:指华南是美以美女布道会专门负责)。通过华南,美以美女布道会可以向其学校和教会提供稳定数量的教师和宗教工作者。华南担心联合之后,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福建协和大学确信:只有尽可能实现差会间联合办学,才能够培养出合适的领袖
教会色彩	华南有全国最高的学生基督徒比例(99%),而福建协和大学同当时中美两国的男子大学一样,已经半世俗化了	福建协和大学确信:自己和华南同样是基督教化的大学。
校园生活	联合计划中华南将搬离原校园。但搬迁不能够保证原有稳定而活泼的校园生活	福建协和大学认为:这样的尝试是值得的
身份保持	无论书面如何保证华南的办学特色不受侵害,但由于福建协和比华南女子大学的规模大很多,所以华南很难维持自己的身份/Identity	福建协和大学认为:应以“大局为重”/the good of the cause

按:表中“争论焦点”是笔者的概括

双方列举的理由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反映了当时争论的激烈程度。无独有偶,金陵女大也发生过激烈的合校争论。

## 二、金陵女大与金陵大学的合校争论

与华南女大相似，金陵女大也与另一所基督教大学——金陵大学，同在一座城市。两校也发生过多次的合校争论。金陵大学的创立早于金陵女大。据该校称，“本校于民国前二十四年（按：1887年），由美以美会傅罗先生首创，称汇文书院”。“民国前二十一年，基督会在南京鼓楼附近创设学校一所，称基督书院，推美在中先生为院长。民国前十八年，北长老会在户部街亦设立一学校，名为益智书院，推贺子春先生为院长。”“民国前五年，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改称宏育书院”。1909年，宏育书院和汇文书院合并，改称金陵大学。美以美会传教士包文为校长<sup>①</sup>。

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大间的合校争论必须从纽约州立大学的特许证说起。1911年4月19日，金陵大学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处获得临时特许册，规定：凡金陵大学毕业学生的学位“改由纽约大学校董会检发，转致金陵大学堂监督，发给毕业学生”。<sup>②</sup>当时金陵大学没有在中国政府教育部门立案。换言之，金陵大学的毕业文凭是中国政府不承认的。但纽约州立大学颁发临时特许证意味着金陵大学学生可以直接领到美国大学的毕业证书，得到美国教育当局的承认。这不仅使金陵大学有法律依据，还为毕业生直接升入美国研究院学习铺平了道路。正如金陵大学章程所说，“此后

---

① 《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年）高时良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581～582页。

② 同上注，588页。

凡在本堂毕业者，即无异在美国大学校毕业也”。<sup>①</sup> 1913 年金陵女大尚在筹划建立阶段，创校者曾考虑向纽约州立大学申请临时注册。但纽约州立大学拒绝在一座城市内同时颁授临时特许证给两所高等学府。1914 年，金陵女大筹划者“投票通过，要求金陵大学托事部<sup>②</sup> 附设一个委员会作为金陵女大的托事部，代表金陵女大的利益”。“1916 年 3 月，金陵大学托事部同意增设五个妇女代表席位，成立金陵女大委员会负责金陵女大的特殊需要。”“根据这一协议，女大成为金陵大学属下一个有独立管理委员会、独立财政的机构。”<sup>③</sup> 这样，金陵女大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毕业生享有金陵大学毕业生同等的权利。这一办法是有代价的。1919 年金陵女大首届毕业生毕业时，金陵女大发现：金陵大学的名字也出现在毕业证书中，而且“作为独立女子大学的金陵女大常被人误解成金陵大学女部（woman's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不仅如此，金陵女大的土地、建筑都必须写上金陵大学托事部的名字。若从美国的法律角度上看，金陵女大只是金陵大学托事部的附属学校<sup>④</sup>。在德本康夫人（Mrs. Thurston）、吴

---

① 《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 年）高时良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581~582 页。

② 所谓托事部（Trustees），是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美国差会管理部门。由于当时的中国基督教大学都是英、美等西方差会创办的，从法律上讲，大学的财产也是属于美国差会的。因此，除了设在中国的校董会之外，美、英两国的差会还另设有托事部。托事部拥有学校的财产所有权以及行政最后决定权。金陵大学等基督教大学之所以可以在美国教育部门获得正式的注册，承认学历，就是因为这些大学以美国托事部的名义向美国教育当局申请的结果。1928 年，基督教大学在中国政府注册后，托事部改称作创设人委员会，仍然拥有财产所有权、行政权；只不过以极低的租金将校产租给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会使用。

③ “Incorporation of Ginling College Presented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March 2, 1934），YDSL, UB Archives, Box127, Folder2619, p. 0457.

④ *Ibids.*

贻芳两任校长治校期间，金陵女大就两校之间关系问题作过多次讨论。

### （一）德本康夫人治校期间的争论（1915~1928）

作为金陵女大的创校者之一，德本康夫人对金陵女大依附于金陵大学之下的情形并不满意。1920年，她回美国休假时，专门就此问题向金陵大学托事部金陵女大委员会提出异议。她要求委员们考虑成立独立托事部的可能。委员们告诉德本康夫人，要纽约州立大学在中国一城市中同时承认两所大学学历是不可能的。她们建议德本康夫人考虑在美国其他地方教育当局谋求单独注册。<sup>①</sup>但是，由于德本康夫人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募集资金、兴建新校舍、聘请师资等方面，这个提议最后不了了之。1920年，金陵大学搬到南京鼓楼西坡的新校舍。1923年，金陵女大也搬入鼓楼陶谷的新校址。金陵女大的新校址毗邻金陵大学，如德本康夫人所说，新校址“位于金陵大学的东面和南面，距离很近，有利于两个学校之间的密切合作，但又没有近到容易引起财产纠纷的程度”。

确实，两校迁入新校址后没有发生财产纠纷，但合校争论却从此而起。德本康夫人抱怨说“自从1923年金陵女大搬入新校园后，与金陵大学的关系就变得尖锐起来”。<sup>②</sup>由于校园接近，两校加强合作，甚至合并的呼声一直存在着。除了金陵大学提出合作要求外，负责华东基督教高等教育工作的传教士葛德基也在积极推动合作计划。1922年，华东地区的基督教大学顾问委员会成立。

---

① “Minutes of Ginling Committees of the Board of Trustee of the Univ. of Nanking” (1920. 12. 13), YDSL UB Archives, Box124, Folder2591, p. 0850.

② “Ginling and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28, sep. 8), YDSL, UB Archives. Box143, Folder2845.



女大学生更喜欢较为通识性的课程，不像金陵大学男生那样要求有更专业性的课程。”德本康夫人认为，这与事实不符，金陵女大学生也要求更为专业性的课程。再有，支持合作的第4条理由指出，金陵大学受社会上男女同学影响，才要求与金陵女大加强合作。她也不同意这一看法，反而认为，金陵大学学生要求男女同学，才是促使金陵大学支持合作的原因。

在报告的另一部分，德本康夫人就两校关系作了自己的陈述。她说：“金陵作为女子学院筹划于1913年，创立于1915年。在那个年代，中国不可能男女同校，甚至女子大学的成立也遭到许多中国、西方男性的反对。”“1920年，政府宣布愿意在大学发展男女同校，少量中国女性得以进入大学。这可能与1919年学生运动产生的革命思潮有关。在那场运动中，女生和男生一起参加游行集会，各地女校组织学生联合会。男女同校成为一种时尚。”她不无嘲讽地说：“在美国，女性不得不为自己的教育权而奋斗。在一些机构中，男性拒绝女性的进入。许多地方甚至关闭一度对女性开放的大门。但在中国，男生们甚至比女性更为热心地接纳女性进入校园。人们向中国首间男女同校大学提供许多奖学金，还有其他奖励。男女同校被人们视为进步的举措。”但是她指责，男女同校的大学“没有为女生安排特别的课程，男生的意见、学校的利益远比女生的需要来得重要。这一情形甚至也发生在基督教大学里”。

德本康夫人的批评主要针对金陵大学，她相信加强合作的要求实际上是希望两校合并。她说：“金陵女大的麻烦几乎都来自金陵大学”（nearly all of Ginling's troubles have had their origin in the University），而金陵大学的学生是德本康夫人心目中主要的麻烦制造者。“我个人认为，自从1919年以后，金陵大学学生有了更大优势（upper hand）。甚至一有学生反对，金陵大学管理委

员会就得取消原来的决定。最近有关男女同校 (co-education) 的争论就是如此。”从 1923 年开始，金陵大学学生和部分老师多次批评金陵女大的工作。这些批评包括：“学校生活太过奢侈，校园建筑不适合学生过中国式的生活；金陵女大学生非常西化，过于学术化，太专注于学习、考试，死守校规。”“金陵女大学生受外籍教师的摆布，不愿在社会、政治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金陵大学多次要求两校应该进一步合并 (merging)。但是金陵女大拒绝了这一要求，“师生们一致要求维持我们女子大学的独特身份 (identity as a woman's college)，她们要求的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 (Cooperation)”。德本康夫人的理由大致可分作以下几点：

1. 男性积极领导妇女运动别有用心。德本康夫人以政坛上许多中国男性领袖为例，“他们希望打破社会规矩的束缚，让女性在他们领导下参与政治及其他活动。这些男性看来想要女性在他们身边”。（这些男性）“为了与新女性结合，花尽心思和原配离婚，甚至可以不理会原配和原来的孩子们。”在她眼中，金陵大学的许多男学生就是这类人。“男学生们与政治圈里的男性一样，要女性围着他们。他们想认识大学女生，要女学生加入他们的活动。他们之所以要求合校，只是希望借此机会让女生加入他们的圈子，一起去看电影，参加他们的社会娱乐活动，丰富自己枯燥的生活。”德本康夫人意有所指地说：“金陵大学不少学生已经结婚。但许多人的妻子不是自己认识挑选的……”

2. 金陵大学的基督教气氛不如金陵女大。“金陵女大的学院生绝大部分来自基督教中学 (90%)。学生大部分是基督徒 (80%)。学院是典型的寄宿型大学，学生生活规律有序，学生会办事认真负责，亲如一家。师生相处愉快。”“大部分学生对男生的活动没什么兴趣。”而“金陵大学的大部分人不是基督徒，他们来自没有基督教思想影响的中国学校。学生生活也不规律，大学只为少部

分人提供宿舍，连食堂也是学生们自行管理。金陵大学收生时也没有仔细挑选，大部分人只是凭入学考试成绩被录取。这些学生思想激进，他们的爱国主义驱使他们节假日在外运动，贬低教员的管理，奉行排外主义，举行破坏性游行示威等等。男生们憎恶女生的独立性，因为她们拒绝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

3. 双方对爱国主义和政治的内涵与形式有不同理解。德本康夫人说：“金陵大学的学生认为金陵女大学生对中国发生的大事熟视无睹，漠不关心，不是爱国主义者，她们不想因为外界出席会议，参加游行的要求，而干扰正常的学院工作。她们建设性的爱国主义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不被金陵大学学生所理解。他们认为外国教师控制了她们。”“确实，金陵女大的学生对待社会事物是保守的，她们尊重家庭观念，欣赏中国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她们并不是狭隘的国家主义，能够欣赏西方文化最优秀的部分。”

4. 两校的教学特点各异，交通不便。两校之间距离约 15~20 分钟的路程，德本康夫人说，这足以令“金陵女大学生不愿修读金陵大学的课程，长距离令课程安排变得复杂”。而且，男女同校后，班级人数必定会增加。而“小班上课的工作量比大班上课少些，我们的教职员可以安排额外课程活动，这对学院精神颇有裨益”。

这份报告清楚表达了德本康夫人对两校关系的看法。德本康夫人不同意两校合并，甚至怀疑倡议合并者的动机。对于两校的合作，也持消极的态度。

## （二）吴贻芳治校期间的合校争论（1928~1951）

吴贻芳治校时期，发生过两次合校争论。一次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争论；一次是 1945 年前后的争论。与德本康夫人不同，吴贻芳对合校争论的态度相对灵活变通。

1. 20 世纪 30 年代的争论。德本康夫人离校后，金陵女大继续

金陵女大加入合作委员会，同意两校进一步合作。

但合并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金陵女大与葛德基等人的矛盾愈益尖锐。双方在不少场合中都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吴贻芳 1943 年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谈到葛德基时说：“我们读过葛德基先生为来华访问的联董成员作的报告，他特别提到金陵女大。老实说，我们很多教职员对他的报告颇有微词。他说金陵女大学生是特殊的一类 (special type)，是独来独往的一群，不太符合大学学生的水准 (not quite up to that of the university)。某种意义上，我们正是为拥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自豪。我们通过课余活动、承担责任等方式全面发展学生的个性，她们能够认真思考，不追求自我，忠实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和职责。”<sup>①</sup>

2. 1943~1947 年的合校争论。1943 年开始，“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英国委员会和中国董事会纷纷成立了计划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基督教大学发展的具体规划。其中，“计划委员会的一个老问题是如何把华东的四所大学——圣约翰、东吴、沪江和之江——合并为一所大学，以及如何使华南女大与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大与金陵大学进行进一步的合作”。与参加华东联合大学计划的四所大学不同，金陵女大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一计划，拒绝与金陵大学合并。当时，“吴贻芳在读过中国基督教大学战后规划后，意识到这一规划只反映了‘男性对女性教育的片面认识’ (only men’s conception of women’s education)”。<sup>②</sup> 对于金陵女大的前途，各方意见相距甚

---

① “Dr. Wu’s Luncheon Speech” (1943. May 7), YDSL, UB Archives . Box 148, Folder2922, p. 1045.

② “Minutes of First Meeting Ginling College Committee of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1945, Dec. 28<sup>th</sup>), YDSL, UB Archives, Box 126, Folder2609, p. 1045.

二是金陵女大校董会、教职员和校友们的看法；三是美国战后规划委员会的看法。中国战后规划委员会要求金陵女大并入金陵大学，金陵女大表示反对，美国方面的态度则较为中立。

吴贻芳认为，中国战后规划委员会的建议明显偏向金陵大学。合校之后，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的地位也不可能真正平等。由于学术地位、发展历史的差异，金陵女大将不得不跟随金陵大学的办学模式，金陵女大方面的意见不会受到对方的重视<sup>①</sup>。吴贻芳说：“第一，如何保持金陵女大的独立地位，为中国女子提供最好教育；第二是怎样确保提供丰富的课程，以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吴认为“为满足这两点，最令人满意的基督教办法是采纳美国战后规划委员会和金陵校董会的意见。金陵女大要拥有独立决策的权利，为妇女领袖的培养做出独特贡献，此外，也希望与金陵大学的合作，节省人力、财力，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sup>②</sup>不过，这样的合作建议也不可行。“现在合并的传言四起，考虑到金陵大学的心态，金陵女大不宜向他们做这样的推荐。”吴贻芳强调：“读过中国战后规划委员会的报告后，我觉得男性对女性教育的观点与女性自己的看法相差甚远，这也使我们与金陵大学的合作增添许多困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唯一可行的计划是保持金陵女大的独立地位，在自愿的基础上与金陵大学合作”。<sup>③</sup>大致上，吴贻芳列出了四个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1) 中国妇女运动的需要。“毫无疑义，中国亟须培养有基督教服务精神的妇女领袖。这样的妇女领袖必须有出色的学术素养，

---

① “Comments from Ginling College, Chengtu, on the Report of the Chinese Planning Commission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945. Nov. 28) YDSL UB Archives, Box127, Fodler2626.

② “statement on Future Plans for Ginling” (1945, Nov. 28) YDSL UB Archives, Box149, Folder2927, p. 0065.

③ *ibids.*



专业的工作精神，成熟的婚姻态度和基督教的服务精神。”但是，“假如中国没有一所女子高等学府，女学生就不可能成为学校学生生活的领袖，女性职员也不可能自行订立和执行教学计划和管理工作”。“目前中国男女同校的大学内，女性要获得公平的机会非常困难。不仅男学生人数要远多过女学生，而且男性教职员有压倒性的优势。”“还不如将女性教职员集中到一所大学，让她们有足够的空间施展自己的才能，发挥自己的影响。”<sup>①</sup>

(2) 基督教妇女运动的需要。“任何与个别学院有关的计划都应考虑整个基督教运动。作为小学院，金陵女大能够成为女性国际合作的中心，展示女性在管理和教学上的团队精神。虽然我们学院规模较小，但是这儿的合作遵循了基督教的精神，排除了政治的干扰。它可以吸引美国、英国的基督教女性来到中国，发挥领导才能，和中国女性一起培养年轻的一代。”

(3) 解决资金的问题。当时有人认为，金陵女大与金陵大学的合并可以节省经费开支。吴贻芳认为“在基督教教育事业中，经费问题必须和其他因素一起考虑”。而且，合并对学校的财政未必有好处，“如果金陵女大作为独立的女子学院，而不是大学里的一个单位，那么她一定能从美国、中国等地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

(4) 学生个性培养的需要。即所谓性格培养 (character-building) 和整个个性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personality)。“师生之间紧密接触是最重要的。在金陵女大，教师可以和学生保持非常紧密的接触。”吴贻芳认为“女子学院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大型、非个人化的大学中，这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女学生的辅导工作必须由女教师负责。但在男女同校的大学内，女教师

---

① “Comments from Ginling College, Chengtu, on the Report of the Chinese Planning Commission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945. Nov. 28) YDSL UB Archives, Box127, Fodler2626.

人数太少，不可能有个人的紧密接触”。

金陵女大托事部决议通过了吴贻芳的意见。决议说“对金陵女大而言，最明智的方法是继续保持独立学院的地位，财政自主。在自愿的基础上和金陵大学开展合作。中国更需要一所充分满足妇女教育需要的女子学院，而不是战后规划委员会的规划”<sup>①</sup>。两校后来在合作委员会（Joint Council of Cooperation）的框架下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合作，但合并计划已经彻底失败。1951年，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分别被政府接管，不复存在。综上所述，吴贻芳支持两校之间的合作，但坚决反对两校的合并。她并没有批评“男女同校”，也没有轻易否定推动合校者的用心，只是强调男性不理解女性的观点。

### 三、合校争论的分析

比较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的例子，我们发现，合校争论是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面临的普遍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民国时期基

---

<sup>①</sup> “Ginling Committee Minutes” (1945. Nov. 28), YDSL, UB Archives Box126, Folder2609, p. 1048.

年以前，男、女校分居两地，矛盾还不突出。迁入燕园后男、女校在同一校园内，女校面临与男校在事务上、经济上全面合并的压力，女校为了维护女权，仍维持自己的一定独立性，不愿完全合并。这自然导致女校与男校之间的摩擦。于是激怒了男生，女校受到了‘骄傲的女校’的指责。女校主任费宾闺臣夫人受到个人人身攻击。”<sup>①</sup> 费宾闺臣本人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也因男女同学的事而关系紧张。1931年费宾闺臣夫人被迫辞职。1941年后，燕大女部基本上已形同虚设<sup>②</sup>。由此来看，在基督教高等教育界，女校坚持自身独立办学的要求是一个普遍现象。

她们提出反对合校的具体原因总结起来有下列几点：

(1) 基督教传教利益和差会色彩。合并是否可以维持大学的基督教特色，是否会引起差会间的矛盾以致无法服从“单一差会的管理”，这是华南女大提出的疑问。当然，华南女大还认为福建协和（位于福州市郊）与华南女大（位于福州市区）两校相距甚远，无法有效合作；迁出现校址又不利于基督教对福州市内基督教的发展。若我们对照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一认真分析，会发现这些理由若非借口，便是一些非实质性的原因。金陵女大是由多个差会合办，而且设南京市郊的陶谷，距金陵大学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样反对金陵大学提出的合并要求。至于基督教色彩的坚持，根据葛德基1926年对全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统计，是年华南女大学生基督徒比例是97.5%，福建

---

①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委会：《燕京大学史稿》，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428~431页。

②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委会：《燕京大学史稿》，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436页。

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否认男女教育有“相对”的区别。正如华南教职员所说：“各级教育标准，宜按各人身心发育之程度，不能纯用客观之眼光。”校长王世静认为男女教育的需求有相对的差异。女子教育“应养成特别技能，一面注重普通科学的基础。女子和男子禀赋既各不同，女子教育，自应注重特殊天才，不能概以男子所受的教育，归在女子身上”<sup>①</sup>。金陵女大在描述自己与金陵大学在教育方面的相对区别时，也举例说：“譬如在化学专业，金陵大学倾向于教授工业化学和农业化学，而金陵女大则更着重家庭化学知识以及生理化学”<sup>②</sup>。可以说，双方对教育的要求和理解并不一致，葛德基等人追求的是教育资源的充分客观地利用，而华南女大、金陵女大则是要求男女教育均等基础上充分满足女性的需要。双方的对话实质上是一种“各自表述”，并没有切中对谈者的真正关注点。因此，虽然在合校争论中，双方在教育问题上讨论得很多，但真正导致合校失败的却是教育问题背后的因素。

(3) 经费方面的争论。经费无疑是影响合校成败的实质因素。经费问题包含了两点疑问：①. 女校并入其他男女同校大学后，是否会使国外捐款人失去继续捐款的兴趣；②合并之后，女校的经费是否仍然由女性来掌握，抑或落入其他人的手中。以燕京大学女部为例，1926年迁入燕园之后。女部的经费仍保持独立性。燕京大学美国托事部设在纽约，而女部的资金筹委会则设在芝加哥。女部主任的英文称为“Dean of Woman's College”。<sup>③</sup>但从双方迁

---

① 王世静：《私立女子教育问题》，《南方日报》，南平，1940年2月。

② “Notes on the Corrlated Program” (1930), YDSL, UB Archives, Box 143, Folder 2485.

③ Harris, Marjorie Jane, *American Missions, Chinese Realities: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China Union Women's College/ Yeching Women's College 1905~1943*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94) p. 235.

人同一校园开始，女部主任费宾闺臣就对校长司徒雷登的财务安排多次表示怀疑。费宾闺臣认为“他和其他人想方设法用女部的钱去满足男部的需要”。<sup>①</sup>出于对燕京大学女部坚持财务独立性的不满，1928年5月，燕京大学纽约托事部决定：“只要女部仍然保持独立的财务安排，那么女部就不应该从大学募集的捐款中获益”。<sup>②</sup>对燕京大学女部最致命的打击是美国女差会支持者对托事部的响应，当年“燕京大学女部美国筹款委员会决定，燕京大学女部与燕京大学在财务完全合并”<sup>③</sup>。费宾闺臣不久收到燕京大学的函件，“托事部全权负责燕京女部在美国和中国的财务安排。燕京大学是一个单一机构，女部(Woman College)从此不复存在”<sup>④</sup>。此后的费宾闺臣被称为“Dean of Woman”，最终不安而去。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反对与金陵大学合并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质疑“合并计划是否可能向一间独立的女子学院提供经费保证”。而且，吴贻芳本人认为“假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独立女子学院，而没有并入其他大学的话，她一定会在美国和中国找到更多的支持”。事实上，美国一些基督教妇女组织专门支持海外的基督教女子运动。其中，前述的美国美以美女布道会就是支持金陵女子大学的最大差会<sup>⑤</sup>。这个美以美女布道会也是支持华南女大的唯一差会。在本书第二章，已经说过，美以美女布道会是最独立的一支。创立者坚持女布道会和总议会应保持合作的关系而

---

① Harris, Marjorie Jane, *American Missions, Chinese Realities: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China Union Women's College/ Yeching Women's College 1905~1943*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94) p. 237.

②③ *ibids.* p. 243.

④ *ibids.* p. 244.

⑤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25页。



非传统的附属地位。美以美女布道会有独立的财政系统。因此，她们对财政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华南女大会计部主任，美以美会女传教士爱以利 (Elsie Reik) “相信这帮男人是想染指女人的钱袋，‘他们想把我们的钱放在一起用，因为他们的花费要比我们高许多’”<sup>①</sup>。女传教士对财政问题如此看重，固然是在美国方面的经验使然。但她们对财政独立的坚持，无疑影响了金陵和华南女大对合并计划的态度。

(4) 团体组织的独立性。这是华南女大反对与福建协和大学合并的主要出发点。建立紧密的团体生活是华南女大和金陵女大的共同关注点。1932年，一位金陵女子大学生说：“中国人缺乏团结的能力，而在妇女方面，尤其是没有团体的组织……所以只有个人的活动而少团体的策划。”<sup>②</sup>在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两校内，女学生们实行姐妹班制度，不同年级的同学以姐妹相称。校长吴贻芳、王世静被称为家长。根据1926年葛德基的统计，华南女大的师生比例是1:5.2，福建协和大学的师生比例则是1:8.8；金陵女大的师生比例是1:4.6，金陵大学的师生比例是1:10.2。若以师生比例作为指标来观察，两所基督教女校的师生关系无疑要比同处一地的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大学紧密得多<sup>③</sup>。紧密的师生关系要建立的是一个关系亲密的妇女团体。这个团体可以“给予学生机会带领学生活动，亦可让女教师自行策划，推行及管理校务，

---

① Graham, Gael Norma,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U. M. 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 Bell & Howell Company, 1994), p. 253.

② 陈岭梅：《中国现代女子对妇女运动应有的响应》，《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32年，30~38页。

③ Earl Herbert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26*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26), p. 102.

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强调差异能够实施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强调差异也可能反过来被利用作反抗旧有权力关系的身份认同。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人强调男女绝对差异，其基点是男性优于女性。近代基督教妇女传教运动中，强调男女的相对差异，其基点则是确立独立的身份认同。两者分别的关键，在于强调男女差异的主体以及强调男女差异的目的。

从上述五个方面的考察来看，合校争论中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女性坚持“Woman's work for Woman”，以相对差异性建立主体意识。她们不愿意在联合办学中失去女子教育的主导权。在女子专门大学中，女性可以保证有足够的权力空间实施或获得女子教育；但男女合校时，女性担心面对男性在各方面的优势，失去自我的身份/Identity。出于自我性别保护的心态，许多女传教士和华人女信徒就一方面声言男女平等，要在教会享有共同参与的权力；一方面又反对男女同校，坚持女子专门教育的存在。正像华南教职员声称：“我们不能指望男人们，尤其是中国男人明白我们对联合办学的看法……只有基督教女子大学才可以充分满足妇女的需要。”<sup>①</sup>

#### 四、本章小结

本文并无意对历史的是非做价值判断。女校是否应该设立，这仍然在教育学研究中有很多的争议。问题的意义在于合校争论本

---

<sup>①</sup> “The letter from Hwa Nan Staff to W. F. M. S” (Aug. 31, 1928), YDSL, UB Archives. Box 114, Folder 2476.

身。合校争论涉及到“男女同校”以及不同性别对“男女同校”理解的差异。

在处理这一问题前，必须厘定“男女同校”这个概念。历史上，“男女同校”又被称作“男女同学”。根据谭惠鹏的研究，“‘男女同校’泛指在同一校舍中同时有男生和女生一起接受教育的模式，它没有固定的、单一的组织方法，可以是同校分学（在同一校舍内分办男子部和女子部），同校分班（男女在同一校舍内，但在不同课室各自上课），同校分科（男女在同一校舍，但有些科目分开上课），同校同班共学（男女一起上课而没有分隔的措施）等”。<sup>①</sup>另外，“男女同校”问题还分为小学、中学以及大学三个阶段。

中国历史上，“男女同校”开始于基督教学校。容闳在《西学东渐记》记载：1834年，郭实腊夫人（Mrs. Gutzlaff）在澳门设立女塾，兼收男生。<sup>②</sup>《国父年谱》记载，孙中山先生早年就读的广州基督教博济医院，于“咸丰五年（1855年）在医院内附设医校，初仅收男生，1879年复兼收女生，实开中国男女同校之始。”<sup>③</sup>最早实现大学阶段男女同校的是广东岭南大学，1905年，已有女生入读岭南大学。1916年，分设大学女部。1917年，校方取消女部，男女同班上学。岭南大学的男女同校在全国教育界有一定的影响。

---

① 谭惠鹏：《从女校到男女同校：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上的性别议题》，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哲学硕士论文，未刊稿，2000年，2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1~3页。

③ 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辑委员会，1969年增订本，36页。

1920年7月，向来鼓吹男女同校的《教育杂志》<sup>①</sup>全文转载了甘乃光的《岭南大学男女同学之历程》。编者按说：“按男女同学问题，全国教育界已讨论许久了。但从前都偏于理论方面，并没有切切实实的办法出来，所以提倡、反对、再加附和，都好算得一种空话。”“这篇文章介绍岭南大学男女同学，也就是事实之一，所以特地把他转载出来，好供教育界参考。”<sup>②</sup>另据王立诚的研究，1920年，沪江大学也实现了男女同校。<sup>③</sup>不过，基督教大学对于男女同学态度并不一致，最明显的莫过于圣约翰大学。该校于1936年才实现男女同校。<sup>④</sup>

中国本土教育界对“男女同校”的讨论开始于晚清学制改革，最初只是个教育问题。1907年，满清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两个章程，正式将女子教育纳入正式教育系统中。此时的女子教育实际上是单轨制，严防男女交往。“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分别设立不得混合”<sup>⑤</sup>，学校行政人员均由50岁以上的男子充任，办公处应在学堂附近，但不得设在校园内<sup>⑥</sup>。此时社

---

① 《教育杂志》创刊于190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历任主编是陆费鸿、朱元善、李石岑、周予同等人，该杂志以“研究教育，改良学术”为宗旨。从1909年创刊，至1948年12月终刊，其间只在1932年12月至1934年8月停刊。全套杂志凡33卷，王云五称“有此教育杂志之媒介，则四十年之教育史实，得以记载无遗；而新教育思想之演进，亦并及之”。王云五：“影印教育杂志旧刊全部序”，《教育杂志》，第一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1页。

② 甘乃光：《岭南大学男女同学》，《教育杂志》，1920年7号，5~6页。

③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0页。

④ 郑朝强：《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第91辑，92页。

⑤ “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801页。

⑥ 周策纵著，杨默夫编译：《五四运动史》，台北：龙田出版社，1981年，395页。

会上已有“男女同校”的讨论。<sup>①</sup>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男女同校”成为思想界激烈讨论的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眼中，“男女同校”及其背后的女性问题是革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最易着手的目标。许多期刊登载鼓吹“男女同校”（或称为“男女同学”）的文章。如《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女界钟》、《妇女杂志》、《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sup>②</sup>。这些论者从各个角度论证“绝对男女同校”的必要性，如节省经费，提高女子的程度，打破歧视妇女的习惯，养成女子的独立心，精神上的感化，减少男女间不道德的行为，男女社交公开，等等<sup>③</sup>。1920年2月，贾丰臻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男女同学问题》一文，说：“吾教育界，自新思潮洋溢以来，德谟克拉西主义已弥漫全国。”“今日之所急应研究者，其惟男女同学乎。”“男女同学问题。吾国近来非常提倡，如各省教育会联合会已有通过提出之议案。”<sup>④</sup>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男女同校”成为大势所趋。很快，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先后为女性开放。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此时的北大是所纯粹的男子大学。尽管大学章程从没有规定不得招收女生，但从来没有一位女生能够进入北大。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青年会发表演说：“近来女权发展，又经了欧洲的大战争，从前男子的职业，一大半都靠女子来担任。此后男女间互相的关系，无论在何等方面，必与单纯男子

---

① 上海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1919~1924）。该期刊曾登载过各类专号，妇女专号是最早的一个讨论专号。其后分别是诗学研究专号、新唯实主义专号、法兰西专号、宗教问题专号（上）、宗教问题专题（中）、宗教问题专号（下）、少年中国问题专号。

② 同上注。

③ 刘爽：《男女同学问题的研究》，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新文化书社，1923年，182~194页。

④ 贾丰臻：《男女同学问题》，《教育杂志》，1920年2月，1页。



方面或单纯女子方面一样。我们国里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这世界大潮流吗？但是改良男女的关系，必要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是学校了。”<sup>①</sup> 1920年1月1日，蔡元培公开表示“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sup>②</sup>。1920年3月，邓春兰等6人获准进入北大旁听。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15年由张之洞创办的两江师范学堂改建而成。南高师实现男女同校与教务主任陶行知有密切关系，1919年12月17日，陶行知在校务会议上提出了《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1920年4月21日，陶行知更明确地说：“学生有应试资格来校应试者，苟能及格，不论男女均可录取。”<sup>③</sup> 当年暑假，陶行知创办了男女兼收的暑期学校。“由徐亦蓁女士担任女生指导员。”<sup>④</sup> 经过激烈讨论和艰苦努力，男女同校，至少是大学阶段的男女同校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基本共识。正如1925年陈兼善所说：“五六年前，对于男女生应否同学的问题，有过激烈的讨论。自从北京大学开放女禁以后，至今男女同学已为一般新式学校所采用；除了几省的顽固官厅以外，其他教育界就令并不主张男女同学，也不敢公然反对了。”<sup>⑤</sup> 此后，大学阶段的男女同校已被中国本土教育界广泛接受，没有更多的讨论。

长期以来，“男女同校”被视作教育进步的标志。许多女性也因为大学开放女禁而获得教育权力，男女同校极大地促进了中国

---

① 蔡元培：《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续），《北京大学日报》，第362号，1919年4月26日，第3版。

② 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215页。

③ 陶行知：《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一卷，143页。

④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一览》，《北京大学日刊》，第629号，1920年6月9日，第三版。

⑤ 陈兼善：《男女同学之讨论》，《教育杂志》，1925年4月，第17卷，第四号。

妇女运动的发展。有人乃至全盘否定单一性别学校存在的合理性，提出绝对的男女同校。“现在讲到 Democracy 问题之中，生出妇女解放；妇女解放问题之中，又生出妇女教育问题。妇女教育问题之中，又生出男女同等教育问题。男女同等教育问题之中，又生出绝对的男女同校。”<sup>①</sup> 问题是“大学开放女禁”与“绝对的男女同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支持“大学开放女禁”的人士也可能反对“绝对的男女同校”。

在“男女同校”（Co-education）问题上，存在着性别理解的差异。在许多男性教育家极力鼓吹“男女同学”，视其为妇女解放的标志的同时，不少女性教育家认为有保留少数女子学校的必要。陈东原称：“高等教育，似乎没有为女子专设的必要”，因为“高等教育是造就专门人才的；专门人才有什么男女的分别？所向的目的既相同，所用的教材又相同，即不说男女同校还有别种利益，已经应当同校了”<sup>②</sup>。1943年，联董负责人芳威廉（William Fenn）、葛德基等与教育部副部长顾毓秀会晤时谈起政府对女子教育的政策。顾毓秀称：“除了几间师范学院外，政府不会设立女子大学。”顾表示支持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但是他不理解，为什么“女性要求所有学校为她们开放，却要保留几所学校不对男性

---

① 《男女同校的根本要求》，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年，216页。

②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394页。

主体。(二)相互合作的团体活动是主要的工作模式。”<sup>①</sup>第一条要求女性具有主体意识,第二条则是强调组织协调对妇女运动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这两条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主体意识,则谈不上组织;没有组织,同样不能保障主体意识。

有近代妇女史研究者认为,1919~1949年间中国妇女运动的主体不是妇女。“妇女不是这一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体!”<sup>②</sup>因为女权主义进入中国,接着“男人接过女权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从事民族革命。而这些男性之所以热衷女权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我得益的考虑,因为,没有女性的自由,男性的自由便无从谈起”<sup>③</sup>。有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者甚至发出“谁持此剑当空舞”的疑问。<sup>④</sup>她们的论点是基于一点——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缺乏自己的主体性,妇女的社会公共空间狭小,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意愿。

从这点看,基督教妇女运动在保证妇女社会公共空间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自我组织和主体意识的相结合是基督教妇女运动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中的特殊之处。虽然以往研究者曾注意到基督教为中国妇女运动提供了角色示范,开创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但这些研究还没有讨论到基督教妇女运动在女性自我组织和女性主体意识方面的努力。如郭佩兰所说:“作为角色示范,女传

---

① 白梅(Mary Ann Burris):《声音的交织》,朱虹等编:《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18页。

② 李小江:《序》,朱虹等编:《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2页。

③ 丁娟:《20世纪的中国女性主义》,邱仁宗主编:《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5页。

④ 李小江:《序》,朱虹等编:《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4页。

教士确实介绍了西方新思想，为女性提供了组织和财政上的支持。”<sup>①</sup>在文中郭佩兰实际上认为：所谓“组织”与“财政”、“西方新思想”一样，只是传教运动的角色示范功能之一。但在华南女大与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大与金陵大学的合校争论的案例中，基督教组织不只是角色示范的功能，而是维护自身主体意识的根本。人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见基督教妇女运动自我组织和主体意识的辩证关系。基督教女子大学之所以抗拒合校，原因之一是这些女性不愿失去属于自己的“组织”；而基督教女子大学之所以能够抗拒合校要求，同样是她们有西方妇女差会的组织、财政上的支持。她们认为，只有自我组织才可以充分实践自己的主体意识。用金陵女大的话说，是“应该允许有一个机构让女性在‘不受男人干扰’的情况下作女子教育的工作”。基督教妇女组织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主体意识（Woman's Work for Woman），强调女性身份，利用主体意识来维持自身的组织。在这里，女性主体意识和身份被用来保护妇女的自我组织。这就是金陵女大、华南女大能够长期设立的原因。

既然当代妇女学家认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殊性质之所以“仍然是男性中心的”“父性女权运动”<sup>②</sup>，是因为近代妇女运动仍然笼罩在传统父性的话语体系（家国传统）之中；那么，从上述合校争论的例子中，中国基督教妇女运动的意义不仅是输入西方妇女思想，不仅是发动天足运动、废婢运动。换言之，它不仅具有角色示范的功能，还为妇女提供了独立主体意识的完整组织

---

① 郭佩兰 (Kwok Pui-lan), "Claiming Our Heritage: 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16 (Oct. 1992), pp. 150~154.

② 李小江：《序言》，朱虹等编：《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4页。

系统。通过这些组织系统，女性得以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流动途径，从而确立自己独立平等的社会地位。



## 第七章

# 校友评价：近代女知识分子的群体典范

---

校友的社会表现、精神特质是评价教育成效的重要指标。正如鲁珍晞所说：“评价教会大学的影响的一个具体办法就是通过对教会大学毕业生的了解。”<sup>①</sup> 诚然，大学的生命力和精神不仅体现在校内的教育思想、校园文化，还体现在校友的社会表现以及精神特质。

### 一、数据统计

虽然华南女大创立时间早于金陵，但中国女子大学首届毕业生却出自金陵。1919年6月25日，金陵女大1915级学生毕业，她们分别是刘剑秋(Liu Gien-Tsiu)、任倬(Ren Cho)、汤蕙菁(Tang Hwei-Tsing)、徐亦蓁(Tsu Ih-Djen)和吴贻芳(Wu Yi-Fang)。1921年1月28日，陈慈悲、陈文华和黄文钦三位从华南女大毕

---

<sup>①</sup> 鲁珍晞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468页。

业，她们是华南女大首届大学毕业生。此后，每年都有学生从两所女子大学毕业。下表列出华南女大、金陵女大历年毕业生人数变化统计。<sup>①</sup>

表 7-1 金陵、华南毕业生人数历年变化表

年份	毕业学生数	
	金陵女大	华南女大
1915 年	无	无
1916 年	无	无
1917 年	无	无
1918 年	无	无
1919 年	5	无
1920 年	8	无
1921 年	10	3
1922 年	10	1
1923 年	10	3
1924 年	10	7
1925 年	15	9
1926 年	20	15
1927 年	18	12
1928 年	21	12
1929 年	26	12
1930 年	49	18

① 本表数字中的毕业生人数取自 1950 年，《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年毕业生人数报告表》，《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年肄业生人数报告表》，福州：福建省档案馆，39-1-8，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年，109 页。

1931 年	18	14
1932 年	34	32
1933 年	36	18
1934 年	32	12
1935 年	47	13
1936 年	34	23
1937 年	48	11
1938 年	35	26
1939 年	37	13
1940 年	17	6
1941 年	27	16
1942 年	27	10
1943 年	37	17
1944 年	42	18
1945 年	34	8
1946 年	41	20
1947 年	68	26
1948 年	63	21
1949 年	29	27
1950 年	36	60
1951 年	56	无 <sup>①</sup>
总计	1000	483

① 当年5月2日，王世静已将华南女大的全部印章上缴福建省文教部。在福建省档案馆中也没有看见1951年届毕业学生人数统计。因此，本书表中没有1951年届毕业人数。

有关华南女大校友毕业后的出路，华惠德对解放前的华南女大校友分布和职业作过统计分析。“让我们首先来看看1921年到1936年（也就是中日战争爆发前）的校友分布情况。在1936年的情况分析中，178位健在华南女大校友提供了有趣的资料。这些毕业生中的55位已经结婚（占28%）。其中2位是医师，2位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6位担任教职。在1936年还有128位毕业生独身，其中92位是教师，4位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2位是图书馆员，7位是医师，3位是护士，另有2位在医院里从事其他工作。在11位就读研究生课程的学生中有6位在中国（3位研究医药，2位研究神学），另外5位同学则在美国攻读学位。”<sup>①</sup>“无论结婚与否，毕业生中共有98位担任教职。其中1位是学院教务长，6位是学院教师，8位是附中教师。另外的则有1位地区督学，6位教务长，16位校长，2位福州妇女圣经学校的教师，20位各地区的中学教师。”<sup>②</sup>“在毕业生地区分布上：104位校友在福建省，其中51位在福州，13位在厦门，11位在兴化，5位在福清，4位在南平，3位在仙游，2位在漳州，而在平潭、江镜、福宁、龙田、闽清、马尾、尤溪和永泰各有1位校友。在省外的校友有49位：21位在上海，9位在北平，6位在南京，3位在广东，3位在汕头，2位在汉口，2位在浙江。另外在开封、苏州和济南各有1位校友。在南洋有15位校友：7位在马尼拉，5位在马来亚，两位在爪哇的雅加达，一位在沙捞越。”<sup>③</sup>

为了更仔细地分析，我们再以1930年毕业的一个18位同学

---

①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140.

② 同上注。

③ 同上注。

组成的班级为例。“这个班是该段历史时期中最大的一个班级。她们分别主修教育、生物和医学预科。我们发现除1位在家外，其他的校友全都分布福建省各教会，如在美以美会、公理会、安立间会、长老会所办的中学里任教师或校长。20年后，对这班校友的调查又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在多年服务于教育界和医务界后，其中10位校友在中国或美国攻读研究生课程。3位在上海基督教女子医科学院获得医学硕士学位的校友，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有机会前往美国攻读研究生课程。另3位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的校友，在为协和医学院服务多年后，获得了前往美国进一步修读研究生课程的机会。她们中的2人被联合国难民救济署（UNRRA）从20名候选人选出赴美进一步研究。在研究的次年，她们再度从6人中被选出继续修读。一位校友在金陵神学院学习，另一位则在燕京大学学习。她在二战期间为学院作了很多工作，战后受资助前往美国攻读硕士学位。一位校友则在华南任教十余年，二战后马上前往美国进修；另有一位校友则被哈佛大学的雷迪夫（Radcliffe）学院授予博士学位。”<sup>①</sup>

2000年，笔者根据1990年华南女大校友会所作的记录做过一次问卷调查<sup>②</sup>。根据《校友录》，华南女大校友分布的区域如下：国内，福建地区共176位，香港9位，台湾19位，其他地区有79位。国外，美国76位，新加坡21位，印尼9位，马来西亚2位，菲律宾1位，英国1位，加拿大2位，荷兰1位。<sup>③</sup>其中海外的校友包括了曾在华南女大工作过的教职员以及华南附中的校友。这

---

① L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Asia, 1956), p. 140.

② 见附录二。

③ 《校友录·华南分册》，福建师范大学校友会，1990年编。



些校友大部分是抗战期间，或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南女大或华南附中就读的学生。为了解她们对母校的认识，笔者根据《校友录》对华南女大校友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为准确反应华南女大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笔者只对居住国内的大部分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友进行统计，共 255 位，占总毕业生数的 52%，其中收到有效回卷<sup>①</sup> 共 67 份，回收率为 26%。

1. 职业和政治立场。华南女大校友离退休前绝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只有 7 份回卷指明离退休前是研究员、会计、医院医师、地质矿产测试高级工程师或政府公务员；89.1%的校友都是各级教育机构的教师，其中有北大化学系、中央音乐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业大学的教授，也有各地普通中学的教师。迄今为止，这些校友参加各类政治党派的有 27 位，占总数的 39.7%。中共党员最多，有 13 位。其次是中国民主同盟，7 位，此外，中国致公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党、农工民主党共 7 位。这些校友都是解放后加入这些政治组织的，13 位共产党员校友中，有 7 位在华南女大学习期间曾是基督教徒。

2. 学生信仰和宗教生活。在回卷中，有 18 份答称入学时未信基督教，占 27%。在他们和基督教团契活动的关系中：从不参加者有 8 位；偶尔参加者有 9 位；经常参加者只有 2 位。至于入学时已信教的 51 位校友，除 6 位没有作答外，一贯参加或经常参加学院基督教团契的有 36 位；偶尔参加的有 9 位。两者合计，一贯参加或经常参加基督教团契活动的华南女大学生有 38 位，占总数的 55.8%；偶尔参加的有 18 位，占总数的 26%；从不参加者 8 位，占总数的 11%。由此可见，即使在 20 世纪 40 年代，宗教生活仍占据着校园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参加人数多主要是因为学生大部

---

<sup>①</sup> 问卷内容和基本数据分析见文后附录二。

分入学时已信教，入学时未信教的同学只有 61% 的人参加了基督教团契活动（大部分是偶尔参加）。

3. 入学动机及对华南女大生活的感受。回答为何选择进入华南求学问题，在入学时未信基督教的 18 位校友中，她们入学的动机分别是：华南女大是教会学校（3 位）；华南女大是女子高等教育学府（5 位）；华南女大有学术声誉（6 位）；华南女大物质生活条件好（3 位）；其他原因（1 位）。这 18 位非信徒学生只有 3 位对学院生活感到有点不适应，其中 2 位是因为华南女大的宗教生活，1 位是因为华南的学习生活。另一方面，在入学时已信基督教的 51 位校友中，有 40 位校友是因为华南女大是教会学校而选择报读华南，其他原因则有华南女大的校誉（4 位）；女校（3 位）；物质生活条件好（3 位）；其他（1 位）。这 51 位校友中有 22 位表示对学院学习生活最为满意；11 位对师生关系最感满意；只有两位校友分别对学院的师生关系和学习生活表示不适应。两者合计：选择华南女大最大的动机是因为华南女大是教会学校，占总数的 63%（三位因为华南女大是教会学校而选择入学的非信徒校友，其父母家庭都不是基督徒，可见教会学校的声誉并不仅在于宗教生活而应该包括其严谨的校风）；其次是因为华南女大校誉较佳，占 14%；真正因为华南女大是女校而选择入校的只占 11%。

金陵校友的就业情况，曾芳苗根据南京第二档案馆藏材料对金陵女大毕业生就业状况作过一次抽样统计<sup>①</sup>：

---

① 南京第二档案馆藏，全卷宗 668，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50，《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学生名单及毕业调查》，转引自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台湾中央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2 页。

表 7-2 金陵女大毕业生历年工作去向调查表

项目	1931年9月		1937年2月		1947年10月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教育	106	57.61	186	54.55	244	32.28
升学与研究	31	16.84	18	5.28	90	11.90
家庭服务	20	10.87	63	18.48	174	23.02
社会服务	15	8.15	26	7.62	81	10.71
宗教工作					7	0.93
公务员	4	2.17	9	2.64	70	9.26
医师护士	5	2.72	18	5.28	35	4.63
写作与编辑	3	1.63	0	0.00	3	0.40
商业	0	0	0	0	2	0.26
其他	0	0.00	21	6.16	50	6.61

另据 1948 年金陵女大的一次校友统计报告<sup>①</sup>指出：1919 至 1948 年间，金陵女大共毕业校友 786 名，其中 30 名已逝世。健在的 756 位校友中，已婚者有 403 人，未婚者 351 人，离异 2 人。有 90 位校友曾修读研究院课程，其中 83 位是国外的研究生。校友的职业以教师为主，247 人在学校任教；174 人成为家庭主妇；81 人从事社会服务；70 人在政府部门工作；35 人从事医务工作；7 人以宗教为职业；2 人经商；其他人的情况不明。国内的校友分布：江苏省 353 人，四川省 48 人，广东 39 人，湖北 35 人，河北 26 人，福建 17 人，台湾 17 人，香港 14 人，浙江 9 人，江西 8 人，安徽、湖南、山东各有 7 人，陕西 5 人，贵州 3 人，甘肃 2 人，河南、云

① “Ginling College Alumnae statistics” (Nov. 1948), YDSL UB Archives Box131, Folder2677, p. 0433~0434.

业机会多，而且待遇也相当优厚，月薪一般在60~65元之间。她专长英文而且学的是医学与化学，要找到一份好工作按理是易如反掌。然而毕业后，她见到其他同学们一个个通过教务处的安排走出校门就业了，而她本人直到一星期后才被教务长华群女士叫去谈话。华女士郑重地对她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好地方，我想只有你去最为合适。怀远一所女子初中需要一位德才兼备的老师去为他们开办高中课程。你有真才实学，你家境又好，不会在乎40元一月的低薪，所以特选你去，你愿意去吗？’<sup>①</sup> 华南学生林碧珠1924年毕业时也遇到相似的情况。当时程吕底亚召其面谈。谈话中，程要其到山区尤溪县的一所小学服务。由于当地土匪猖狂、道路难行，林碧珠回绝了程的要求。于是，“程女士怒目圆睁，拍着桌子说：‘假如你不去尤溪帮助你的人们，我就回美国去’”。<sup>②</sup> 最后，严莲韵和林碧珠都到了校方安排的学校工作，在当地干出一番事业。不仅如此，校方对校友工作表现也非常关心。1932年毕业的金陵校友黄续汉到上海一所学校教英文。黄续汉回忆道：“由于我在金女大学习时孩子气较重，吴校长一直担心我教课时能否控制课堂秩序，教学效果如何，因此她特请金女大教育学老师华群女士去上海出差时专程到我教课的班上听一节课。”<sup>③</sup>

---

① 李葆真：《爱母校至深至长的严莲韵》，《金陵女儿》，1995年，36页。

② Esther Ling（林碧珠），“A Modern Apostle-A tribute from the alumnae”，*Miss Lydia Trimble Archives of United Board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Box 176, Folder 3211, p. 12.

③ 黄续汉：《难忘的金陵岁月》，《金陵女儿》，1995年，99~100页。

## 二、个案分析

为详细说明毕业校友的情况,下文将选择几名校友作为案例,分析金陵、华南校友群体。她们的经历或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具体地理解校友们的成长历程和社会影响。下面三位校友分别是华南女大的余宝笙、周苏藤以及金陵女大的胡秀英。她们只是华南、金陵群体的一小部分。

### (一) 余宝笙 (Patricia Yue)<sup>①</sup>

余宝笙,1922级校友。1904年出生在福建省莆田县。父亲余景陀是莆田圣路加医院院长兼护士学校校长。1910年她随姑母余恩赐到福州陶淑小学、陶淑女中就读。圣路加医院和陶淑女中都是圣公会在福建创办的医疗、教育机构。余宝笙家人在其中担任要职,其家庭成员应该是圣公会的信徒。1922年~1924年余宝笙考入华南女大。1924年到1926年到美国望城大学半工半读完成学士学位。192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同年回母校华南女大服务。1935年再次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修读生物化学博士。1937年余宝笙博士学成回到抗战中的祖国<sup>②</sup>。

建国初期,余宝笙随华南女大加入福州大学任职。因为余宝笙是业务骨干,她颇受领导器重,担任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科

---

① 资料大部分取自《余宝笙院长纪念集》,福州:福建华南女子学院编,1996年。

② 李晴:《余宝笙年谱简编》,《余宝笙院长纪念集》,福州:福建华南女子学院编,1996年,49页。



培养，充实自己，将来才可以‘施’得从容，‘施’得出色，‘施’出水平”<sup>①</sup>。1987年，有位美国东北大学分析化学专家到福建访问。他得知余宝笙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化博士，就问：“你当时那样年轻，又有如此优越条件，如能继续在那里搞科研，必能获得很大的成就。现在你却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当上了什么全国人大代表，又是华南女子学院院长。这些事是另一批人干的，对你却于事无补。我认为这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难道你不感到后悔吗？”<sup>②</sup>余宝笙除了告以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应为国家服务外，还说“许多高校由于专业上和生理上的要求限制女生招收的数量，甚至不收女生。众多女性被关在高校门外，她们的才能得不到进一步培养和发挥”，所以，她创立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她相信这“比留在美国有意义得多”<sup>③</sup>。

1996年余宝笙逝世，享年93岁。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陈光毅、厦门市市长洪永世、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郑思远等人发来信电。一份唁电上说：“她阐明了伟大的华南传统和华南精神，那就是：忠诚于人民，愿意为人民服务以及永远有一颗永恒的爱。”<sup>④</sup>

## （二）周苏藤（Ivory Chou）<sup>⑤</sup>

周苏藤，1934级校友。1917年生在福州。父亲周宗颐是福建

---

① 余少玉、江德爱、黄兴灵、李碧钦：《缅怀敬爱的余宝笙老师》，《余宝笙院长纪念集》，福州：福建华南女子学院编，1996年，21页。

② 引自林梅英：《缅怀余宝笙老师》，《余宝笙院长纪念集》，福州：福建华南女子学院编，1996年，5页。

③ 引自林梅英：《缅怀余宝笙老师》，《余宝笙院长纪念集》，福州：福建华南女子学院编，1996年，5页。

④ 《唁电，唁函选》，《余宝笙院长纪念集》，福州：福建华南女子学院编，1996年，41页。

⑤ 以下资料大部分取自周苏藤：《蒙爱岁月》，诗巫：卫理神音书局，2000年；《景风》，第67期，1981年9月。

协和大学首届毕业生，美以美会会友。母亲李整珍是第一届福州护士训练班的毕业生。1934年至1946年，周苏藤先后任福州毓英女校教师、教务主任、校长。1946至1948年，她赴美进修，在田纳西州的George 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 Nashville 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获得教育硕士学位。1948年，她返回国内，任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校长。<sup>①</sup>

1950年，周苏藤曾在改造运动中受到冲击。6月份，她借到广州医治眼疾之机，前往香港。其后，她辗转到新“福州”——马来西亚诗巫的卫理公会中学任教。

从基督徒教师转向神学教育家，是周苏藤人生的又一次转折。1953年至1955年，她重回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宗教教育博士。1955年，她回到马来西亚诗巫，以女性的身份担任当地神学院院长一职。当时有位美国女神学家告诉她，神学院根本是男人的“世界”，女人是不便插足的。但她这个神学院院长一当就是12年，培育了许多教会的骨干人才，包括现任马来西亚卫理公会沙捞越华人年议会会长陈泽崇。不仅如此，她还以女性身份在1958年受按立为卫理公会牧师。1960年至1961年，她在纽约协和神学院修读神学硕士。1961年，她参加普世教会协会第三次大会。不久，她受普世教会协会神学教育基金部(T. E. F)和中国神学教育基金托事部(前中国南京金陵神学院基金托事会)双方面的委托，同时担任两个机构在东南亚地区神学教育的执行干事，负责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神学教育工作。在她参与帮助下，东南亚神学院协会得以正式成立。<sup>②</sup>

---

① 周苏藤：《蒙爱岁月》，诗巫：卫理神音书局，2000年，119~122页。

② 周苏藤：《蒙爱岁月》，诗巫：卫理神音书局，2000年，60~97页。

周氏重视华人神学教育的发展。“教育既为‘百年大计’……本此推想，装备圣徒以为普世宣扬福音的工具，乃关系人生的重新再造，生命中心与方向的转变，价值观与待人接物态度的根本调整，可说是‘千年树天国精兵’的大计。”“普通人对神学的两种错误观念。一为视神学为艰难高深的学问，超过平信徒所能领悟，这是很不幸的误解……另一误为视神学院乃专为受牧职训练者而办的。”<sup>①</sup>1967年，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召见普世教会协会执委会，周苏藤也随团入白金汉宫受女皇接见。1977年，周苏藤退休，入英国国籍。1977年至1978年，她入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获文学硕士学位。1980年至1992年，周氏又在Hull University担任中国文化和语文课程的兼职教师。

1981年，周苏藤参加英中了解协会(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十人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周氏访问各地教堂，拜访金陵协和神学院，回到福州探访。探访中，有宗教局官员向其透露“国外有很多人攻击三自教会是‘官办教会’，有的牧师由政府委派，且说牧师讲章须经政府批准等等”<sup>②</sup>。希望她给予澄清。周氏返到英国后，遂在《景风》杂志上撰文，为国内三自教会发展给予正面的宣传。她指出：“祖国信徒有两点大特征。一为灵命的活泼……另一特征为‘爱国爱教’的坚强信念。”现在，“许多不幸的历史牵连终于割断了。许多福音以外的包袱累赘终于放下了”。“宗派和西洋差会的压力都成过去了”。“目前中国教会不欲轻易地重新建立与西方教会的正式联系，是不难理解的。一方面恐重蹈过去不健康关系的覆辙。另一方面国内教会凡百待办，本

① 周苏藤：《蒙爱岁月》，诗巫：卫理神音书局，2000年，90~93页。

② 周苏藤：《与祖国信友欢聚记》，《景风》，第67期，1981年9月，25页。

身的建立必须为首要之务。但我深盼国内外信徒能不顾虑地多多争取机会，积极促进思想的交流。”<sup>①</sup>

### （三）胡秀英（Hu Siu-Ying）

胡秀英，1933届金陵校友，国际著名植物学家，被誉为“会走路的植物百科全书”。胡秀英终身钻研植物，是世界冬青、金针、锦葵、泡桐、菊和兰的研究权威。世界400余种冬青科植物，有300余种都是胡秀英命名。她现为哈佛大学生物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2001年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其铜紫荆星章。同年11月，香港电台专门制作了一个节目——“世界杰出华人系列——胡秀英”<sup>②</sup>。

胡秀英1908年出生在苏北铜山县的农村，幼年丧父，是母亲抚养她和哥哥长大成人。“那时传教士来到我们村中设立教会，办个小学，我哥哥去读，我常跟着去玩，母亲因为心情悲哀，接受基督，渐渐跟我哥学识字，读福音书，眼光开阔了。她自己小脚，知道劳累脚疼的痛苦，决意不替我缠足，自己承担乡邻的指责。她移风易俗，送女儿入学读书。”胡秀英是村上第一个中学女学生，入读的是美南长老会的徐州正心女中。1928年，胡秀英接受正心女中资助，考入金陵女大。

金陵女大为胡秀英的一生奠定下坚实的基础。胡秀英自述：“金陵给我健壮的身体，叫我一生可以过着出力出汗的生活。”“金陵引我到自然界，教我学习钻进自然中心求知的方法；以致我终生在科学的领域里研究、分析、综合、创造新的成果；服务人群。”“金陵教导我组织的技术、主持会场方法，使我由学生变为成人。”“金陵深化我农村养成舍己为人的习性和中学为神而活的训练。世

---

① 周苏藤：《与祖国信友欢聚记》，《景风》，第67期，1981年9月，21～26页。

② 胡秀英：《金陵予我》2001年，胡秀英手稿。

界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语言，说出相同的意念。道德最高的境界是忘了自己，服务别人。”<sup>①</sup> 在金陵，胡秀英主修生物学，副修社会学。她原来身体孱弱，心有杂音。由于金陵的体育卫生训练，“两年下来，人长高两寸，体重加 10 磅。三年级时我成了运动健将，各种校队的球员，Field Hike 队长”。她还是学校活动的活跃分子。“起初参加金陵邻居拜访，三四年级时，女青年会社会服务部的主日拜访和儿童礼拜都由我负责。四年级又担任课外活动委员会第一任主席。”金陵女大“厚生”精神更影响了她的一生。“‘更丰盛’的生命，后来在我身上完全实现了。”<sup>②</sup>

毕业后，胡秀英原打算回徐州正心女中任教。但是 1928 年后，国民政府禁止在教堂上宣传宗教，立场保守的南长老会因此决定停办学校。于是，胡秀英到岭南大学以半工半读的形式攻读植物学硕士课程<sup>③</sup>。研究课题是中草药的研究。1937 年 6 月毕业，她获得硕士 (M. Sc.) 学位。原本打算在傅涣光主管的南京中山陵植物园工作。未几，抗战爆发，南京被日机轰炸。胡秀英带着母亲逃难到四川成都。在成都，金陵女大生物系主任黎富思博士/Dr. Reeve (时恰在四川) 推荐任教华西协和大学生物系植物学讲师，教授植物分类学、普通植物学。在教学科研之余，胡秀英希望有机会到国外深造，苦于没有合适的推荐人。恰巧当时，华西坝文化圈内组织了一个名为国际妇女会/Chengt u International Women's Club，参加者必须是女子大学生、精通英文。胡秀英担任这个俱乐部的第二任华人主席。这个俱乐部除了交流讯息之外，还举行义卖义演，为抗战筹款。其间，胡秀英认识了哈佛大学毕业的齐鲁大学教师 Dr. Queene。在其推荐下，1946 年胡秀英获哈

---

① 胡秀英：《金陵予我》2001 年，胡秀英手稿。

② 胡秀英：《芥菜种子一粒》，《金陵女儿》，1995 年，90 页。

③ 见附录——金陵女大校友胡秀英访谈录。



佛大学 Radcliffe College 的全额奖学金，入读哈佛大学植物学博士课程。胡秀英在哈佛大学进行中国冬青的研究。1949年6月，胡秀英获哈佛大学植物学博士学位。由于内战，滞留在美。胡秀英遂留在哈佛大学工作。1967年，香港发生暴动。此间的香港中文大学需要植物专业教师。适逢胡秀英博士想回中国进行田野研究，于是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75年，她以香港居民的身份，参加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所组织的祖国科学教育访问团到了北京，还重访了南京金陵女大故址。目前，胡秀英大部分时间居住、工作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身体依然健朗，93岁的她可以一口气走上南京中山陵。

胡秀英至今保存着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赠给她的字幅，“我们应该去耕他人未耕之田，开他人未开之矿，独树风声”。<sup>①</sup> 这是她一生科研工作的座右铭。早年在华西工作时，胡秀英时常利用暑假时间在川康边界山区采集植物标本，“经常单身一个人，一去就三个月”。1944年，胡秀英带领学生上山采标本，发现四川冬青，从此开始中华冬青科的研究。此外，她在华西边疆学会会刊科学版上发表了《成都生草药用植物研究》。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可以在研究室一呆48小时，不眠不休地工作。她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一个植物标本室，以个人的努力，收采了18000份的标本。尽管已是93岁的高龄，仍然保持上山采标本的习惯。自1945年以来，胡博士发表超过150份的植物原创研究、专题论文，还出版了不少图书著作。她的博士论文早已在哈佛大学出版。美国冬青学会更用她的名字设立生物学奖学金，以纪念她在冬青科研究方面的贡献。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的成立发展也离不开胡

---

① 香港电台：《杰出华人系列之胡秀英》，2001年11月4日，资料来源，[www.rthk.org.hk](http://www.rthk.org.hk)，2001年11月17日。

博士的努力。目前，胡秀英正大力推动中国药用植物的研究。胡秀英精通拉丁文和其他5种语言，她所写的《中药词汇》/ *An enumer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详载了中药的中、英文学名和拉丁文对照。现已出版第二版。哈佛大学生物系主任 Robert Cook 对她有很高的评价：“像胡博士这样举足轻重的专家，她对植物分类学、特别是中国植物，作出重大贡献。”2000年，哈佛大学植物标本室将胡博士一手研究的《中国植物志》/ *Flora of China*，总共150万种中国植物，以“Hu Card”放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学者研究参考。正如她所说：“我走遍山野海边，为的是将自己的知识服务社会。”<sup>①</sup>

虽然长年身在海外，胡秀英仍然关注祖国科学的发展，关心金陵校友们的生活。1960年，她在波士顿近郊买了一所房子，为金陵校友提供一个可以憩息的地方。1975年回国时，她会见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回到香港，她把中国植物学界的工作介绍给国际上的同行。她说：“中国的植物学界，在治学环境很不顺利的时候，坚韧卓绝，著述中国植物志80余卷。科学不能分国界，植物学国际命名法中有一条是‘先入律’，就是一个新种的命名，以合法发表最早的算数，其后发表的作废。我的同胞，应该享有公平合理的权利！”<sup>②</sup>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胡秀英与国内植物学家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她时常为国内植物界学人写推荐信，甚至为赴美访问的国内学者招待食宿。胡秀英本人是位基督徒。她说：“生命是在乎奉献，我年轻的时候，几次奉献，要传教，但是我没有。所有的机会都没有让我去传教，总是给我机会更高一步去研究，结果我在这做研究。机会给你，你丢了是不行的，就

---

① 香港电台：《杰出华人系列之胡秀英》，2001年11月4日，资料来源，[www.rthk.org.hk](http://www.rthk.org.hk)，2001年11月17日。

② 胡秀英：《芥菜种子一粒》，《金陵女儿》，1995年，90页。

不守本分。就不是神的安排。”<sup>①</sup> 在胡秀英的生活中，工作与信仰结合在一起。“工作是我对社会的应许，神要我做下去，我就做，实在我的日期来到，我不能做，不是我的罪过。”<sup>②</sup>

胡秀英对金陵女大有深厚的感情，怀念吴贻芳校长。“我们这一代的金陵人，回想金陵也怀念吴贻芳校长，她永远是我们的楷模。1928年我们同时进金陵。她从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得了生物学博士，返金陵作第一位华人校长。我是新生，她爱金陵，看每个学生像自己的子女。中日战争期间，带着师生逃难到四川成都，在华西大学女部院旁，重建金陵！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又带师生经过大西北，陆路再返回母校。她舍己为人的风范，我们要始终学习。《厚生》校训出自‘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接下去是‘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吴校长是第一班毕业生、第一位华人校长。她在金陵得着丰盛的生命，为金陵献上生命。代表中华民族，向世界发光。今后的金陵人，要跟着她的脚步走。”<sup>③</sup>

### 三、校友会与“新华南”、“新金陵”

校友对母校的忠心离不开校友会的工作。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非常重视校友工作，除了组织各地校友会（也称同学会）外，还在校内专门设立校友部，由校内老师兼职负责这一工作。比如，华

---

① 香港电台：《杰出华人系列之胡秀英》，2001年11月4日，资料来源，[www.rthk.org.hk](http://www.rthk.org.hk)，2001年11月17日。

② 注同上。

③ 胡秀英：《金陵予我》2001年，胡秀英手稿。

南校友陈钟英 1949 年毕业后留校担任的职务是“文史系助教兼校友部工作”，金陵校友黄续汉在金陵女大工作的职务也是“学生生活辅导员兼金女大校友会执行干事”。金陵、华南校友会是毕业生联系沟通的桥梁，也是学院延续生命力的重要一环。以上海金陵女子大学校友会为例。1924 年，“金陵同学逐渐增加居沪者及服务于沪者亦日多一日，故有组织上海金陵女子大学同学会之必要，旋由本校毕业生同盟会杨竞学女士于二月间召集居沪金陵女子大学生于 (Mrs. Hiltner's) 席夫人之府，到会者十余人，选举临时职员筹备一切”。这个上海金陵同学会设有会长、副会长、书记、会计等职。<sup>①</sup>1928 年，北伐军进驻南京城，德本康夫人等外籍教师离校的紧急时刻，上海金陵校友会派严莲韵、刘剑秋和邓裕志三人回金陵女大协助管理。刘负责总务兼保健，严抓教务，邓负责管理<sup>②</sup>。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大学被取消之后，台湾、香港和海外的校友会继续活动。1956 年 11 月 4 日（金陵女子大学的创始人日），台湾金陵女大校友会成立台北金陵女中（又称厚生女中）。台北金陵女中坐落于台北北安路 400 巷 2 号<sup>③</sup>。首任校长是徐秀英，仍以“厚生”作为校训。金陵女中现址在台北县三重市，1979 年改称金陵女子高级中学，现任校长黄盛兰。在香港，金陵女大校友也非常活跃。1973 年金陵女大同学会香港分会的报告称，香港金陵同学会的职员分别有会长谢迎娟、副会长何庆华、秘书罗怀玉、司库张汉秋、康乐何洁玉。校友们通过各地同学会互通消息，开展各种纪念母校的活动，帮助有困难的校友。据 1959 年美国金

---

① 《上海金陵女子大学同学会组织之经过》，《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4 年 6 月，45 页。

② 李葆真：《爱母校至深至长的严莲韵》，《金陵女儿》，1995 年，36 页。

③ “A Brief Report on the Taipei Ginling Middle School”，YDSL, UB Archives, Box154, Folder2957, Paee0128.



陵校友会 (GAA) 的一份文献报告, 美国金陵校友会在过去 10 年中帮助许多新来美的金陵校友适应美国的生活, 甚至介绍工作<sup>①</sup>。

在国内, 华南、金陵校友会工作曾一度停顿。“文革”结束后, 两校的国内校友会又重新开始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 校友会再度凝聚海内外校友的力量, 先后创建“新华南”、“新金陵”。“新华南”的建立是以余宝笙为首的华南校友会的心血结晶。80 年代初, 余宝笙从北京的华南校友了解到燕京大学校友会已重新成立。她回福州后重新组织了国内华南校友会。余自任理事长一职, 校友会的工作目标很明确——在福州建立华南女子学院。华南校友会在创建华南女子学院时遇到过一些困难。在余宝笙和校友多方奔走之下, 最终于 1985 年 10 月 18 日在福州仓山区烟台山下建立一所女子学院。这就是“新华南”, 全称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她“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所民办的女子高等职业教育学府。她的创办是一个热心妇女教育的群体——建校于 1908 年的福州私立华南女子学院暨附中的校友会 (包括海内外的各分会)。校友总会理事长余宝笙任院长”。“学院以‘自强, 开拓, 勤朴, 奉献’为校训, 旨在培养高素质的妇女人才。设置有四个专业: (1) 实用英语: 培养学生具有纯正流利的英语口语, 兼及粗识日语, 并有从事经济实务、公关文秘的能力; (2) 儿童教育与咨询: 培养学生具有从事儿童教育工作的能力, 尤其是在儿童智力的开发与心理行为的矫正方面能运用现代最新的科学方法来开展工作; (3) 营养与食品科学: 培养学生具有食品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实验室的基本技能, 并具有制作食品、运用食品疗治疾病和平衡营养、改革饮食结构的能力; (4) 服装设计工程: 培养学生具有现代服装的鉴赏力和

---

<sup>①</sup> “a Letter from Miss Edith Haight” (1959. Aug. 27th) YDSL, UB Archives, Box131, Folder2678, p. 0467.



设计各种服装的能力，并掌握服装制作工艺市场营销的技巧，同时还要学会训练服装表演队或当服装模特的技能。四个专业的学生都要求学好外语和应用计算机。”<sup>①</sup>“新华南”的学生规模远大过华南女大。据介绍，“在校学生保持500余人的规模，学制3年。建校10年来已为国家培养了1300余名毕业生。”“新华南”是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女子高等教育学府，人员自聘，经费自筹，在香港设有校董会。历届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建社会各界都给予过有力的支持。另外，学院还先后和美国亚联董、中国爱德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建立了交流合作协议。福建华南女子学院首任校长是余宝笙，1996年余宝笙逝世，1949级校友陈钟英接任校长至今。

“新金陵”的成立略迟于“新华南”。1985年11月，吴贻芳逝世时留下遗嘱：“把金陵女子学院建起来，而且要建得比老‘金女大’更好。”<sup>②</sup>“1987年，江苏省政府正式批准：在南京师范大学学校内建立金陵女子学院。”与“新华南”的民办性质不同，“新金陵”是设在南京师范大学内的公办民助式的女子学院，行政建制上归属南京师范大学。金陵校友们为“新金陵”的成立尽了最大的努力。“到1987年金女院建立时，仍有数百位老校友健在，这些老人虽居住在海内外，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为金女院的新生出点力。经过磋商，北美、上海、北京、四川等地的校友会，委托南京校友会负责金女院的具体筹建工作。”

为支持“新金陵”的办学，1985年11月3日，“海内外校友一致提出要成立吴贻芳基金会，为实现吴校长的遗愿募集基金”。

---

① 《福建华南女子学院：建院十周年纪念特刊》，1995年，8~9页。

② 黄进、严国宁：《根深脉远花正茂：南师大金陵女子学院成立十三年纪实》，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金陵女儿》，2000年，3~7页。

有出身富裕家庭的。严彩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她的祖父严筱舫是宁波籍富商，上海总商会第一任会长。严彩韵 15 岁时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同年考入金陵女大。1921 年，19 岁的她就已大学毕业。这年秋天，严彩韵前往美国波士顿史密斯大学专修食品化学和营养学，暑假时，她又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修读三门功课。恰巧，金陵女大有位学生张肖梅申请去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芝大校方因不知道中国学生的程度，不敢接受。但两星期后芝大又给中国方面来信表示愿意接纳中国金女大的毕业生，其理由就是芝大经过查询，获悉有一位金女大毕业生严彩韵，暑假时曾在芝大攻读 3 门学科，3 门均获‘A’等。由此芝大对金女大的教学水平表示了认可，愿意接受金女大的毕业生进该校深造”。<sup>①</sup>

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的校园中，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女性被熔铸成近代女知识分子。她们有良好的公民素质和知识结构。勤奋、扎实、不尚空谈是这些校友的共同特点。一位华南校友在回答笔者 2000 年问卷调查时说：“华南的教育对学生的为人方面，绝对是诚实而忠厚的。”归纳起来，华南和金陵的校友特质有两方面。

一是女性的群体意识。这表现在她们对母校精神、教育传统的认同感。一位华南校友在晚年回忆中说：“华南给我们非常崇高的理想和人生准则，后来不论生活在哪里，这个谆谆教导总在我们耳际回响。它帮助成就今天的我们，并通过我们传给下一代。”<sup>②</sup>如前所述，不论是建国初期新旧政权更迭，“文革”中饱受冲击，还是在 80 余岁的垂老之年，余宝笙都在不懈地努力钻研科学，服务社会。周苏藤亦是如此。无论顺境或逆境，两位华南校友都没有忘记服务的精神。1981 年周苏藤访问中国教会时，还特地就

---

① 严莲韵：《我的大姐，营养学家——严彩韵》《金陵女儿》，1995 年，26 页。

② 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4 辑，601 页。

一步造福社会，否则连自立也不可能。”<sup>①</sup> 金陵女大校友的子女在回忆自己母亲的教导时说：“母亲在世时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时常告诫我们：女孩子一定要自立，只有能够自立，才谈得上个人的幸福。”<sup>②</sup>

---

① 余少玉、江德爱、黄兴灵、李碧钦：《缅怀敬爱的余宝笙老师》，《余宝笙院长纪念集》，福建华南女子学院编，1996年，21页。

② 彭新珠等：《缅怀我们母亲——冯邦新》，《金陵女儿》，1995年，910页。

## 第八章

### 结 语

---

宋儒欧阳修说：“自古女祸，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身亡。身苟免矣，犹及其子孙，虽迟速不同，未有无祸者。”<sup>①</sup> 明儒谢肇淛亦称：“夫子谓‘女子小人为难养’，《书》称‘纣用妇言’……凡妇人、女子之性无一佳者，妒也，吝也，拗也，懒也，拙也，愚也，酷也，易怒也，多疑也，轻信也，琐屑也，忌讳也，好鬼也，溺爱也……”<sup>②</sup> 这样的言论在数千年封建中国的主流文化中俯拾皆是，直接反映出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近代百余年中国现代化发展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女性的命运。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妇女的改变是始自西洋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鼓吹，他们借由宣传及实际行动，唤醒社会对妇女的关注；其后政府与政党也相继制定政策，以图改变妇女生活及其地位。经由女权思潮与妇女政策的交互激荡，接受新观念的女性，自上而下、由点至面的不断增加；为达成两性平权，她们不仅被动的接受，也主动地发起妇女运动，同时出现应和政策与颠覆体制的两

---

① 欧阳修著、徐无党点校：《新五代史》（第1册）《梁家人传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27页。

② 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48页。

极反应。无疑的，促使妇女改变的因素不止一端”。<sup>①</sup>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洪流中，基督宗教曾是重要的“一端”。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工作则是其中之佼佼者。严格说来，金陵女大、华南女大不是最早的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机构。<sup>②</sup>但是，金陵女大、华南女大作为近代中国唯一两所长期独立存在的女子综合大学，足以作为近代中国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的范例。本书中，作者从出现背景、校长治校、社会角色、教育角色、性别角色以及校友表现六个方面分析了金陵、华南历史的各个层面。每一章小结部分，作者作了自己的评述。相信读者能够从中清楚了解作者的论点。

总括而言，金陵女大、华南女大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她们的治校者，如吴贻芳、王世静，有着相似的身世背景、治校经历。校训“受当施”、“厚生”的意义也颇为相近。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两所基督教女子大学更多的是“应和政策”的改良倾向，少有“颠覆体制”的激烈行动。而且，华南与福建协和、金陵与金陵大学分别同处在一座城市，彼此间发生过激烈的合校争论。建国后的高校调整工作中，金陵女大、华南女大都变成师范类院校，即今天的福建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她们都有一群忠心的校友，基于发展女子教育的理想，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后重建了“新华南”、“新金陵”。

---

① 《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上册，台湾：国史馆编印，1998年，161页。

② “美国北长老会医疗传教士富马利医生（Dr. Mary Hannah Fulton, 1854~1927）在广州设立的夏葛女子医学院（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自1906年起，就已经为中国女生提供四年制的医学本科课程。1907年起，该校毕业学生的医学证书由美国领事及两广总督共同颁发。”彭淑敏：《清末民初中国妇女的医疗教育：广东夏葛女子医学院（1899~1916）》，香港浸会大学主办《辛亥革命、孙中山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23~25页。



另一方面，两校办学水平存在明显差异。1943年，联董负责人芳威廉等曾和教育部副部长顾毓秀讨论女子教育问题。顾毓秀表示，除了几间女子师范学校外，政府无意再单独办理女子高等教育。顾认为，假如有一流的水准，可适当保留一两间女子大学。顾还高度赞扬了金陵女大，认为华南女大应该发展自己的办学特色<sup>①</sup>。顾的评价实际上反映了金陵女大、华南女大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界中不同的地位。比较而言，金陵女大是一所全国性的女子大学，生源遍布大江南北；华南女大基本上是一所地方性女子大学，其影响力主要局限在福建地区。造成差异主要源自两个因素。一是创校模式的不同。华南是单个差会兴办的女子大学；金陵则是多个差会合办的协合式女子大学。创校模式的不同引发出一系列差异，如经费收入、办学水平、社会影响等等。二是地域文化的差异，民国时期的江苏、福建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区。政治、经济、文教乃至交通的条件相差甚远。金陵、华南的办学自然要体现两个地区差异的影响。可以说，两校之间相似点代表着近代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的共性，而两校之间的差异则反映了不同地区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的个性。

时下，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根本性改变，但是，歧视女性的社会现象仍然存在。对于女性而言，机会平等的道路依然山长水远，坎坷不平。本书的研究或许可以作为今后中国妇女工作的历史参考。正如王奇生教授所指：“1949年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的改革和调整，专门性的女子大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内地不复存在。”但随着“新华南”、“新金陵”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建立，“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又将步入一个新的发

---

<sup>①</sup> The Letter from William P. Fenn to Charles H. Corbett, (1943, September 12) YDSL, UB Archives, RG11-8-189.

教育史，于教会办学之得失利弊素有心得。每次阅稿，吴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阅读、批注。所提意见常常扣中肯綮，予我启发。也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江大惠先生、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李金强教授，他们是论文评审组的成员，为我完成毕业论文提供了实质性帮助。另外，这本专著也离不开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领导和老师们的支持。林金水教授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基督教史、中西交通史学家，多年来一直关心我在学术事业上的成长，谆谆教导，无微不至。谢必震教授是带我走向基督教史研究的另一位导师，我对中国基督教教育史的研究兴趣即源于谢教授的教诲启发。福建师范大学李湘敏教授《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一书也是我撰述时的宝贵参考。本书笔者还参考过许多学术前辈，尤其是王奇生、曾芳苗、黄洁珍等人的研究成果。他（她）们从各自角度对近代基督教女子大学作过精辟的论述与分析。许多金陵女大、华南女大的校友也以个人访问、书信查询等方式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这些都是本书的重要基础。笔者的工作只是向前略走了一小步而已。至于书中错误的责任，应该悉数归诸笔者。

义山诗：“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极写相思之情。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感情常常亦如是。研究愈深入仔细，历史人物、事件愈发鲜活地呈现在自己的脑海里。构思章节、钩沉史料，无不念兹在兹。不知不觉中，著述竟成了作者自己的挚爱，唯恐有错漏之处，唐突前人。临出版前，仍有挂一漏万的惶恐、“墨尚未浓”的遗憾。故此，恳盼读者不吝赐教，多加批评。

朱 峰

2002年仲春识于香港沙田

## 附录一

### 主要参考文献

---

#### 档案资料

华南女大档案、福州、福建省档案馆藏

金陵女大档案、南京、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Group Number 11, Compiled by Martha Lund Smalley & Karen Jorden.

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及手稿缩微胶卷第11组,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史玛莉,凯伦·乔丹编目,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系吴梓明教授珍藏

#### 中文部分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刊》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

《金陵女子大学校刊》

《教育杂志》

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巴顿调查团：《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王孝绮等编：《西清王氏族谱》，1935年。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4年。

王桂芳等：《金陵文化概观》，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纽曼选集》，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7年。

冯梦龙：《全像古今小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

民国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传记文学出版社，1930年。

池贤仁主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福州：华艺出版社，1992年。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

阮雁鸣：《杜威学说与中国教育》，香港：文教图书社，1966年。

庄泽宣：《抗战十年以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

李香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周策纵著：《五四运动史》，杨默夫编译，台北：龙田出版社，1981年。

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陈颐：《颐园老人忆往》，台湾：闽光出版社，1990年。

陈叔通：《百梅书屋诗存》，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陈启天：《最近卅年中国教育史》，台湾：文星书店，1962年。

陈书禄主编：《江苏文化概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林家钟：《福州历史人物》，第一辑，1988年。

林耀华：《金翅——传统中国家庭的社会化过程》，宋和译，台湾：桂冠社会学丛书，1986年。

林中泽：《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相遇——以利玛窦《天主实义》和庞迪我《七克》为中心》，广州中山大学专门史专业博士论文，2000年，未刊稿。

金陵女大校友会编：《金陵女儿》，1995年。

金陵女大校友会：《永久的思念》，1995年。

金陵女大校友会编：《金陵女儿》，2000年。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台北：时报出版社，1983年。

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6年。

胡秀英：《金陵予我》2001年，胡秀英手稿。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3，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高时良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郭榕生：《福州民间办学的缘起与现状》，《教育评论》，福建教育学会，1993年第2期。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增订版。

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神学学部硕士论文，1996年，未刊稿。

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姚柯夫编：《陈中凡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梁家麟：《广东基督教教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3年。

秦孝仪主编：《战时教育方针》，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7月。

版社，2000年。

## 英文部分

Burton, Margaret 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Diffendorfer, Ralph E. : *The World Servi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Chicago,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Council of Boards of Benevolence Committee on Conservation and Advance, 1924

Earl Herbert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28

*Educational Review*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 ~1938.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Boston;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at Harvard University, 1974.

*Foochow Woman's Conference, 1919~1930/*. ~600 p.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31.

Graham, Gael Norma,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U. M. 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 Bell & Howell Company 1994

Gregg, A. H. ,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46.

Heathen Woman's Friend (vol. 15) Boston: Woman Missionary Society

Harris, Marjorie Jane, *American Missions, Chinese Realities: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China Union Women's College/ Yenching Women's College 1905~1943*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94

Hunter, Jane: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Ida Belle Lewis,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 Ph. 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19.

Miao, C. S. & F. W. Price, *Religion and Character in Christian Middle School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2.

Mitchell, Juliet & Ann Oakley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Women* Great Britain: Penguin Book Ltd, 1977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 1890)

*Record Group No. 11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Constitution; Board of Trustees; Hwa Nan College Committee of the UBCCC

Reuben Holden, *Yale—in—China, the Mainland: 1901~1951*, New Haven: Yale—China, 1964

Robert, Dana L. , *American Women in Missio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ir Thought and Practice* Macon,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Roderick Scott: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A Historical Sketch*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4.

## 附录二

# 2000年华南女大校友问卷调查及基本数据

---

### (一) 2000年问卷调查表<sup>①</sup>

\_\_\_\_\_校友：

本人朱峰，是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班研究生。因个人兴趣，现打算深入研究华南女子学院近百年来的发展历史。

惟历史重构不可全恃文献资料，尤不能忽视事件参与者的声音。目前，本人只有官方文献、美国联董档案。假若没有贵校友的宝贵经历，有关华南历史之研究皆为不完备之记录。历史的价值乃在于承载之精神，而您正是这段历史的亲身参与者，您所见证的华南历史是非常宝贵的。因此，敬希各位校友帮助，共同恢复这段历史真实。

---

<sup>①</sup> 本问卷调查的格式曾参考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一书中，对燕京大学校友的调查问卷，特此说明。

# 问 卷

---

本问卷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请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填写；第二部分为选择问题，请在您所认为合适的号码前打勾；第三部分为简答题，请尽可能简短地回答所提问题。本问卷不记名、不以个人材料形式公开发表，仅供有关人员进行相关分析与研究时参考。敬请各位校友协助支持。

## 关于华南女子大学的问卷调查

—

性别\_\_\_\_\_职业\_\_\_\_\_ / 离退休前职业\_\_\_\_\_

在华南母校学习时间：\_\_\_\_\_ 系别：\_\_\_\_\_

在华南女大工作时间：\_\_\_\_\_ 系别：\_\_\_\_\_

二

请在您所认为合适的答案号码前打勾：

(1) 入华南时父亲（或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者）的职业



- A. 工商金融界    B. 军政界    C. 教会工作者
  - D. 工人    E. 农民
  - F. 专业技术人员（如教师、医生、律师、编辑、文学艺术等）
  - G. 其他
- (2) 入华南时家庭宗教背景
- A. 父母双亲都是基督徒
  - B. 父母双亲中一人是基督徒
  - C. 父母双亲都不是基督徒
  - D. 信仰其他宗教（佛、道、回等）
- (3) 个人入华南时宗教背景
- A. 信仰基督教    B. 信仰其他宗教
  - C. 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 (4) 入华南前在哪类中学里接受教育
- A. 教会中学    B. 公立中学
  - C. 其他私立中学    D. 其他
- (5) 入华南前对华南的了解主要通过
- A. 家长或亲属    B. 朋友或师长
  - C. 报纸等公共宣传媒介    D. 其他
- (6) 为什么选择进入华南
- A. 因华南有学术声誉    B. 因华南物质生活条件好
  - C. 因华南是教会学校
  - D. 因其他学校关闭转而选择华南
  - E. 其他
- (7) 在初入华南时对校园生活有何感想？
- A. 很适应    B. 有点不适应    C. 很不适应
- 为什么？

- A. 华南的物质生活      B. 华南的学习生活
- C. 华南的宗教生活      D. 华南的师生关系
- E. 其他

(8) 在华南期间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况

- A. 一贯参加      B. 经常参加
- C. 偶尔参加      D. 从不参加

(9) 在华南期间参加基督教团契的情况

- A. 一贯参加      B. 经常参加
- C. 偶尔参加      D. 从不参加

(10) 在华南时以何种经济资助完成学业

- A. 完全由家庭资助
- B. 完全靠奖学金
- C. 完全靠勤工俭学
- D. 部分由家庭承担，部分靠奖学金支助
- E. 部分由家庭承担，部分靠勤工俭学
- F. 部分由奖学金支助，部分靠勤工俭学
- G. 其他\_\_\_\_\_

(11) 在您的家庭是否还有人在华南学习或工作过

- A. 有      B. 没有

(12) 如果您是某一党派团体成员，请回答加入的时间

- A. 入华南之前      B. 在华南期间      C. 离开华南后

(13) 离开华南之后的去向

- A. 赴国外学习或工作      B. 在国内学习或工作

### 三

请用一两句话简短回答下列问题：

(1) 作为华南的毕业生，您认为华南的学习生活最令人怀念的地方是什么？

---

---

(2) 您认为华南教育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

---

(3) 您对学院的中外籍教师分别有何评价。

---

---

(4) 如果您参加过抗战时期的华南生活，请谈谈当时最深的感受。

---

---

(5) 您认为华南作为女子高等教育，同其他男女同校的女子教育有何不同。

---

---

(6) 您是否知道今日的华南女校，有何期许？

---

---

## (二) 基本数据

发出问卷：255 份

有效回卷：67 份；回收率：26.2%

回卷校友之职业、主修专业暨毕业时间：

1. 1930 至 1940 年毕业:

主修专业	人数	职业	备注
化学	3 位	教师	
教育	2 位	教师	
生物	1 位	教师	

2. 1941 年至 1949 年毕业:

主修专业	人数	职业	备注
教育	6 位	教师	
文史	2 位	教师	
外语	7 位	5 位教师; 2 位科研	
生物	3 位	教师	
化学	8 位	1 位科研; 7 位教师	

3. 1949 年后毕业:

主修专业	人数	职业	备注
外语	6 位	教师	
生物	2 位	1 位科研 1 位教师	
文史	3 位	教师	
教育	7 位	2 位干部 5 位教师	
化学	11 位	1 位科研 10 位教师	

4. 无法确知毕业年级的校友答卷:

主修专业	人数	职业	备注
化学	2 位	教师 科研	

朱：那您为什么没有回到自己的母校——徐州正心女中工作呢？

胡：我是很想回去。但是，正心女中是所守旧派的教会学校。当时我们的教会叫南长老会，南长老会比北长老会守旧。有个名人叫毕范宇，也是我们教会的。他的太太是我的朋友。南长老会的人说，若不能在课堂上教圣经，学校就关门。立案后政府又不准在课堂里教圣经，所以美南长老会就把正心女中关闭了。我们徐州教会自己组织起来，重新复校。本来，徐州教会办两个中学，男的叫培心中学，女的叫正心女中。我原来是正心女中毕业的，是正心女中资助我上金陵女大读书。我哥哥是在培心中学毕业的。结果呢，我们教会的中国牧师，是金陵神学院毕业生，叫王恒心。大家举他当校长。他就把培心和正心合起来开办，叫培正中学。我们这些正心女中校友知道教会要关校门这件事，夏天在教堂演戏，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演戏的钱用来捐建学校。

朱：您有去表演吗，当时不是在金陵女大念书吗？

胡：我在毕业后的暑假回家表演。

朱：是啊，金陵女大经常表演节目，像话剧、舞剧的。

胡：在金陵女大，有个体育系同学叫凌佩芬。凌佩芬小我几岁，我们只要扮戏，她一定做女角色，我一定做男角色。凌佩芬的父亲叫凌道扬，是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森林系毕业生，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第二任院长。凌佩芬是她的大女儿。凌道扬本人是香港粉岭人，他有很多田园在那里。请他做崇基校长时，港督来看他，问他需要什么。他说，我是个林学家，我一直在大陆办森林，我希望有地可以种树造林。港督问凌道扬，你要多少地。凌道扬说，给我300英亩吧。后来，这300英亩就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址。

朱：您在岭南大学毕业后，就到华西大学工作吗？



胡：不是，我是1937年6月毕业，拿到硕士文凭后，就去南京，预备在中山陵植物园工作。我把行李都放在植物园。植物园的主任叫傅涣光。然后，回徐州老家。几天后，七七事变。南京被轰炸。我冒险到南京把行李拿回家。情况越来越坏，结果我就逃难。逃难到了成都。所以，是逃难到华西大学。当时金陵生物系主任黎富思教授推荐我到华西生物系教植物学。

朱：是那位推荐吴贻芳当金陵校长的黎富思教授吗？

胡：是啊，黎富思为让吴贻芳当校长，失了很多钱。因为她想叫吴贻芳当校长，而德本康夫人想叫郝映青当校长，恰巧她在纽约有遗产需要回美国。她为了让吴贻芳当校长，不肯离开金陵。她没有回美国，结果就丧失了遗产的继承权。

朱：为什么德本康夫人不选吴贻芳当校长呢？

胡：吴贻芳会读书，但不会说话。而郝映青是善于说话的，可以站起来说话。德校长认为郝是一个领袖人材。但黎富思教授看到的是另一方面，吴不光是博士，是一个很安静、很好的实干家。可能起初吴贻芳说话是不太行，可后来她慢慢的会说话了。慢慢学，学得很好。

朱：当初您到了成都，为什么不到金陵女大工作呢？

胡：我到成都，金陵女大还在路上呢。黎富思是1937年7月到四川的，在峨眉山上过夏天。后来，就在华西大学教生物。从前很少人愿意去成都，我到华西大学时，他们没有人教植物学，所以我就被请去了。

朱：您可以谈谈华西的情形吗？

胡：华西坝当时有位 Andrew T. Roy<sup>①</sup>，他当时是金陵大学的教员。

后来崇基在香港建校时，他又被纽约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派来崇基工作。

朱：您知道葛德基/E. H. Cressy 这个人吗？

胡：哦，他不住在那里。

朱：我为什么说这个人，是因为他一直在推动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合并。您知道这事吗？

胡：我不知道这事。他是疯疯傻傻的一个人。总而言之，大家都不喜欢他。以我所记，他没来华西坝的基督教大学。在华西坝，金女大最先搬过来。后来，齐鲁在贵格会的地方建校。后来，燕京搬来时，老师住在华西坝，学生住在美以美会中学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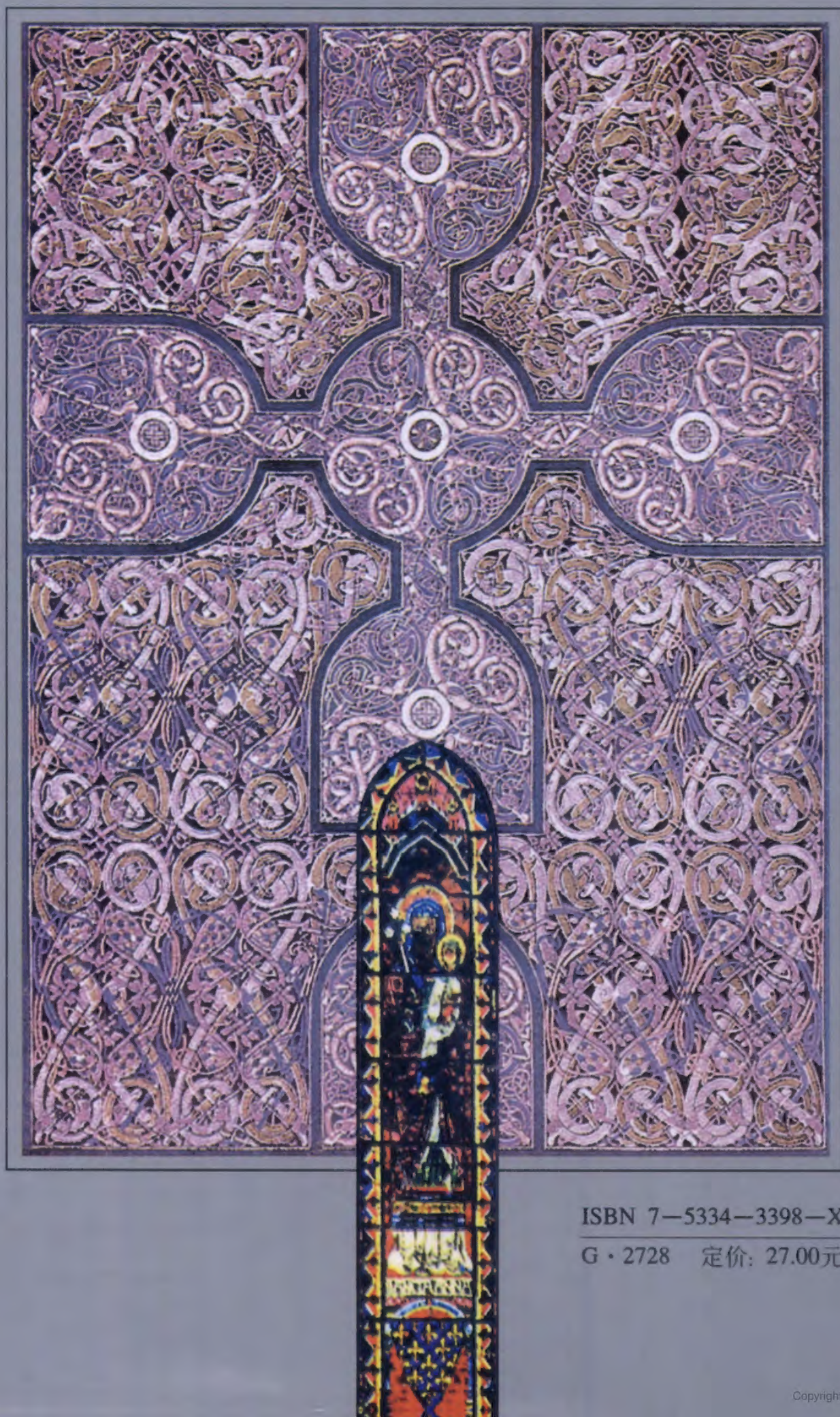
胡：在华西坝这地方，各大学的人来了后，成为文化区。大家就组织了一个 Chengtu International Women's Club。进这个 Club 的，都必须是大学毕业，用英语说话。我到了华西一两年后，她们让我做 president of club。如果我没有在金陵读过书，我就不能做这个主席，因为要会英文，会组织会议。这么一来，我就认识了很多人。其中，我认识一个照 X 光的医生，是齐鲁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叫 Dr. Theodore Greene。他们做传教士的人，每 7 年有 1 年的休息。因为他和他太太都是哈佛人，他回去的时候把我的申请表和成绩拿去，所以我申请哈佛就成功了。那时美国也很少中国人去，所以有这

---

① 即芮陶庵博士。芮陶庵，美国得克萨斯州人，大学时代，参加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受长老会差派，来华传教，曾任教于金陵大学。1945 年，芮陶庵返美，在普林斯顿大学修读哲学博士。不久，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院校牧，神学院院长，崇基学院副院长，兼授社会学课程。1972 年，芮陶庵退休，定居在费城。参芮陶庵著：《渴慕更深》（叶树慧译），（香港崇基学院，2001 年）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



ISBN 7-5334-3398-X

G·2728 定价: 27.00元